

周恩来

总理生涯

熊华源 廖心文 著



责任编辑：王德树
封面设计：王德树
肖 辉
版式设计：朱 强

周恩来总理生涯

ZHOENLAIZONGLISHENGYA

熊华源 廖心文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X1168 毫米/32 印张：18.25 插图：2

字数：440 千字 印数：1—21,000 册

ISBN7-01-002544-4/D·692 定价 30.00 元

后记

10几年来，我们一直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曾参加撰写《周恩来传（1898—194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的工作，目前正参加撰写《周恩来传（1949—1976）》、《周恩来年谱（1949—1976）》的工作。

几年前，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同志提议，希望我们能写一本生动而真实地再现周恩来总理生涯的普及性读物，奉献给衷心爱戴并热切期望更多地了解周恩来的人们。这是一项使我们兴奋不已的很有意义的光荣任务，理应尽心竭力把它做好。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准备，我们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断断续续却是严肃认真的写作，终于写成本书。

为了区别于近两年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体书籍，我们选择了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片断，以独立成篇，而又不失内在逻辑联系的形式，以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和简洁明快的文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光彩照人的思想、生平和业绩。其中第1—10、15、20—23、25、28、29、36篇由熊华源撰写；第11—14、16—19、24、26、30、32—35篇由廖心文撰写。另外，第27篇由杨明伟撰写；第31篇由陈扬勇撰写。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现任室顾问李琦同志，原室务委员、研究员力平同志的热心指导与大力帮助，请他们审阅了全书，并承蒙力平同志为本书作序；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副研究员安建设同志审阅了部分书稿。我们还得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马连儒同志、国际编辑室副主任王德树同志和原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吴学金、肖辉、朱强、李兰亭、吴志敏、吴侮平、高丽华等同志也分别参加了本书的审稿、封面设计、校对等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限于写作水平，书中若有错漏不当之处，祈盼读者指教。

作者

1996年6月于北京毛家湾

序

力平

1935年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境遇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急起直追，要使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任总理，而且连续担任了26年。在这26年中，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内忧外患，周恩来都以他杰出的才能和忘我的精神，化险为夷，逢难拓路，使政府机构运行不息，国家日益强盛。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由世界上有数的贫穷落后之邦，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作为总理治国20多年，日理万机，工作涉及内政外交，方方面面。他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戒慎恐惧，虚心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经验，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思想和意见。这些思想和意见，有些付诸实行了，有些虽然没有能付诸实行，但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在总理生涯中，始终是艰苦朴素，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优美情操和高尚品德。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既有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物质文明建设，也有利于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熊华源、廖心文同志研究周恩来都已有10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他们对周恩来的总理生涯，写得信而有证，绰有新意。这本书，为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提供了不少值得珍视的内容。特此为序。

1996年7月

周恩来总理生涯

筹建首届“内阁”

毛泽东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刚在一小时前正式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霎时间，在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飘舞的海洋中，爆发出长久的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后，毛泽东启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国旗迎着高悬蓝天的红日徐徐升起。这一时刻，标志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项任命，党中央广泛地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各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对周恩来的高度信任和支持，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早在1948年初夏，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向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¹、朱德汇报工作时，就提出了应该赶快抓经济工作的建议。但是怎么个抓法，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这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朱德强调说：“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了解中国革命形势。他在同周恩来会谈后，不无感慨地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开国大典后，被朱德、毛泽东分别亲切地称之为“好管家”、“内阁总理”的周恩来，便集中主要精力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怎样设置？周恩来在开国大典前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一次报告中就已作了概略的介绍。他说，“政务院下面设4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30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

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筹建政务院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

¹ 当时刘少奇兼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

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特别是领导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就是在这以后陆续从各大区调来政务院（1954年9月以后为国号院）工作的。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筹建政务院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因此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

1949年3月24日，最高统帅部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向古都北平转移途中，召开了一次商议25日抵达北平后所要做的有关事情的小会。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回忆：

周副主席说，到北平以后，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那些知名党外人士，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傅作义、柳亚子、茅盾等见面。这些人过去就和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更高兴了，他们急于想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成立新政府以后，他们能安排什么工作等等。关于党外人士如何安排工作的问题，我们到北平以后，还要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进行协商。毛主席说，我赞成恩来的意见。对做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的职务。但是，怎样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

周恩来做了大量平衡与协调工作，将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数是由他提出来的，并且做了大量平衡与协调工作。

首先是对傅作义的安排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这样一批国民党著名将军。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其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一大功劳，一定要再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

周恩来在西柏坡对傅作义说：

早在1949年2月22日，傅将军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在敌后合作打日本的。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的嘛……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样的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

鉴于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就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藻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中共中央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他请傅作义推荐入选，并对李藻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个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

家；另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北平市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第二是劝说德高望重的黄炎培担任公职。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社会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始终奉守“不为官吏”的立身原则。对此，有人说他是故鸣清高，也有人说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1949年3月，黄炎培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

鉴于这一情况，10月11日下午，周恩来前往安儿胡同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1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充满敬意地望着这位比自己大20岁的老人，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理屈词穷”，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还需要考虑考虑，等他第二天回话。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12日早晨，黄炎培广泛征求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的盛情邀请之下，他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

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这时，黄炎培高高兴兴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子女感到难以理解了。任职后不久，他在大连工作的四子黄大能因公出差到北京，一见面就问他爸爸：您“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详告了周恩来做他工作的经过，并严肃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呵！”

无独有偶。在旧社会也曾拒绝过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的林业学家梁希，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第三是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

让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有人为此大惑不解，提出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呢？

周恩来解疑说：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对党也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

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一波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

李书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的。

周后来力排众议，不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职务。民主人士纷纷称赞道：“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由于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机，所以在他综合平衡下，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差不多都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在这前后，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都众口一词地提出，应该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以做到人尽其才，使她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具有深邃眼光、独到见解的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不予安排。

对此，当时有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据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卫戍司令彭干臣烈士的儿子彭伟光，1995年在他撰写的《西花厅见闻》一文中披露。

我母亲认为，邓大姐除了是总理的一个贤内助外，还应该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所以我母亲问总理：“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到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当时总理很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这个老太太倒想得挺多的呀！这个问题不是你第一次提出的，过去已经有人提过，建国初期，党内外人士都这么提过，甚至还有人劝过我，但是我不能这样做。”

“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那时，听了总理的话，我的母亲和我认为总理过于认真了。以后党和国家历史的演进，证实了总理的做法是非常英明的。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其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在这项任命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4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他们是：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 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 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 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 梁希

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 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 史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何香凝

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

对以上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纷纷称赞道：“周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

不久，陈毅也对薄一波说：“周总理平衡这个班子的功绩是，既照顾到解放区的各个方面，也照顾到延安；既照顾到各党各派，也还要照顾到被安排人的资历、职业和他的能力。”

40年后，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孙晓村在《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一文中，仍然感慨道：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上海。朋友们都讲共产党的确伟大，打下了江山，但不统统用自己的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党外人士都是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1/3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至今想起这些事情，我深感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用人唯贤的楷模。”新中国首届“内阁”——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

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部门就应该有一个组织法。现在由政务院先规定原则，再由各部门自己拟定工作条例、组织条例，以便依法办事。政务院成立后，周恩来担负起处理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根据政务院第一次会议的精神，他首先抓了《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等条例的制订，使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适应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在政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经过3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并顺利地开始了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领导政府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和非凡才华，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以后，从1954年9月起，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连续4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到1976年1月逝世，他在共和国总理的岗位上任职长达26年。

开国后的首次出访

毛泽东曾赞许道：“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1950年1月10日凌晨1时许，一辆苹果红的小轿车从中南海西北门驶出，途经府右街南口，向东转入长安街，到天安门后折向南行，旋即驶进前门火车站。车刚停稳，在警卫人员的照顾下，车内走出一个人来。他风度翩翩，身着黑呢中山装，外罩黑色皮大衣，头戴棕色皮帽子，微笑着，会同等候在车站的同行者，神采奕奕地径直向早已停靠在站台旁的专列走去。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开国总理周恩来。

同行者有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中财委计划局长沈鸿、周恩来警卫秘书何谦、贸易部机要秘书苏农官。

2时正，长鸣的汽笛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火车缓缓启动，然后向东北方向急驶而去。

周恩来此行，是要前往莫斯科辅佐头一年12月首次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就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谈判，主要是商谈取消国民党与苏联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以新的友好条约来代替，同时努力争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事宜。周恩来莫斯科之行，是善于用人之长的毛泽东点的将。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在行，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又是政府总理。由周恩来出面主持与苏联方面的谈判、签约，更为合适。他曾赞许道：“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早在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就怀着喜悦心情致电中共中央：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

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这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致电中共中央，交代准备工作的注意事项。其中，在1月3日凌晨4时电报中称：

昨日下午11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争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兮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国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座谈会作同样报告。

1月6日夜，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参与商议毛泽东2日和3日的来电内容。会议一致决议：“完全同意来电所示各项办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行动果断利落的周恩来立即开始了

周恩来动身时间实际上是1月10日凌晨。

各项准备工作。1月3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作关于中苏谈判问题的报告，并宣布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

1月11日傍晚，专车抵达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

在东北地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及其随行人员在这里上车。在这里上车的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共旅大中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陞、外贸部处氏常彦卿、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王勋，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煤矿局计划处处长罗维、东北俄文学校副校长赵洵。

专列抵达哈尔滨后。周恩来召集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出访工作的指示，并介绍对这次中苏谈判的基本设想。他说：“我们这次出访，要把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往前推进一步，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气象一新，而且有很好的政治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

13日，专列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继续风驰电掣般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由东向西行进。呈现在周恩来眼前的是一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冰雪世界，令人心旷神怡。感慨万千。

途中，周恩来抽空翻阅了名噪一时、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反映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苏联国内一些人把它奉为军事历史小说的范本。他对苏联作家竭力美化，宣扬沙俄侵华战争十分反感。在10个月后的1950年11月，周恩来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谈到了在出访途中看这部小说的感想。他说：这部小说，我是“今年1月在去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看的”。接着，周恩来用敏锐的眼光、犀利的言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他说：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

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讲得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1月20日下午5时，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车站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车站的大自鸣钟敲打了5下。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人民政府首脑的身分出访，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外交部长安·扬·维辛斯基、驻华大使尼·瓦·罗申等的热烈欢迎。

这是10年以后周恩来对苏联的再次访问。上一次是1939年。那年7月，他在延安不幸坠马，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8月底赴苏联治疗，次年3月返抵延安。

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满脸笑容地同苏联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度的举止，幽默含蓄的言谈，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

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充分肯定中苏友谊与团结重要性的简短演讲。他说：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

平进步事业毫无疑问将有重大的意义。

领命而来的周恩来不负毛泽东的重托，到莫斯科后，立即投入到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之中

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伍修权等出席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斯大林举行的酒会。

在交谈中，从体现主权的立场出发，周恩来提出苏联归还中国长春铁路应该有个年限，并且指出：（一）铁路在未归还之前，应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共同经营的股额，中方占51%，苏方占49%；（二）铁路局局长可否由中方担任正局长，苏方任副局长。苏方答复：中苏股额比例按51%和49%确定不平等，将影响苏联与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因为苏联与它们间的股额都各为一半。再就是铁路的正副局长任职，可采取定期轮换制。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中长铁路既已确定定期归还，便同意了苏方的意见。

关于旅顺口问题，有意以新协定取代不平等的旧协定的斯大林，指出可以不必顾虑《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保持1945年协定的形式而实际撤兵；二是实际上暂时维持现状，而采用一个新的形式。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苏联将放弃《雅尔塔协定》所赋予苏联在中国享有的特权。

毛泽东、周恩来的想法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海军尚未组建，不如让驻旅顺口的苏军推后一些时间撤退，但应在形式上规定撤兵期限，使中国今后收回旅顺口有法可依。如果协定形式不变，苏军撤退后还可以随时进驻，于中国不利。因此，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二方案。

在同斯大林握手致意时，周恩来看到20年不见、经历卫国战争洗礼的斯大林，已经须发皆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苍老

多了。但是，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斯大林，仍如过去那样踌躇满

志，稳重端庄，保持着他那特有的神韵，讲话一板一眼，用词简洁准确，态度友善谦和，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1月22日晚9时，周恩来陪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磋商着手起草新的友好条约和借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与方法。

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在新的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且申明对《雅尔塔协定》中所规定的苏联对大连、旅顺港所享有的特殊权益可以不去管它。还指出：现在有两类问题需要解决。第一类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与旅大问题、贸易与贸易协定问题，第二类为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

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周恩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就第一类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会议开始后，双方分别增加李富春、王稼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安·葛罗米柯、罗申参加），起草条约和有关的协定。同时决走，由刘亚楼同部长会议副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就第二类问题进行谈判。从1月23日开始，在毛泽东指导下，周恩来率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周恩来在苏联期间未见到斯大林。

葛罗米柯、罗申进行具体谈判，并着手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40年后，据当年参加该《条约》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一书中写道：

他（指周恩来）将条约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开动脑筋，贡献力量。他自己更是格外认真和精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漏洞。周总理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周总理，都为它付出了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了这看来只有几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

1月24日，周恩来将中方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随后，苏方提出修正稿。修正稿接受了原草案的基本内容，只是对文字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对结构进行了一定调整。其中，将第二条由被动式行文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尽速缔结条约；在第三条中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2月1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称：“现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电告如下，全文共880字，请令乔木校正有无错误。此案大体已定，如有个别文字修改，当再电告。”8日，周恩来致电杨尚昆、胡乔木：昨日又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最后付印稿发给你们。“此次标点符号仍不计算，亦无草案及全文字样，共计898个字，请校正是否无误”，“现已争取派飞机送文件到北京”。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拟成并送交苏方后，周恩来从1月24日开始主持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对苏方提出的《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方原则同意，只是对年利为1%的优惠条件的解释提出了修改意见，但苏方坚持原有提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认识苏联何以减少一倍的利息优待中国”。对此，中国表示谅解。

在中苏双方对有关条约和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后。2月5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告以：现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6个文件发回。有关文件，可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并在签字前一天，由你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传阅6个文件，同时由你作解释性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

2月8日，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中苏谈判进展的简要情况。从这天到2月14日，他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文字校正、签字时间和国内就此事的宣传报道等事宜起草数电发回国内。周恩来在12日致刘少奇转杨尚昆、李克农和胡乔木的电报中说：

一、7种文件及新华社社论已于11号上午10时由赖亚力、石乔乘飞机送往北京，如无障碍13号至迟14号上午可到。

指不含标点符号的实有字数。

苏联贷款给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年利为2%。

二、为防万一飞机误事，今日将新华社社论电告你们，文件经电告有错误旨，当于今日再电告一次，以便作最后校正。

三、签字日期，时间大致定为 14 日下午 6 时至 7 时（即 18 时至 19 时），计北京时间已为 14 日 23 时至 24 时。我们准备在签字后，即于莫斯科时间 19 时至 20 时将签字情况，分别以有线电明码及无线电话发新闻稿给你们，以便 15 日与各项文件见报。

**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说：条约和协定的签订，
“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2 月 14 日，是象征中苏两国友谊和合作进一步加强的日子。这天上午，中国政府代表团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中苏友好条约和协定的签字仪式。两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斯大林亲自出席，为签字仪式增添了隆重而欢快的气氛。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正中间。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端坐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旁，分别全权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条约》明确指出：中苏两国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中苏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两个协定分别规定：（一）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 1952 年来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付苏联自 1945 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二）苏联政府在 1950 年到 1954 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 3 亿美元（年利 1%），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

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问苏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周恩来满怀喜悦心情，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他说：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会，热情地款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苏两国官员其乐融融，互致问候。

斯大林兴致勃勃地举杯，向毛泽东祝酒：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毛泽东欣然干杯后，回敬一杯：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真心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部长会议副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维辛斯基在给毛泽东敬酒

之后，特地来到周恩来面前敬酒。他们在受斯大林指派后，在同周恩来的接触与交往中，对周恩来那东方的儒雅与魅力，严谨精细、虑事周密的工作作风和话锋敏锐、超群绝伦的外交才干，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为此，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幽默地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2月14日晚，为了庆祝中苏两国谈判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大部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斯大林满怀欣喜之情，破例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酒会。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驻苏联大使、苏联各界知名人士和各国记者也出席了酒会。各方宾客济济一堂，共有500余人。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两巨头的毛泽东和斯大林，自然成为酒会注目的中心人物。

兴奋中的周恩来临场不拿讲稿致祝酒词，把他无以伦比的讲演才能淋漓尽致表现出来。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总理的祝词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也许是受周恩来祝词的安装，经过一轮祝酒之后，斯大林起立，以轻松愉快的语气致词。他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周恩来回国后说：“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
中苏两个国家7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
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
家8万万人民的团结……”**

2月17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别莫斯科，踏上归途。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周恩来对留学生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你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随后，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回国归途中，毛泽东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先后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苏联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的隆重欢迎和热忱款待。2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中国国境，抵达满洲里车站。抵达哈尔滨后住了一晚上。28日，在长春视察后到沈阳。在沈阳，毛泽东、周恩来同高岗、林枫等中共东北局负责人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定需要在东北地区贯彻实施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恩来还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报告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情况，说明李富春仍然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经济问题”，主要是贸易问题、经济合作问题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继续谈判这些问题，是“为了建设，都要具体化”。同时，他肯定了率先解放的东北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在本地区经济恢复工

作中的成绩，指出：东北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比较快”，“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经济建设阶段”。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东北是全国工业建设的基地”。为了使东北能够顺利地进行建设，这次苏联给予中国贷款的绝大部分，中央给了东北，这是“因为东北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局部然后才能有全国”。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安抵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彭真、林伯渠、聂荣臻等的热烈欢迎。他们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获得圆满成功。考虑到新中国外交工作如何更好地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苏联后的新形势和迎接新任务，3月2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主题为中苏缔约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任务的报告。他高度评价了中苏签订新约的历史意义，说：

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直接会晤，顺利地签订了条约和协定……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

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7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8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美帝国主义的企图，一是发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力量，二是武装德、日，三是欺骗美国人民，以便它发动战争。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要揭露。我们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其目的是要完成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就是要使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有了，我们要努力去推动。

这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以后世界局势所起的变化。

最后，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将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开展起来。老实说，我们的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外交战线上有许多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经验比较少，人才也比较缺乏。但是，我们要下决心去完成任务。”总而言之，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出访苏联，为5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对于保障世界和平，对于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商建“陆大”到海上阅兵周恩来主持中央

军委会议，确定创建解放军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现由单一军种向包括有空军、海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技术兵种在内的诸军兵种的历史性转变的重要关头，1950年7月，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分，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研究磋商创办全军军事院校的有关事宜。

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等出席了这次会议。

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肖克将军回忆：

1950年2月我接到军委命令，要我到北京出任军委训练部部长……一到北京，我就向周总理及朱老总、聂帅请示。他们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要建立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不仅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还要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所有军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训练，统一的纪律。他们指示我立

即办3件大事。第一，办各级军、兵种正规学校（有些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大量训练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干部。第二，制定军队共同条令，即队列条令、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以统一全军的军事生活，纪律和制度。第三，抓好队列训练……

经过这次谈话，我明确了工作方向，也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就奉令以军委原四局——军事出版局作为基础，从华北军大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军训部，开始工作。军训部成立不几天，军委开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军队办学校问题。当即确定将战争年代各部队办的许多学校、教导团队，改组为训练现代战争人才的正规学校（其中一部分改为专业学校），没有现成机构的组建了机构。并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大学（次年1月正式开学，改名为军事学院），我兼任筹备主任。

创办人民解放军教育和训练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的消息，越过巴山蜀水，转瞬间传到了远在四川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耳中。这位早年为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优等生、一向注重并擅长军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刘伯承，为中央军委及时地作出这一正确决策，感到由衷的高兴。经过几番思考后，他致信党中央，请求辞去现职，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在信中，年已58岁的他恳陈肺腑之言，请求说：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要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不久，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决定派遣这位身经百战、威震中外、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陆军大学，搞教育。10月23日，毛泽东给伯承发去急电。电称：“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

10月27日，刘伯承领命来到北京，这天正值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不幸因病逝世。

**周恩来评价刘伯承：“你有几个特长：一有学问，
二又非常严格。严师必出高徒嘛！”**

周恩来结束了任弼时的治丧活动后，便邀请刘伯承和原华东军区参谋长、第八兵团司令陈士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商谈学校的筹建问题。

11月初的一天早晨，刘伯承等来到西花厅。这时，工作到凌晨二时左右才睡觉的周恩来刚刚起床。周恩来见刘伯承来了，微笑着朝他大步走去，拉着他的手，连声说道：“刘老，你来了！我起来晚了。”周恩来和刘伯承相识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担任领导这次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他临危受命，急需一个在军事筹划上的得力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军事暴动的经验，还要有丰富的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几经思考，他选中了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暂编第15军军长的刘伯承。

得到通知后，刘伯承从武汉乘船顺流而下前往九江，参与擘画南昌起义。随即，刘伯承成为起义领导中枢的参谋团参谋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和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了由共产党独自掌握的、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第一支人民革命军队。

从此，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里，周恩来和刘伯承结下了深情厚谊。周

恩来很敬重这位比他大5岁的兄长。两人见面时，他总是亲切地称呼刘伯承为“刘老”。

“总理，你多睡一会吧。听说你每天早晨四五点钟才休息？”刘伯承歉意地说。

周恩来回答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趁周恩来吃饭的工夫，刘们承观看了周恩来的住所西花厅。西花厅建于清朝宣统年间，应于中南海西北角，紫光阁以西，西北两边临街。它是摄政王府西花园内的主要建筑之一。

映入刘伯承眼帘的是：这所古老的庭院，北房数间，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都在北面，房间陈旧，设备简单。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张又宽又长的老式办公桌。铺了绿布的桌面上，摆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还井然有序地摆放着白瓷茶杯、笔筒，还有那枕在台历架上的记载每天“工作节目”的台历，以及那装着绿色灯罩的经常彻夜长明的台灯。

透过这一切，刘伯承对这位老战友更加尊敬和钦佩了。

刘伯承说：“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

“你这个人组织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就来。”周恩来满意地说。

刘伯承又说：“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

周恩来爽朗一笑说，“你搞得不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一有学问，二又非常严格。严师必出高徒嘛！”

随后，周恩来向刘伯承等人提出了陆军大学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同他们详细研究了学校的组织机构和有关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没过几天，周恩来又约刘伯承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谈话。

首先，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军大学的指示，并告诉说，为了办好陆军大学，毛主席已经为学校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不久将到学校帮助工作。

鉴于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太上皇自居，专横跋扈，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教训，刘伯承坦诚地说：“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

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可是，叫专家就超脱了。他当他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我的问嘛！”

“对，对，叫专家好”，周恩来爽快地采纳了刘伯承的这个意见。

以后，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规定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中国的苏方人员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者和过去未按顾问名义所聘的苏联方面的人员，一律称呼专家。

接着，周恩来同刘伯承等磋商研究了陆军大学的正式校名、校址、干部人选等问题。

综合刘伯承等的建议和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一）为了便于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军大学的校名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二）校址暂设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军事学院各级机构。

周恩来和刘伯承共同绘制的解放军

最高学府的建设蓝图诞生

两三天后，周恩来第三次邀请刘伯承等继续商谈军事学院的建校问题。

周恩来同他们一道研究了学校的教学方针，酝酿了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课的具体内容，议论并决定了教员的来源问题。

在谈到教学方针时，周恩来认为，就是要在人民军队现有的军事素质的基础上，熟悉并能指挥各技术兵种和陆军步兵的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和通信联络，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

在磋商军队文化课教学问题时，周恩来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军队学员的文化水准低，但只有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书科学技术。因此，一定要搞好文化、科学知识教学。

在研究到教员的来源问题时，刘伯承反映说：现在要选调合适的教员作常困难，但却有一些起义或者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可资利用。他们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都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旧的军事学术也懂得一些，可以当教员。

周恩来接过话茬，说：行啊，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陆续从学校每期毕业生中选留一些任教，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他还对大家说：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要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继承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坚持政治工作制度，把人民军队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他强调说：要努力把这两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最后，周恩来提议由刘伯承召集筹委会成员根据这3次会议商谈的精神，尽快写出一个办校的综合意见来。书面意见写成后，再开一次会议讨论定案，然后报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11月13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军训部和军事学院筹委会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由刘伯承、陈士榘联名提出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除刘伯承、陈士榘外，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军训部长肖克、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也出席了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与会者对《意见》进行了逐条讨论，并对《意见》的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这天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的建设蓝图——《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正式形成。

11月1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朱德，汇报了13日会议座谈修改《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的情况，建议予以批准。同时，他说：学院筹建资金“100亿元已拨50亿元。刘伯承、陈士榘两同志先去上海同陈、饶一商在南京筹备事，然后刘伯承去太湖休养一月，陈去南京筹备。”

一心扑在军事学院建校工作上的刘伯承，并没有接受周恩来要他“去太湖休养一月”的安排，于11月21日晚抵达南京。第二天上午，他便开始办公。

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随后，他连续召开院务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教学工作人员大会，号召全院工作人员“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并把“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学院“开宗明义的第一章”。

指旧币。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新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告成立！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重大转变的标志之一。

这以后，军事学院为人民解放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

海空中回荡着周恩来铿锵有力的声音：“为建设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195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的纪念日。鉴于30年是大庆，中共中央军委决定8月1日在青岛举行海上阅兵，邀请解放军的两位主要创建人毛泽东、周恩来检阅新中国的海军部队。当时，毛泽东正在青岛主持召开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周恩来则在这里参加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并准备在会上作《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进入七八月，位于胶州湾东南岸、地处崂山余脉的青岛虽然正值盛夏，但气候却不炎热，月平均温度只有27左右，清爽宜人。特别是在一早一晚，海风徐徐吹来，颇有些凉意。

毛泽东是7月中旬来青岛的。也许是因一时不适应青岛的气候，或许是游泳时不小心着了凉，他感冒了，咳嗽不止并逐渐加重，半月来仍未好转。这样，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作全权代表，检阅海军青岛部队，并把检阅时间推迟到8月4日。

4日上午9时许，在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陪同下，周恩来驱车来到海军军港。肖劲光向他报告了检阅的程序。陪同周恩来参加检阅式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副总参谋长韩先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在军港码头，担任检阅总指挥的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马忠全跑到周恩来面前报告，请他检阅军官队伍。周恩来检阅军官队伍后，乘检阅艇驶出港外。这时，一艘艘挂满了彩旗的舰艇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胶州湾海面上，各舰艇指战员列队接受周恩来的检阅。周恩来站在检阅艇前端。每经过一艘舰艇时，他都向官兵们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

顷刻间，“同志们好！”“总理好！”的洪亮声响彻海空，此起彼伏。

检阅完备舰艇指战员后，10时45分，周恩来登上检阅旗舰。海军司令员向周恩来致欢迎词。他说：

敬爱的周总理，今天我们怀着庄严和愉快的心情，接受您的检阅。我代表海军全体指战员向总理致以崇高的敬礼和热烈的欢迎！

海军建设8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已经成长起来了……我们将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学习，熟练地掌握军事技术，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继续发挥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为建设一支海上战斗力量，保卫海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接着，周恩来向海军指战员们讲了话。他说：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同志，全体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年了。30年来，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英勇艰苦

的斗争，保证了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正在保卫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同志们！你们在建设海上武装力量上，在保卫海防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祝贺你们！但是，你们都知道，我国的海岸线很长，美帝国主义还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你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建设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周恩来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海空中回荡。随后，开始海上分列式。两架水上飞机从旗舰两侧滑行起飞，摇摆着机翼向周恩来致敬，紧接着，潜艇编队、猎潜艇编队、快速炮艇编队……依次驶过；海军航空兵歼击机群、水雷轰炸机编队从海空飞过。周恩来神采奕奕，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含笑着，时而平视驶过的舰艇，时而仰望天上的飞机。参加受阅的指战员个个精神抖擞，动作干净利索：舰艇和航空兵编队行动整齐划一，海上和空中的表演技术精湛，充分显示了人民海军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和所向披靡的战斗作风。周恩来高度评价了8年来海军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将近12时，海上阅兵式圆满结束。应受阅官兵的请求，周恩来欣然答应为海军题词，挥笔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同志们，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希望你们为建立一支更加强大的足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海军而奋斗不息！”

最后，周恩来同受阅的官兵代表合影留念。

此时此刻，海军广大指战员怎么也忘不了周恩来对年轻的人民海军建设倾注的关怀和指导。

——1951年6月，周恩来视察大连海岸。——1952年1月，周恩来审查《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批示同意“海军的空军建设方针”，批准向苏联购买232架飞机。这批飞机，为海军航空兵的组建和成长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11月，周恩来视察东海舰队某部，并题词：“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为巩固祖国的海防而努力。”

——1954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海军建设的5年计划。

这次海上阅兵式，是对8年来海军装备和训练成果的检阅，推动了海军军事战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参与抗美援朝决策

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周恩来主持召开 保卫国防问题会议，组织东北边防军， 部署未雨绸缪的有力措施

由于连绵不断的长期战争的破坏，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国民经济，在新中国诞生之时，更是百孔千疮，百废待兴，人民生活贫困，失业众多。尽快地肃清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土匪武装，争取获得一个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来进行国家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

正在这个历史转换的节骨眼上，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晚，美国政府从其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立即作出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定。

紧接着，6月27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宣布已命令美国驻远东空军和海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并决定侵占台湾。这天，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紧急的军事措施”，给南朝鲜以“必需的援助”。

7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给入侵朝鲜的美国军队及其他15个国家的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使朝鲜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所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对于朝鲜人民来说，则成为反对外国干涉者的祖国解放战争。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之邦。俗话说：“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联合国军”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不能不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援助邻邦朝鲜，反对外来侵略、保卫中国国家安全视为紧迫的重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立即开展坚决的外交斗争。

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讲话，表明了中国人民对于远东局势的严正立场，强调：“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

这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了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以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7月6日，周恩来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的电报中强调：安理会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宪章”，“显然是非法的”。

尤其重要的是，在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以战略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内审国情，外度大势，及时地在军事上采取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防范措施。

毛泽东、周恩来清楚地看到：虽然朝鲜人民军敢打敢拼，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汉城、仁川、水原、大田等地，并一直向洛东江三角洲攻击前进，但对方的主力并未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何况，朝鲜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骄横不可一世，自认为不可战胜、居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是绝不会轻易认输的，因此朝鲜战争很可能有反复。

据当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的雷英夫介绍：

正是这时，总理在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电报》稿时，郑重其事地询问李克农、章汉夫、乔冠华、陈家康和我，“你们对朝鲜战争有何看法？8月份能结束吗？”……我说：“总参谋部的看法和外交部一样，但还稍微谨慎一点。认为即使把伪军和登陆美军消灭了或赶下海，也不等于朝鲜战争结束，因为美国还可以用绝对优势的海空军，进行轰炸和封锁，陆军实行登陆。战争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不歼人敌人的主力，不打得敌人实在招架不住，它是不会罢休的”。

总理又点了点头说：“是呀，不经过反复多次的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到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至于持久到什么时候，是1年、2年、3年，甚至更长？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才能确定。反正一两个月，一两个战役是不行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点。”

与此问时，毛泽东、周恩来还清楚地看到：东北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个地区集中了中国半数的重工业，因此，东北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区。但是，因为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时入关南下，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东北已成为全国驻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正规部队只有一个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第42军，东北全部兵力不足20万。如果不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后果难以想象。面对极其严峻的战争形势和东北地区兵力奇缺的现状，1950年7月7日，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第一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的指示，提出并初步商议了对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源补充等问题的设想。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第四野战军副政委谭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铁道兵司令员滕代远、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军训部部长肖克等。

经过几天的酝酿考虑后，7月10日，周恩来继续召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最后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立即成立东北边防军并屯兵鸭绿江畔的战略决策，认为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正确决策。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确定：

（一）抽调1950年初被定为国家战略预备队的第13兵团及其所辖第38军、39军、40军和在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42军，以及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和1个高射炮团、1个工兵团、1个坦克团、1个骑兵团等，共约26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负责保卫东北边防，并准备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任务。这些部队最迟限于8月上旬在东北地区南部完成集结。

（二）任命能征善战、负责准备解放台湾战役的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任命骁勇战将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原第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参谋长曾国华调广东军区任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指1950年7月5日。

7月13日，周恩来嘱军事秘书把修改后定稿的《决定（草案）》立即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审核批准。当天，毛泽东批示：“照此执行”。9月上旬，中央军委又将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7月23日，因粟裕身患重病，肖劲光、肖华在原有工作岗位上不能脱身，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东北边防军后勤保障由东北军区统一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

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开抵东北边境辑安（今集安）、通化，柳河、开原、铁岭、辽阳、海城、凤城和安东（今丹东）等地，开始以美国军队为假设敌的突击训练。

8月23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听取雷英夫汇报总参谋部作战局和有关部门研究朝鲜战场情况，战争局势走向问题的汇报。雷英夫介绍，参与研究的同志经过各抒己见，一致认为，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登陆的可能性很大。这是美国企图扭转朝鲜战局的一着很厉害的棋子。

周恩来认为，总参谋部作战局提出的意见，涉及到一个重大军事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他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周恩来带雷英夫到他的住处菊香书屋再作一次汇报。

周恩来把雷英夫介绍给毛泽东。

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听好汇报，叮嘱雷英夫说：“你慢慢讲，不要慌。”

在雷英夫打开朝鲜作战地图，进行详尽的汇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一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

为了以防万一，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分析，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供他们参考。同时，他俩还责令总参谋部和外交部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

为了适应朝鲜战局可能出现的突然变化，8月26日，根据在毛泽东处商定的计划，周恩来再次召开有各方面领导人参加的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上，周恩来介绍了朝鲜战场的形势，阐述了加紧东北边防军战备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朝鲜问题就成了世界至少是东方局势的焦点。经过两个月的作战，证明友方原来设想“一鼓而下”，把李承晚军队和美国军队赶下海，很快解放全朝鲜，已经不可能了。友方“过去多为击溃战，歼灭战很少”。

进而，周恩来指出：根据现在情况看来，战争将趋于长期化，要准备在长期战争中消灭敌人。“将美军各个歼灭，这个任务落在我们肩上”。“这就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的准备，一出手就胜。因此，在我们未准备好之时，不要过早地惊动敌人，使敌人警觉”。

接着，周恩来强调：我们必须在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否则，万一形势恶化，就会措手不及，陷于被动。我们的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各军兵种都要有一个3年建设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也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

8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东北边防建设计划会议。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11个军（36个师），共70万人作三线配置，第13兵团、第9兵团和第

19 兵团分别为第 1 线、第 2 线、第 3 线。从第四野战中抽调 10 万老兵，准备在参战后补充到第 1 线部队。

以上所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为以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证明是富有远见的，并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合国军”大举北犯。周恩来发出不能置之不理的严正警告。在警告无效后，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9 月 15 日凌晨 6 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气势汹汹的 7 万余美国军队，在近 500 架飞机、260 余艘舰艇的配合下，实施仁川港登陆计划。

9 月 27 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指令，授权他在朝鲜“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摧毁北朝鲜军队，占领整个朝鲜。

面对急剧恶化的朝鲜局势，为了避免战争扩大化，9 月 30 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

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朝鲜人民和人民军是坚决而勇敢的。他们在金日成首相领导之下抵抗美国侵略者，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今后朝鲜人民在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下，必能克服许多困难，取得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

最后，周恩来向美国政府发出严正警告：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警告却置若罔闻。不予重视。

10 月 1 日，麦克阿瑟指挥打头阵的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这一天和 10 月 3 日，金日成首相两次请求中国人民给朝鲜人民以特别的援助，即在对方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军队直接出动，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中国国家受到严重威胁。此时此到，中共中央面临着出不出兵的重大历史抉择。10 月 2 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明了中闰的鲜明立场，指出：中国“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次狗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10 月 3 日凌晨 1 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大使卡瓦拉姆·马达瓦·潘尼迦，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他指出：

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尽管在三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

……

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对于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

为了引起有关国家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重视，在接见潘尼迎大使之前，周恩来考虑通篇讲话应该突出一个“管”字，就是说，如果你美国要如此猖狂下去，我们可就要“管”了。据知情者李越然回忆：

周总理知道这个“管”字在英文上不容易翻译准确。怎么管，什么时候管，都没有说，但又要有相当的分量。他特地把浦寿昌同志找去说：“寿昌，这个‘管’字怎么翻译好？”浦寿昌同志把这个“管”字译得非常恰当。

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通过无线电波，很快就经印度新德里传到美国华盛顿白宫。但是，美国方面一意孤行，没有把中国人民的力量放在眼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刚刚一年，各方面困难重重，军队装备差，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而已。

的确，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都很弱，要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较量，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举足轻重的事情。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下，中国到底出不出兵、何时出兵、出多少兵、出兵后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等等，这都是不能不反复斟酌、权衡得失利弊后才能下定决心的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10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出兵抗美援朝问题。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邓小平、林彪、罗荣桓、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要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力主出兵援朝，但也有一部分人不主张甚至反对出兵援朝，林彪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彪在国家危难之时撂挑子不干了，使曾同林彪共事多年的聂荣臻也感到不可理解。24年后，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怕死到这个程度。

娴熟地掌握《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最懂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令’，国家安危之主也。”因此，他在打定主意出兵援朝之后，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挑选最称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上来。

为什么毛泽东最初决定林彪担任志愿军统帅呢？

一是这次所抽调的部队都是原东北野战军的，林彪对这些部队的情况很熟悉，便于指挥；

二是林彪在东北工作时，经常和苏联、朝鲜方面人士打交道；

三是在四个野战军领导人中，他年纪最轻，只有44岁，而且是以能打硬仗闻名于世的，在党内军内部有很大的威望，最受毛泽东的喜欢。毛泽东曾经称赞说：林彪打仗又狠又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不同意见出兵的意见，毛泽东发言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危难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无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会议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正式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在林彪拒绝挂帅出征后，从德、威、才、资几个方面综合考虑，中共中

央和毛泽东选定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1898年出生。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领导平江起义，并率领所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坚持井冈山斗争，建立了卓著功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身居要职，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和延安保卫战、沙家店战役、宜瓦战役等。

早在1935年10月，毛泽东曾挥笔写诗，盛赞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诗中写道：

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10月6日，周恩来主持最高军事会议，同陈云和中央军委其他负责人彭德怀，林彪、高岗、罗荣桓、聂荣臻等进一步商量入朝作战的诸项重大事宜。

会上，林彪仍然不赞成出兵。他说：我军打国民党军队有把握，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却艰难说。美国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美国军队逼急了，它扔两颗原子弹或用飞机对我军大规模狂轰滥炸。将够我们受的。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他还说，如果一定要出兵，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周恩来接过话题，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心已定。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以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最后，会议议定由周恩来、林彪赴莫斯科商洽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援助中国武器装备问题。

10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这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

面对进一步恶化的朝鲜形势，8日，毛泽东当机立断，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命令。在命令中，毛泽东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毛泽东又致电金日成首相，将以上决定告诉他，并请“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

**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提出希望苏联
在中国出兵援朝时提供空中掩护，同
时要求援助中国所需的军事装备……**

在10月8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的同时彭德怀赴沈阳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一职，并在当日下午同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领导人高岗、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等开会，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问题。

也正是在这一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偕林彪、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前往苏联，同斯大林等党政领导人商谈紧急而机密的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有关事宜。

10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

11日上午，周恩来、林彪飞抵苏联高加索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同在这里

休养的斯大林和赶来此地的其他苏联党政领导人会谈。

在整整一天的会谈中，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说明中国出兵后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提出希望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强调只要苏联提供空中掩护，中国就一定出兵援朝。

莫洛托夫表示，苏联可以出动空军支援。

斯大林则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随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情况。

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动空军到朝鲜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既使出使苏联的周恩来感到意外，也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始料未及的。

收到斯大林、周恩来的联名电后，10月12日晚8时，毛泽东立即去电召回彭德怀、高岗。

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最新情况，对出兵不出兵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认真讨论。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根据他的意见和主张，会议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掩护，在“联合国军”大举北进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也要克服千难万险，尽快出兵援朝。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致周恩来电。

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的来电。毛泽东要他将电文内容转告苏联领导人，电文指出：“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对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能否采用租借办法和两个半月内苏联能否出动志愿空军没有把握，但这两件事又至关重要。因而，他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斯大林商议并确定：

（一）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究竟“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租借办法”，使中国政府明年能够“保持20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二）“只要苏联能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空袭，只是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受一些损失。”

这天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的来电内容，要他立即转告斯大林。

10月14日，在得到苏联政府对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用贷款和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志愿军的肯定答复后，办事认真仔细的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进一步提出8个问题请求给予明确答复。

其中有：

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作战？

苏联政府派志愿空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中国近海各大城市？

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

周恩来还随电附去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附属器材的订货单。

这一天，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本日3时和21时半的两份来电。前电介绍了朝鲜前线敌友双方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计划，指出：志愿军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的到来，然后再打”。

后电通报了志愿军的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情况，指出“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告以彭德怀将于“15日返安东，在安东布置两三大后即去德川与金日成会面”。

周恩来迅速将两电内容通知了斯大林。

鉴于“联合国军”北进甚速，平壤危在旦夕，15日15时，毛泽东随机应变，改变了本日1时作出的“志愿军决于10月18日至迟19日渡江”的命令，致电彭德怀、高岗：“我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第二个军可于18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

但是，就在这极为关键的时刻，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战略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全面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改变主意，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现决定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作为大军事家的斯大林当然知道：要这个经历了许多年国内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惨重人力和物力损失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再冒极大风险，去同世界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交战，打得不好，就很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果真如此，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斯大林自食其言，推翻了自己所作的承诺。

得到斯大林改变原有主意的消息后，毛泽东眉头紧整，陷入久久的沉思中：友好的兄弟国家之间，怎能出尔反尔，怎能置在严肃场合下达成的协议而不顾呢？然而，事已至此，毛泽东又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

10月17日17时，毛泽东再次急电原拟18日赶赴朝鲜的彭德怀和高岗，告以志愿军先头两个军的出动时间由17日、18日推迟“于19日出动”。彭德怀、高岗请于18日火速返京。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会上，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的情况。考虑到斯大林最后虽不同意出动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入朝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书援助，会议正式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日入朝作战。在以后的20多年间，周恩来曾多次谈到这次会谈的有关情况。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会见金日成首相时有一段对话：

毛泽东：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过，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

在中朝两国军队把“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后，1951年3月3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在别洛大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支持，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过。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1971年12月30日，周恩来同在京爱国高层人士谈话时回忆说：

抗美援朝时，我同林彪一道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说苏联是否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林就很高兴。后来毛主席决定，即使苏不派飞机，我们还是出兵。

10月19日黄昏，在北国秋末的朦胧夜色的掩护下，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3路，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等地渡过中朝分界河——鸭绿江，入朝作战，揭开了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精心绘制第一幅建设蓝图

在周恩来、陈云领导下，勾画出了中国 有史以来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 幅宏伟建设蓝图草案

50年代初始，我国国民经济在重重困难中正朝着预期目标迅速地恢复着。为了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1年2月中旬，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责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了编制好“一五”计划，周恩来提议并在这年2月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成员是：周恩来、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宋助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

鉴于自1951年7月以来朝鲜战场战争形势出现新的转机，朝中人民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就像铁板钉钉似的把战线牢固地稳定在三八线上，出现了朝鲜战争一时不可能结束但也不可能逆转的相持局势。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52年5月走出了一着实行“边打、边稳、边建”战略方针的妙棋。

这样，周恩来、陈云领导中财委加紧研究制订“一五”计划方案。到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为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的中国人民，勾画出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幅宏伟建设蓝图草案——《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据参加“一五”计划编制的宋助文介绍：

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3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以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

由于我国还没有制订和实施五年计划的经验，有必要就我国“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问题，征求已经领导一个大国胜利进行3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苏联政府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同时还需要同苏联政府商定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为自己近期的工作安排，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他写道：

在7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

所拟分工计划如下：

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

对旅大问题当准备一新约草案。

对朝鲜停战谈判及反细菌斗争，除过问日常工作外，当令章汉夫接替这两项工作……

外交使节会议已开过一月，现他们在各地参观，待他们在月中回来，我当参加总结，并向中央汇报。

政务会议，当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将议程准备好，即使周、陈不在，仍能按期开会。

维汉同志已商好自7月12日起休假，政务院日常工作只能由齐燕铭处理。这是有若干困难的。如能于7月下旬与邓小平同志商好，先发表他为政务院副总理，并于8月份来京主持一个时期（政务院工作），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三反、五反已过，未了事项请子文、一波同志分别主持。量刑之事，将由景范同志主办。

中央一级总党委第一书记，我可不再挂名，提议即以安（子文）为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肖华为第三书记。

上述事项请主席批准，并予传阅。

七八月间，骄阳似火，酷暑难熬。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订的《中国经济状况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终于完稿。同时，他还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这两个文件分析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基本情况，提出了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指导方针和主要经济指标。8月13日下午，周恩来同匆忙从重庆赶到北京就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谈话，向他交待了政务院的工作。随后，他在第148次政务会议上郑重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斯大林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但“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

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3架中苏航空公司的飞机飞离北京，由东向西，途经苏联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等地，向友好邻邦苏联的首都莫斯科飞去。

8月1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目的地。代表团阵容庞大，共65人，包括了各部门、各行业主要负责人。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云、李富春、张闻天（驻苏大使）、粟裕（副总参谋长）；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还有：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中财委计划局局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净、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东欧司司长徐以新和亚洲司司长陈家康。

这次出访活动，是新中国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底到1950年初访问苏联之后的第二次重大国际活动，是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的一次最重要谈判，为新中国即将到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机场，周恩来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的热烈欢迎，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兴奋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3年时间里，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到莫斯科后，周恩来把代表团成员集中起来，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又逐段、逐句地重新讨论修改了一遍，宋劭文在《周总理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章中谈到上述情况时，感慨地说：

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第二天周总理未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总理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总理亲自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经同总理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处于鼎盛时期。中国坚决地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并取得辉煌胜利，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走所谓“民族主义道路”的最后疑虑，他决定尽力给中国以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因此，斯大林对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此次来访

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先后3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会谈。

8月2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简述了中国代表团将同苏联商谈的有关问题，接着介绍了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静静地听着周恩来的介绍，并不时地投以信任的目光。

随后，斯大林发表意见，表示同意毛泽东对朝鲜战局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在停战谈判中所应采取的方针；还表示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

最后，斯大林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8月23日、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

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经双方约定，9月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与“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军队整编等情况。接着，他着重介绍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设想。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经济状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反应。他面带微笑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接着，他对中肯“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而宝贵的意见，指出：“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1%，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斯大林在问明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下公布整个具体计划的情况后，说：“应该使人民知道，不能只提方向和方针。看来非公布不可，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

这时，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信任和尊重的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同时，他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订“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

斯大林的以上表示，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周恩来对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所给予的亲切关怀和伟大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同斯大林会谈所获得的实际性进展，9月6日，周恩来两次致信莫洛托夫。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中国在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从苏联进口装备、普通货物和非贸易支出所要支付的外汇，同中国对苏联出口和非贸易收入二者之间，将出现46亿多卢布的逆差，因而需要请苏联政府给予中国贷款。在第二封信中，他提请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技术资料，以帮助中国提高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准。同时，周恩来还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订货单、委托苏联帮助设计的建设项目名单、聘请各类苏联专家名单等文件资料送交苏联方面。接着，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直接商洽，面对面地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项目。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使他和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可以有更多时间考虑并同代表团各组分别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9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斯大林格勒参观。为什么去这里参观呢？据担任此次出访的首席翻译师哲介绍，此行目的是：

一是慰问这个英雄城市的居民，他们在卫国战争中蒙受的损失和灾难也较大，但是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对扭转整个战局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史诗般的壮丽；二是为了了解当年在这个地区所进行的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最猛烈而具有关键性的战役的实际情况；三是就地实际调查战争带来的后果，以及在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

接着，师哲深怀钦佩之情他说：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周恩来同志虚心好学的精神和善于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情况的好作风。他把参观访问当成一个学习和钻研问题的机会，把游艇变成学习的场所。周总理向陪同参观的当地州、市委负责人详细询问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详细经过，战后城市恢复工作的进展情况，特别是工业生产的恢复情况。在参观拖拉机厂时，周总理对这个厂的重建、扩建和生产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

9月15日，周恩来出席《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议》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并在会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致词：

30多年前，中国人民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启发，认识了民族革命的真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经过30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全国解放的胜利。反动统治阶级被推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被赶走了，中国人民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近 3 年中国人民对外抵抗了美帝国主义新的侵略，对内实行了土地改革，恢复并发展了工农业生产，镇压了反革命，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人民的这些胜利，这些成就，是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政府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亲切关怀和伟大援助分不开的，也是与世界进步人类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深切的友谊和援助。这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和指导之下，使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成就。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周恩来面带微笑，注视着斯大林，激动他说：

我现在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获得新成就庆贺，请大家为中国人民最好的导师和朋友，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

面带喜悦神情的斯大林，在周恩来话音一停就站了起来，向周恩来点头致意。这之前，斯大林曾对周恩来说：你们的革命成功后，我们援助你们是我们的责任。只能说你们的运气好，假使你们的革命先成功，我们也会向你们求援的。我应当感谢你们在朝鲜作战和提供橡胶两件事情上对苏联的援助。

在中国代表团各组的工作大致走上正轨后，周恩来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领导各组继续进行谈判。

9 月 24 日，周恩来，陈云、粟裕一行 17 人返回北京。

周恩来回国后继续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并参与最后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回国后，周恩来继续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每当李富春在谈判中遇到重大问题打电报向国内请示时，周恩来总是及时审阅这些电报，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商定后，及时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1953 年 3 月 5 日，对苏联革命与建设事业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的一代伟人斯大林逝世。他的逝世，震动了苏联，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以至整个世界。

3 月 8 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抵达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在莫斯科期间，他利用工作间隙，听取了李富春、叶季壮、宋劭文关于中苏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并作了详细记录。回国后，他将李富春等的汇报和李富春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等 4 个文件整理后，分送有关领导人征求意见。

4 月 8 日，周恩来约见奉命回国汇报中苏会谈最新进展情况的宋劭文，详细询问了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

周恩来颇为不解地问道：“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宋劭文回答说：“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投备分交、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

听了宋劭文的解释，周恩来明白了原由，赞同他说：“是啊！确定 100 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使周恩来对整体情况有更清楚的了解，宋劭文还将中国代表团绘制

的七八张中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交给周恩来。从曲线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受援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情况。周恩来饶有兴味地仔细审看了这些曲线图，感到很满意。

4月30日，周恩来起草复李富春电：

我们同意你在来电和来信中所提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的议定书》、《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议定书附件》及《两个清单的附注》等8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和长期的援助。中国党和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完成这些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并即委托李富春同志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

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根据中共中央的授权，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再次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15个项目。这样，“一五”期间，苏联援助中国总共156个重点项目。以后，简称为被中国人民所熟知的156项。

自此，历时8个多月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援助新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会谈，获得圆满成功。

无论是国家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还是政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等，对这次会谈所获得的成就，都充满了欣慰和喜悦之情。

这以后，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在陈云、李富春等编制五年计划纲要8人小组的具体领导和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国家计委继续进行着“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并在1954年9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至此，“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尾期。

1954年11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来到虽是初冬时节但却温暖如春的广州。在这里，他们审核修改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同时，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原则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

7月6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精心绘制的第一幅建设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8人小组于1954年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

11月9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命令，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随令下达，指示各地“遵照执行，并须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由于“一五”计划是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和速度的基础上的，因此，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一五”时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这些成就，为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的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却是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用事实证明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宣传的“中国一五计划一定要失败”的谎言的破产。

叱咤风云日内瓦

周恩来提出《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 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指出 “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退军队，而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继续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法国军队也还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战争。但是，由于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上的坚决斗争，由于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战争的进一步开展，打得法国侵略军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迫使美国和法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这两个地区问题。

新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开展，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充分显示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特别是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没有它的参加，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和很好解决的。正如1953年10月8日周恩来在一份声明中所宣告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5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1954年2月，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4国外长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经过苏联的艰辛努力，终于达成一致协议：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除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5大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分别参加会议讨论。

有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从2月底到3月，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周恩来，挤出相当的时间，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他指导有关人员收集、熟悉、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情况，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文件，约李克农等商谈和确定中国代表团成员入选等问题，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

同时，周恩来还主持拟定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项文件，研究了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国际宣传问题。

3月2日，在毛泽东主持，有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地提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初步意见》指出：“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4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但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3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

《初步意见》明确而坚定他说：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即使美国将用一切

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3月3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同兄弟国家领导人多方协商，
并对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说，我们到
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
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

人心齐，泰山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为了使中国、苏联、朝鲜和越南4个兄弟国家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支持和默契配合，3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两次同朝鲜南日外相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问题。随即，周恩来致电胡志明主席和越劳中央，告诉日内瓦会议的开会日期，并强调说：

目前国际形势下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因此，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的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也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而且还要看今后战局的发展。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人能否接受。这条线最好越往南越好，北纬16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

周恩来在电文中还请胡志明3月底或4月初来北京一谈。并一同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3月底，胡志明抵达北京。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大体就绪后，4月1日，周恩来借少数工作人员启程飞莫斯科。随即，他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和越南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在4国范围内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

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3位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根据内部分工和安排，代表团秘书长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代表团顾问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乔冠华、上海外事处处长黄华、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欧非司司长宦乡、情报司司长龚澎、军委作战部处长雷英夫、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4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苏联专机，由北京取道苏联飞往日内瓦。

行前，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打招呼”会议。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

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4月24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周恩来一下飞机，人们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到这位传奇式人物身上，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抢拍照片。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着装差不多一个样，队伍整齐威武，以致外国新闻媒介形容为“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这以后，周恩来成为西方新闻报道的中心人物。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复杂而极感兴趣的心情，拭目以待，冷眼旁观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在这名人荟的世界舞台上如何表现。

日内瓦是享有“旅游行的圣地”之美你的世界名城，位于瑞士西南部。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湖山环绕，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风光各异，充满了诗情画意。不但如此，它还是一座享有“医治国际政治创伤的医院”之称的国际城市。在这里经常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并设有许多国际组织的常设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国际联盟在这里成立，并建造了著名的“万国宫”——国联大厦。日内瓦会议全体会议就将在国联大厦举行。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次走向世界舞台，经受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考验的国际会议。

周恩来走下飞机后，面对久经磨练、身手不凡的各国记者，显示出了杰出外交家、政治家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风度。他向人们挥手致意，并镇定沉着地在机场散发了热切期望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声明：

日内瓦会议就要举行了。这个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回际的紧张局势。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待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随即广为散发了周恩来的中文和英文的书面简历。简历有1800字左右，从一开始便称：

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个简历是由李克农主持起草的，是没有经过周恩来径直报中共中央批准的。为什么要在简历中使用这个评价很高的话呢？

据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熊向晖在他所写的《李克农同志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一文中透露：“克农同志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据我所知此前尚未用过‘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这表明了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

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乘车到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万花岭别墅”住地。中国代表团多数工作人员则住在城内玻利瓦什旅馆和瑞希蒙特旅馆。

“万花岭别墅”房子不大、房间不多，但四周是花园、葡萄园和大草坪，还有各种花草树木，显得恬静宜人。法国19世纪著名诗人拉马丁曾经在此居住过。由于别墅门前的一条小路叫“花山”，因此人们常叫它“花山别墅”。

周恩来开宗名义地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旧国联大厦开幕。出席会议的国家除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5个大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外，还有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会议一致推举由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那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4月27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朝鲜问题。南日外务相在发言中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方案确定：（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

美国依仗自己“金元帝国”、“世界霸主”的地位，伙同南朝鲜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采取了想方设法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立场。南朝鲜代表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美国代表全力支持这一无理建议，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

显而易见，联合国在被美国操纵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实际上意味着南朝鲜吞并北朝鲜，美国将支配整个朝鲜。

4月28日，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首次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接着，周恩来义正词严地驳斥了美国 and 南朝鲜代表的荒谬主张，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3项建议，郑重地指出：

根据昨天大韩民国代表的发言看来，李承晚政府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他显然无视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企图证明似乎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就不能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其中包括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他公然主张美国军队留驻朝鲜。仅仅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所谓南朝鲜的统治是代表朝鲜人民利益的各种说法，它的价值究竟如何了……

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于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朝鲜的和平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关心维护远东和平的相应的国家愿意采取措施保证不妨碍朝鲜的和平发展，不容许外国干涉朝鲜的内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在以雄辩的事实给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以有力的驳斥后，为了推动会议的进展，5月22日，周恩来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在南日外务相4月27日的方案第一条之内补充以下一项：

“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军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

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6月5日，南日在全体会议上作了

关于希望与会各国能以朝鲜代表团 4 月 27 日的建议和中国代表团 5 月 22 日的补充建议为基础达成协议的发言。

紧接南日的发言，周恩来情真意切地说：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协议的途径上的一个障碍。”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会上，莫洛托夫综合会议开幕以来各国代表所提意见的共同点，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与 5 点建议。

由于美国 and 南朝鲜代表设置重重障碍，极力加以阻挠，本次会议仍未取得进展。

尽管如此，但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大的默契配合，和他们立场坚定、通情达理的发言，逼使论战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陷于被动、尴尬的处境之中。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在会上的表现，赢得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和新闻舆论的好评与称赞。

朋友和敌人都交口称赞：“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周恩来是“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6 月 5 日以后，美国代表加快了决心使朝鲜问题会议无结果而散的步伐，因而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逼其他西方国家代表唯美国政府旨意是从，同时在会外到处散布将在 15 日大会上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据艾登 1960 年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透露：

比德耳·史密斯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来电拿给我看，其中指示他尽一切力量，使会议尽快结束，理由是共产党人只是故意拖延时间，以符合他们自己的军事目的。

针对以上情况，为争取会议达成某种协议而作最后努力，6 月 14 日，中国、苏联、朝鲜 3 国代表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一致认为：我方“必须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使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应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

和往常一样，6 月 15 日下午 3 时，日内瓦会议全体会议在旧国联大厦开会。会上，南日、周恩来、莫洛托夫相继发言，发起了又一场和平攻势。

南日提出《关于保卫朝鲜的和平状态》的 6 项新建议。

周恩来附议南日的新建议，强调这 6 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与会各国没有理由不在“6 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同时建议：“本会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7 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以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莫洛托夫提议与会 19 国共同发表《关于朝鲜的宣言》，以此保证“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

在朝、中、苏 3 国代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会场上一片肃静，大家都在屏息倾听。3 国代表所提的 3 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部署，引

起了美国等国代表的一阵恐慌。会场出现短暂的奇异的沉寂。在美国代表史密斯的授意下，菲律宾代表提议休息，并得到会议主席艾登的批准。

在长达 40 分钟的休息中，以美国为首的 16 国召开了紧张的对策会议。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统旧径后，美国代表史密斯抢先发言，带头反对南日、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的 3 个建议。紧随其后，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南朝鲜代表发言附和。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代表的发言，两道浓眉下闪闪发光的一对透出智慧的大眼在不停地转动着，留意着每个发言人的神态和语气。

在一阵开台锣鼓之后，由受宠若惊的泰国代表开始宣读《16 国共同宣言》。《宣言》声称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企图强行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会场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

这时，场外的警卫部队指挥车扩音器响了：“注意！注意！马上散会了，把车开过来。”

在会议陷入绝境的关键时刻，莫洛托夫、周恩来和南日轮番发言，揭露对方不可告人的企图。

被美、英、法等国领导人称为“令人望而生畏”的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临危不惊、沉着镇定地说：“《16 国宣言》不是有助于朝鲜的统一的，也不是有助于加强朝鲜的和平发展的。”我们相信，朝、中、苏 3 国代表的建议，“将使朝鲜人民感到巨大的兴趣”。“我们将循着这一方向继续奋斗。我们将为朝鲜人民的利益，为统一这个国家的利益，最后为全世界和平的利益而继续奋斗”。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出：“《16 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接着，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和智慧，一鼓作气地提出中国代表团建议通过下述决议：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上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他以坚定语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夕、，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专加这个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了，那么我们不能不对这一事实表示最大的遗憾。

周恩来的风度和魅力令人陶醉，周恩来的一席话语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感受。

顷刻之间，会场轰动了，泛起短暂的骚动和窃窃私语，迅即又恢复肃静。会场气氛发生陡然变化。显然，大家被周恩来铿锵有力、合情合理的和解性讲话所感动，都感到他的讲话的分量。

虽然对方在本次会议上宣布了《16 国共同宣言》，但是它们内部的意见也并非铁板一块。深受感动、受良知驱使的比利时外长斯巴克起而响应，解释说：“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16 国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的其他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听到斯巴克的这番出自内心的自我表白，周恩来本着“化干戈为玉帛”

的既定方针，接过话题，以尊重和协商的口吻说：“如果《16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末，《16国宣言》只是一方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19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有尊重便有回报。这时，斯巴克也坦诚地以更加确定的简洁语言说：“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同意票决定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面对斯巴克“胳膊向外拐”的发言，史密斯又气又急，但又不便在会上发作，只好干瞪着眼看着斯巴克。

对周恩来的建议点头默许的艾登，这时拉长声调说：

据我了解，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比利时代表认为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所普遍接受？

会场又一次出现短暂的寂静。心猿意马的史密斯此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表示反对，将违反国务卿杜勒斯使会议破裂的指令；如果表示反对，无疑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眼看周恩来的建议就要通过了，史密斯干咳了一声，身不由己地仓皇发言：“我不懂得中国建议的范围与实质。因此，在请示我的政府之前，我不准备参加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说完，史密斯更陷入手足无措的窘态之中。

周恩来以大外交家豁达大度的气质、平缓有力的语气，对眼前所发生的情况作出总结：

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所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6月15日，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天啊！由于美国代表横蛮无理阻挠，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以没有通过任何协议而宣告结束。但是，这一天会议将美国代表的顽固立场暴露无遗。究竟谁赢得了胜利，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散会后，莫洛托夫急步来到周恩来面前，兴奋地拍着周恩来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

朝鲜代表则感慨道：“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事后，美国前国务卿狄恩·艾奇逊也称周恩来为“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共同点……我希望本次会议能够根据这些共同点达成某些协议”

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是会议第二项议程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5月8日开始的。由中国、苏联、美

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印度支那3成员国——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9个国家参加。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5月7日，即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从越南战场传来歼灭1.6万余名法国侵略军的奠边府大捷的喜讯，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8日，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但是，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更为复杂棘手。这因为，涉及的国家不仅有越南，而且有老挝和柬埔寨；还因为，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而且有存心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美英。

在进行9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会谈仍无进展的情况下，5月27日，周恩来在限制性会议上仍然平心静气地说：从各国代表目前对莫洛托夫和皮杜尔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军事停战的各项建议的发言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共同点；同时还有许多差异点。我希望本会议能够根据这些共同点达成某些协议，以便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同时对于那些差异点也应当寻找方法加以解决”。接着，他根据印度支那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本着实现这个地区和平的真诚愿望，提出了一个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可行的照顾到敌对双方利益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6点建议。

周恩来逐项解释了建议的内容，强调：印度支那3国不分哪一个国家，都必须同时停火而没有例外。双方军事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由于3国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3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的办法也会有所不同。

周恩来的6点建议推动了会议的进程，经过会外的秘密交谈和9国代表团的准备会议，5月29日，9国代表团通过了关于越法双方军事代表会晤的协议。这项协议的达成，实际上承认了印度支那3国都存在着停火问题，停火必须在3国同时实现。

从5月31日开始，会议双方进入以划区、监察和国际保证为中心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谈判在半个月中未能获得重大进展。

随着法国国内矛盾的尖锐化，6月12日，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采取拖延政策的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17日，法国国民议会授权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组织新内阁。孟戴斯-弗朗斯表示：新政府如果不能在4个星期内谋求到印度支那停火，就准备辞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的基本前提，是双方都要有诚意。因此，孟戴斯-弗朗斯所表示的鲜明态度，无疑使会议出现转机有了新的可能。

善于洞察新形势并顺应和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周恩来，在会议进程中同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成为促使会议再次取得进展并最终达成协定的关键人物。

6月16日，周恩来以5月2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的6点建议和5月29日会议的协议为基础，提出了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6点建议。这个新的6点建议，受到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欢迎，像和煦的春风，使陷于僵局的

会议恢复了生机。

经过周恩来、莫洛托夫同法国、英国等国代表的广泛而深入的接触，6月19日，会议顺利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我方代表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周恩来对法国官方人士说：“我们的目的是支持双方能够光荣停战，我们是推动、促成，而不是阻碍”

从6月下旬开始，周恩来全力以赴为解决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而忙碌和奔波。

6月22日，周恩来接见法国驻瑞典大使让·肖维尔，就同孟戴斯-弗朗斯会晤的安排问题交换意见。为了让法国新总理兼外交部长了解中国代表团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对肖维尔说：中国代表现已介绍老挝、柬埔寨代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接触。“我们希望（印度支那）3国能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目的是支持双方能够光荣停战，我们是推动、促成，而不是阻碍。”

6月23日，周恩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同孟戴斯-弗朗斯会谈。他询问了法国政府关于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新方案，同时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申明：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代表团的条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对美国的干涉，不让美国把战争国际化，反对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条件。如果美国阻挠达成协议的企图得以实现，受损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3国，还有法政府和人民。

周恩来的以上两次谈话，高屋建瓴，言辞恳切，着眼于和平，既照顾到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充分考虑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切身利益，赢得了孟戴斯-弗朗斯的好感。反过来，孟戴斯-弗朗斯也以心交心，再次表示：“我决心以1个月为期实现停火，尊敬的周恩来先生，如果不成，我将提出辞职！”

在将对方最重要国家——法国的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以后，从7月初到7月中旬旬初，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专程赶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3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

据师哲1991年回忆：

7月3日，周总理在我国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总理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开导、说服越南同志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方已经给我方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他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越南还是越南人的。

经过周恩来远距离奔波和卓有成效的协调，中、越、苏3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7月12日，远行几千公里、风尘仆仆返抵日内瓦的周恩来，立即投入到争分夺秒的斡旋工作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7月20日，在祥和的气氛中，日内瓦会议双方代表终于在会外协商中取得7点共识：

(一) 在全境同时全部停火的原则下，越南具体执行停火日期已协议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北部 7 天、中部 10 天、南部 20 天。

(二) 越南军事分界线确定在 17 度略南、9 号公路以北。

(三) 撤军日期，准备从对方地区撤退到集结区以 9 至 10 个同为期限。

(四) 越南选举期限确定为 2 年，1955 年 7 月由双方协商确定选举日期和方法。

(五) 老挝划区问题，已同意寮国抗战部队集合区，先在 11 个点集结，最后集合在老挝东北的丰沙里与桑怒 2 省。

(六) 柬埔寨问题，采取就地停战、政治解决办法。

(七) 国际监察，已确定由印度、波兰、加拿大 3 国担任，以印度为主席。

7 月 21 日凌晨 3 时 30 分，交战双方代表分别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中午，交战双方代表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

随即，法国政府发表关于从印度支那撤出自己的军队、尊重 3 国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分别发表关于使全体人民参加共同生活以及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的声明。

这天下午 3 时，周恩来同与会国绝大多数代表一样，怀着欢快喜悦的心情，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他在发言中说：“日内瓦会议 9 个代表团经过 75 天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获致了协议”。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协商合作”。在这次会议讨论的两大问题中，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它并没有从议程上去掉。现在，本会议对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不仅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而且达成了关于解决政治问题的原则协议。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有关国家具有和平诚意，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协商获得解决的”。

接着，周恩来特别提到了对达成协议作出重大努力的几个国家的代表。他说：这次会议中，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都表现了很好的和解精神”。本次会议两主席莫洛托夫和艾登“对于推进双方为本会议达成协议的努力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渴望的印度支那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

美国代表眼睁睁地看着会议马上就要通过宣言而无可奈何，但又顽固到底，最后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字，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

在美国代表不参加签字的情况下，会议仍然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 3 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终于以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获得协议而胜利闭幕。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出乎人们意料。尤其令人意外的是，为会议成功起了特殊作用的竟然是初出茅庐、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周恩来。难怪人们由此而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

7 月 23 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途经并在访问德国、波兰、苏联和蒙古后，于 8 月 1 日返抵北京。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

西郊机场盛情欢迎凯旋的和平使者周恩来及其一行。少先队员向周恩来等献上一束束鲜花，表示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日内瓦会议后，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成为平坦大道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接踵而至，如北面大国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南亚大国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西欧大国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理查德·艾德礼等相继来华访问。东亚大国日本的有识之士也纷至沓来，与中国开展经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亚非人民的历史盛会——亚非会议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关系展现在新中国人民面前。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周恩来建议熊向晖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1952年国庆》

日内瓦会议期间，曾发生过一起周恩来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取别名的趣事。

为了让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国家代表团和新闻记者，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和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所呈现的新气象、新面貌，周恩来特意指示中国代表团带去了国内刚拍出的第一部彩色电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同时还带去了《1952年国庆》、《锦绣河山》、《中国杂技团》、《白毛女》、《翠岗红旗》、《敦煌壁画》、《葡萄熟了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和《孽海花》等影片。

会议召开不久，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所展示的精神风采已为各国代表团和各国记者所注目。有人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在日内瓦是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立即指示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熊向晖，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电影招待会，放映纪录片《1952年国庆》，用影片所展示的已经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来回击这些记者的诽谤。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记者之家”，以便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国解说词，用英语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5月13日晚，中国代表团新闻处在圣彼得广场剧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时，能容纳250人的剧院座无虚席，还有一些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问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握手，表示祝贺。有的说，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国了。还真有不少美国记者来看，也不知他们作何感想。

事后，一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心中有偏见的人，总是要发诽谤性议论的。这时，一位美国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

**周恩来指示说：“我们有梅兰芳的大戏
……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

针对以上情况，周恩来再次指示熊向晖说：“即使个别人这样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不过“这好对付，我们有梅兰芳的大戏，什么角色都有。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看。”

这部片子是由电影艺术家桑弧导演，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越剧是流行于我国江南地区的一大地方剧种，它具有清雅脱俗的

气质、诗情画意的风格、优美动听的旋律，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在这之前，周恩来和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拍摄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1953年11月5日，他曾和邓颖超、陈毅一同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审片。1992年初，桑弧在《追忆周恩来二三事》一文中这样写道：

1953年冬，影片摄制完成，夏衍同志邀请周总理、邓颖超和陈毅市长来审看样片。他们看后十分高兴，对袁雪芬、范瑞娟的优秀表演以及摄制组集体的创作劳动给予很多鼓励。周总理还详细询问了拍摄情况。他知道舞台上的《梁祝》要演3个多小时，这对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过量的负荷。因此，如何把影片的长度控制在电影通常所允许的2小时放映时间之内，而又要尽可能地保留甚至突出舞台的精华，这确是一个难题。摄制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仍不能尽如人意。周总理沉思片刻，用商量口吻问我们，为了剧情贯串，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能否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以衔接下面马家花轿进门，祝公还硬逼女儿上轿的场面。我们觉得总理的建议非常好，于是又补拍了“思兄”一场，增加了短短4句唱词，却把梁山伯与祝英台坚贞不渝的爱情烘托得更浓烈了。

外国人对中国越剧片究竟感不感兴趣？作为新闻联络官的熊向晖心中没有把握。

20年代在欧洲生活过、对欧洲人的文化素养有较多了解，并且喜欢看中国各种民族歌舞尤其是越剧的周恩来认为，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越有世界性。因此，只要给这部影片取个既恰如其分又有吸引力的别的名字，外国人看它的兴趣是会有有的。

周恩来凝神沉思了一会儿，说：“只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这样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何为《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在16世纪末创作的一部悲剧。剧本题材源于意大利古老的民间传说。剧情反映了青年罗密欧与朱丽叶两情相爱，但因生活在这个有世仇的贵族家庭而不能结合，终于酿成先后自杀的悲剧发生。事后，两个贵族家庭大梦初醒，握手言和。

这个动人的故事，在西方国家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

为了招待各国记者，5月20日晚，中国代表团在湖滨旅馆大厅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果不出周恩来所料，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的受到众多外国记者的喜爱。放映前10分钟，能容纳200多人的旅馆大餐厅的位子已经坐满了人。和上次放映《1952年国庆》不同，这次在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观众个个入戏，全都看懂了。

从“草桥结拜”的欢悦到“英台抗婚”的悲剧，从“楼台会”的哀怨告别到“坟前化蝶”的忠贞相随，那富有浓郁东方色彩的旋律随着美丽动情的画面，在观众心中起伏回荡。当放映到“楼台会”时，一位法国女记者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当放映到“哭坟”和“化蝶”时，只听见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和哭泣声。

电灯复明，放映结束，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一会儿，才突然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位美国记者说：这部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想不到电影的色彩这么绚丽。一位比利时记者说：“简直忘了在看电影，好像我也在梁祝身边。”一位印度记者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时近午夜，人们还在尽兴地谈论着，不肯离去。

当周恩来听取熊向晖汇报得知影片放映获得巨大成功时，意味深长地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的比喻，多么打动人心的比喻啊！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又蕴含了多么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请服务员拿来一瓶茅台酒，亲手送给了熊向晖，以庆贺演出成功。并嘱咐服务员将酒款记在自己的帐上。

**周恩来授意扩大影片放映范围，融洽
同各国人士的思想感情，并且说：“我
们的《梁祝》就超过英国的《罗密欧
与朱丽叶》一头……”**

这以后，根据周恩来的授意，《梁山伯与祝英台》还在其他场合放映了几次。6月8日，周恩来宴请并招待以艾登外交大臣为团长的英国代表团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看后，艾登满意地说：“影片的色彩鲜艳，服装美丽，女主角表演优异。”他还建议中国向外国出口这部片子。还有其他国家的社会名流，看了后赞许道：“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完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片子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

鉴于这部影片在西方国家记者和社会名流中的轰动效应，周恩来又将它拿到中、苏、朝、越4国代表团举行的联欢会上放映，并在现场配备了第一流水平的俄语介绍，特地安排方祖安和在苏联留学的一位烈士后代欧阳菲（小姐）分别翻译男女主角的对白。当剧情发展到梁山伯到祝家求亲，发现小妹就是祝英台，他仍然像少年时的同学关系一样，彬彬有礼，不苟言笑时，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惊讶了，说，“中国的伦理道德太独特了，与欧洲根本不同——看见自己思慕的情人，竟不亲吻，不拥抱，甚至手都不握。”言谈中流露出对东方传统美德的敬意。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对《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独具匠心的安排，不仅增进了中国代表团与兄弟国家的朋友们的友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洽了中国代表团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人们的感情，推动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

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世界影坛巨擘卓别麟看了周恩来托中国代表团成员王倬如捎去的这部电影后，他由衷地称赞中国民族戏曲的优秀传统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增进过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友谊，为推动日内瓦会议获得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越剧彩色艺术片，1954年7月在捷克斯

洛伐克第8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获音乐片奖。在袁雪芬领奖归来后，周恩来高兴地对她说：“雪芬啊，向你恭喜！我们两‘台’（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茅台酒）在那里很受称赞。”

这一年，《梁山伯与祝英台》进入港澳电影市场，并连续上映107天，轰动了港澳和东南亚地区。

周恩来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喜欢，可以说已经到了百看不厌的地步。1955年10月16日晚，他忙中偷闲，到位于北京西城区护国寺旁的人民剧场再次欣赏了这出越剧。

几天后，周恩来向文艺工作者讲话时，津津乐道地对《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出戏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给予了理论性的阐释。他满怀厚望地音着在场的文艺工作者，以激昂的声调说：“我们要使人民的艺术受到人民的欢迎，艺术里面必须充满人民性。而人民性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由于地域、气候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人类社会形成了各种民族。它们相互之间“有了不同的习惯，有了不同的传统，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了不同的语言”，“表现在艺术语言上也有不同”。这样，艺术“虽然育它的特殊性，们是总有共问性，这种共同性就贯穿了人民性”。由于“是人民的艺术，所以人家能够理解”。

周恩来强调：《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丰富的艺术形式下”，在内容上“有更完美的人民性的”一出戏。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中国古典戏曲，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喜爱。“因为它不仅写了悲剧，而且写了理想，这就表示了中国人民是有理想的”。这是“一个鼓舞力量”，“它推动着中国这个民族生存下去，强大起来。所以，我们的《梁祝》就超过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头，因为它那个悲剧里头没有理想……”

这就是周恩来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总体评价和独特的见解。

1957年1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文化部举行的1949年到1955年优秀影片授奖大会上，又荣获舞台艺术片类的唯一金奖。

求同存异万隆城

毛泽东运筹帷幄，授权周恩来 对会议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5个发起国，热情地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最早是在1954年初由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这年12月，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正式提出召开亚非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周恩来极其敏感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在复电中，他高兴地指出：“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中国政府对于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荣幸”。

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将共聚一堂，讨论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响。

但是，亚非会议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并非易事。这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最害怕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觉醒。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美国扩张侵略、称霸全球的对外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它必然站在敌对立场上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美国《圣路易邮报》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

同时，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国初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参加会议的29国中，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同中国有外交关系，锡兰同中国只有贸易关系；其余22个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有外交关系，而且有的国家在政治上受着美国的影响或控制，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对立情绪。

在阻止亚非会议召开的阴谋破产后，美国便企图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大做文章，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对远东地区已经“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的谎言。极力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使这次会议失败。到亚非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竟然公开要求会议“将设法谴责以武力实现其国家野心的做法”的共产党政权。

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置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美国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为此，从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他主持研究与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在4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文件。《方案（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

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

4月3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审核了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全体人员名单。

4月5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彭真、陈毅、张闻天，王稼祥等。会议充分讨论并批准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的计划》等有关文件，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4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和代表团成员名单。13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为顾问，王倬如为秘书长。

这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同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尼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临危不惧，“克什米尔公主号” 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他在险象环生 中出现于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4月7日，周恩来拖着刚动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病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乘坐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8日抵达昆明。

对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卓越表现大感紧张的蒋介石，在1955年初向国民党高层人士发表了一篇题为《最近国内外局势的推演与我们反攻复国计划的进度之说明》。在这篇讲话中，他悲叹道：1955年4月至6月乃是“我们外交最危险的时期”。在2月10日周恩来公开发表关于接受印尼总理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声明之后，国民党当局开始筹划谋害周恩来的罪恶计划。

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放置了定时炸弹。

这天，当飞机飞离香港约5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东经107°59'38"、北纬3°53'12"）上空爆炸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由于周恩来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埃及等国领导人会晤，事先改变了出国路线，得以幸免于难。

在这以前，周恩来以他对敌情的特殊敏感，曾指示有关方面加强对敌情

报工作。从3月开始，我方陆续侦察到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对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采取破坏行动。

4月7日，周恩来在即将登机时，得到了赶来机场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呈交的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收买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准备借“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短暂停留、乘为飞机加油之机，进行破坏。周恩来当即指示：请转告有关部门领导办理。9日，周恩来再次指示外交部立即将有关情报通知英国方面。很快，香港政府在机场采取了防范措施，但囚忽视了对飞机的安全检查，致使国民党特务周驹有隙可乘，在飞机右翼舱内安放了破坏力很大的小型定时炸弹。

面对险象丛生的局势，周恩来面无惧色，处之泰然。在他的经历中，身处危局险境的事何止一次！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

一行驱车由延安南下两安途中，在劳山附近遭土匪袭击，同行30余人仅幸存7人。但是，就在第二天，他又赶到西安同国民党谈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

4月12日，中国政府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表郑重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和香港政府对这一不幸事件负有严重责任。同时，声明要求英国方面彻底查处罪犯，将特务逮捕法办。

这一天，周恩来正好收到邓颖超关心他和全体同志安全问题的来信。当天，他在复信中深情地写道：

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净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一封短信，寥寥数语，把周恩来一生部在忠实实践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盘托出，这就是他经常说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亲自过问和关心着破案与善后工作。在中国驻印度使馆参赞申澍处理完现场的善后工作赶往万隆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沉痛地说，历史将永远记住，烈士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他要申澍把烈士的骨灰盒留给他，由他带回北京。

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烈士墓，至今仍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它的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以后，周恩来以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开展了多方面的各种形式的积极活动，终于促使香港政府在进行大量侦破工作之后，于1956年1月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对犯有谋杀罪的国民党特务周驹已经发出逮捕状，要台湾当局将逃到台湾的这名罪犯送交香港政府处置。

1994年9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华裔学者曾锐生在《中国季刊》首次披露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始末。1995年春，台湾《中时周刊》予以转载。据《中时周刊》介绍。

当时这次暗杀行动的两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系“保密局故后部署组组长”，

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早年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故后颠覆的情治人员。

.....

此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个关键人物。问题的难点自然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而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第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 20 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意。

在港市 60 万的重赏下，小郑接下了暗杀周恩来的这一事件的主角。

计划大致确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

4 月 10 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 60 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文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时，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 月 11 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对工作人员的例行检查。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 TNT，是一种高科技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按规定，简易的漱洗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就这样，小郑带着 TNT 混入机场。

4 月 11 日早晨，小郑负责 3 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为加油而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小郑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的。4 月 14 日，周恩来飞抵仰光。

15 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 6 国领导人在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这时，飞机爆炸事件已经在一些亚非国家中引起思想混乱：有的国家领导人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

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在会上，周恩来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冷静地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他建议在座各位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没有结果。与会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决心为推动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4 月 16 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在飞经新加坡上空时又遇雷雨，被迫暂时降落到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国民党的活动比较猖狂的新加坡的机场上。在机场，周恩来受到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的接待。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抵达雅加达，可急坏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以及使馆工作人员，不安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

下午 6 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群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后，印尼外长苏纳约陪周恩来乘车驶离机场。一路上，街道两旁，楼台房顶，到处挤

满了欢呼致意的人群。从此以后，凡是中国代表团经过的地方，“和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掌声震耳欲聋。

4月17日，周恩来飞抵万隆。他在机场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同时，他预见性地指出：“我们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以后发生的事实，证实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周恩来一平风波，在会议出现分裂危机的情况下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气候宜人的“花城”万隆隆重开幕。

在印尼国歌的伴奏下，神采奕奕，身着白色制服、头戴黑色贝蕾帽的苏加诺总统，在5个发起国总理的引导下步入独立大厦会场，然后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他说：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的不屈不挠、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的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接着，苏加诺总统进一步强调：

我们属于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我们的种族是不同的。甚至我们的肤色也是不同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为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对种族主义的共同厌恶而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而联合起来的。”

苏加诺总统的开幕词，引起了各国代表的共鸣。

开幕式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绝大部分发言指出，会议应当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会场上充满着友好与和睦的气氛，但是，从下午最后一个发言起到19日，会议出现分歧和矛盾。有些代表的发言或因偏见，或因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偏离了会议议程。有的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提出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并提出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如果处理不当，就必将使会议陷入混乱，形成分裂之势。

各国代表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周恩来，有的同情和焦虑，有的幸灾乐祸。这时，周恩来镇定自若、不急不躁，静静地听着、思考着。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而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不一会儿，一篇内容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准备好了。

下午4时45分，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话音未落，会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会场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人，

没有座位的地方也站满了人。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

转瞬间，水银灯一齐亮起来，照像机一齐动起来。没有人不意识到这一时刻的重要。不管是采访记者，还是与会代表，而且连来宾席上的外交官也都掏出了笔记本。

周恩来在作了简要的说明之后，转入正题。他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会场一片肃静，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义落地了。

全场都在屏息倾心周恩来下面的发言：“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在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接着，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所谓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等，是不存在的。他侃侃而谈。这是因为：

第一，“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第二，“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宗教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

第三，中国人民“经历了近 30 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所受苦难“数也数不尽”的中国人民，“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得以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内政呢？”“华侨双重国籍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但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至于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便是“威胁了别人”，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宣布：为了不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在会上不提“解放自己的领土和沿海岛屿”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

讲话结束时，周恩来诚恳而亲切他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但是，“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据周恩来当时的翻译浦寿昌回忆说：

周总理讲话的整个过程，大厅里鸦雀无声，楼上是记者席，挤满了人，可是没有一点声音。后来他们描述说，如果当时掉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非常安静地听总理讲话。

周恩来这篇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引人入胜的发言，只有 18 分钟，却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使与会各国代表认识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

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看清了新中国确实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人们心中的担忧被驱散了，对会议的成功又充满了希望。

周恩来的话音刚一停住，会场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掌声与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

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国代表纷纷离座，去同周恩来握手。甚至连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都称赞：周恩来的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十分和解，表现了民主精神”。

周恩来再平风波，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
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4月20日，亚非会议转入实质性讨论，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同已经于19日开会的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头举行秘密会议。政治委员会讨论以下3项议程：人权和自决问题、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和平和合作问题。经济和文化两个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和文化合作问题的结果也将由政治委员会批准。这样，政治委员会是3个小组委员会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权的委员会。

但是，在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后，一只无形的黑手要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从20日傍晚开始，会议再次掀起波澜。有的代表节外生枝，把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殖民主义”。当有的代表提出提案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有的代表则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提案，要求所谓“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凭借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会场气氛异常紧张。许多代表目睹这一僵局，认为会议再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了。

这时，在万隆的一些自封的美国“观察家”幸灾乐祸地声称：会议有“破裂的倾向”。

4月23日上午，周恩来在政治委员会上再次发表了后来被某些代表称作“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说：“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与会29个亚非国家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这就“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既然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机”。

周恩来又说：“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无疑成为消除障碍的最关键的几句话。

接下来，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3）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同时，他采纳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1个半小时。他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发言完毕，在他的四周已经围上了一大群人，纷纷同他握手并致祝贺。

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并且写进《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中，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

会上，尼赫鲁总理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话是权威的。有人为此感慨地称许道：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40年来，这十项原则促进了亚非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至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周恩来广交朋友，频频的会外接触与
赤诚交往，他吸引了所有的人的注意
力，几乎同所有与会国代表团团长“建
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为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自由接触交往的机会。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周恩来都想方设法地与他们接触，探讨相互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阂和疑惧。频频的会外接触与交往，使周恩来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收到了显著效果。其中有很多代表团团长包括有对立情绪的，都同周恩来建立起了友谊。

一天，各国代表团都在会场外排队等候入场。突然，周恩来问同行工作人员，站在咱们旁边的那位代表是谁？当这位工作人员打听到他就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时，周恩来随即过去同他攀谈起来。他俩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认识并交上朋友的。

当年以滔滔辩才“而出名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卡洛斯·罗慕洛，在亚非会议召开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采访时，深情他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中，有两件是在会外取得的。

第一，经过平等协商，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条约》共 14 条，其中规定：凡属同时具有缔约国双方国籍的人，“都应该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选择一种国籍”；在条约生效时，凡属具有两种国籍的成年人，“应在本条约生效后两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凡属具有两种国籍的人，条约生效时尚未成年，“应在他们成年后一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

周恩来在《条约》签字仪式上说，现在，中国和印尼之间的问题“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经过友好谈判，获得了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将坚决执行今天签订的条约”。“我希望，由于过去的历史所造成的持有双重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们，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了他们的国籍之后，将严格遵守这个条约的内容和精神，并加重他们对其所选择的国家的责任感”，并将为促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共同努力”。

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旧时代遗留给新中国的繁难问题的解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为新中国同其他国家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树立了典范。

会后，缅甸总理吴努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地说，我深信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国却受到了美国赤裸裸的公开进行的颠覆之害。

第二，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

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在会外，他毫不隐讳地同关心这个问题的有关国家代表团深入交换了意见。他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二是，“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是“国际性问题”。“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针对有人提出“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只说明要解放台湾，而未提用武力解放”的话，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历次声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了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巴基斯坦总理问道，和平解放台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笑答：“完全可以”。

4 月 23 日，周恩来发表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

很快，周恩来的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并波及到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完全消除了，并导致了中美大使级谈判，为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

4 月 24 日，获得巨大成功的亚非会议，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胜利闭幕。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说：“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从 17 日抵达万隆到 24 日会议闭幕，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事务工作，已经耗去了周恩来相当多的时间，再加上频频的会外接触、交往，使他的睡眠

时间少得可怜。据当年跟随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

会议期间，周总理7天总共只睡了13个多小时觉。回到昆明后，一天在院里散步时，总理对我说：这次出去紧张些，睡觉少些，回来多睡点就补上了。大姐身体不好，回去后不要对她说，免得她担心。这件事一直到总理逝世后的1977年冬天，我才向大姐作了汇报。

周恩来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随行的陈毅。他深情而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我对你非常佩服，我不但工作不如你，我熬夜也不如你！”

亚非会议的胜利成果，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虽然会议从始至终仅有短短的一周时间，但是局面却一下子打开了，新中国的地位上升了，形象突出

了。各种舆论纷纷认为，会议获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周恩来这个中国革命神化般的领袖人物，作为新中国优秀代表的参与分不开的。

一位路透社记者曾经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怎样的洞悉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

一位美国记者也报道说：“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他确实确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7日，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满载着向全国人民汇报的累累果实，在和煦的阳光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李济深、郭沫若、贺龙、李先念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在冒进和反冒进中

毛泽东表示：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周恩来处于被动的跟进状态中，说《农业十七条》成为“一个推动力量”

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其创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战胜艰难险阻，绕过一个又一个暗礁，克服一重又一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许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胜利地开展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从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到1955年国民经济一直健康发展，成效显著，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在1955年又获得大丰收。

这一切，都给获得新生在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从切身体会中感受到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更增加了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

可以说，是天随人意，人心思快。

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毛泽东等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头脑开始热了起来，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同时，还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设想到1956年即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即生产关系改变后，就“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1倍”。

在以上认识的驱动下，1955年底，在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后，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并进而批判在这个方面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

为此，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南下杭州和返回北京途中抵达天津时，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地区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主持制订了《农业十七条》。

《农业十七条》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有益探索，但却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同时规划了12年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比原来设想的产量增加了1倍以上）。

毛泽东以愉悦的心情迎接《农业十七条》的产生，并在12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他们对这个文件的意见。

11月30日、12月1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不切实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作为推动力量，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他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个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同时告诫领导工业建设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周恩来同刘少奇、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也是同意的。

周恩来曾经指出：《农业十七条》成为“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比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刘少奇也曾说过：“经济上先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了。“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3000亿是可以完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决定：“把反盲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但是在实际上，周恩来同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在这时是处于被动的跟进状态中的。因为在不久前，他们仍然坚持无论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都需要15年的时间。

1955年11月15日，周恩来会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访华团成员时说：中国“现在很落后，从经济上说、文化上说，比起你们落后得多，但是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工业化。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相信有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以后，再逐步提高，赶上工业发达国家。

1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又指出：我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转变，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转成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的所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

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为了全面安排好这项工作，同一天，陈云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报告中强调：“各地方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应该在明年1月底作出一个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轮廓计划，规定先改造哪几个行业，后改造哪几个行业，哪一年改造到多少，哪一年完全改造好。”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准备在明年3月，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规划”。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迅速到来，在1956年3月就已基本上实现各行业公私合营了，也就无须再搞什么对资本主义改造的规划了。

冒进冒头后，周恩来会同刘少奇等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在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1956年1月上旬，在《农业十七条》基础上，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要求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简称《农业四十条》）形成了。

《农业四十条》所规定的各项农业指标都很高。其中，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等于说，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而实际情况是，40年后的今天，中国粮食、棉花的产量仍未达到这个指标，足见《农业四十条》所确定的战略目标是何等的脱离中国的实际。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引起连锁

反应,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 1955 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这样,在头一年 9 月 22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 1956 年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受到不断加码的严重干扰。

在严峻的经济局势面前,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冷静的理性思考和周密的科学计算,较早地察觉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并预感到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高指标的潜在威胁。在内在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的驱使下,他们急切地意识到: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

为了使全党干部在持续了多年的大好形势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和陈云行动起来,充分利用各种重要会议进行宣传和呼吁。

例如,1956 年 2 月 8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告诫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 12 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在上述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2 月 10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 170 多亿元减到 147 亿元。会后,国家计委依此决定修订《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从积极意义上所讲的把高指标压下来的“2 月促‘退’会议”。

3 月 25 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到 4 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严重地表现出来。

但是,这时党内领导人的某些急躁冒进情绪依然严重存在。4 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据当年列席会议的胡乔木回忆:

1956 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 1955 年冬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4 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 1956 年的基建预算 20 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上的分歧,开始显现。

5 月 11 日,双眉紧锁的周恩来以“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的无私无畏精神,在国务院第 28 次全体会议上言词恳切地果断提

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指导起草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稿中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和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系统全面地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并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和论据，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据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10日，刘少奇主持了有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李先念、薄一波、胡乔木等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共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

周恩来、陈云等开展反对和 纠正急躁冒进倾向的工作， 大力削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6月5日，即在中共中央提出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第二天，周恩来便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议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研究继续压缩经济建设实践证明仍不实际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

针对有人不同意削减预算一事，面带严肃神情的周恩来，说明了“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预算高了就“一定要削减”的道理，强调“要打破预算不能修改”的观念。他以协商的和缓口气指出：“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他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周恩来在说明理由并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后，他综合李富春、薄一波在会上提出的意见，确定按5%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其中再次把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6月12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针对有人不同意在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财政决算和预算的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问题，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的说法，毫不让步地坚定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他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

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以上意见，为全国人大会议所完全接受。

为了配合国务院、中共中央自5月以来开展的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斗争，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对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并为中共中央充分肯定的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的意见作了深入阐述，既充分肯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前进的，又中肯地分析了经济建设中客观存在的急躁冒进问题。

在这之前，社论初稿写出后，6月12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信刘少奇：“嘱写社论，已由本部王宗一同志写好。我们认为可用，转送上请阅正”。胡乔木、刘少奇对社论初稿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随后，刘少奇函告毛泽东：“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审阅时，只批了“不看了”3个字。

单从字面上看，毛泽东对社论稿未置可否，但在实际上他是不同意这篇社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这可以从毛泽东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对《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批语和多次批评中得到证实。

毛泽东指示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印发与会人员，并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同时，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说：《人民日报》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引用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是在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话说回来，这段时间，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国务院会议、中共中央会议上所进行的反冒进斗争，全国人大会议对反冒进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为动员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和在经济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使已经冒进的本年度经济从下半年起开始逐步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并为向八大提出一个比较实际与稳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言以蔽之，急躁冒进受到抑制，经济建设趋于正常。周恩来等继续坚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主持制订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二五”计划的建议

1956年7月以来，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精力转向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上面。

“二五”计划是1955年8月开始编制的，不久便提出了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轮廓数字。这以后，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斗争的开展，被纳入远景计划的

“二丑”计划的各项指标也跟着订高了；又由于这些高指标在1956年4月下旬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因此，使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根本无法平衡。到6月，国家计委继提出各项指标都经过修改的“二五”计划的第一方案后不久，又提出了第二方案。但是，由于对这些指标的改动，都属于非实质性的小修小改，从而使整个编制工作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这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只有两个多月了，有关部门却拿不出一个能够提交八大会议的方案来，真令人心急！

在编制“二五”计划困难重重，时间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周恩来、陈云等看到：要搞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必须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要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就必须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工作，讲冒进之事实，摆综合平衡之道理。只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高指标降下来。

7月3日到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方案。

周恩来指出：制订新方案“是为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明“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以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5500亿斤，也是“不可靠的，有危险的”，甚至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这是因为，农业合作化后，虽然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我们还“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它们天天都在管着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粮食生产每年很难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农业指标一旦达不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他强调说：对国家财政收支指标和工业生产指标，尤其是钢铁生产指标，也应该进行压缩。

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认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仍不稳妥，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5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元至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减少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可以说，这是一次把高指标大幅度往下降的带转折性意义的会议，从思想上反对和清理了离开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离开综合平衡的急躁冒进倾向。这样，向八大提出一个接近实际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已经成为可能。

这次会议结束后，在7月里周恩来倾大力主持编制了“二丑”计划的建议。

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同陈云又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对7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方案和该方案的调整意见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适当调整。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同张玺、薛暮桥等最后审定了“二五”计划的建议。

本年度以来，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以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视和忘记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本应起到的积极作用。鉴于这一情况，周恩来等在对“二五”计划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和又安全的精神”一语即被删掉

了。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

9月初，周恩来在阅读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1962年要求生产粮食5200亿、棉花5200万担”，恢复为“到1962年要求生产粮食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并以坚定的语气在一旁注明：“粮食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由于周恩来的坚持，这两个比较实际又很重要的指标才最后确定了下来。

一个注意到综合平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和初步总结了几年来国家经济建设宝贵经验教训，强调稳步推进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犹如经过较好的营养供给和良好胎教的双胞胎婴儿，就这样幸运地诞生了。它的诞生，为“二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周恩来提出以“要重工业，又要人民”
为出发点，坚持“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指导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

为了向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一个较好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安排下年度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依据，同时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在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转到了对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指标的研究和计划的编制工作上。

1957年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当经委把投资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嗷嗷直叫，反对再往下压了。

看到这一情况，周恩来对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他认为必须根据凡年来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以苏联、东欧国家不顾人民生活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酿成比较严重的社会后果为鉴戒，在1957年计划中充分体现“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究竟怎样才算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周恩来同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心心相应，达成共识：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趋于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下不来，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也就必然会继1956年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供需紧张状态在1956年过多地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因此，要下决心把基本建设投资压下来，而且要压到大大低于1956年投资金额的程度。

基于以上认识，10月20日到11月9日，在3周时间里，周恩来共主持召开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

会上，个别同志对1956年急躁冒进造成的危害看得并不清楚，仍旧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说：“1956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

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当即，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这种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恳切地说道：“这4个字（指前一发言人提出到冒、松、紧、分）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李先念发言支持这个意见，并且强调说：“今年的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明年就压不了。”“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从统一思想的目的出发，11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比较系统地陈述了自己对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的看法，严肃地指出：从“我们国家这样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国情和“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他强调：“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就是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所以，对于高指标“应该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当然决定了就要执行，但是有意见还可以保留。”由于反冒进已经进行几个月了，急躁冒进给经济带来的危害，在各部门特别是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感受更加深刻，又由于这次会议把重点放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上，因此使“总想把工业多搞一些”的少数同志也认识到“过去的想法有些片面和主观”。这样做，既团结了同志又统一了思想。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国务院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全会上继续反对急躁冒进。开会的第二天，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了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使全党高级干部从过去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更多教益，周恩来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的某些弊端，联系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再度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作准备。因此，1957年计划的方针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否则，将进一步影响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同时，他说：这次全会提出的财政预算、生产和基本建设等指标。“是很初步的数字”，“经过全会讨论，把方针批准”，“再待经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核算，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恰当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

这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就国家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

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和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事，还高兴，还得

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一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毛泽东对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全面性的反冒进的会议，感到意外。进而，他认为反冒进到二中全会已经“到了高峰”。于是，他在15日讲话中谈了7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其中，他缓缓而有力地强调：

“我们看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增产……”

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相左的意见，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在报告中所述的重要意见和制订1957年计划必须坚持“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仍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并且在会后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11月17日，周恩来出访越南、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

在反对急躁冒进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方针的指导下，陈云担负起了主持制订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担。

根据再次摸底后的情况，1956年12月17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讨进一步减少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

陈云提出：明年投资究竟搞多少，“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负着6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把投资压缩好，“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计划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会议决定再将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114亿元，待进一步算帐后提中央讨论。

出访中的周恩来，中途于1957年1月3日回国休息，1月7日再次踏上出访的征途。这天，陈云前往送行。据薄一波回忆：

陈云同志送总理回来后赶紧打电话给我，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3次，他要我转告你，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100亿元。”这时我正准备拍板。于是，我在会上说：“不要争了，接总理的指示定为110亿元（因为陈云同志讲的是上海话），我把100亿元听错了，听为110亿元。”可见，总理反对急躁冒进很坚决。

为了深入总结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有利于1957年计划的制订和该年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重要讲话。

陈云阐释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道理，指出：“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他还提出应当用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

27日，李先念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继续强调：从1956年冒进给财政金融带来的重要的后果中，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财政、信贷和物资必须统一平衡。”“只要在正常收入的范围以内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保持这个限度，大体上就可以做到信贷平衡。财政和信贷平衡了，大体上整个物资也就是平衡的。”

在全国省市书记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次会议的反冒进气氛也有所不快。他说：

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估计低了，那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是二中全会解决了的，但是这次会上（我们一共开了8天会），还有许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可见得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还有问题。

全国省市书记会议之后，国务院进一步对1957年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和财政支出指标进行了核算和压缩，并在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安排了1957年计划。到4月，访问归来不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44次至46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了对基本建设投资、行政经费、军费、社会购买力、劳动计划和文教卫生等指标都作了压缩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计划（草案）》确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11亿元，规定工业和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4.8%、7.1%。

在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下，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1957年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后

周恩来急切地感到：“人才缺乏，已经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各项建设的开展，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时时处处都碰到一个躲不开的严峻问题，这就是建设人才缺乏，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并且需要不断地及时提出解决知识分子有关问题的具体政策和办法。

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贯给予了高度重视。多彩的历史周详地记载了他的历史功绩。

早在 1950 年 8 月 24 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上作《建设与团结》的报告时，他就明确提出：我们国家的“方向和目标确定了”，这就是要“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我们是在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恢复工作“不可能百废俱兴”，只能先从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制造化学肥料这几项工作入手。“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

一年后的 1951 年 8 月 22 日，在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 18 个专业会议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又指出：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从 1952 年 7 月开始，周恩来以很大精力参加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搞五年计划，他更感到建设人才缺乏的问题。到 1955 年底，以农业合作化为先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预示着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将到来，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进入有更多的建设项目要铺开的关键性的第 4 年。各种人才匮乏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迫切和尖锐了！

周恩来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50 年代两次到欧洲，亲眼目睹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在 30 年中给西欧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样，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科学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周恩来告诫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社会历史条件，为知识分子大显身手提供了优越的用武之地。

建国后的几年时间里，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的实际锻炼和政治理论的学习，可以说，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看到了在旧中国无法见到的与自己命运紧密相连的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产生了强烈的为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的内在动力。同时，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也有

了显著提高。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王淦昌、唐敖庆、汪德昭等许多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也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决然地放弃在国外的优越工作条件和丰裕的物质生活，排除重重阻力，奔向祖国，为建设新生的古老中国尽心效劳，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作出了杰出或重要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但是，这时中共党内却严重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在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要求过高过急、不实事求是、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许多人中间还流行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不正确思想；有的则对知识分子抱有一种盲目的排斥和嫉妒心理，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利用种种机会加以压制和打击。对此，中国民主同盟也反映了类似的一些情况。以后，在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费孝通先生主持下，整理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一批材料，送给中共中央统战部。这批材料经统战部分类整理后，他们把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六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随即，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周恩来汇报了这6方面的问题。

这样，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已经非常必要。

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1955年11月22日，曾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进行商讨，决定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不失时机地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到来的历史转换关头，即在1956年：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下设强有力的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列宁曾经说过：“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为了摸准情况，筹备工作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抓了全面调查知识分子情况，认真收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工作。

1955年11月下旬，周恩来邀请中国科学院、北京市部分大学等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多的一些单位的有关人员座谈，进行调查研究，并详细研究了北京市26所大学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各方面情况。同时，他指导10人领导小组对统战部、北京市已经上送的调查材料加以分类整理和分析研究，写出了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社会活动过多与兼职过多、待遇问题、发展党员问题等11个专题报告。

周恩来还认为，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是一支调查研究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力量。为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11月2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问题座谈会上，专门布置了各地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 12 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他还指示各地也像中央这样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认为“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当天，他又召集中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了这项工作。

为了更好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11 月 30 日，周恩来进一步责成 10 人领导小组继续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观点等 12 个方面，更加系统地全面地整理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努力从宏观与微观、正面与反面等各不相同的角度去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以此为制订正确的新的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打下坚实基础。

经过紧张而有节奏、得心应手和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对知识分子的现状和中国同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现状有了更深刻了解以后，周恩来在 12 月 17 日、19 日两次约胡乔木到西花厅，商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起草问题，就起草报告的指导思想、稿子的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提出了系统意见。

由于起草报告稿的目的和思路明确，可资参考和利用的材料面广，质量比较高，加上胡乔木对这一类报告的起草驾轻就熟，因此到 1956 年 1 月上旬报告初稿就已写成。6 日，周恩来召集中央 10 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报告稿。随后，他一遍又一遍、一丝不苟地，逐段、逐句、逐字地对稿子进行推敲和修改，并增写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修改一直持续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这天凌晨。当他写下“印一千四百份周恩来·十四”的批示后，才放下已经紧握了数个小时的毛笔，躺到床上，让疲惫的身体和倦乏的双眼得到短暂的休息。

报告数易其稿后，稿子的逻辑性更强了，思想理论观点更突出了，内容更加充实、准确和全面了。

周恩来提出两个著名思想，成为 党领导和加强知识分子、科学技 术工作的指导思想

1956 年 1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怀仁堂建于清光绪 13 年（1887 年），原名为佛照楼，紧靠中南海西口。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专作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会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国务会议都曾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规模宏大，出席会议的 1279 人济济一堂。他们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徐向前、贺龙、蔡畅、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 57 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 27 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当这天的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后，周恩来便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都要关注

的一项基本工作，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并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证。周恩来列举雄辩的事实，说明“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思想。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周恩来有针对性地合乎逻辑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作出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的计划，争取“在1962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3左右。”

在报告中，周恩来对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周恩来又远见卓识地提出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著名思想。实际上，这就是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斗争中取得主动和赢得胜利，谁就必须依靠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做基础。

因此，科学技术对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盛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周恩来提出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著名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订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的根本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加

强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思想。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这两个著名思想的指导下，他把报告的重心放到阐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上，放到阐明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考虑和规划上。对此，周恩来强调要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让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3项措施：

“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在上述措施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问题。他在1955年11月就曾指出：“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所谓尊重，“是要尊重他们那个知识”，“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他说，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各项建设，对于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的”。对他们的使用应做到“用

而不疑”。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周恩来在报告中批评了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敬而远之的作法，认为“这样，既缺乏了解，也容易形成隔膜”。

周恩来把向知识分子学习，同他们交朋友，作为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内容，身体力行，努力实践。1988年底，笔者访问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他感慨万千地回忆说：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对周总理很尊敬，很爱戴；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无话不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周总理懂得知识的真正价值，非常珍惜它。他尊重知识分子，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逆耳之言，时刻关心他们的疾苦。这样，他和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必然地会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了。

1992年初，著名作家老舍夫人胡絮青在《巨人的风格》一文中，深有同感地写道：

他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那里，找不到强加于人，找不到强迫命令，找不到“我说了算”。他永远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

这便是周恩来！

这便是周恩来的魅力！

有这个魅力，多大的艺术天才也对他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地跟着他走，走得愉快，走得高兴，服服帖帖。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高度重视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他在1955年11月就曾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在生活待遇上的现状，应当说，“比抗战时期好”，但“比抗战前差”。就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如果同政府官员的工资比较，现在除极少数教授的工资同司局长差不多外，其他的只相当于副司局长甚至更低。这都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因此，知识分子的工资一定要调整，其中有特殊贡献者的工资还可以超过国家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直接抓。

据此，周恩来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应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问题，并指出：提高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在业务上的上进心，加强新生力量的培养，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同时，还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强调：如果他们“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大多的时间，这应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这年春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有郭沫若、老舍、曹禺、刘白羽、周立波、艾青、赵树理、李准等参加的小型作家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问题是作家稿费问题。当时的稿酬偏低，而文化部还准备取消印数稿酬。据李准在《清风亮节》一文中说：

因为要讨论稿酬标准，总理就调查作家们的开支情况，我记得是先算老舍先生的每天开支花销。总理算得很仔细，连茶叶、招待烟都算上。开初，我并不了解总理的意图是要当时的文化部领导不要把稿酬压得太低。算到我的时候，我说我的工资是65元，有3个孩子，但妻子和孩子都在农村“落户”当农民，所以也够花了。总理马上说：“你这个没有代表性。一个作家的生活标准，不能按农民算。作家的劳动是艰苦的劳动，应该有所照顾。”

算到最后，大体上得出接当时的物价，每月要300元左右……所以大家欢呼雀跃。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还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国家还不宽裕，还要过较长时间的艰苦生活。但对作家、艺术家，不能难为他们，要出大作品，得有一定物质条件，我们国家现在才有几个作家！应该让他们安心创作，无衣食之虞。

会议开得很成功，都感到有一种祥和畅快的气氛……作家们都体会到，什么叫“无微不至”，什么叫“如冬日之阳，人赖之温”。

周恩来对作家、艺术家是如此关心体贴，对科学家、教师和医务工作者等也不例外。在周恩来的主持和过问下，5个多月后的6月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有了普遍的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253元提高到364元，增资幅度为36.4%。

接着，深思熟虑的周恩来以世界战略家的眼光和恢宏气魄，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紧急呼吁：“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必须“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周恩来看到，这意味着既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要在务实精神指导下，确定正确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和制订具体的方针政策。为此，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要在12年内，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决策，周恩来信心十足地强调：国家除了拟定一个大规模的培养干部规划外，还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也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政府各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再就是“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如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周恩来具有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卓越才干。他在报告中还认为，应该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使之“保持适当的比例”，纠正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偏向。他说：如果说，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那么，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及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同样存在着。又说：“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在报告快要结束时，周恩来停了停，提高了音量，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周恩来富有鼓动性的结束语，赢得了与会者持久的雷鸣般的掌声。

在会议闭幕的这一天，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望着1200多位代表，笑容满面地称赞道：“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这次会议在成功地实现预期的目的后胜利闭幕。

**周恩来为贯彻落实知识分子
会议精神而进行韧性战斗**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载入了史册。这以后，周恩来以很大精力，开始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韧性战斗。

周恩来首先抓了有关具体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指示、决定等文件与材料的修改定稿、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

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周恩来指导起草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和中央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

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会后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和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除规定由新成立的专家局“负责研究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应由有关部门办理相关事情的目录，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关于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

同时，中央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会同国务院专家局，在本年内有计划地检查了高级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10多个部委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到这些部门若干有代表性的单位，通过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对他们进行访问等形式了解情况，总结了成绩，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使知识分子普遍地感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会后对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已使过去严重存在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受到严厉批判和有效清算，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充分肯定，人格得到应有的尊重，工作条件、生活待遇也正在改善中。现在，是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了！这样，全国迅速掀起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高潮。这种形势，当时在中国科学界被赞誉为“兴旺的1956年”。

为了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周恩来还抓了制订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工作。

在科学规划制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一些发展科学的方针性问题。但是，周恩来总是以他可贵的领导科学的高度民主的作风，特有的考虑复杂问题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决策时军事家的干练、明确、果断，及时妥善地处理和解决了一些繁难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

据参加当年科学规划的武衡回忆，负责科学规划的10人小组曾向周恩来做过多次汇报。当汇报到基础理论的发展时，规划小组曾提出一个“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周恩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后，略为沉思了一下，反问道：“那么，还有一些任务带不起来的学科将怎么办？”“是不是再补充一个基础科学的规划？”

后来，根据周恩来的主张，在原定56项重大任务中又增加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由此扩张为57项。此外，又在这个基础

上专门制订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

在周恩来和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人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的组织领导下，经过数百名科学家半年多的积极努力，于195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顺利诞生了。《规划》共确定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又挑选出对全局有关键意义的12个重点，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另外，对于某些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采取了特殊的紧急措施。例如，为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再加上当时未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总共是6项紧急措施。这些措施，为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突破尖端技术，使“两弹”过关，奠定了基础。

不幸的是，由于受旧有意识惯性作用的影响，以及当时国际政治风波的影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在中共党内却没能获得稳定的持久的支持，尤其是没能得到毛泽东的持久的支持。

就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不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又把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并提出：“对他们继续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仅仅是“利用”他们的力量，而不再是“依靠”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了。1957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产党内一些领导人的认识发生这种逆转后，周恩来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他只能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采取实际措施来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上。

这一做法，可以说是周恩来在当时历史条件制约下所能作的最好选择。正因为如此，才使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的种种规定和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学非所用、使用不当的现象有了明显改观；他们5/6的业务工作时间基本得到保证，并给许多专家配备了助手和辅助人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购置图书资料的费用有了较多的增加；高级知识分子得到普遍的增薪和晋级。此外，还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医务和文艺工作者。这些措施的有效贯彻，提高和加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由于周恩来大力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由于我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努力，还由于我国科学技术瞄准的是世界先进水平但又实事求是，方针政策正确，措施具体有力，原定时限为12年完成的科学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大都提前5年即到1962年就完成了，使我国科学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一批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问题，大大地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我国研究机构也由381个发展到1296个，人员由18000余人增加到86000余人，初步改善了国家科学力量薄弱的状况。

传播友谊的使者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国内不仅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这年秋天，周恩来开始对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等亚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他的亚洲之行，为新中国即将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大大的
不同了，大民族主义正在被清除，
而代之以兄弟的情谊

中国和越南，山连山，水连水，自古以来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然而，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这份友谊也曾蒙上过阴影。

那是在1900多年前，越南民族女英雄征侧和征贰率领民众起义，赶走了统治河内的中国官员苏定。随后，征侧就位，号称“征王”。

两年后，即公元42年，中国封建王朝光武帝派马援（马伏波）大举侵略越南，夺回统治权。征侧、征贰姐妹率兵奋勇抗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姐妹俩不甘受辱，双双投入河内西面浪涛滚滚的底江中。

为纪念这两位民族女英雄，越南人民在临江的东仁村修建了一座庙宇，以示纪念。后来，东仁村的百姓害怕江水泛滥冲坏这座庙宇，遂将庙址迁到河内市区的南部。这座庙宇被称作“二征王庙”。

1900多年后，1956年11月18日，新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贺龙一行乘坐飞机在越南嘉林机场降落。

热情而欢乐的人群涌向前去，向周恩来递上一束束鲜花……

虽然，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到越南，但是，他同越南人民，特别是同越南人民最尊敬的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友谊却是久远的。正如胡志明所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一起共甘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30多年来的亲密的战友。”

为弥补历史上的遗憾，周恩来到达越南的第四天，临时增加一个“节目”，同贺龙一起到“二征王庙”，向两位民族女英雄献花。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越南人民。

那天，“二征王庙”内，香烟缭绕，钟声回荡。

小小的庙内前方正中是庄严肃穆的锡金牌位，两旁立着两只大锡象。当年征侧二姐妹就是骑着大象抗拒马援的军队的。通过两旁的阁门入内是正殿，征侧、征贰的巨大塑像端正地坐落在神台上，两旁并排站立着许多女将的塑像，个个英姿飒爽，栩栩如生。

在庙中女主持的引导下，周恩来、贺龙走向征侧、征贰的巨像前，献上两束象征中国人民友谊的鲜花。这两束鲜花，也表达了新中国的领导人愿以诚挚的友谊来偿还历代王朝大国主义侵略者所欠下的债务……

当然，周恩来参观“二征王庙”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他这次出访前

夕，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英法侵略埃及，一是苏联出兵匈牙利，这两件事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震动。一些弱小的民族主义国家，甚至像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抱着疑虑的目光注视着中国。他们想知道，正在日益强大的新中国究竟会怎样对待它周围的小国。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表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大国主义的立场。

越南《人民报》在“兄弟的情谊”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大大的不同了，大民族主义正在被清除，而代之以兄弟的情谊”。

柬埔寨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对它的客人给予过这样盛大的欢迎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11月22日中午，周恩来告别美丽的河内，告别热情的越南人民，乘专机飞往柬埔寨。

静静的湄公河像一条闪闪发光的缎带在机身下铺展开来。迎着金色的阳光，人们可以发现，远远的地方有许多黑点向前移动，并且很有规则地分开，向这架飞机两侧移来。原来，这是柬埔寨王国派来的八架护航机，特地从金边飞来迎接来自北京的贵宾。

飞机在波成东机场缓缓着陆。

当周恩来一行走下飞机时，头天夜里才从印度新德里赶回，今天一早又匆匆赶到机场检查准备工作的西哈努克亲王，笑盈盈地走上前来，同周恩来热烈地握手。

在这一瞬间，人们或许会想起，1400多年前，奉国王之命到

中国译经的柬埔寨高僧曼陀罗和保婆罗；或许会想起，1200多年前南行取经路过柬埔寨的唐僧义净、想起著有《真腊风土记》的元朝的周达观、想起七下西洋的明朝三宝太监郑和；或许人们会想起，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第一次会面的难忘时刻；或许人们会想起，今年春天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的动人情景……

那天，柬埔寨首都金边有10万多人聚集在波成东机场和通往王宫的路上，这座30万人口的城市，有10万人参加欢迎的行列，那种盛况是可以想见的。

在机场，主人举行了短暂而隆重的欢迎仪式。柬埔寨国家欢迎委员会主席宾努亲王致欢迎词。他说：“在今天，阁下可以看到整个柬埔寨王国人民，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聚集在这个简朴的机场上，汇成人海。这象征着向贵国和阁下表示的兴奋和热诚的友谊。这种友谊表现在群众自动地来欢迎阁下，这是由于柬埔寨独立之父西哈努克亲王的睦邻政策所促成的。这种政策萌芽于我们敬爱的亲王到印度访问的时候。之后，大约在两年前，它又逐渐而羞怯地在万隆会议中，与阁下会晤后而滋生，最后，当我们的亲王应邀到贵国访问时，接受了五项原则，并且坚决选择了这个政策。”……

宾努亲王热情而亲切的欢迎词，把人们的思绪带向那难忘的岁月。

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家访问的周恩来表情非常激动，他在答谢辞中向柬埔寨人民转达了中国人民真挚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他说：“我们来到你们美丽的国家，就像到了一个近亲的家里一样亲切。”他希望这次访问能

够加深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进一步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天晚上，苏拉玛里特国王和王后在被上千盏电灯照得通亮的克马蓝宫设国宴招待周恩来。

晚宴在充满友好的气氛中开始。

苏拉玛里特国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尊敬周恩来有两个理由：首先，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总理带来了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友好感情。其次，他是我们皇太子（指西哈努克）最亲爱的朋友。”他指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一种最可贵的预兆。它将增进两国的繁荣与世界和平。”

周恩来也很激动，他代表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国王和王后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并祝愿两国人民永远和平共处，“世代生活在友谊之中。”

到达柬埔寨的第二天，周恩来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观游览了首都金边。

金边的市容美丽而动人，金边的人民热情而好客。中国总理的来访，使整个金边更加容光焕发，欢腾雀跃。

在城内，预计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成员要经过的道路上，两旁到处是人群，他们为了看一看中国贵宾，宁愿在热带炎热的太阳下，站上几个小时。只要有中国贵宾乘坐的汽车驶过，他们就鼓起掌来。而在街道两旁阳台上的人们则挥手致意。大群人在日落以后很久还守候在客人逗留的王宫和政府大厦的前面，在郊区，成千的人拥挤在道路的两旁。甚至在附近没有村庄的地方也是这样。在欢迎的人群中，还有许多华侨，他们泪流满面，站在街旁，为的是看一看来自祖国的亲人。

关于欢迎的盛况，当地报纸是这样评论的：“柬埔寨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对它的客人给予过这样大的欢迎。”

柬埔寨人民把这份特别的感情给了周恩来。这是因为，周恩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议者，这五项原则，与柬埔寨人民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是一致的。

“尊重每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

在周恩来结束访问的那一天，这五项原则——著名的“潘查希拉”，再次写入他和云桑首相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在印度谁不知道周恩来总理？事实上，
他就像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一样

“砰！砰！砰！”清脆的爆竹声，划破北京的夜空，仿佛提醒人们，1956年的除夕来到了。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除夕之夜是每个家庭团聚的日子。而1956年的除夕之夜，周恩来却是在印度渡过的。

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亚洲，印度是第二大国，无论从地

域面积，还是人口，都仅次于中国。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如何，不仅影响到两国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非常重视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1953年12月31日，也是一个除夕，周恩来会见了到北京来参加谈判中国西藏和印度关系的印度代表团。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同尼赫鲁和吴努分别在中印、中缅联合公报中进一步倡导了这个原则，受到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1956年底这次出访，周恩来是第二次到印度。在整个访问期间，周恩来4次路过这里，每一次，他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在尼赫鲁的陪同下，周恩来参观、游览了印度著名的城市德里、浦那、班加罗尔、马德拉斯、阿桑克尔、奇特兰詹、辛德利和加尔各答等，到处是欢迎的人群，到处是“印地秦巴，巴依巴依”（印中两国人民是兄弟）的亲切欢呼声。

11月29日下午，周恩来出席联邦院议长和人民院议长为他举行的宴会，宴会在国会大厦举行。担任主席的联邦院副院长向两院议员介绍时说：“在印度，谁不知道周恩来总理，事实上，他就像是我們当中的一个人一样。”这确实代表了广大印度人民的心声。

尼赫鲁在招待周恩来的宴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意，他说：“约在两年以前，中国总理来到了我们这个城市，但是很快就离开了。那时候，我们曾经热烈地欢迎他。现在他又来了，虽然这次逗留的时间比上次要长些，但是也不会很长。我们要聚在这里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给他的真正欢迎，是他亲眼看到的德里街道上的人民所给他的欢迎。”

周恩来也向印度人民传递了中国人民的友情。他说：“当我又一次应邀访问我们伟大的邻邦印度的时候，我感到格外亲切，也感到十分的兴奋。我感到亲切，因为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我们来到这里就像来到自己的兄弟的家里一样。我们也感到兴奋，因为自从两年多以前我第一次访问印度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两国所确定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潘查希拉——已经得到许多亚非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愈来愈大的响应。”

1956年的除夕，周恩来是访问巴基斯坦后途经印度的。

头一天夜里，周恩来在尼赫鲁的陪同下离开喧闹的德里，前往巴克拉——南加尔水闸区视察。火车平稳地运行在旁遮普绿色的原野上。

清晨，火车到达被喜马拉雅山外沿3千英尺的高山所环绕的旁遮普邦，这是一个环境十分宁静，景色十分优美的小镇。周恩来的出现，使这个1万5千人口的小镇欢腾起来，一群群白鸽飞向清新蔚蓝的天空。

两位总理站在敞篷汽车上，合手答谢五万多从远近村庄走了很多的路程到这里来的欢迎群众。汽车沿着宽阔的柏油马路，越过小山和溪谷，来到巴克拉水闸，工人和孩子们涌了上来，“印度中国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随行人员向周恩来介绍说：这座水闸是世界最高的水闸，工程完工后，它将能灌溉千万英亩的土地，发送将近一万千瓦的电力。往前走，是混凝土工厂，尼赫鲁告诉周恩来：“去年11月17日，我装满了第一桶水泥。”要完成巴克拉工程，一共需要10万吨水泥。

周恩来和尼赫鲁又来到南加尔水闸区。这个水闸是1954年完成的，建筑十分宏伟、壮观。周恩来不禁赞叹道：印度人民是多么勤劳而有智慧啊！

火车沿着新开的运河向行驶。周恩来一行中午抵达苏特里杰河左岸的美丽的苏特里杰大厦，他与尼赫鲁在大厦外面一间镶着玻璃窗的小屋内，进行了3小时会谈，气氛友好而热烈。

这真是忙忙碌碌而又富有成效的一天。

除夕之夜终于来临。

周恩来和尼赫鲁登上返回德里的列车。

餐车里灯火辉煌，布置得像在家里一样温馨而舒适。周恩来和尼赫鲁共同切开新年蛋糕，举起酒杯……

欢声笑语传出车窗，留在旁遮普绿色的大地上……

中缅两国确是山连山，水连水，边界不能够把我们的友谊分开

芒市，是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毗邻缅甸，距中缅两国国界只有几十公里路程，远在古代，这里就是中国通往缅甸的道路之一。

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和缅甸总理吴巴瑞一起到芒市参加了正在那里举行的中缅边境人民联欢大会，把出访活动推向了高潮。

1956年12月15日这天，本来就美丽的芒市，又增添了一份喜庆的节日景象。街道上，到处红旗招展，各机关、学校纷纷搭起彩门，彩门上挂着“欢迎缅甸朋友”的标语。居民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新近落成的迎宾馆和招待大楼布置得格外漂亮。联欢大会的广场也已经修成，广场两端的水池四周栽上了芭蕉、大青树和松柏等。从下午开始，在中缅两国交界处的中国畹町镇就欢腾起来，到处是彩旗飞舞，欢声笑语，当两国领导人乘车从缅甸境内缓缓驶上畹町桥，进入畹町镇时，等候在畹町街头的2千多边境各族群众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和欢呼声。

吴巴瑞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周恩来曾经几次到过云南，但是却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区，他们立即被两国边境兄弟民族的友好气氛所包围。

在简短的欢迎仪式上，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致欢迎词，他对两国总理和缅甸贵宾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他说：“由于我们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亲戚般的密切联系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巩固的基础。我深信，这次在芒市举行的中缅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在两国总理、副总理和各位贵宾的亲自参加下，一定会大大地增进我们两国边境人民的友谊和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接下来，由吴巴瑞总理致答谢词，他说：中缅两国人民历史上有着2千年的传统友谊，而且都是热爱世界和平，反对战争的民族。虽然中缅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都坚守着由吴努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有分歧的意见，我们都主张和平协商解决。因此，当前两国的友谊，将比历史上更为亲密。他还说：在两国的友好关系中，最主要的是两国边境人民的互相谅解和互相友好。希望这次大会能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友好和团结。

吴巴瑞的讲话被一阵阵掌声所打断。

这时，两侧欢迎的群众，一齐挥舞着绸带，敲起象脚鼓。许多人高举手中的鲜花跳起欢快的舞蹈。一大群身穿色彩鲜艳的服装的少女涌向前去，把一束束美丽的鲜花献给两国领导人。

周恩来一行到达芒市时，夜幕已经降临。

第二天下午，中缅边境人民联欢大会在芒市隆重开幕。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偶尔有几朵白云浮过，金色的阳光洒满坝子上。

大会广场上两国国旗和几十面红旗迎风招展，耸立在主席台两侧的两条标语上写着：“中缅友谊万岁！”，“世界和平万岁！”按照当地民族的习惯，主席台两侧还栽上象征和平、友谊和吉祥的甘蔗、芭蕉和松树。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着中缅两国国旗和巴字总统、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

赶来参加大会的，不仅有芒市附近的傣族和从三百里以外赶来的景颇族人，也有不远千里而来的拉祜族和来自缅甸的掸族、克钦族朋友。中国的傣族和缅甸的掸族；中国的景颇族和缅甸的克钦族，虽分属两个国家，但是同一个民族，他们自古以来就有着亲戚关系。1956年：月，缅甸政府曾经在邻近中国陇川县的雷基镇召开了两国边境人民的第一次联欢大会，为缅中两国的友谊奠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为各族人民提供了交往的机会。而这一次大会，又为中缅友好打下了一块基石，使两国边民又重新聚在一起，大家怎么能不激动，不欢快呢？

在大会上，被友好情谊包围着的吴巴瑞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缅甸有句成语，“敬人者，人亦敬之。”这句成语。不仅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我们必须坚决贯彻的。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我们所要求的世界和平，才能建立国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真诚地希望“历史上一向有相同的民族自尊心并成功地保持着民族文化的缅中两个民族，同舟共济地、宽宏大量地处理各项问题，让我们缅中两国人民以友好邻邦的态度和相互信任的精神，一起防止外来阴谋的干涉。”

同吴巴瑞的讲话一样，周恩来的讲话也感人至深，被一阵阵掌声所打断。他说：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的主动措施，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贯信守不渝。对于我们友好邻邦的人民，我们要永远谦虚谨慎和耐心，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当天晚上，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举行宴会，招待中缅两国领导人。

在轻快的乐曲声中，吴巴瑞总理充满热情他说：当我们来到中国时，我们看到许多民族人民，与缅甸联邦的民族不论从服装上、面貌上和语言上都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相同，不但在表面上，而且在内心里。所以我们称呼中国人民“胞波”。“胞波”就是亲兄弟的意思。

在掌声中，周恩来含笑走向扩音器。他说：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份，接受藻昆卓邦长的友谊。“我们两国的确是山连山，水连水，地理上把我们连在一起，边界不能够把我们的友谊分开。克钦邦邦长吴赞塔信说过，我们是同一个种族来源的，并且是亲戚关系。吴巴瑞总理说我们两国人民是‘胞波’边界是不能把我们的亲戚关系分开的，不能把我们‘胞波’关系分开的。”他高高地举起装满茅台酒的杯子，请大家喝一杯浓烈而醇香的美酒。

这次边境人民联欢大会，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胞波”友情。

17日上午8时，周恩来、吴巴瑞一行告别热情而友好的芒市人民，在刘明辉陪同下，乘车经畹町镇到缅甸的首都——仰光，更盛大而热烈的场面在等待他们……

过去，曾经有过著名的中国学者到这

里寻求友谊 and 知识，现在我们又来了

1956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在吴巴瑞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仰光明加拉顿机场。今天，他将满载缅甸人民的深情厚谊踏上新的旅程。

飞机就要起飞了，周恩来用缅甸话向主人道声再见；吴巴瑞夫人和其他朋友也用中国话向周恩来一行道声再见。在依依惜别中，飞机沿着跑道慢慢滑行，随即腾空而起，冲向云端。送行的人一直站在那里，挥手再见，直至飞机消失在云层中。

下一个目的地是巴基斯坦。

为迎接周恩来来访，巴基斯坦人民进行了充分而周到的准备。

12月18日，西巴基斯坦首席部长，共和党领袖萨希布汗在拉舍尔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中说：“我们和中国有着非常古老的情同手足的友好联系，它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在北部和它有共同的边界。中国和巴基斯坦在追求共同的目标和愿望上可以在许多方面相互帮助。我们两个国家面临着一些同样的问题，如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准，建设我们的国民经济，对国际和平和正义事业作出贡献。”萨希布汗认为，周恩来的访问无疑地将会有助于促进我们两国之间在各方面的更密切的合作。他指出：“无论周恩来先生到哪里，西巴基斯坦人民将给予他热烈的欢迎。”

东巴基斯坦首席部长拉赫曼和东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主席巴沙尼12月17日晚间，在达卡号召人民给周恩来以有高度纪律性的热烈欢迎，他们号召东巴基斯坦各地所有能够来参加欢迎会的人都来参加。

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中央机关决定，周恩来到来的那天下午停止工作，并专门成立了欢迎周恩来招待委员会进行准备工作。

整个巴基斯坦沉浸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

20日下午，周恩来抵达卡拉奇。

当中国客人走下飞机的时候。欢迎的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小学生们放出了五彩缤纷的气球，在通往机场的路上，站满了等待周恩来经过时瞻仰他风采的人。

离开卡拉奇，周恩来访问西巴和东巴的第一段路程是白沙瓦。

白沙瓦，是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的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这座城市被松树林和白雪皑皑的山巅所环抱。自古以来，这里一直就是一个战略要地，离开白沙瓦十英里的地方就是开伯尔隘口，巴基斯坦人的祖先过去曾经在那里同侵入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的入侵者进行了无数次战斗。白沙瓦的居民有15万以上，绝大部分是勇敢、勤劳、坚强的巴丹人。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曾同殖民主义者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从第5世纪开始，中巴两国就从这里开始了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国著名的高僧法显和玄奘先后来到过这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周恩来来到这里来时，又过了14个世纪，他非常喜欢祖先曾到过的这个地方。他在访问白沙瓦大学时，对那里的师生说：“今天，我们落到法显和玄奘的后面了。他们在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的优秀文化方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期望，中巴两国的文化交流能够在这一代获得进一步发展，这样，中国青年就可以像法显和玄奘那样到白沙瓦来学习。

白沙瓦大学的副校长亚迪基在学校宽阔的草坪上搭起的帐篷中举行了茶

会，他在欢迎词中说：周总理的访问，“恢复和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公民之间旧有的关系”。他高兴地指出：白沙瓦大学的所在地，就是两千年以前，阿育王和迦腻伽王所创立的佛教学术中心，这两种古老文化的重新汇合将会导致东方文明的再生。他深信两国总理的相互访问肯定将会有助于对两国面临的问题求得更好的解决。

白沙瓦留下周恩来的足迹，留下了中国人民的情谊。

离开白沙瓦，周恩来访问了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西巴基斯坦首府拉合尔。这里是西巴基斯坦的政治、学术中心，也是巴基斯坦最古老、最美丽的城市。

这座城市的特点是以莫卧尔王朝建筑的皇堡、寺院及其他历史性的建筑物而闻名。当周恩来乘车穿过市中心向皇堡开去时，在通往皇堡五英里长的路旁，前来欢迎的人群拥挤在人行道上，许多住宅的阳台和屋顶上也站满了人。

皇堡建于12世纪，但是在莫卧尔王朝的阿克巴尔皇帝的时候，拆毁了原来的土堡，改筑成为坚固的砖石堡。皇堡内的宫室中有许多精致的玻璃镶嵌和花饰，还有许多壮丽的门廊楼阁和花园。拉合尔的巴德沙市回教寺院，雄伟、壮观，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寺院之一，每天吸引着国内外游客。这些景物也深深地吸引了周恩来。

在西巴基斯坦省长的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讲话。他说：我这次访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寻求友谊，中国访问者到处都受到了盛大的欢迎，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共同愿望的基础上的；第二个目的是寻求知识，过去曾经有过中国的学者到过巴基斯坦，现在我们又来了。中国人民要向不论大小的一切国家学习，特别要向邻国学习；第三个目的是寻求和平，中国人民是要和平的，巴基斯坦人民也是要和平的。周恩来在这段话中提到的“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这12个字，实际也是他这次亚洲之行的根本目的。

28日傍晚，周恩来一行告别拉合尔，到达东巴基斯坦首都达卡。在这里，他们受到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最盛大的一次欢迎。欢迎的群众突破警察的保卫线，团团围住中国客人，汽车都无法向前开动，他们激动地喊着：“巴依（兄弟）、巴依”；“萨拉姆阿勒古姆（伊斯兰教徒见面问候语）”。

第二天下午，达卡举行了独立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会，到会的有20万人，占全城人口的1/3。

周恩来随苏拉瓦底总理走上主席台后，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主席大毛拉巴沙尼马给他带上花环。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了亚非团结的重要性和中巴友谊对巩固亚非团结的重要意义。他的讲话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周恩来离开讲台时三次用孟加拉语说：“巴基斯坦——秦尼巴依巴依（马中人民是兄弟）！”坐在地上的20万群众站起来欢呼、鼓掌，挥动着手帕，会场的情绪达到高潮。

在欢迎周恩来的人群中，最活跃的是记者，他们常常追寻、包围着周恩来，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乘内河轮船“玛丽·安德逊号”前往达勒斯瓦里棉纺厂时，遭到记者“袭击”。当时，他正在看英文报纸；一群巴基斯坦记者前来找他。周恩来对苏拉瓦底总理说：“我被记者包围了。”苏拉瓦底说：“我来救你。”不过，周恩来最终还是友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周恩来的谈话是通过翻译的，有时候他自己也用英语回答几句。

由于巴基斯坦参加了美国操纵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所以记者们十分关心中巴是否在政治上成功地取得了谅解。周恩来指出，两国人民都要和平和友谊。无论到哪里，这种看法都得到了证实。他说：“两国的领导人员讨论了范围很广的问题。虽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双方很自由地交换了意见，这种不同的看法不会妨碍两国之间的友谊。”

记者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台湾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我们要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他用英语说：“台湾过去是，现在还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台湾应该归还中国”。

周恩来的呼声通过记者的笔传向世界各地，传向世界人民的心中……

帕米尔高原不能阻挡我们的祖先来往； 殖民主义统治也不能妨碍中国同 阿富汗人民的友谊

阿富汗位于亚洲的中西部，是个内陆国家。

中国和阿富汗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和冲突，只有团结和友谊。中阿友谊源远流长。5 世纪，著名的中国旅行家法显曾来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访问；7 世纪，著名的中国学者和香客玄奘也曾到这个城市访问过。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居民也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过中国。后来，是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切断了两国友好的交往。

同中国近代历史所经历的遭遇一样，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英国入侵这个美丽的国家。同中国人民一样，阿富汗人民对外来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 1838 年至 1919 年，阿富汗人民 3 次抗击英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

正像周恩来所说的，帕米尔高原不能阻挡中阿祖先的来往，殖民主义统治也不能妨碍中阿人民之间的友谊。当两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后，传统的友好关系又恢复和发展起来。

1957 年 1 月 19 日至 24 日，周恩来对阿富汗五天的访问，把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又推向一个高潮。

在 1955 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与阿富汗领导人开始接触，共同成为万隆会议的参加者和万隆精神的拥护者。所以，尽管这一次是周恩来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但他对这个国家却丝毫不感到陌生，相反，却感到非常亲切。1 月 19 日，周恩来一行到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达乌德首相举行了盛大的晚宴招待中国朋友。在宴会上，周恩来与达乌德彼此倾诉了这种友好的感情。

达乌德首相在讲话中说：

阿富汗同中国保持了几百年的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我们彼此并不陌生。幸运的是，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这几百年的接触当中，我们的关系从来没有被分歧和恶感所损害。在悠久的过去，每当我们会晤和互相访问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得到好处，而且促进了彼此的了解和繁荣。

……

今天，我们在重新兴起的、觉醒了的亚洲再度会晤了，而且非常幸运，我们又本着友好和睦邻的精神会晤了……

周恩来以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口吻答谢阿富汗人民的热情接待。他说：

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阿富汗和中国就曾经有过贸易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我们两国之间虽然有着帕米尔高原的阻隔，但是我们的祖先却翻越过险峻的山岭，开辟了历史上著名的“丝路”，进行了友好的往来。的确，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从来没有战争和冲突，而只有友谊和同情。

……

同许多亚非国家一样，阿富汗和中国都热爱和平和正义。我们两国同许多其他亚非国家一起，在万隆会议上，为促进亚非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合作，为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了共同的努力。中国人民十分尊重阿富汗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友好地政策……我们十分满意地看到，中阿两国的关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

第二天傍晚，喀布尔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整个城市一片洁白，空气格外清新。这突然变化的天气，为这次访问增添了新的情趣。

在喀布尔的四天访问中，周恩来除了同达乌德进行会谈外，还参观了索罗比水电站。这座水电站建在离喀布尔东约 80 公里的喀布尔河下游的峡谷中，车队沿着喀布尔河岸走了两个多小时，经过了盖着皑皑白雪的小山所环抱的喀布尔盆地，也经过了为积雪掩盖的田野、房屋，以及由单峰骆驼和毛驴组成的商队。沿途，村民们聚在路边，举起手来向客人们致意，水电站工程工地的工人们也对周恩来一行表示欢迎。这个水电站完工后可以发 2 万 2 千千瓦电，比阿富汗目前发电量要多一倍以上。周恩来参观了水闸、隧道和发电站，并向西德工程师提出了许多关于这些工程的实际问题，这时，在周恩来心中正在酝酿回国后如何解决在中国存在的类似问题。

留下最后一天时间，周恩来访问了阿富汗南部美丽的城市坎达哈，送去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对周恩来的访问，阿富汗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就是“为中阿两国友好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

我到这里访问，也是把喜马拉雅山那一边人民的友情，带给这一边的人民

高高的喜马拉雅山，白雪皑皑。

坡北属于中国，坡南属于尼泊尔。象征着中尼两国友谊的喜马拉雅山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又被称为“中尼友谊峰”。

1957 年 1 月 25 日中午，迎着灿烂的阳光，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在绿色的加德满都河谷降落。

正如中国佛教学者的著作中所称，尼泊尔是一个有着美丽风景、优秀文化和热心而友好人民的国家。周恩来一踏上这块土地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当中国客人登上设在机场的演讲台时，前来欢迎的人们献上了大束的鲜花。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响过之后，周恩来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周恩来说：“正如阿查里亚首相三个月前在北京所说的那样，我到这里访问也是把喜马拉雅山那一边人民的友情带给喜马拉雅山这边的人民”。他回顾了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传统友谊，说：“这种友谊连喜马拉雅山也阻隔不了”。周恩来强调，同历史上的友谊相比，今天的友谊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为基础的，因此更稳固。

在阿查里亚首相陪同下，周恩来一行从机场前往迎宾馆。聚集在路旁

欢迎他的群众越聚越多，街道两旁挂满旗帜和布幔，群众排成好几行。在沿街房屋的每一层楼窗口，都有一些穿着节日盛装的妇女探身欢迎，他们大把大把地向周恩来和阿查里亚撒鲜花、花瓣、炒玉米，并且按照尼泊尔的风俗撒朱砂粉。有些地方，连屋顶和树枝上也站着人，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当周恩来等人到达迎宾馆时，他们从头到脚都被群众抛撒下来的朱砂粉染红了。

在盛大的欢迎宴会上，阿查里亚称周恩来为他“个人的朋友”和“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那一边的亲密朋友”。他说，他相信，周恩来对尼泊尔的访问，将大大有助于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友谊和亲善精神的发展。

周恩来非常感谢尼泊尔人民和阿查里亚首相的欢迎。他强调，当殖民主义者不甘心失败并且不断想对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进行侵略和威胁的时候，中尼两国更有必要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当天，周恩来还参加了欢迎他的群众大会。在会上，谈到了他对这次出访亚洲的深刻感受，他说，虽然他访问的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在民族、信仰和文化上都不相同，可是它们都要求世界和平和各国之间友好，要求独立地发展它们的国家。这种亲身经历使他相信，中国和尼泊尔共同为之奋斗的和平事业是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的事业，并且是一定会成功的事业。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参观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所孤儿院，向这所孤儿院捐赠了五万尼泊尔卢比。随后，周恩来一行又到市郊参观了一座寺庙。那天，一群由尼泊尔法林会召集来的佛学家们和男女佛教徒聚集在庙宇外欢迎中国总理。法林会的欢迎词中提到传说中国到尼泊尔的文殊师利用宝剑劈开南部小山开出水道，并巨排除加德满都山谷的水；追述了尼泊尔的哈丽塔·塔腊公主和中国唐朝的文成公主在西藏的事迹，以及玄奘对尼泊尔的访问。法林会特别赞赏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使他们想起了佛院的五项基本原则。

曾经到过中国的著名的尼泊尔诗人契塔迪尔·赫里达亚在欢迎词中说：“今天，我有机会在尼泊尔的天空之下看到你，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历史事件。”

在尼泊尔短暂的访问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正像他在访问拉提士尔市时所说：“你们的无法形容的热诚欢迎使我们大家都十分感动，这种情形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锡兰人民对中国是怀有友好感情的，
这次欢迎比我国以前对任何其他客人
的欢迎都更加热烈”

1957年1月31日，周恩来开始对这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个国家——锡兰进行访问。在他所走过的这些国家中，他同锡兰的关系最久远。

36年前，赴欧洲留学的青年周恩来途经锡兰，被这个美丽的国家所打动。36年后，这个国家依然美丽，但是，周恩来已经找不到过去的印象了。因为，锡兰已经挣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成为锡兰人民的锡兰了。

中国和锡兰自古以来有着传统的友谊。早在公元一世纪初，中锡两国在文化、贸易上就已经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国之间的

友好关系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锡兰是最先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周恩来的到来，受到锡兰人民的热烈欢迎，班达拉奈克总理对中国朋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昨天受到的盛大欢迎一定已经使你们看到，不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什么分歧，锡兰人民对中国是怀有友好感情的，这次欢迎比我国以前对任何其他客人的欢迎都更加热烈。”他重申了锡兰对中国的政策，指出：“在意识形态方面或者其他方面，我们可能有分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要互相敌视。”他希望不但如此，还应该设法相互了解，了解这些分歧，并且互相保持友好亲密的关系，以保障世界和平。对周恩来的访问，班达拉奈克认为“是在极其需要大家为解决世界纠纷而贡献力量的时候”。他认为中国能够在世界局势中起伟大的作用。

当天下午，周恩来一行由锡兰首都科伦坡前往康提。这里是锡兰的古都和文化中心。

客人们所经过的地方挤满了人，巨裂的爆竹声掩过了欢笑声。

当地的乐师打着鼓，吹着喇叭，表达欢快的心情。在离康提五英里的地方，周恩来等人的汽车被群众堵住，车只好停下，他们在人群的欢声和纷纷落下的鲜花中受到康提市政府官员的迎接。

周恩来进入康提时，这个美丽的城市人山人海，他立即被引入群山环绕的大广场。周恩来等通过用鲜嫩的椰子叶铺成的小路，走上可以俯瞰广场的用鲜花装饰的阳台上。

欢迎的场面十分令人感动，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认为你们的热诚对我们这次目的在于寻求友谊的访问是一种鼓励。”在康提，周恩来还参观了佛牙寺，并向这个寺院赠送了一万卢比。

对几个著名城市访问后，周恩来回到科伦坡。4日下午参加了在科伦坡举行的锡兰独立日庆祝活动。他是第一个被邀请在锡兰独立日庆祝大会上讲话的外国政治家。周恩来在讲话中热烈祝贺锡兰赢得独立的胜利。几分钟后，天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周恩来谢绝别人为他打伞，而是坚持在雨中把话讲完。他的行动感染了到会的广大群众，一些已经躲到附近亭子里避雨的人们也陆续回到会场上。

周恩来对锡兰的访问进一步巩固了中锡两国的友好关系，改变了人们对中国的认识。正如锡兰驻印尼公使兼驻新加坡和马来亚专员萨拉风纳穆图所说：“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认清谁是真正能代表今日中国广大人民的政府。”

处理中缅边界问题

秋天，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

1956年的秋天，周恩来在北京迎来了中国西南邻邦的友好使者、缅甸联邦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主席——吴努。

吴努这一次访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和中国领导人商谈，如何尽快解决中缅两国的边界问题。

周恩来的答复也很坦率。他对这位老朋友说：“愿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做为典范。”

这掷地有声的许诺，扫除了吴努心中的疑虑。

“什么人只要见了周总理，
谈了问题就放心，愿意和他做朋友，
他从来是说话算数的”

吴努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触周恩来了。在以往的接触中，他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什么人只要见了周总理，谈了问题就放心，愿意和他做朋友，他从来是说话算数的。”

吴努的印象一点不错。

1954年夏季，世界瞩目的日内瓦会议结束了，和平的曙光终于冲散战争的阴云。周恩来觉得轻松了许多。几个月来，他一直周旋在国际舞台上，为实现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尽了最大的努力。

回国前，他先到了缅甸。

这个国家是中国通向南亚的大门，和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一直十分重视同缅甸的交往，也一直向往到这个美丽的邻国做客。

在中缅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十分复杂而重要的问题——边界问题。这个问题是1885年英帝国主义侵占缅甸后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究竟会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受到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关注。

因此，周恩来这次访缅受到缅甸方面隆重的欢迎，他们希望在谈论边界问题时能有所收获。

会谈中，吴努直接了当地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能够早些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

这是周恩来预料到的话题。

从周恩来本意讲，他也希望早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稳定周边国家，促进亚洲和平，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开国以来短短的几年中，国内外发生了那么多急迫而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时顾不上啊。更何况，边界问题又是那么复杂，总要有一段时间了解情况吧？周恩来深知，这是一件必须对缅甸人民也必须对中国人民负责的事情，绝对不可草率！

因此，他也直接了当地对吴努说：“希望缅甸能够给我们一点时间，把情况弄清后再正式商谈。”周恩来还说：“我们两国要以友好的精神，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好吗？”

翻译的话音刚落，吴努立即点头表示赞成。他对周恩来充满了信任。

这年12月，吴努应邀访问北京。

他与周恩来谈话的主题还是中缅边界问题。不同的是，双方会谈的结果

以公报形式正式公布出来。公报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承诺，无论对中国人民，还是缅甸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然而，正当中缅两国领导人为解决边界问题进行积极努力的时候，1955年底，中缅边境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响起了枪声。

这枪声划破了边境的平静。

那天清晨，边界线上雾气浓浓，几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像往常一样，中国军队开始了一天的巡逻。他们没有想到，会在黄果园附近与缅甸军队相遇。由于雾太大，辨不清情况，双方开了枪。一时间，帝国主义大作文章，缅甸国内也出现了不利于中缅友好的言论。

边境局势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起来，原本复杂的边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那些日子是缅甸领导人焦虑不安的日子，中国会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

正像吴努所说的，周恩来“说话是算数的”。他没有因为黄果园发生的冲突而动摇公报的精神。相反，适应形势，把中缅边界问题急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1956年春天开始，周恩来主动同缅甸领导人进行频繁的接触，拨开了蒙在两国之间的那朵阴云。

1956年周恩来依据和平睦邻政策和对 中缅边界问题调研的结果，向缅甸提出 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大国，它的四至边界从来不那么明确。

那时候，作为大国的中国，总想把周围弱小的国家臣服过来。然而，这种政策遭到了一些国家的抵抗，由于相互之间你争我夺，战事连绵，使边界呈现“出出入入，犬牙交错，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状况。这种奇特的状况，直到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后才有所改变。

为达到对亚洲国家分而治之的目的，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同他所殖民的国家划界，并签定了一些对中国很不平等的边界条约。

中缅边界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缅甸同中国西南边睡的云南省接壤，蜿蜒曲折的边界线呈南北走向，有2700多千米长。放眼望去，绿色的枝叶覆盖着崇山峻岭，非常壮美。近处，湍急的怒江、澜沧江、大金沙江等流入缅甸，带去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它们的支流网状般布满两国交界处。边界两边常常可以看到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边民，以他们祖辈开始的世世代代的交往，奠定了两国之间深厚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时，中缅边界的大部分已经划定，只有3段存在着未决的问题。

第一段是南段，即作假山区的一段。这里一直居住着勤劳的佤族人，他们长期过着部落生活。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后，也占领了这个地方，但是英国军队没有到达这个地方，那时候，中国曾经到达这个地区的两个地方，一个叫班洪部落，一个叫班老部落。在班老那个地方还有一点银矿，中国政府曾动员民工去开过矿。1894年和1897年中英两国先后签定的两个关于中缅边界的条约中，对于这一段边界都曾经有明文规定，但是，由于有关的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为了造成既成事实，1934年初，英国

派军队进攻班洪和班老部落所辖的地区，但是没有得逞，他们遭到当地佤族人民的英勇抗击。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机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强迫中国政府用换文的方式在作伍区划定了一条对英国片面有利的边界线，这条线包含着中国人民的屈辱。被称作“1941年线”。由于不久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因此，双方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桩界。

第二段是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人们又称它为南畹三角地。这片面积约25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在1894年中英两国签定第一个中缅边界条约前，英国不经中国同意，强行通过这个地区兴修了一条从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到1897年中英两国再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这块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对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

第三段是北段，即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是1911年，英国武装侵占片马。“片马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其强烈的民族义愤，中国大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1911年4月10日，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是属于中国的。然而，事实上，英国却毫无道理的继续侵占着这个地方。

对中缅边界的现状，缅甸政府却不是这么认识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北段存在未定界问题，而南段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与中国在认识上有很大的距离。

究竟怎样缩短两国在认识上的差距呢？

有着丰富谈判经验和对缅甸人民充满友好诚意的周恩来提出，可以暂时避开具体问题，从确立原则谈起。

为了寻找一条公平合理地解决中缅边界的途径，周恩来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周恩来对中缅边界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在那些日子里，西花厅的灯光常常是笑迎启明星。

在周恩来整洁而明亮的办公室内，桌子上、地板上，到处是翻开的书籍和各式地图。后来，毛泽东告诉吴努：“周总理读了几本书，我们把过去的文件和书都研究了又研究，也把地方干部调到北京研究了一下，又派了一个将军去查了一下，又和法律专家研究了一下，于是才定出一个方案，一个包括南线和北线的统一方案。”

这年秋天，吴努到达北京。

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

10月的中南海更是景色宜人。

10月25日下午，吴努乘坐的汽车驶进中南海，在西花厅的台阶前停下。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从周恩来那双依旧炯炯有神的眼睛中，吴努仿佛看到了他付出的辛劳。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陈毅副总理、章汉夫副部长、章文晋司长、姚仲明大使以及缅甸朋友吴敏登、吴拉茂大使等。

会谈的主题十分明确——中缅边界问题。

周恩来直入主题，说：“这个问题本身并不严重，因为这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两国是倡导五项原则的国家，应该根据这些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短短的两句话，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周恩来高兴地告诉吴努，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就是：“中国政府愿意把中国军队撤出 1941 年线以西地区。缅甸政府也保证缅军不进入中国军队曾经驻扎的地区。中国政府仍可以对 1941 年线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缅甸政府取消了对 1941 年线的要求。同时，在北段，缅甸政府为了友好起见，也同意把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 3 个地方，中国政府也保证中国军队将不进入这些地区，以待最后的划界。中国政府认为，这可以作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一个公正的途径。”

谈话中，周恩来进一步向吴努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几个原则，形成了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

周恩来在建议中除了重申上述处理南、北段的原则意见外，对勐卯三角地的问题，提出：“中国人民认为，这块土地最好由中国收回。但是，因为缅甸有公路通过，我们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究竟应该如何收回。”他强调：“以上三点联系起来解决，才能改变我在前边所说的情况，这个方式比较好，缅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也照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便于我们进行解释。”

周恩来入情入理的一番话，深深感攻了吴努。他体会到，中国人民确实是缅甸人民的朋友，周恩来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是充满诚意的。

吴努这次北京之行是同周恩来谈话最多，谈的问题也最多的一次。当时，中缅之间一个较大的分歧是怎样认识 1941 年线的问题，这条线是缅甸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他们坚持认为以这条线划界是符合国际法的；但是，这条线又是英国在中国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中国人民不愿意接受这条线也是在情理中的。

周恩来认为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要照顾到，偏到任何一方都会伤害人民的感情。因此，他在第二次会谈中对吴努说：“不按 1941 年线定下来，缅甸就没有其他办法，这种困难，我们是了解的，所以我们并不要求修改这条线，也不反对缅甸坚持这条线的立场。我们的要求只是缅甸军队不忙进去，等到这条线最后确定和要下桩时为止。”他还说：“如果你们在解释的时候，一方面说这段边界应该是 1941 年线，另一方面也承认 1941 年线是英国乘中国之危强加于中国，现在既已成为事实，就应该维持下来，那么你们既向人民作了交代，又向中国表示了友好。”

这的确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用吴努的话来评价：“中国的建议是公平的”。这个建议被写入 1956 年 11 月 5 日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

经过这次接触，中缅两国在原则上达成一致的意见。在友好气氛中，周恩来表示：“愿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做为典范”。很明显，这个时候，周恩来对中缅边界问题的思考，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希望通过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来推动我们同整个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使中国获得一个广泛的和平建设的良好环境。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吴努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郑重宣布：中缅两国取得谅解，从 1956 年 11 月底到 1956 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 1941 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1956 年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分

别完成撤军工作，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中缅边界问题究竟怎样解决还要听听中国人民的意见。能够尽量多的讨论、多商榷总是对事情有好处的

中缅边界问题提出后，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关注。

1956年11月5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报告了与吴努会谈的情况。会议批准了他所提出的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

但是，对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一下子理解和接受的，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都有人提出了意见。一些代表写信给周恩来，坦率地说明自己的意见，总的意见是认为“失地太多”、“吃亏太大”，希望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现状。这些意见启发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思考。1957年2月，周恩来访问亚欧11国归来后，立即抓紧时间研究边界问题。他听说云南代表尹明德对中缅边界问题很有研究，并在20年代就化装到北段江心坡一带调查的情况后，立即请他到北京当面讨教。尹明德给周恩来带来许多书籍和地图，这对周恩来研究边界问题很有帮助。

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周恩来除了同北京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座谈讨论外，还特别邀请了云南省负责人及各界各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对群众的思想情绪和问题做到了“心中有数”。而与代表对周恩来“为人民利益而博访周咨搜集资料和周到深刻慎重考虑问题的服务精神”也是十分敬佩的。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后，3月16日，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举行全体大会，周恩来就中缅边界问题做了专题性报告，正面回答了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周恩来首先从地图讲起。他为什么以此为讲话的源头呢？原来，会议的前一天，碰见一位代表时，那位代表第一句话就说：“我根据地图，我感觉很大的不安。”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到这件事时说：“我一下就听懂了，所以我今天从他那里学来，头一个也讲地图。”

周恩来依据讲台前挂的示意图详细分析了清末以来各个时期，绘制的几幅比较像样的地图上所发生的变化，说明：“我们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情况又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不吻合，因为交涉还没有达到。制图时要把实际情况和交涉之间有一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一百年来从刚才说的1849-1948年没有交代，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样的地图当然很高兴。”

建国以后，中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出版一本正式地图。人们通常使用的是1953年由地图出版社委托私人出版的一本地图，这本地图没有经过政府审定。这本地图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建国前申报馆出版的一本地图发展来的。周恩来在会上说：“今天必须跟大家说清楚，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个工作还是需要很认真的，又很慎重的，又要站稳民族立场，又要照顾到友好关系，又要划得合乎实际，又要能够不损失我们主权，这的确是一件艰难的工作。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明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地图办事。可是人民不懂，所以这个问题用一个什么办法向人民去解释，比较恰当，解释的不恰当，人民了解了，可是又引起了友邦觉得我们是不是还要向外要的大多，还要局势不定。要说得很定了呢？那又等于默认现状，也不完全好，所以这个地图问题，倒是一个难题。”

那么，对未定界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采用“争”的态度呢，这也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一些人认为，清末以来，历届政府都在力争未定界，大家“印象极深，难以忘怀”。因此新中国仍旧应该采取这个态度。针对这种思想，周恩来说：“当时与帝国主义争地方，就是说参加到中国大家庭里来总是比被帝国主义压迫要好。所以争地方多一些这样的爱国主义立场是对的，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那时没有争到，而现在那块地方已不属于中国，而是独立后的缅甸。两个国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变成了民族主义国家，一个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彼此的关系是友好关系”。他还说：“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与历史上解决问题不能相同，当然不是毫无联系，虽然历史不能割断，但也不能完全相同。”听了这段讲话，使许多人纠正了过去只从历史上地图上空谈领土版图，要求愈多愈好的错误看法，明确了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原则和平外交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道理。

对具体方案，人们十分关心 1941 年线的问题，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承认这条不公平界线。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把它否定了，重新定一个新的，当然是修改条约，或者重新废弃这个条约，重订，这使人家感觉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以改变，绝不是这一个条约为止，那的确四邻不安。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慎重号虑。1941 年线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条约，但是那已经是签订的边界条约，而这个地方（佤）两边都不是直接统治的，划得不很公正。但是，我们如果照这样解决比否定了然后重新划问题要好得多。两个利弊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 1941 年线我们顶多提出某一点斟酌，而不是给他来一个否定。”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明确指出了我国同缅甸的谈判原则是同我们的国策紧密相联的。我们的国策首先是要争取世界局势的缓和，好进行我们的和平建设；第二，是要争取亚非国家，要跟他们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时常警惕，预防大国主义情绪，下使人家感觉我们要向外收复多少东西，但应该得到的我们要争取。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有根强的说服力，许多人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由于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关系到云南地方的利益，因此，3 月底，周恩来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昆明，同云南省各界和各少数民族代表座谈，耐心地做解释工作。这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曾经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处理有着不同认识的尹明德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 4 月 18 日给外部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信中写道：“我两次听了周总理对于中缅界务的报告，分析得极其详细，很全面，很具体，对听众很有说服力。我过去对于边界很重视历史事实，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使我进一步有所认识、了解，对于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尹明德的切身体会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

经过周恩来的努力，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基本的统一。

7 月 9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做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向人大代表正式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在报告中，周恩来进一步重申：“中缅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正像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现在，中

缅两国都已经取得独立，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缅两国又是同印度一起首先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们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亚非国家的分歧在这些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和不和，竭力企图重新对这些国家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在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解决。这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使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团结。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7月15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批准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意见。

此后，中缅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进入具体协商阶段。

协商中，周恩来始终平静自若，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疏导，耐心协调双方思路，从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具体协商阶段，是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最艰难的一个阶段。

1957年2月4日，周恩来还在锡兰访问的时候，缅甸一位负责人写给他的一封信已经寄到了北京。

这封信，实际上是这位负责人对1956年10月周恩来吴努会谈时，周恩来所提出的建议的理解，也是他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具体设想。

这位负责人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1948年缅甸独立时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边界线。这就是在南段承认1941年线；在中段把勐卯三角地无条件给缅甸；仅有的修正是在北段，把包括片马、古浪、岗房在内的50平方英里土地交还中国。

这个“希望”，中国人民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不久周恩来回到北京。中国国内开始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舆论普遍要求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边界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缅方2月4日来信没有马上给予答复。

3月底，周恩来到昆明时，同正在那里访问的吴努会晤，对2月4日来信中的划界建议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对案：

在北段，根据地形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并且根据过去英国在致清政府的正式文件中承认中国在小江流域的管辖范围，要求把归还中国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地的面积划得比缅方所建议的要大；在中段，中国政府不准备收回勐卯三角地，但要求在1941年线上作调整，即换回该线以西的班洪、班者等地区。

这个方案，缅甸方面也是不能接受的。吴努说：“既然双方意见有出入，就不发表公报为好。”

虽然，这次会谈后，双方没有发表任何公报，但是彼此认为两国在总的方面还是一致的，周恩来和吴努都希望，在两国边界问题取得最后解决的同

时，将签订一个体现友好合作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友好条约，双方互相保证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集团。

6月7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要求会见周恩来。他给周恩来带来一封吴努的来信。在这封信中，吴努催促周恩来尽快对缅方2月4日的信做出正式答复。

周恩来对吴拉茂说：“中国政府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是不会变的。”他还说：“关于中国方面的正式复信，那需要在人大开了会批准了政府的方针后才能回，因为如果不经过人大的手续，人大代表可提出责问，政府就不主动了。根据宪法，也必须报告人人，这样的边境的大变动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了解这仅仅是地图上的变动，但是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了解。在人大批准了政府的方针后，我们就可以在报上宣传，人大代表回到各省后，也可以向人民解释，配合报上的宣传。”

不久后，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这样，周恩来立即致信吴努，郑重提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各项具体建议。这封信实际上也是对缅方2月4日来信的正式答复。

信中重申。

一、关于尖高山以北地区：从伊索拉希山口往北直到底富山口的一段，可以按照双方共同谈定的习惯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向南至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同意以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界，至于应该归还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的面积，中国政府根据历史上可以依据的事实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等因素，提出具体建议，希望缅政府能够予以同情和考虑接受。

二、关于佻伡地区和勐卯三角地区：1941年6月18日由当时中英两国政府经过换文在佻伡地区划定的界限，是英国强加于中国而为中国人民所不满的，但是考虑到中缅两国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除要求对这条线作某些调整以外，同意在佻伡地区基本上按照这条线定界。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调整是把一直同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如果缅甸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调整建议，中国政府愿意把属于中国而在1897年永租给英国管辖的勐卯三角地永久地移交给缅甸。

三、中缅边界公平合理解决后，建议两国签订一个新的边界条约，以代替一切旧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

一方要求维持边界现状；一方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双方思想上差距一时难于接近，但是，周恩来一点不灰心，在后来的日子里，缅甸朋友多次到北京来协商，协商中有时难免出现争论，周恩来始终平静自若，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疏导，耐心协调双方思路，促使对方进一步考虑，以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因此，边界问题虽然一时达不成一致意见，但缅甸朋友对周恩来始终充满敬意。正如一位缅甸朋友所说：“同周总理共事是最愉快的，尽管他的意见总是占了上风，但使人心悦诚服。”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
共饮一江水。”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把

两国友好关系推向一个高峰

由于种种原因，中缅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已经到了1960年。

这时，中印边界发生第一次冲突。为了树立一个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中缅双方加快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步伐。

1960年初，年轻的奈温将军来到北京。1月28日，周恩来和奈温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中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上签字。

接下来，双方加紧对边界的勘察工作。周恩来指示，要同缅方勘界人员友好协作，互相传播技术，共同总结经验，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要通过联合勘察搞联欢、搞友好。领导中方边界委员会工作的姚仲明后来回忆：“由于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双方勘界人员始终在和谐的气氛中互相帮助、合作，勘界、划界、树桩等任务都完成得很圆满。”

在勘界过程中，周恩来十分注意教育参与工作的同志要尊重边境居民的民族感情。

由于中缅边界是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双方的部落关系、家庭关系、亲戚关系，盘根错节，所以，周恩来一再要求他们处理好这个问题，周恩来指出，有的民族被边界线多年分割，这是历史所造成的，想加以改变是十分困难的，但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量照顾其合理的愿望，设法做一定的调整，也是必要的。如佤族班洪、班老辖区的收回就是一例。

在“1941年线”上，还有不少骑线寨。所谓骑线寨即是指一个村寨同一家族的人，由于住宅的位置不同，被划属两个国家，不仅日常生活不方便，也给双方的行政管理造成了不少困难，这是帝国主义埋下的纠纷祸根。1960年，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开会前，周恩来对姚仲明说：对骑线寨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保持每个村寨的完整，分别划归给中方或缅方，力求平衡，主要看大家方便，搞友谊。8月7日，他在北戴河又向姚仲明提出：可采取交换或补贴的办法，注意切不可伤害少数民族的利益和关系。

由于双方的努力，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1960年10月1日，喜气洋洋的北京又添一喜，周恩来同前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吴努总理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上签字，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61年1月4日，是缅甸独立节。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赴缅甸参加庆祝活动，随同周恩来一起出访的还有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等。同时中国政府还派出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中缅边界委员会中方代表团，中国云南省代表团，中国佛教代表团，中国电影、新闻和体育代表团参加缅甸独立节的活动。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陈毅即兴赋诗一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表达了中国人民同缅甸人民之间深厚的“胞波”情谊。这次活动把两国友好关系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在缅甸期间，周恩来出席了中缅互换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缅甸总统授予周恩来“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最高勋章，以表彰他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出的杰出贡献。

1980年，姚仲明重访缅甸时，许多缅甸老朋友还在流传着周恩来为两国边界问题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姚仲明说：“有些人认为，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周总理生前访问缅甸达9次之多，这是中缅友好的重大历史记录，显示了极不寻常的平等精神，许多老朋友把周总理视作新中国的代表，人民外

交家的光辉典范。他们特别提到，周总理大力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支持第三世界的独立和发展，努力维护世界和平，是第三世界同家和世界人民的真正朋友。”

伴随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中国又分别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老挝等国经过和平谈判顺利解决边界问题，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

征服黄河长江的足迹

中国是一个江河众多的大国，如果把中国的天然河流连接起来，总长度达 43 万公里，可以绕地球赤道 10 周有余。在这些天然河流中，著称于世，作为中国象征的是黄河与长江，它们为中国人民带来了丰富的水利资源。然而，这两条河流也给中国人民带来过严重的危害。为了变害为利，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周恩来
治水，26 年呕心沥血，其功不在禹下

提起治水，中国人民常常会想起远古时代的夏禹。传说中，他为了治水，“劳身焦思，居外 13 年，过家门不敢入”，终于治平洪水，功留干史。为了纪念这位治水英雄，大禹长年奔波经过的许多地方，人们为他修建了禹王宫、禹王庙和水德祠。

提起治水，中国人民也会常常想起开国总理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做了 26 年总理，治水是他紧抓不放的主要工作之一。正如周恩来自己所说的：“解放后 20 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导弹、卫星）”，水利专家林一山这样讲过：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难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认真处理；凡是毛泽东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恩来更是抓得紧、抓得细。

虽然，人们没有像对大禹那样，专门为周恩来修一座庙宇，或竖立一块石碑，但是，那波涛滚滚的江水，那滔滔江水上立起的一座座大坝、一座座水库不都是形象地记载着他的功绩吗？

绍兴，是周恩来的祖籍；绍兴也是埋葬大禹的地方。据史料记载：大禹“忧民救水到大越（今绍兴），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会计”是讨论的意思，讨论的地点茅山因此改称为会稽山。大禹做了皇帝以后，“巡狩大越”，在这里病故，就葬于会稽山下，人们为他在这里安置下舒适的陵墓，供他永远的歇息。1939 年 4 月，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回到故乡。在亲友的陪同下，周恩来专程拜谒了大禹陵，像家乡人民一样，真诚地怀念这位远古的治水英雄。周恩来拾级而上，驻足陵前。背靠大禹的陵墓，周恩来留下一张英姿勃勃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入周恩来画册中，成为永久的纪念。几十年后，人们面对这张照片，透过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仍然可以体会出周恩来当时的心情：人民一旦做了国家真正的主人，他也要像大禹一样治理水害，造福天下。

周恩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49 年 11 月，新中国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一个多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参加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他说：古代的人被传得最多最久的便是治水的大禹，他的形象最高大，最受后人颂扬。他号召大家向禹学习，以禹为榜样，努力治水。后来他还说：“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大禹以来从未做到的”。

在以后 26 年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身体力行，为治水呕心沥血，其功不在禹下。

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需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解决矛盾，把黄河治理好

中国人民称黄河是母亲河。

1976年1月11日深夜，一架国产小型运输机冒着凛冽的寒风，经北京、天津向山东黄河入海口飞去。在黄河口的上空，飞机开始盘旋，脸上还留着泪痕的张树迎和高振普抑制住悲痛的心情，把周恩来的最后一包骨灰撒向黄河那宽阔的怀抱中……

选择黄河入海口做为撒放周恩来骨灰的最后一站，是因为周恩来对黄河有着深切的期望，是因为周恩来对象征祖国母亲的黄河有着无限眷恋的感情。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万余平方公里。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个省市自治区，最终注入渤海。这条中国的第二大河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但是它在过去曾是中国人民的大灾祸。据史料记载，解放前2千多年间，黄河下游溃堤泛滥达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几千年来，中国人世代代想把黄河水害变为水利。汉朝贾让的治河三策中明确提出：“富国安民，兴利除害”的见解；近代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在三门峡咏砥诗中抒发了“吾欲铲平新巨蟑，扬帆碧海大河源”的理想。然而，他们都没有能改变黄河的面貌，实现治理黄河的理想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曾经说：“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1957年4月13日，对黄河除害兴利的关键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这项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控制黄河上游水量的92%，拦蓄三门峡以上地区的特大洪水，使河南、山东、河北、苏北、皖北等地8千万居民免除洪水的威胁；而且可以灌溉黄河下游4千万亩土地，可以为三门峡附近地区的工业提供充裕而廉价的电力，可以发展黄河上的航运。为表达中国人民的心情，在黄河南岸狮子头的岩石上刻着一副对联：“根治水害有日，黄河变清有期”。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啊。

周恩来明确指出“三门峡水库的兴建，只是根治黄河的开始”，他要求水利部的同志充分准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治黄的客观规律。正像周恩来所说的，探索治理黄河的路于并不那么平坦，虽然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了，但是原来就存在的争论并没有停止。

1954年底，黄河规划委员会正式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后，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被列为第一期工程的主要项目。1955年12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刘子厚出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张铁铮、齐文川任副局长，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由于新中国缺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三门峡委托给苏联专家进行设计。当时的规划思想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设想能大量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护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设计原则，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

拔 360 米，相应库容 647 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大量移民。对这个设计规划，主要是对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引起一系列争论。有人说，这个水库很快地淤死了，那么还有修的必要没有呢？有人说，是不是把坝再提高一下呢？还有人说，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溉，就是将洪水拦一些，然后再放出去是不是可能呢？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后，这些争论还在继续。陕西省的同志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周恩来一直关注着黄河问题，他认为，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了修建三门峡水库过程中还净在着没有解决的困难，肯于反映，敢于反映，而且敢于说出来，这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周恩来约请彭德怀和习仲勋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

为了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8 年 4 月 21 日至 24 日，周恩来在三门峡工地主持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现场会。这个会本来准备在北京开，为了同实际相结合，吸收持各方面意见的人参加，特别是持反面意见的人参加，周恩来决定改变会址，到三门峡现场召开。

4 月的三门峡工地春寒料峭，可是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与会同志畅所欲言，给了周恩来许多有益的启发。

4 月 24 日，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综合各方面的争论和意见，作了长篇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这个会是有意识的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树立对立面。”他还说：“如果说这次是一个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争鸣下去。”

周恩来认为，通过对三门峡的研究，来更好地总结根治水害，发展水利的问题，并可以把经验推广到其他的流域，对海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等等总有好处。

由于黄河的灾害带有突然性，不一定那年出现最大的洪峰，黄河如果决口，四五省都要受害，一淹就是几十万人口，就是不决口，在洪水的威胁下，防汛动员的人力也极大。因此，周恩来谈到修建三门峡的目标时指出：不能孤立地靠水库来解决防洪问题，必须联系配合各方面工作，最主要的是水土保持问题，根据这个原则，周恩来具体提出三点：首先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其次先防洪后综合利用；其三，防洪的限度是确保西安。

针对讨论会上大家认为拦泥措施不可靠，对淤积的预计没有把握，移民任务太大，周恩来在会上果断决定把原方案改为大坝按 360 米设计，350 米施工，初期蓄水控制在 335 米，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减少移民数量。

1960 年，三门峡大坝修成蓄水，实践证明，修改原设计方案是完全必要的。然而，黄河确实如一匹难于驯服的野马，问题很多，主要是在治理泥沙方面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办法。淤积部分迅速向上游延伸，形成“翘尾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采用厂大搞水土保持等各种措施。但是，水库如不改建，再过 3、5 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这时，各种意见又争论起来，有的人全盘肯定，认为应该按原规划继续在上游支流修拦泥库；有的人全盘否定，认为只有废除三门峡枢纽，甚至把大坝炸掉才能有出路。争论中，大家提出了各种修改方案。

1964 年 12 月 18 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本来三门峡改建的事计委批准就可以了，可是有些意见出入较大，不征求大家意见，周恩来不安

心。那段时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非常繁忙，但仍旧抽出时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周恩来指出：“黄河治理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将近15年了，但是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也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都认识和掌握了。我们承认现在的经验比十五年前是多了，比修建三门峡枢纽工程时也多了，但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未知数要我们去解答：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会议的中心是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改建问题，多数同志认为应将三门峡彻底改建，但又顾虑改建影响不好。周恩来教育大家：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有了错误要彻底改正。他还从战略的高度提出厂意见，他说：改建规模不要太大，因为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上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这个总设想和方针是不会错的，但是水土如何结合起来用，这不仅是战术性的问题，而且是带有战略性的问题。

在讨论如何处理三门峡泥沙淤积问题时，周恩来要求到会同志提出方案。他看到林一山后对他说：“林一山同志，你有什么好办法吧？”林一山根据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理论，主张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以恢复潼关河段原黄河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听到这里，周恩来问道：“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啊？”有人回答：“叫温善章。”周恩来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在场的同志都为周恩来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感动。

为增加三门峡枢纽工程的泄流排沙能力，减轻水库淤积，有关部门提出“二洞四管”方案，即在大坝左岸打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把八条发电引水钢管管中的四条改成泄流排沙道。会议讨论这个方案时，大多数人认为增加“二洞四管”还是需要的，但是个别同志仍旧反对这个方案，主张上游修三个拦泥库，只拦泥，不综合利用。为统一思想，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会上明确指出：“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即使说过去水土保持做得不好，上游勘察工作做得不好，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电力部工作上都有错误，但是眼前的这个病怎么治？要回答五年内怎么办这个问题。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何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实施水上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得很，五年之内国家哪有那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那么多的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希望多从全局想一想。我也承认三门峡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是在想不出好办法的情况下的救急办法。改建有利于解决问题，不动就没法解决问题。改建投资可能多一些，但即便需要八九千万元，也不能不花，哪能看着问题下去解决！看问题要有全面观点，要看到变动的情况。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可以批准，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

经过这次会议，对三门峡改建问题的争论少了，但是周恩来仍旧没有完全安心。他向有关同志一再强调，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

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他说：“到现在我还担心二洞四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满，还可能会遇到困难，还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新问题，设计方面要多研究，施工时要和工人多商量，要兢兢业业地做。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提出来，随时给北京打电话，哪一点不行，赶快研究。不要因为中央决定了，国家计委批准了，就不管了。因为决定也常会出偏差，会有毛病，技术上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多。我再重复一句，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大家要时常多想想。因为，黄河的规律还没有完全被认识。这一点要承认。我还要再三说一下，不要知道一点，就以为自己对其他都了解了，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大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1968年，三门峡第一期改建任务胜利完成。从1969年开始，三门峡工程进行第二期改建，经过四年的奋斗，到1973年完成，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的问题。这时，已经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消息，使陷于困境的周恩来露出欣慰的笑容……

争论只要是不妨碍工作，有利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

1958年3月，长江上游两岸仍被寒气包围着。然而，从武汉溯江而上的“江峡轮”上却显得格外热气腾腾。当它与迎面而来的船只相遇时，总会骄傲地响起清脆的汽笛声，仿佛向船上的人们问好。谁都没有想到，这艘船上载着周恩来和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

细心的人们可以从报纸上发现，周恩来刚刚从朝鲜回来，今天，他又急匆匆地到哪里去呢？

这年初，中共中央在广西召开了著名的“南宁会议”。因为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然而，批评是批评，一些重要的工作，还需要周恩来挂帅去做。在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重要决议，抓紧进行长江三峡的工程。毛泽东提出，今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由周恩来领导。毛泽东要求周恩来每年抓四次，而实际中周恩来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这个要求。

这个时期正是周恩来内心最痛苦的时候。对“反冒进”问题，他承担了责任，做了检查，但是，他并没有消沉。南宁会议后，周恩来访问朝鲜归来，立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勘测长江三峡坝址上。

2月26日，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的陪同下，率领中央各部委、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一百多人乘“江峡号”踏上征途，开始对三峡地区的考察。沿途，他对荆江大堤几个险要堤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视察。那几天，天气非常冷，下起了鹅毛大雪。但是，周恩来仿佛什么都不觉得，他专心致志听取随从人员介绍情况，并且不停地提出问题。一直跟在他身边的长办主任林一山向周恩来报告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他说：长江洪水水位高出地面十多米，假如荆江大堤有一处决口，不但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毁灭性的灾害，武汉市的汉口也有被洪水吞没的危险。在大水年，湖南

洞庭湖区许多坝子也将决口受灾，长江有可能改道。为了防洪，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堤防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当然修堤防汛抢险是当前主要的防洪手段，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但那时的安全程度就不一样了，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当年陪同周恩来一起考察的王任重考察日记中写道：“周恩来等人边看边听，频频点头。”

3月1日上午，周恩来先率领大家勘察了南津关坝区。下午，周恩来看了三斗坪坝址，在中堡岛上详细地观察了坝址，并实地研究对照了工程设计方案，他认真了解了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心。王任重回忆：“总理还取了一截花岗岩心说要带回北京放到他办公室里陈列”。

从2月26日启程至3月5日到达重庆，周恩来在船上渡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就在这段时间内，就在这条船上，在周恩来主持下，对三峡工程第一次进行了充分地论证。论证的中心问题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不是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工程。船舱内四面挂着规划和设计示意图，气氛十分热烈。周恩来要求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对林一山主张的三峡工程作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的意见，李锐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很理想，但不同意以三峡作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说，应该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以解决。钱正英支持林一山的意见。她指出，从长江流域的全局出发，以三峡作为规划的主体工程是有道理的。长江的防洪问题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决不可掉以轻心，单靠加高堤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讨论中，王任重、张劲夫、阎红彦、刘西尧、李葆华、刘澜波等同志都发表了意见，周恩来听得十分认真、仔细，脑子里在酝酿着总结报告。

3月2日，天气转晴，露出了太阳，使人感到空气特别清新。下午没有开会，周恩来走出船舱，倚在船栏上欣赏着巫峡壮丽而宏伟的景象，真是难得的休息日啊，当天晚上，颇有文学才华的王任重写了一首自由诗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诗是这样写的：

“沿着弯曲的峡谷，
逆流而上，
仰观山峰，
俯视川流，
翻滚的浪涛，在激情的歌唱。
秀丽的美人，
沉思的神女啊！
引起人们无穷的遐想：
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们，
会继续让洪水任意逞狂？
不，不，不！
我们一定要兴利除害，
让滔滔的江水，发出强大的电流，
输送到华中，华东，华南的电网。
想得更远一点：

终会有一天
我们将指引江流向北京，
让长江的水
浇灌华北平原大地，
三峡大坝的建成，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它向全世界宣布，
新中国的人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工任重的诗句，表达了全体水利工作者的心声：“新中国的人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经过几天的讨论，大家基本上统一了思想。3月6日，周恩来在重庆主持讨论了林一山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总结纪要》，周恩来全面总结了几天来讨论的情况。

周恩来指出：“这次会议主要问题是如何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他说：“在南宁会议上曾提出兴建三峡的可能性问题，现在就是要听听苏联专家和各部门兴建三峡的意见。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要涉及全江，要谈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因为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必然的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于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的兼顾及水火电的比例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必然会涉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整个工业的部署和电力网的设立等。这次会议的中心虽然是兴建三峡枢纽问题，但同志们的发言中联系到这些问题也是自然合理的。可是这次会议的目的仍是积极准备兴建三峡的问题，并将同中央报告解决有关问题。”

从1954年以来，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就存在着争论，在报告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三峡必须搞而且能搞，在政治、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意见。充分肯定了长江流域办公室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集中力量在三峡研究上有成绩。”他说，两年来的争论也是必要的。“争论只要是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反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

接下来，周恩来详细地谈了修建三峡本身的问题。关于三峡工程的综合利用问题，周恩来提出“要与干支流、上中下游综合搞，要分担任务配合进行，既使三峡水库能蓄一千亿立方的洪水，还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他说：“三峡枢纽是问题的主体，但是我们不能集中一点不及其他。三峡是重点而不是一切，应有主有从，这样才能全面论证问题。”关于三峡工程的准备时期和准备工作，周恩来提出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是长江流域规划要点阶段，现在已基本完成；第二是规划性设计阶段；第三是初步设计阶段。他说：“南津关、三斗坪两坝区都要进行，要进行综合比较。地质部有人怕分散力量，只想搞一个坝段。如果我们要学本事就要搞两个地方，可能吸取经验，训练人才。”这种慎重的态度是周恩来一贯的作风。

在总结报告中，周恩来还提出长江流域规划的方针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

为进一步推动治理长江的工作向前发展，周恩来决定取消原长江水利委员会，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

最后，周恩来提出十六个大字与大家互勉，这就是“鼓起干劲，相互促进，乘风破浪，力争上游。”

经过这一次对三峡的实际考察，周恩来对长江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的认

识。他的工作作风也给随同他一起考察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近三十年后，人们回忆起那些情景仍旧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王任重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随从总理视察的10天中，我看到总理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对同志那样平易近人，主持会议那样虚心听取各种意见，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善于和各方面的群众接触，人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许多和他偶有过接触的人，他差不多都能说出名字来。他有超人的充沛精力，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中午也不休息。我比他年轻20岁，也不能像他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理的高尚品德、认真精神和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一辈子的。”

随后，周恩来从重庆赶往成都，参加3月8日至26日在那里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23日，周恩来在大组会上做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为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由于种种原因，三峡工程没有马上进行，这份意见没有在周恩来手中化为事实。但是中国人民为他圆了“三峡梦”。

1994年12月14日，周恩来亲自勘察过的长江三峡的中堡岛上迎来了令人的振奋的时刻——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仪式。礼炮轰鸣，国歌回荡，仿佛在呼唤周恩来的名字……

寄希望于香港人民

“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四十年前，周恩来曾经这样预言。

四十年过去了，中国收回香港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而这位杰出的预言家却已长眠地下。

他没有等到收回香港的那一天，但他的
足迹却早已留在那块美丽的土地上

香港，位于广东省东南部，与广州市隔海相望。

关于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有许多动人的传说。据资料记载，英国人最初到香港是从现在的“香港仔”登陆，那里有一条泉水流入大海，成为一个小小的港口。船上的水手发现这条泉水特别甘香可口，就常常到这里来汲水上船作为饮料。因此，这条泉水被称为“香江”而它的港口也就被人叫做“香港”了。

19世纪2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灾难极其深重的年代。1842年，在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清政府被迫同入侵者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条约的第三款是，中国“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祠后世袭王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然而，清政府的退让求和远远没有满足英帝国主义的贪欲。1898年，英国政府以法国租借广州湾（现中湛江）为借口，进一步扩大对中国领土的要求，他们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毫无道理地提出：法国人租借了广州湾，对英国在香港的利益构成威胁，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将九龙岛“租借”给他们。这口气，分明是强夺嘛！这年6月9日，在洋枪洋炮的威慑下，软弱的清政府，同英国签署了《拓展香港界址专条》。

《专条》中，“拓展”的地界叫做“新界”。它的范围，九龙方面以深圳河为界，东起大鹏湾，西至深洲湾，南到南丫岛，还包括大小一百多个岛屿。这比《南京条约》中割让香港的界址扩大了几乎一百倍。《专条》规定，租界期限长达99年。

1898年7月1日，英国开始接管“新界”。从此，中国的香港，（包括九龙半岛和二百余个小岛在内的一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被世界称为“东方之珠”的地方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英南京条约》和《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中，写下了这屈辱的一页。少年周恩来在课本中读懂了这段令人愤慨的历史，从此，他心中埋下深深的民族仇恨。1920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年仅22岁的周恩来远涉重洋赴欧洲求学。四年后，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周恩来回到祖国，这时候，他已经从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对他的评语是：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二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或许正是这份优秀的评语，使他一回国就担起领导广东地区党的工作的重任。

1924年秋，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周恩来先到达香港。这是他第一

次踏上这块本来应该属于祖国的土地。周恩来在香港大学找到他南开时的同学石志仁，就住在他的家中。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没有更多的时间在香港停留，也来不及仔细地看一看这座美丽的海岛城市。

9月初，周恩来乘坐“佛山号”轮船从香港回到广州。这时的广州已经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国内风起云涌的反帝斗争浪潮很快冲击到香港。

1925年6月，香港地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工人大罢工，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广东区委积极参与并有力地支持了这场斗争，在香港工人运动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周恩来再一次来到香港，已是大革命失败之后。

1927年8月1日，为反对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辰日。

南昌起义胜利了，部队按预定计划南下。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队伍很快被打散了。8月3日至7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在南下途中，由于过度的劳累和炎热的气候，周恩来终于病倒了。当他率领被打散的部队到达广东省普宁县内流沙镇时，已经病得很重。周恩来高烧不退，常常处于昏迷之中。一直守候在周恩来身边的是叶挺、聂荣臻等人，他们不熟悉道路，又不懂当地的语言，因而陷入极端的困境中。好在不久，他们遇到潮汕地方党的负责人杨石魂，他从村里找来一副担架，把周恩来抬上，转移到陆丰县的甲子港，从这里出海去香港。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如实记载了当年的情况，他是这样写的：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大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达香港后，杨石魂很快同省委取得联系，把周恩来安置下来。

周恩来扮做一个商人，住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养病。广东省委派来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照顾他。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静心休养，周恩来的健康逐渐恢复。

这时，已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分析革命形势和研究斗争策略。10月23日，中共中央致信南方局并广东省委，请他们通知周恩来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会议。

11月上旬，周恩来从九龙深水涉上船，经广州返回上海。不久，他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职责。

四个月后，周恩来又回到香港。这是他最后一次去香港。他的任务是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广州起义是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挥代英、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下进行的。起义前，周恩来在香港曾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这次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发动的又一次英勇反击。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缺乏周密的准备，起义发动后又缺乏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因此很快失败了。

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敌人对革命者进行残酷的屠杀，鲜血流淌在广州街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英勇牺牲，聂荣臻、叶挺等败退香港。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李立三对起义的情况没有做出实事求是、客观的分析，而是一味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广东省委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1928年1月中旬，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全面检讨广州起义问题，李立三在会上不顾大家的反对，坚决采取惩办主义，大批地处分了起义领导人。对李立三的作法中共中央不同意，因此，决定派周恩来来到香港重新处理这个问题。

周恩来来到香港后，在广东省委扩大会上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充分肯定了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批评了一些同志的错误，周恩来郑重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他的意见，在会上受到了多数同志的拥护。由于周恩来正确解决了广东省委的争论，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使党内团结大大地巩固了。

在香港期间，周恩来听到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的消息，这使他心中十分悲痛。

周文雍是广东省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他从1925年起长期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广州起义时，他又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和广州苏维埃的人民劳动委员。陈铁军以妻子的身份掩护周文雍工作，两人配合默契，并在斗争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立三派周文雍回广州组织打散的队伍，不幸的是，周文雍很快暴露目标，和陈铁军一起被捕。在敌人面前，他们坚贞不渝，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们在刑场上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婚礼。这段动人的故事几十年来一直流传在人民之中。

香港报纸上登出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的消息和照片，聂荣臻到香港后把这份报纸收藏起来，周恩来从聂荣臻那里看到这些资料后，流下悲愤的眼泪。他的目光停留在陈铁军的脸上，思绪回到1927年“四一五”大屠杀中的广州。那时，邓颖超因为难产，住在一所医院里。陈铁军冒着生命危险到医院通知邓颖超，要她马上离开广州。邓颖超刚刚离开医院，敌人就来了。但是，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张空荡荡的病床。

想到这里，周恩来又是一阵心痛，多么好的战友啊。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革命者要经历多少次这生与死的考验啊。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周恩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新的工作又在等待着他。

伴随阵阵汽笛声，轮船缓缓开出香港码头，迎着波涛滚滚的海浪向北方驶去。周恩来倚着甲板的船栏，回首望着远去的城市，是惜别，还是留恋？

以后，他除了五十年代期间出访归国时曾在香港机场有过一次短暂的停留外，这可以说是他最后一次来到香港。

香港可以作为大陆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新中国成立了，香港怎么办？

伴随开国大典隆隆的炮声，采取什么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摆到中国人民面前。

其实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前已

有所考虑，并作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慎重决定。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这种策略，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考虑，主要是为了孤立美国。周恩来曾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考虑，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一直是我国货物进出的转口港，是我国和外国之间经济、文化、市场信息联系的桥梁。周恩来认为“那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从 50 年代开始，周恩来已经在具体考虑怎样处理同香港的关系问题。

那是 1957 年的春天，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国内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三大改造，特别是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引起了香港产业界一些朋友的疑惧和不安。为了最广泛的动员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周恩来在上海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谈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这篇讲话对争取香港各界积极支持国内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4 月 28 日，和暖的春风吹拂着上海。

在上海延安西路 200 号小礼堂内，春意融融，周恩来正在这里举行座谈会。受邀请的除了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外，主要是工商界的朋友们。如盛丕华、胡子婴、盛康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

周恩来选择上海来开这个会，是因为香港的资本家许多是从上海去的，香港与上海之间有一种大然的、难以割断的联系。

周恩来宣布：座谈会就从香港问题谈起。

他用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到会的朋友，接着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周恩来希望大家不要拘束，敞汗心扉，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短短几句开场白，缓和了大家有些紧张的心情。在轻松、亲切的交谈中。周恩来了解到许多他渴望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当盛康年谈到荣家（指荣毅仁家）买了两辆新式汽车，不敢坐；洪佐尧很有钱，而没有买汽车时，周恩来说：“工商界应有几辆汽车，否则人家奇怪，汽车全是机关里的。你们有外汇可以自己买，要公家代买也可以。公家汽车可以出卖一些。”

当吴志超谈到香港工商界对我们进行的“五反”运动耿耿于心，说现在情况好了，今后情况如何还想再看一、二年时，周恩来说：“太少了，应该多看几年！”

当简日林谈到国内的工资改革也搬到香港，工人意见很多时，周恩来急忙问：“工资后来加了没有？”简日林回答“加了！”周恩来又问：“你们厂独立起来行不行？”简日林如实告诉总理：“有客观困难。”周恩来毫不

含糊地拍板说：“可以管得松一些，让港厂独立经营”。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他首先表示：今天听到大家反映的情况，很有收获，大家谈得部很好。这些意见，中央要进行研究。

接着，他对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不是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那么，对其在香港的企业要不要去变动它呢？周恩来态度坚定地指出：“不要去变动它！”他说：“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象‘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

听了周恩来这番话，在座的朋友们非常感动。无形中化解了他们心中的疑虑。

最后，周恩来歉疚地检讨了某些部门过去在执行政策上出现的一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谅解。他说：“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过去我们搞得比较死，但总的说是对的，否则上不了轨道。现在既上了轨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

这篇讲话是周恩来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步构想。当我们在将近四十年后重温这篇讲话时，不能不由衷地钦佩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香港离北京不远，但是消息不通，
有隔阂，你们这次来了，要想法
把消息沟通才好

1955年冬天，香港大学以E·C·布兰顿教授（英籍）为首的访问团24人和国民党元老陈友仁之子、香港著名律师陈丕士等5人越过罗湖桥，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

12月的北京，已是天寒地冻。然而，冬天的阳光依然是那么灿烂。在冬日的阳光下，中南海内金壁辉煌的古老建筑越发显得灿烂夺目。

23日那天，几辆黑色的小轿车缓缓地驶进中南海，沿着柏油路向紫光阁开来。在这座美丽的殿堂里，周恩来曾经接待过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今天，他迎接的又是谁呢？

汽车在紫光阁的台阶前停下，布兰顿等人走下来，周恩来伸出温暖的手，迎接来自香港的客人。

访问团的客人十分复杂，其中大部分是抱着怀疑态度来看看的，他们对新中国大不了解了。周恩来的热忱给了他们最初的美好印象。

陪同周恩来接待访问团的有文化界著名人士楚图南、阳翰笙、沈雁冰、郑振铎、丁西林、张奚若等，以及外交部有关负责人章汉夫、黄华、雷任民等。

谈话中，周恩来说：“香港离北京不远，但是消息不通，有隔阂。你们这次来了，要想法把消息沟通才好！”他问道：“不仅是消息不通，交通也不灵，不通畅，香港到广州，广州到香港很麻烦，把它通起来好不好！”

周恩来的话引起大家的兴趣，布兰顿教授指着原港大毕业生石志仁说：“你们铁道部的副部长，很向往母校，如他愿意的话，一定能想办法把这件事办好。”

周恩来高兴他说：“如果大家都赞成，就请副部长办好了。”这位铁道部副部长正是周恩来在南开时的同学，三十年前，周恩来访欧归来途经香港，就是住在他的家里。

在热烈而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话锋一转，谈到北京、香港和广州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周恩来指出：“过去我们经常经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处，我们希望今后不必都经过英国代办处，而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布兰顿表示，回去以后尽量发挥影响。

周恩来还提到，在座很多朋友与台湾有联系，希望他们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多做贡献。

谈到英国民族的特点，布兰顿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在战壕里等待着战争的结束，结果战争还是结束了，我们英国人的特点是有耐心，我们应该忍耐。”

周恩来同意地点点头：“英国民族的特点是有耐心，我们要学习英国人的等待和耐心，我们更有耐心等待真理的实现。中国人民等了一百年，一个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还是等出来了。”

布兰顿称赞中国人的耐心可以得到最高的分数。关于周恩来个人，如果在英国的话是可以得到奖品的。

谈到中国的建设，周恩来表示还刚刚开始，“我们需要一个和个的环境，我们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都很落后，比起西方国家和苏联部落后得多。”

布兰顿却说：“我觉得中国有这么大的面积，情况并不像总理说的这样。来了以后对中国人民的情绪了解到一些，中国人民有这种思想情绪，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

周恩来的讲话，使这些过去对中国一无所知或受到帝国主义影响的朋友们，开始重新去认识一些问题。

20日、27日，周恩来两次会见了与香港大学英籍教授一同来京的陈丕士

等人，并在西花厅家中请他们共进午餐。

在第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热情称赞陈丕士的家庭是“国际家庭”、“外交家庭”。陈丕士的父亲陈友仁在大革命时期对革命很有贡献，支持过省港罢工。周恩来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省港罢工的情况，并一再赞扬以国民党左派著你的廖仲恺对罢工的历史功绩。

陈丕士很感谢周恩来对他父亲的评价。他说当时他在武汉外交部工作，曾与英国人谈判，由于自己年轻，争不过英国人，就去请教父亲。陈友仁告诉他：“你只需要向英国人说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中国人民不同意。”

在座的有一位年轻姑娘，她是香港大学的学生，名字叫廖瑶珠。如今，这位姑娘已是香港议员，全国人大代表。

姑娘直率地问周恩来：“香港问题怎么样？”

周恩来也直率地回答她：“香港问题我不能肯定他说，你今年才21岁，到80岁还有60年，总有一天，你会看到香港问题得到解决的。”

周恩来寄希望于香港人民，他说：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同胞，他们愿意看到祖国前进。

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着重谈到在香港设立机构问题。

周恩来问陈丕士：“从律师的角度看，在香港用什么方式同香港政府保持接触最合适？”

陈丕士回答：“我认为在香港的中国人部愿意看到中国有一个正式机构设在香港，和大陆发生联系。”

周恩来恳切地希望他在香港多吃一些和平工作，陈丕士答应一定尽力去做。

周恩来不无遗憾他说：“六年来我对香港了解得不太充分，注意得不够，工作作得不够，现在接触了一下，知道那个地方大有可为。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祖国，而且从来就看成那是自己的地方。”

访问团在中国大陆停留了三个星期，对新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们踏上归途，再次走上罗湖桥时，不禁留恋地回过头去

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对他们遇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力帮助解决

1984年12月11日，香港《文汇报》上记载着这样一条新闻：

香港前任总督麦里浩说：“在我作为总督的年月中，我发觉中国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广东的官员一贯地和日益增加地提供帮助。”

他的话毫不夸张。周恩来作总理期间就是这样做的。

对香港大到政治问题，小到物资淡水供应，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些工作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政治局势的稳定、人民生活的保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香港同胞很难忘记，1962年秋天至1963年初夏那段旱情严重的日子。在这几个月中，从大陆深圳到香港几乎没下一场雨，土地干裂，淡水缺乏。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连有限的死库容水量也被抽上来使用。到处可以看到，水龙头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干旱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

面对无水之苦，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联名给广东省省

长陈郁写信，请求协助解决香港用水的困难。香港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广东省人民政府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提供帮助。当时，广东省人民政府一方面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开始酝酿讨论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

香港供水的困难很快传到北京，传到周恩来耳中。他非常重视这件事，并且积极支持广东人民政府采取的措施。

1963年12月，周恩来准备访问亚非各国。出访之前，他绕道广东，亲自了解并过问了供水香港的问题。

12月8日，周恩来到了中南局书记陶铸家中，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汇报石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陶铸、陈郁、曾生等人。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作出六点指示：

一、向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所谓事实上连在一起而公开的又不连在一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

二、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

三、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作为援外专项项目。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办比较主动，不用他们插手。

四、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设投资费用，水费应该实行经济核算，每一吨收一角钱（人民币），可定下来，不要讨价还价。

五、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委，由国家计委审查批准。

六、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请港英当局派人进来谈，谈判如何进行，由广东省请示外交部决定。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64年2月，石马河工程全线开工，到1965年春天仅用一年的时间即竣工。这项工程不仅解决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食用水的局面。

对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周恩来都是及时制止，予以纠正。

1956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45周年纪念日。然而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国民党特务分子在香港九龙制造了大规模的骚乱和暴行。他们纠集了数千名暴徒对许多学校、商店、居民进行袭击、抢劫、纵火，使香港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周恩来非常气愤，两次会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抗议香港当局没有及时制止这一暴行，要求他们保持在港中国居民的安全。

1967年5月6日，九龙新蒲岗“香港人造塑料花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警方进行镇压打伤许多工人。香港地下党领导的工会，受到国内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影响，组织工人、市民罢工、罢市，人们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墙上张贴大字报，高呼“爱国无罪，抗暴有理”，情形就像内地发生的红卫兵运动一样。民众和警方发生严重冲突，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最终遭到警方镇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震撼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对这种“左”的作法，中共中央是不赞成的，在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纠正了这一错误，坚持了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这座计时牌面朝人民大会堂，时时向中国人民提示：香港总有一天是我们的

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东侧，耸立着庄严雄伟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三十多年来，这座博物馆以其丰富而精湛的展览吸引着无数南来北往的客人。

1994年12月19日，在博物馆的西门外，又矗立起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大的计时牌。

这座计时牌以两块巨大的花岗石为底座，计时牌白底红字，非常醒目。牌的上方中央是一个金黄色的大五角星，这颗星的下方由四颗金色的小五角星形成半包围状。

计时牌上这样写道：

中国政府

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倒计时

距1997年7月1日

××天××秒（电子显示器显示着时间）

这座计时牌面朝人民大会堂，仿佛时时向中国人民提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这是周恩来生前的预言，只是他没有来得及在自己任职期间去实现这一天。

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到邓小平身上。

1979年，港督麦里浩访华，他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新界99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97年以后继续租让。”

邓小平明确而坚定地回答他：“中国届时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权。”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进一步阐明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

邓小平的回答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愿，也代表了周恩来生前的心愿。

计时牌上的数字日日夜夜显示着，变换着，离1997年7月1日愈来愈近，愈来愈近……

“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这一天真的为期不远了。

从反“反冒进”到“大跃进”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批评反冒进后，
仍然意犹未尽，主张再召开一次范围
更大一些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

1957年秋，正当周恩来、陈云等政府领导人同心协力，继续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准备在“一五”计划完成后对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为争取“二五”计划取得更大成绩而奋斗的时候，毛泽东的注意力由对苏共20大否定斯大林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反共逆流、波匈事件的关注，对国内反右斗争的关注，再次转移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关注上。

这时，深扎于中国共产党内一些领导人头脑中的过急地要求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开始以更顽强、更猛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决心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一个“大跃进”。他认为，只有首先统一全党高级干部对于建设速度这个战略问题的认识，才能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局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开展彻底清算所谓反冒进错误的反反冒进斗争。

但是，开展这场斗争，在党内高级领导层内会不会遭到公开的抵制和反对呢？这是毛泽东这时还把握不定因而十分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对反冒进进行了摸底性质的公开批评。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

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

‘冒’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

‘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

少顷，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这时，中共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有些不正常，训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曾经主张过反冒进的领导人也难以正常地发表不同意见了，因此在会上没有对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再提出异议。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同周恩来、陈云曾经多次指出过各项指标都冒进了的《农业四十条（草案）》并无实质性差别，但在会上没有人再表示相反意见了。反过来，当毛泽东看到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他反反冒进和对《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采取默认态度时，他由此推断完全可以开展反反冒进，并获得预期效果。

自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形势发生巨变，反冒进变成了反反冒进，批评和指责反冒进成为占绝对优势的舆论。

1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指出：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赞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何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同时，社论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接着，毛泽东又过问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工作，并把社论初稿带到莫斯科，在他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进一步斟酌修改。社论稿在带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于12月12日正式发表。

这篇社论以尖刻的语言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批评，说：这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二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因此“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社论要求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一些，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尽管反冒进从10月上旬起接二连三地遭到指责和批评，但是周恩来等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反冒进已经被毛泽东认为是个严重事件。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从1958年初开始的。

1958年新年钟声刚刚敲响，1月2日，周恩来陪同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飞往杭州会见毛泽东。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召集的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杭州会议）上，汇报了几天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讨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并听取毛泽东讲述工作方法十七条。

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十分欣赏已经在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并对前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了不满，向周恩来发了一通脾气。他说：“你们那个时候（指反反冒进——作者）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发了大火，但仍然意犹未尽，并且主张再召开一次范围更大一些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亲自起草了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9省2市领导人参加的南宁会议。

会议向与会代表散发了12份作为受批评的材料。其中有：1956年6月25日，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

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

即使地处亚热带，1月里南宁的平均气温也只有10度左右，仍有几分寒气。但是，位于邕江边的会议室甩却火力正旺。毛泽东在开会的头两天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

11日晚，毛泽东在会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12日上午，毛泽东继续批评说：“1953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9与1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南宁会议开会时，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王子巴德尔。13日，当周恩来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

16日上午，毛泽东在讲话时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柯庆施的这篇急躁冒进味道浓烈的文章，是1957年12月25日他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南宁会议召开25周年后的1983年7月，笔者随同方铭、金冲及前往中南海访问了薄一波副总理。他记忆犹新地回忆说：“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周恩来在检讨反冒进“错误”时说：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

毛泽东很注意批判的武器。当他把反冒进同“右派的进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反冒进“错误”的性质自然就变得相当严重了。毛泽东声色俱厉的接连不断的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过冒进的人坐卧不宁。与会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

这时，耳闻目睹了毛泽东等人批评的周恩来，更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从到达南宁的当天起，他几乎天天都约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谈

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错误”的发言提纲；

周恩来于19日上午飞广州会见泰国外宾后马上折回南宁，在尚未适当休息的情况下，便在晚上8时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检查。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到的问题，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针对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革命派是左派。在这个意义上，左比右好”。“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由于周恩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主动承担了责任，未对毛泽东脱离实际的批评作任何解释与申辩，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未使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但是，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却促进了中共党内急躁冒进“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正如薄一波后来评论所说：“南宁会议在我们党内是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

这时，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要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错误”；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的共产党人，他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中又尽可能要坚持稳重与谨慎的立场。

就在1月下旬，心情沉重压抑而又善于控制情绪的周恩来，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 and 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对文中所写的这些他仍不愿意接受的“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同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诚然，在当时急躁冒进的大气候下，周恩来此举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从细微之处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主动参与者之间，在思想上仍然是有一段明显距离的。

毛泽东对南宁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但是，他也看到只开一两次这样的会议，是不足以把反冒进“空气改变过来”而成为“大跃进”的空气；只有连续召开几次小型、中型再过渡到大型的会议，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反对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虽然反冒进错误现在还是10个指头中的1个，但如果要固执下去，看问题的方法不有所改变，到那时也许变成两个指头，并发展到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地步。

南宁会议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平素日以继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每天的工作“节目”一下子少了许多，有时甚至显得无所事事。据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梅行在《纪念许明》的文章中写道：

1958年初南宁会议上总理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我和许明就成了可以谈心的朋友，有一天下午，总理值班室通知我去西花厅，总理正在和许明等人打乒乓球。总理向我交待工作以后，我就到许明那里，问她为什么总理竟有时间和他们一起打球。她沉默了一阵，反

问我：“你难道不知道池现在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吗？”随后她又说，他们不忍心看着总理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才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的。我看了一下她那憔悴伤心的脸，无言地同她告别。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说：我觉得恩来同志在1956年11月二中全会上的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这两句话。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那种？我看应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周恩来在19日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23日作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之后，又在25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1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对周恩来发自内心和沉痛检讨依然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与会者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心里都很清楚，实际上就是继续要周恩来在下一轮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照毛泽东所主张的从“方法问题”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再一次检讨。

26日，在1956年支持过并在有的场合下参与过反冒进的刘少奇，在会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究竟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上，我“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路线的争论”。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水利和生产运动发展得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这是有可能的。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由于以上中共中央召开的多次中小型会议，毛泽东都顺利地开展了反反冒进的斗争，这就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和“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和理论等方面的准备，全国性的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局面已经形成。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周恩来、陈云再次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毛泽东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在开会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对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

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阐释性的论证，同时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到1958年中国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1956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工作报告》指出：“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这样，被认为应该对1956年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再次安排到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上进行检讨。

16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

于1956年发生的‘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多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就不

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因为我是财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稿，是他花了10

天多时间，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写成的，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和彷徨。

据周恩来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听候周恩来

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他对我说：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我讲一句，你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里，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17日这一天，周恩来在发言时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有关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然后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他说，“这次会议，

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周恩来再次承担了“错误”的责任。他唯恐与会者听不清楚，于是加大音量反省道：“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接着，周恩来着重检讨了反冒进“错误”的性质，深挖了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反省了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他沉痛地说道：“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在陈云、周恩来按照这次会议的意图作了深刻的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同时，开展反反冒进斗争的目标已经实现，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新的根本性任务是全力以赴领导全国的大跃进运动。

但是，毛泽东在会上还从另一角度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他极为严肃地说道：假如我们党在某个时候，“有些人不顾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样，像我们中国的高岗那样，那就要出现分裂。”因此，“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说得是相当重的。实际上就是说：谁要在经济建设出现急躁冒进的时候，再进行反冒进斗争，准就是不要党的团结的分裂主义者。这样，就使中共党内的民主气氛再次遭到严重损害。

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发生逆转。在毛泽东所发动的持久的愈来愈烈的反“反冒进”斗争面前，党内没有人能够再发表不同意见了。从此，反冒进成为禁区，从而使毛泽东极力倡导的有很大片面性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非常痛苦和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又鉴于自己在反冒进问题上犯了“方针性的”大错误，于是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此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纷纷表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总理职务。

6月22日，总书记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嘱咐起草了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讨论了周恩来的请求，但会议认为他“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随即，邓小平把会议记录报送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退

尚昆存。”

这样，周恩来继续留在国务院总理岗位上。但是从这以后，周恩来、陈云等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也正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立即掀起了一个打破常规、违反常识、追求高速度、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迅起，使本来就底子薄、基础差的年轻的共和国受到了一次客观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毛泽东发觉“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重大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开始认识：“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同时，他感慨道：“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在论及这段历史时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样，就为1955年底至195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论争中的是非曲直，作出了正确的历史结论，并从中引出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教训。

走出功德林大门之后

功德林，位于北京西郊德胜门外。

功德林，好奇怪的名字。一听到这个名字，人们眼前马上会浮现出那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寺庙。

不错，最初，这里的确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才被改建为一座监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座监狱直属国家安全部管辖，被称为北京战犯管理所。

从1959年以后，经历了脱胎换骨改造的战争罪犯们，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一批又一批走出这座监狱的大门，走向新的生活，走向人民的怀抱中……

经过上上下下充分酝酿，对战争罪犯实行宽大特赦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

对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中央人民政府一直没有进行正式审判，而是采取了慎而又慎的态度。

真正把处理这批人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已经是1956年了。

那一年，是中国大地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

当时，正在各地监狱接受政府改造的战争罪犯，做梦也不会想到，一项决定他们命运的重大决策正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内部悄然酝酿，并且很快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

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这项重大决策是伴随争取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而提出的。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提前完成，政治、经济出现空前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象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说，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反动分子，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共产党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月14日，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在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

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议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主张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表示：“如果我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说：“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允许言论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经过上上下下地充分酝酿与讨论，对战争罪犯实行特赦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

为加强战犯的管理和改造，二百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集中功德林

中共中央的方针确定后，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实行了全国战犯大集中。战犯中的二百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理人员向他们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接着，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五云山下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做说服开导工作。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1959年6月至10月，这批战犯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统一祖国的事业中贡

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9月14日，国庆十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9月17日，二届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决定在国庆10周年之际，对一批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这个消息犹如巨石击水，打破了沉闷的功德林。战犯中由宋希濂起草，邱行湘缮写的第三封感谢信寄向中南海。信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的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沦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的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

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两个月后，首批特赦战犯名单确定下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三十三名，其中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有十名。

那天，功德林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悦情景。礼堂上方悬挂着红绸做的大横幅，上面贴着白色的仿宋体字，透着热烈而又肃穆的气氛。

主席台正中，坐着严肃而英俊的法官，两边分坐着中央统战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的高级干部。台侧面还坐着战犯杨伯涛的儿子杨健华和郑庭笈的女儿郑心楠，他们是亲属代表。

法官开始公布特赦名单，台下死一般寂静，人们唯恐漏听了自己的名字。

“杜聿明——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

法官换了一口气，接着念道：

“杨伯涛——郑庭发——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以上人员，改造10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话音落后，沉寂片刻，会场骚动起来。

杨健华和郑心楠分别代表亲属们讲了话，向党和政府表示感谢，并希望自己的父亲回家以后继续改造，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第一批特赦的这10位将军，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十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

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周恩来这样安排有着特殊意义。因为，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亲信多数来自黄埔系，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也深有影响。依靠这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来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

功德林特赦大会的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出来，这个消息随着电波传向海外，传向全世界……

从功德林走向西花厅，走到周恩来身边，那是多么难忘的一天

走出功德林的大门，对这批人来说，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是每个人不能不考虑思索的问题。

然而，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的步子还没有迈出，方向还没有选定，就受到了周恩来的关注。

此时，周恩来关心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他深深地知道，走出功德林后，这批人所处的复杂环境，思想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他们能很快适应新的生活吗？他们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吗？一切一切都在周恩来的系念中。

正在这时，周恩来收到曾扩情以学生身份请求“赐教”的来信。周恩来考虑到自己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现在是新中国的总理，无论从旧情还是新谊来讲帮助他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立刻安排了会见。

12月13日，周恩来会见的前一天，曾扩情等11人接到通知，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位首长会见。因此，他们心中忐忑不安，甚至当天夜里久久都不能入睡。

第二天，载着客人的汽车悄悄地驶进中南海，在西花厅的门前停下。下了汽车，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迎过来，和蔼地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周恩来的家。

大家先是一楞，反映过来后感到惊喜万分。其中有人后来回忆：“当时，能够见到周总理感到很幸福。但是，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望着西花厅清洁、简朴的院落，大家慨叹不已，称赞着主人的廉洁。因为周恩来有事，他们被引进客厅等候。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进来一个人，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向大家介绍：“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先生。”溥仪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

不一会儿，周恩来笑容满面跨进客厅。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大家同时站了起来，在他们眼中，周恩来同他们过去印象中的一样，英气不减。

周恩来挥手请大家坐下。他亲切地环视一周，逐一问起每个人特赦后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

他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

曾忙回答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这时，周恩来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溥仪，这是他第一次同末代皇帝见面，所以问话的时间比较长。他同溥仪说起满族人的习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周恩来的目光又转向杜聿明，转向杨伯涛，转向宋希濂……

周恩来的问话那么具体，那么周到，使开始有些拘紧的气氛逐渐松弛下来。杨伯涛后来逢人就讲：“对我们这样慈祥，这样亲切，就如阵阵暖流，沁人心脾。”

在祥和的气氛中，周恩来话归正题。

他说：“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先谈一谈好。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话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

为使他们在新生活的道路上行为有所遵循，周恩来希望他们着重解决四个问题，这就是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

谈到立场问题时，周恩来强调：“立场是个政治问题，就是人民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他说：“你们在这个方面要经得起考验。”接着，他又激动地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一百二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他的目光转向溥仪说：“溥仪先生可证明，现在我们的国家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也没有搞好，今天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站起来了。生于斯、长于斯，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

大家深为周恩来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热情所感动。

谈到观点问题时，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他们做新人的愿望，但指出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不要把十年改造所得抛于一边。

接着又谈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安排和前途问题，嘱咐徐冰等同志一定要做出妥善安置。他对大家说：“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与统战部联系。”

最后，周恩来希望他们今后利用旧的社会关系多来帮助政府改造社会上的死角。他特别对着溥仪说：“溥仪先生可能起到我们起不到的作用。对社会上好的影响要接受，坏的影响要挡回去。”鼓励大家接受考验，努力改造，努力工作，不断进步。

周恩来讲完话后，章士钊对大家说：“你们各位过去都带过几十万大军打仗，好好干，将来是能发挥作用的。”

张治中在一旁补充道：“你们过去都是黄埔学生，你们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现在周主任释放了你们，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来笑了笑，接过去说：“张文伯（治中）是老一套，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挽救了你们。”

在一旁沉思良久的傅作义抬起头来有些激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个时候，也是被迫改造的。”周恩来补充说：“是啊，应该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强迫改造，你们应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过去了，周恩来抬手看看表说：“哟，这么长时间了。”他转身问工作人员是否准备了晚饭，听说没有准备后，他抱歉地对大家说：“只好以后再补了。”

那天的天气很冷，但是大家心里却感到无限温暖。周恩来的谆谆教诲像一阵春风、把党的关怀传送到每个人心中。在陈诚部队成长起来的杨伯涛感动地说：“这种对待俘虏的作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十几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二十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

没有周恩来，他们夫妻不会团圆， 周恩来就是他们的“红娘”

第一批获得特赦的郑庭笈，是广东文昌县人，黄埔五期生。解放战争期间，他曾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辽西战役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他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中渡过了十余个春秋，由于认真接受改造，得到了人民的宽大和谅解。

他被释放后和杜幸明、杨伯涛等一起走进了西花厅，不知是因为室内暖气太热，还是内心太激动，郑庭笈的脸上沁出一层细细地汗珠。

当周恩来走到他们面前时，张治中在一旁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

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郑庭笈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郑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稿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笈离婚。

郑庭笈如实地把家庭的状况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这件事郑庭笈以为周恩来随便问问就过去了。没想到当他再次遇见周恩来时，周还记挂着这件事。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周恩来、邓颖超、陈赓、张晓梅、董小鹏、罗青长和在京的国民党知名人士郑洞国、侯镜如等都参加了。获特赦后正在京郊公社参加劳动锻炼的黄埔生也参加了。

周恩来因事到得较晚，邓大姐向大家解释说：“你们要原谅他，他忙得不得了，我在家都没时间同他谈话。”

大家闲谈了一会儿，周恩来匆匆赶到。同第一次会见一样，他一边同每个人一一握手，一边询问他们出狱后生活是否习惯了，还有什么困难，今后有什么打算。

轮到郑庭笈时，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一句普通的话犹如一股暖流，通过郑庭笈的全身。

大家在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准备了两桌酒菜，周恩来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的毛主席都不吃荤了。文白先生本事大，为我们搞了这么多菜。”饭桌上空气活跃，周恩来不时为大家挟菜，共叙国共合作的历史。

郑庭笈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他看着周恩来亲切的面容，听着他朗朗

的笑声，百感交集。想到旧中国，国民党发动内战，使他成为人民的敌人，家庭如一面镜子破碎了。新中国，共产党胸怀博大，使他重新做人。国家总理还亲自过问他的私生活，并牢牢挂在心中。他想自己没有理由不努力进行改造，早一天结束劳动锻炼，解决好家庭问题，使周恩来放心。

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他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在周恩来关怀下，政协对他也很照顾，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

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军事上的失败没有使杜聿明真正降服， 而共产党的改造政策却使他彻底地折服了

在西花厅的来客中，内心最惭愧，表情最拘紧的要数杜聿明。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生，深受蒋介石器重。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没有使他觉悟。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也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送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他仍不服罪，动不动就发火。以至，1950年11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

然而，到达功德林后，共产党的干部却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各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服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他激动地对姚处长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

或许正是这些令人难忘的情景，使他走出功德林后，在周恩来、陈毅面前不得不低下头，面有愧色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的回答是：“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无论是杜聿明的忏悔，还是周恩来的自责，都是真诚的。

在西花厅会见之前，周恩来和杜聿明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之间却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合作”。

那是1957年，杜聿明的女婿、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消息公布后，几乎在同一时刻，周恩来派人到功德林与杜聿明联系，而蒋介石则在台北召见了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取杨振宁。

不久，在大洋彼岸，美国普林斯敦研究院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收到父亲杜聿明的来信，看着这熟悉的字迹，她当着丈夫和孩子的面大哭起来。当晚，杜致礼给在台北的母亲写了封信，起句是：“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这句话曹秀清心领神会。但是，她必须按台湾方面的委托赶往美国。

在曹秀清启程前，周恩来也派出了他的使者。这位使者就是杨振宁当年的老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行前，张文裕受周恩来嘱托走进功德林，请杜聿明以岳父的身份给杨振宁写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面交。

杜聿明欣然从命。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这封信的地址落款不是功德林，而是他过去在北京的家庭地址：“弓弦胡同二号”。

杜聿明很快收到杨振宁的复信，最后一句话是：“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

后来，杨振宁到日内瓦讲学，他的父亲、复旦大学教授杨武之奉命前往日内瓦探望儿子。行前，他也走进功德林，按照周恩来的嘱托，请杜聿明给杨振宁写信，杜聿明在信中再次强调了“民族”的意义。

周恩来与杜聿明的真诚“合作”最终的结果是，杨振宁于1971年回到中国大陆看望。

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

1964年11月，中央统战部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政协委员。这是杜聿明政治生命的新起点。如果说，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失败并未使他真正降服的话，那么，在新中国的怀抱中，在周恩来的面前，他确实彻底地折服了。

像康泽这样的人获特赦在中共党内也不是容易说通的，但最终还是说通了

在周恩来的关注下，一批又一批战犯，切实改恶从善，走出功德林大门，走向人民之中。甚至像康泽这样反动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也不例外地选择了这条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与国民党谈判时与康泽交过手，在两党协商过程中，康泽处处设置障碍，起了很坏的作用。像这样一个两手沾满人民的鲜血、罪行累累的特务头子要被特赦，许多人是想不通的。1956年，毛泽东谈到康泽问题时指出，像他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后来，周恩来见到康泽时告诉他：“像你这样的人获特赦，我们党内也不是容易说通的。但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方针，有毛主席和党的威信，只有人民中国才能这样做。”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特赦第四批战犯，其中包括康泽。康泽走出功德林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

这年11月10日，周恩来会见康泽，以及在京特赦战犯和家属。同每次会见的情况一样，周恩来在谈话中重点强调立场问题。他说：“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这也是客观历史的发展。共产党掌握国家政

权，就可以因势利导，可以求同存异。人是可以改造的，敌对是可以改变的。”

“一个人的改造必须先把自己的过去否定，‘矫枉必须过正’，对过去的错误有认识，肯悔改，先过正一点，才能适得其中。”“有句老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不断革命。你们已经五十岁以上的人了，但是不要以为年老了，不要衰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虽然是句老话，今天新的解释是要天天反省，不断检查自己，总是有好处的。”

谈话中，周恩来还详细介绍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再次表达了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周恩来还说：“台湾现在面临美帝要把它变成独立国，我们和蒋介石都不同意，这是共同的观点。”“美国逼到最后，希望他们能和平归来，只要他们取消中华民国的招牌，台湾还是可以交给他们管。这个决心什么时候下，阶级性限制他，但形势也逼着他。”这段话对特赦人员有特别强的感染力，促使他们愿意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最后，周恩来总结说：“世界总是要改变的，我们不要妨碍青年人前进，中心是共同前进，不断学习改造，精神焕发。谈一次大家要有所得有所帮助，不要怀念过去。有句老话：‘好汉不谈当年勇’，过去的已经过去，人要不断前进，才跟得上时代。”

人民政府的宽大和信赖，对每一位特赦人员都是巨大的鼓舞。他们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对战犯的宽大政策，也使台湾方面出乎意料，许多人一直认为，共产党对这批人不是杀头也要长期关押。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做出相应的表示。

如今，功德林已经面目全非，那走进功德林，又走出功德林的幸存者，还在为周恩来最后的心愿——祖国统一而奔走，而忙碌……

为祖国统一开路播种

美丽而富饶的台湾岛，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海峡两岸人民至今还隔海相望，盼望着统一。统一，是历史的主流，从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领导开始就在为和平统一祖国而探索，尽管道路千辛万苦，复杂而艰巨，他们一直作着不懈的努力，周恩来曾经说：“我们这一代是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1949年，在新中国解放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当时，由于人民解放军海上作战经验不足，第一次武装登陆金门岛的战斗遭到严重挫折，解放台湾的问题拖了下来。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与此同时，美国军事力量进驻中国领土台湾。这使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了。由于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中央不可能以更多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后，台湾问题才被中共中央郑重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美国加紧对台湾的控制。它一方面策划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面积极拼凑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极大威胁。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中央认为，如果美蒋阴谋得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更难寻求缓和与转弯的余地。”因此，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从政治上揭露美国的意图。

这时，沉浸在日内瓦会议胜利喜悦中的周恩来尚在国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周恩来的信，信中写道：“在朝鲜停战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中央请周恩来考虑回国后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一个声明。

8月1日，周恩来到北京。

第二天，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声明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次会议上的报告重申了这一立场。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然而，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警告，于12月2日同台湾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面对美国政府的猖狂挑衅，中国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两方面斗争。

12月8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战争。”这是外交上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军

事上做解放台湾的准备。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主张和缓紧张局势的呼声甚高。中共中央决定加紧开展外交活动，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当时，面临的外交局势十分复杂，虽然许多国家都主张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不同的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在同各国朋友的接触中提出：谈和缓远东局势，首先要研究紧张局势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是非问题。美国同蒋介石策划共同防御条约目的是要霸占台湾和沿海岛屿，第二步就要发动新的战争。因此，台湾问题的中心是要美国放弃侵略。对苏联、印度、缅甸等国提出召开国际性会议的主张，周恩来表示需要确定两项原则：

- 一、蒋介石集团不能参加；
- 二、联全国无权过问。

周恩来还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坐下来谈，我们也是不会拒绝的。这些都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在同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中，周恩来批评了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周恩来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打破了美同的舆论封锁，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也增进了中立国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

1955年2月，印度提出在召开国际性会议之前进行一些外交试探，可由苏联、英国、印度来进行，目的是在中美之间寻找一些初步的共同点。周恩来接受印度的建议，同意在会前进行不公开的外交接触。

这年4月，世界瞩目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在美丽的印度尼西亚的小城万隆举行，会议期间，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锡兰七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纷纷找周恩来，了解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4月23日，周恩来同七国代表团团长进行会谈，全面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根据与会国的要求和在国内已经确定的“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的精神，周恩来临时决定发表了一个声明。

声明提出：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的这份影响世界的声明，把中国推上政治上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

万隆会议后，苏联、英国、印度等国加紧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

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周恩来回国后加紧了外交活动。从5月13日至20日短短的几天中，他仅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就进行了六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告诉梅农：“谈判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从而使中国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湾。谈判的原则是必须严格区别两种性质的谈判：中美之间进行的是国际性谈判，为的是要美国放弃干涉。中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台湾问题可以用武力解决，也可以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周恩来的谈话对澄清一些人的错误认识很有帮助。

这时，国际和平舆论也影响到美国国内舆论的变化，许多有识之士呼吁美国政府对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采取一个现实的作法。7月，英国驻华代

办杜维廉向中国政府转交了美国关于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晤的建议。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中美之间终于踏上漫长而艰巨的谈判道路。虽然，在较长的时间内，中美谈判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几经波折，但是，中美两国政府毕竟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为扫除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
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
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
采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

中美会谈开始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逐步开展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的工作。

实际上，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这项工作就在周恩来的筹划下有步骤地开始了。当时，工作的中心放在政治宣传上。

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统战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凡愿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他说：“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济上要加强建设，从而加强解放台湾的物质力量。”8月15日，他在宴请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强调了这一精神：“跑到台湾去的人是愿意回来的”，他们“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9月25日，中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方针明确提出：任何人都允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来与家属团聚。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访问缅甸。在与吴努总理会谈中，吴努表示想调解中共与蒋介石的关系。吴努的兴趣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和平解放台湾，特别是怎样对待蒋介石；二是和平解放台湾后，中国是否愿意同美国签订友好条约并接受美援。

周恩来回答说：“台湾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陆）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这是国内问题；另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国际问题，二者不应混淆起来。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间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容许外来干涉。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他。但蒋介石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

后来，周恩来在外交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继续强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解决的方法，作为中央政府不仅不拒绝而毋宁是提议同蒋介石集团进行谈判，7月30

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明确了这一方针。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

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

对台湾的政策相应地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愿意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这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的方针和政策。他强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后，对台政策的突出变化是不仅将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团结之列，而且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解决。中共八大肯定了这一方针。

为将中同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和谈的愿望传递到台湾，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他捎话给海峡对岸的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到了6月，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又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了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对台政策。周恩来最后表示：“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的。”这是他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至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中共对台湾的和平呼吁得到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许多人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推进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一些朋友时对国共和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办法。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有关人士、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当场，周恩来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

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

中共中央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为达到继续占有台湾的目的，美国政府加紧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反对。国共两党在台湾问题上一致坚持的民族大义，成为周恩来对蒋介石集团的上层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政治基础。

**周恩来争取过来的第一位国民党
高级将领，曾经是有名的“剿共”司令，
也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

1955年，因躲避蒋介石的迫害而出走香港的卫立煌收到一封奇特的信，这封信是他妻姐的女儿韩德庄写来的。信中说：“姨夫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请姨夫姨母回来”。

“太原的朋友？”

卫立煌愣了一下，旋即，脸上浮现出难以掩饰的激动。

这位“太原的朋友”就是周恩来。

1937年秋，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从平津向山西大地燃去。

经历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在山西战场开始了最初的，也是最好的一段军事合作。

这个时候，周恩来和卫立煌抱着同一个目的——抗战，到了山西前线。

周恩来的任务是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协商合作抗日事宜，卫立煌的任务是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带领部队开赴前线迎击日军。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太原，阎锡山官邸。

这时，正处在著名的忻口战役前夕。

能在这特殊的地点特殊的环境下见到自己在北伐时期就十分仰慕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卫立煌感到非常高兴。

双方谈话的主题很快就归于前线的战事。

周恩来听说卫立煌决定去忻口迎敌，很钦佩。他告诉卫立煌，近两个月在庐山、南京两地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弱点。他说：“目前全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各界朋友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这是最严重的情形，直接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

卫立煌提出希望中共调八路军第129师到忻口参加阵地战，共同保卫太原。

周恩来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但在敌后游击战中将起决定作用。现日军向太原方面进攻，我们不能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应该给第129师独立自主的活动机会，使它能迂回日军后方，寻找有利条件打击敌人。

卫立煌一时没有完全理解和接受周恩来所讲的道理。

1937年10月5日，忻口战役迫在眉睫。

周恩来同阎锡山、卫立煌等共同商讨忻口战役作战计划。周恩来提出应

以忻口周围山地为固守阵地，诱敌深入，求得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处于左右两翼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同时向宁武南北、代县以东侧击敌人，协同友军作战，力争在忻口以北取得胜利。

忻口战役打响后，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八路军第115师协同友军袭击平型关、大营镇，相机略取浑源、应县；令第120师主力位于岱县（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358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129师以一部进至正大路之寿阳等地，积极有制与打击西进之敌。八路军的有力援助深深感动了卫立煌。

11月初，忻口最终失守。

卫立煌败退太原。作为一名军人，战场上的失败，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沮丧和懊恼交织心头。周恩来十分体谅卫立煌此时的心境，他安慰卫立煌说：“胜败不在一城一池之得失，只要我们继续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民主改革，最后定能改变不利形势，在战场上取得主动。”

经历失败后的卫立煌这时才真正感受到忻口战役前，周恩来提出的种种意见是正确的。

太原时期的短暂交往，使周恩来和卫立煌结下深厚的友情。难怪这位“太原朋友”的来信会激起卫立煌珍藏心中的感情。

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卫立煌曾经为蒋家王朝屡建战功。由于他不是蒋的嫡系和亲信，所以，尽管他战功赫赫，仍然受到蒋的排挤和猜疑。这使卫立煌深感苦恼和愤懑。

解放战争末期，卫立煌终于下定决心脱离蒋的阵营，出走香港。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曾通过“民革”的关系争取卫立煌回国，卫立煌曾郑重回答：“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新中国诞生的第三天，卫立煌起草了一份致毛泽东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

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江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

1月24日，周恩来发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引起卫立煌的共鸣。他向友人表示：解放台湾、统一中国大业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态度和愿望。卫立煌的政治态度受到周恩来的重视。他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欢迎他回来的时候，将会对海外国民党人士起一个榜样作用。因此，他请韩德庄发出那封令卫立煌激动不已的信。这封祖国来信，坚定了卫立煌投向新中国怀抱的决心。3月15日，卫立煌从香港抵达广州。在这里，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庄严的一个文件《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台湾袍泽们、朋友们：

祖国近五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由无而有，自少而多，如

“江”按韵目为三，此电是十月三日发的。

钢、铁、煤、油等重工业之大量开发与建设，治淮、荆江分洪以及各地水利之兴修，康藏、青藏两公路及成渝铁路之筑成，宝成、陇海铁路之增筑，包兰、成昆铁路之测建，中蒙国境铁道之完成，以及自造飞机、火车头、轮船等等。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论过去如何，凡对国家有所贡献者，均能奖励扶植，一视同仁（如程颂云、翁文灏、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郑洞国等等）。以视蒋介石时期，在外交上俯仰随人，厚颜谄媚；在政治上视国为家，排除异己；经济方面则将国家经济命脉置于四大家族之手；人事上嫉贤忌能，非亲莫用。真乃泾渭分明，善恶立判。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台湾是中国领土，乃是历史上和外交上文献所具载，任何人不能歪曲事实，加以否认。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乃其别具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无论他如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台湾之于中国，正如夏威夷之于美国，如有其他国家舰队霸占夏威夷领海，他们美国人民又将作何感想？何况解放台湾，是讨伐中国的罪人蒋介石，纯是内政问题，是世界上主持正义者所同情的。今蒋介石乃与美国订立美蒋防御公约，图借外力负隅抗拒，真是出卖主权，引狼入室，这种行为不但为六亿同胞唾弃，更为具有天良，心存爱国者所切齿！各位已看到了韩战时祖国坚强军力迫使美国停战之事实，台湾最后必定解放，无论按哪一方面说，都是必然之理，既成之势。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遥念在台数十年共患难的袍泽们、朋友们还在蒋介石魔掌之下，不忍坐视诸位随蒋沉沦毁灭。故特掏诚坦告，深望诸位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有负于请位。肺腑之言，敬希谅解！责任艰巨，诸维珍重！

卫立煌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

看到卫立煌的返国宣言，毛泽东十分高兴，一封洋溢着欢迎之情的电报从北京发往广州：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用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宴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他特意邀请卫立煌作陪。伏罗希洛夫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是无敌的。”周恩来说：“对。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句话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卫立煌回国的全部含义。

卫立煌的行动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和鼓励，他先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只是由于无情的疾病突然袭来，使卫立煌没有能够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在他住院治疗期间，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多次前去探望。到了卫立煌病势沉重，说不出话来时候，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同

疾病作斗争，使他感动的流下热泪。

1960年1月17日，寒风伴着哀乐而起，卫立煌逝世，终年64岁。周恩来亲往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为他主持公祭。

张治中在悼词中说：“卫立煌不愧为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这是人民对他的最高评价。

一位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士说：“从卫立煌的转变，再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伟大、正确，它吸引了千千万万群众进人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连原先蒋介石的重要台柱、得力的左右臂、反共最有名和红军打仗打得最厉害的骤悍先锋也成了共产党的好朋友，未后也自己跑到人民这一边来了。”

以民族利益为重，继续发展 海峡两岸关系，把中国共产党和 大陆人民的诚意传递到台湾

1960年初，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变化，它一方面继续从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力图借此打开缺口，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设法增加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寻找新的折衷方案。美国的作法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这种局面十分有利于中共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商讨。中共中央坚持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中央认为，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为把中共的诚意传递到台湾，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工作。他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台湾当权派深有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多次致信蒋氏父子和台湾第二号人物陈诚，转达中共对台的方针和政策，每一封信写好后，周恩来都要认真阅读。在60年代初，张治中等的信中向台湾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更为宽松的四点意见：

- 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
- 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 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但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
- 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这些信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阔胸怀。

抓住机会做国民党元老的工作是争取台湾人士的一条重要渠道。

1961年3月中旬，曾参加和谈的国民党方面代表章士钊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最近给香港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胡子”就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周恩来建立了比较深的关系。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恩来接到信后，立即通知于右任的女婿中共党员屈武，要他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周恩来自己也准备了一些礼物。当时，于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陕西的风俗可以补寿。周恩来听说后马上指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给于夫人补寿，还让人转达他的话：“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

屈武后来回忆说：事后，我决定写封信，把这件事辗转告诉于先生。在准备写这封信的时候，思想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必须使他知道周总理对他和他留在大陆上家庭的关怀。这就必须在信里写上周总理的名字。那么这封信到台湾，如果被特务们发现，对于先生将产生什么后果呢？反复思考，无以为计，于是我就到邵力子先生家里向邵老请教。邵先生和于先生有几十年的深厚友情。这是许多人所知道的；周总理对于先生的关怀，也是邵老先生所了解的。我把问题向邵先生提出后，邵先生非常机智地想出了办法，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廉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他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京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廉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廉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得是周总理，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我就照邵的说法把信写好，连同祝寿时的照片等物清点后转交于先生。后来吴先生给我来信说，于先生收到我的信、照片等，高兴到了极点，真是喜出望外。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他非常的感动。他要吴先生告诉我向周总理表达他诚挚的谢忱。他对总理的称呼也用廉溪先生。足见邵力于先生的设计和判断是很高明的。就在我接到这封信的第二天的一次晚会上，我把吴先生来信的内容报告了总理。总理听了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于右任逝世前写一首诗：“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反映了他盼望祖国统一的浓烈情感。屈武说：“这固然与于先生一贯的为人和思想有关，也是周总理长期工作的结果。”

周恩来还嘱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这一系列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有关人士透露，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和陈诚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他们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章士钊曾经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

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做交代。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做了更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用张治中等的角度来说，“一纲”就是“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后，于9月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只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作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这表明，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不负周恩来的一片苦心。台湾的国民党有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道：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艺术家的知音

丰富胡同，普通的院落最 受欢迎的客人之一是周恩来

北京东城灯市口西街内，有条普普通通的胡同。灰墙上一块醒目的红牌上写着四个白色的字——丰富胡同。

在丰富胡同南口，有一座小小的四合院。

从外表看，这座小院落再平凡不过了。灰色的院墙因年久失修已是色彩斑驳，两扇脱了黑漆的小门坐西朝东总是紧紧地关闭着。

然而，就是这座平凡的小院里却住着一位不平凡的人，他就是被称为“人民艺术家”的著名作家老舍。

老舍一家人在这座普通的院落里接待过许许多多不平凡的客人。

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是周恩来。

每次周恩来到这里做客，都感到十分亲切。

小小的院落整洁而干净，院里空地上种了许多花，老舍酷爱菊花，每到夏秋之季，满院总是芳香四溢。屋里的布置简朴而温馨，充满艺术人家的情调。周恩来常坐的一个旧沙发至今还保存着，每逢有人到这里寻找老舍的足迹，家里人都会告诉来者，这是周恩来常坐的地方，话语中流露出亲情，仿佛周恩来就是他们家中的一员。

有一天，周恩来来到老舍家做客。可能是好久没有见面了，他们关起门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急得女主人胡絮青在西屋不知做些什么好。谈话结束时，天已经很晚了。老舍来到西屋，对胡絮青说：“总理要在家里吃晚饭，你准备一下。”这下可难为了女主人，总理要留在家吃饭，可家里什么都没有准备，怎么办呢？胡絮青赶快到厨房里，东翻西找，找出了一块咸鱼。她把咸鱼蒸熟后，又摊了一盘鸡蛋，端到北屋，周恩来一看饭桌上的两样菜就笑了，对胡絮青说：“你呀，和我们家小超一样，是个知识分子，不会做饭。”

说罢，周恩来坐下，津津有味地吃下这顿饭，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后来，胡絮青回忆起与周恩来接触过的这些“小事”时，充满感情地说：“我的生活环境教我只能看到这些小事。使我自豪的是，正是这些小事让我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形象，看到了一个卓越的革命者、政治家和领导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不，或者正好应该反着说，恰恰是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发现他惊人的魅力来自何处，体会到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活在世上，才称得上是达到了顶有‘人味儿’的最高境界”。

友情由来已久，最初是在 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

周恩来与老舍的友情由来已久。

他们第一次相见，是在1938年的武汉，那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武汉已经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千千万万爱国的同胞，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这里，已经是著名作家的老舍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日军逼近济南时，忍痛离别弱妻幼子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来的。这时候，周恩来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正在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共同抗日成为他们友谊的起点。

为了使云集武汉的文化界人士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周恩来指示阳翰笙等，筹备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筹备组织过程中，他们积极推荐深受文化界人士爱戴的老舍出面主持这项工作。

虽然，在抗战前，我们党同老舍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已经了解到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的作家。抗战爆发后，老舍的爱国立场更加鲜明，战争给他带来的痛苦已化为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他曾毅然宣称，“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个抗战派。”

这样的人党信得过他，国民党反动派也无法给他带上什么红帽子，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抗日。显然，老舍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最合适的领导人选。我们党可以通过他实现对“文协”的领导。周恩来非常支持这个意见，并积极为此而奔走。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特意拜访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因为初来武汉的老舍正在他那里帮助工作，会见中，周恩来同冯玉祥商谈了筹建“文协”的事情，并提出想请老舍出面主持这项工作。冯玉祥爽快地表示全力给予支持。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文协”于3月27日正式成立。老舍当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因“文协”不设主席和会长，所以总务部主任实际负总责），周恩来当选为“文协”的名誉理事。

从此，周恩来与老舍的交往逐渐多起来。

在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肩负重任，工作繁忙，但是，他还是常常抽时间到“文协”同大家见面谈心，给“文协”的工作以指导和帮助。

1938年5月，“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周恩来应邀参加。在老舍作的会务报告中有一段精彩的记载：“……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筹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周恩来的情绪感染了到会的每一个人。难怪老舍等人常常说，周恩来每次到来都会“使人感到温暖，也从中汲取奋斗的力量”。胡絮青后来回忆说：“这时期虽然老舍还在迷雾中徘徊，但他凭着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深深地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自豪。”

整个抗战期间，通过与周恩来的接触，老舍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认识，“成为共产党的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老舍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他把一批不同政见，不同性格，不同爱好的文化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使大家既没有因为生活的困苦而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也没有改变以文艺宣传而尽力于团结抗战的初心。老舍本人在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以编写抗战曲艺、戏剧、小说等多种文艺形式鼓舞人民的斗争。他的作品均以抗日、团结、进步为主题，处处洋溢着感人至深的爱国热情，对广大人民有着深刻的教育与启发。

茅盾在庆贺老舍四十五岁生日时写道：“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

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认识，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认。”老舍的回答是：“我还要像木匠和洋车夫那样做下去，走下去，尽力地做，尽力地走。”

在新中国总理的关怀下老舍 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发挥

1949年7月6日，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召开。全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又重新聚到一起。这是一次隆重的大会师。周恩来在会上深情地说：现在就差老舍先生一个人了，无论如何要请他回国。

这时，老舍先生在哪里呢，他听到朋友们的亲切呼唤了吗？

原来，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与著名戏剧家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了。一年之后留学期满，但是这时，中国内战爆发，老舍被迫滞留大洋彼岸。在这段时间内，他积极向世界介绍和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通过文学使世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虽然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去做，但是，老舍依然感到极度的痛苦。他孤单、寂寞、苦闷；他想念妻子，想念儿子，想念朋友，想念祖国。这种情绪整整困扰了他三年。

在这三年中，周恩来日日夜夜在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奔走，为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而运筹帷幄。不过，他心中一直没有忘记老舍这位为抗战出过大力的人。当战争结束，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向老舍发出了第一声呼唤。

1949年10月，在纽约的老舍收到一封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位老朋友联名签署的邀请他回国的信。这封信是周恩来授意并委托司徒慧敏带给他的。那天，恰巧老舍不在家，司徒慧敏悄悄地将信塞进了他家的门缝。

当时，老舍由于坐骨神经痛，刚动完一次大手术，抽了脊髓，非常痛苦。但是，他不顾疾病未愈，甚至会使病情恶化的后果，偷偷托人买票，并立即赶往旧金山乘船经香港回到祖国。

老舍归国的心是急迫的，老舍想见到周恩来的心也是急迫的。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老舍不顾疾病缠身，旅途劳顿，在阳翰笙陪同下见到了周恩来，老朋友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两人畅谈许久。

周恩来的召唤使老舍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此，在新中国的怀抱中，老舍开始了新的起步。虽然他一直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的心始终是和党连在一起的。

解放以后，老舍一直埋头写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发挥，在老舍的创作过程中，始终受到周恩来的关怀，他鼓励老舍多写自己熟悉的事物，从创作计划到创作内容都给予具体的指导。每当老舍的一部新剧上演不久，常常可以听到他对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说：“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这之后，又会有一部新的戏剧出台。可以说，老舍的每一部新剧的诞生都渗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龙须沟》是使老舍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的优秀剧本。这部戏写成后，“人艺”开始有顾虑，因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怕排演这部戏脱离形势的需要，另外，从话剧舞台看，由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刚刚上演苏联

名剧《保尔·柯察金》，引起观众很大的兴趣，一时演外国戏成了一种时髦。这件事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帮助剧院正确分析了这个问题。周恩来认为，《龙须沟》是一部成功的剧本，它真实地反映了新旧社会人与物的变化，可以帮助广大群众认识新中国，了解新中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龙须沟》演出后，正如周恩来所分析的，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风靡话剧舞台，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部戏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这部戏，周恩来还推荐给毛泽东看，成为不喜欢看话剧的毛泽东进城后看的第一部话剧。

周恩来无论多么忙，都要亲自观看老舍的新剧，从剧本到演出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茶馆》也是周恩来喜欢的一出戏，排演时，不同意见也很多，其中主要的批评意见是：“缺少正面形象”，“灰色”、“怀旧”等等，又是周恩来站出来为老舍说话，高度赞扬《茶馆》是一出非常好的话剧。当然，他也毫无隐晦地谈出自己的意见。周恩来曾说：如果让我写《茶馆》，我不会象老舍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周恩来认为，老舍选择的不够典型，典型的应该是“五四”、大革命、抗日和解放战争。谈完意见后，他连忙声明：“我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讲不清楚”。他对老舍始终抱着这样一种负责的态度。

对老舍写作中的困难，周恩来总是及时给以帮助，比如《春华秋实》这部剧中的主人公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是老舍不熟悉的人物，因此在写作中感觉难度很大，周恩来就帮助他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进行分析，找出问题，常常讨论至深夜。

对老舍提出的意见，周恩来总是认真听取，并尽力去解决。在一次人代会上，老舍的发言中谈到，平时会议大多，成了灾，挤了他的写作时间，请求免去他的各项社会兼职，以便多写几个剧本。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些意见，并且非常理解老舍的心情，后来在政协的一次会上，周恩来特别讲到这件事。他说：“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

周恩来是多么善解人意啊！正是周恩来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使老舍深受感动，并化为自己前进的动力，从全国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老舍在创作上硕果累累，共发表剧本 24 部，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胡絮青在纪念周恩来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历史上流传过许多大政治家和作家、艺术家文朋友的动人故事，而这种亲密关系对当时文艺的繁荣又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文化特别发达的时期和地方，这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我觉得，周总理无疑是这光荣传统的最优秀的继承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热爱文艺事业，自己有很深的文艺修养，多才多艺，他非常关注文艺事业，把很多时间花在文艺事业上。他连报自己的岁数都爱这么说：‘我和老舍、郑振铎、王统照同庚’。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有工作关系，还有在工作关系之外的亲密的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文艺界一致认为：这种关系的建立对文艺事业的发展好处极大，有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老舍卷入太平湖中；晚年重病的周恩来来到北海湖畔表达不尽的哀思

老舍的创作劳动及其卓越成就，赢得了人民的尊重和爱戴。他从一名进步的爱国作家，成长为人民的艺术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民艺术家，却在一夜之间被“文化大革命”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卷入太平湖中。

这一天，是1966年8月24日。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身患重病，住进医院。这座医院的东墙外是北海公园，周恩来经常到那里散步。

那一天，也是8月24日。

周恩来穿过医院东墙的小门，径直来到北海湖边。望着眼前这一泓清水，他默默地沉思良久。只知道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

然而，只是这短短的一句话，已令人深深感受到他对亡者的哀悼与思念。此时此刻，他究竟想到了什么？沉思中他是为新中国失去了这么一位人民艺术家而痛惜，还是为自己没有尽到保护责任而深感内疚？外人的确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正如老舍的儿子舒乙所说的：“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的思想又飞回到他的老朋友老舍身旁了。”

老舍投湖的前一天，1966年8月23日，在成贤街的孔庙前，在市文联的大院内，演出了一场践踏人类文明的丑剧。老舍遭到那些无知的、近乎疯狂的红卫兵的毒打与凌辱。当派出所通知胡絜青赶到现场时，老舍满身满脸已是伤痕累累，鲜血淋漓。两位老人相依相靠地回到家中。

那天晚上，老舍和胡絜青谈了很多很多。胡絜青印象最深的是，老舍反复地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理解我的。”那时，胡絜青没想到，老舍已经抱定了要以死相抗争的决心。否则，她一定会牢牢地守住他，寸步不离；她一定会去求救于总理，请他出面阻止这不可能阻止的悲剧发生。

第二天一早，老舍象平时一样起床了。他或许因为下定了死的决心，所以显得那样平静，平静地送走了家人，平静地向心爱的小孙女告别。

他对小孙女说：“和爷爷说声再见。”这是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孩子用稚嫩的声音说了一声：“爷爷再见！”老舍弯下身来，亲亲孩子，孩子也亲了亲爷爷。这是老舍最后一次享受人间的亲情。

可惜，那时孩子太小，不理解爷爷这样做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她以为爷爷还会回来，她等待着爷爷回来。

老舍失踪后，家里乱作一团。胡絜青立即让儿子舒乙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让他穿着老舍头一天留下的血衣，带着这封信到中南海去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得到老舍失踪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立即派人设法寻找，但是太晚了，老舍已带着满腹的疑问，带着不堪受辱的决心，投入位于北郊的太平湖中。

老舍为什么选择偏僻的太平湖做为最后的归宿呢？他的儿子舒乙后来找到了答案。舒乙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太平湖悲剧发生十二年后，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市的西直门

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道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她老人家是一九四二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老舍的死使周恩来非常震惊，也使他格外关怀老舍家庭的命运，1966年国庆节，周恩来在天安门碰见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请他代表去看看胡絮青。随后，又同王昆仑深谈了一次，向他了解老舍死前的详细情况。

王昆仑是6月23日孔庙那场“战斗”的目击者，他亲眼看到老舍异样的神态，看到老舍头破血流，伤痕累累的情况。对文联大院内发生的情况，王昆仑把自己听到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周恩来，说老舍和红卫兵直接发生冲突，几乎被活活打死。等到把他抢救出来时，他已经气息奄奄了。

听了王昆仑的叙说，周恩来眼中闪出的是悲痛和愤怒。

后来，王昆仑把他与总理交谈的信息告诉胡絮青，这位老人简直认为自己是做梦。她说：“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没有任何人来过我的家。我当时很孤独。孩子们纷纷被揪斗，回不了家。我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的老婆，没有人敢理我。”而正是在这沉重的日子里，她却受到了周恩来的关怀。当天夜里，胡絮青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感谢，也向他报告：“我还活着”。

在以后的几年中，周恩来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他没有能够为老舍平反昭雪。在这场民族的大悲剧结束之前，周恩来也告别了人世。或许他正是预感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不顾重病缠身，选择了这个日子，选择了静静的湖畔，来向老舍的亡灵表达包含着歉意的哀思。

历史经验曾告诉人们，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只是时间的问题。

1976年的10月是金色的十月，是灿烂的十月。“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人们开始重新来审视“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1978年6月3日，北京文艺界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那天，八宝山灵堂的气氛显得格外肃穆。

胡絮青和子孙们刚刚在大厅休息落座，就听到邓颖超来了的消息。

思念的泪水，感激的泪水，混合在一起涌出每个人的眼眶。邓颖超双手紧紧握住胡絮青，她要告诉胡絮青自己心里憋了很长时间的话。

邓颖超说：“我是代表恩来来的，如果他活着，今天，他是一定要来的，而且也会提前到场。恩来生前多次和我提到老舍先生，所以，今天我早早地就来了。我想让你知道，这是恩来的心意。”

“这是周恩来的心意！”默念着这句话，胡絮青的泪水再一次涌出来。

情洒各族人民

中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温馨大家庭。周恩来是这个大家庭的总管家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到内蒙、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视察，带去了党和国家的关怀与温暖。有些地区他十分想去，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够成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但是，他的心和每一个民族都是紧紧相联的。为了整个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友爱、繁荣昌盛，周恩来付出了许许多多……

“成立壮族自治区是一件大事，
还是由广西各族人民来决定”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经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内整整一个星期，为的是起草一份使各族人民都能够接受和满意的《共同纲领》。

在这份共同纲领中，周恩来郑重地写上了“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这项政策一公布，就得到全国各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新中国成立不久，内蒙、新疆等地陆续建立起民族自治区。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匈牙利共产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毛泽东和周恩来：“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首先是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这个教训，给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启示。

当时，摆在周恩来面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问题。由于帝国主义正利用西藏问题在中国大搞分裂活动，因此解决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可以树立一个民族团结的榜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57年3月，北京地区寒气未尽。

但是，由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使人们感到政治气候却是春意融融，冰消雪化。

在这种民主、祥和的政治气氛下，政协全国委员会于3月17日至26日，邀请来京协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广西省代表团全体成员、广西籍政协委员和有关的政协委员，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春等地工作的广西籍人士，就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

对这个问题，中共广西省委在1956年10月曾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在党内外进行酝酿和讨论。12月，政协广西省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又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壮族自治区，这个被称为“合的方案”；另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划为两部分，即保留广西省的建制，管辖当时广西省的东部，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三。另外把西部壮族聚居地区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七的地方划出来建立壮族自治区。大家把这个方案称为“分的方案”。

是采取“合的方案”，还是采取“分的方案”呢？代表们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北京参加讨论的。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发言提出了关于建立壮族自治区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围绕这些看法和意见，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气氛十分融洽。

广西省副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委员陈再励，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梁漱溟，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致公党广西省支部书记委员雷沛，广西省副省长、民革广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此生，广西省副省长、民盟广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石兆棠，国防委员会委员、前中共广西省委员会第一书记张云逸，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等都纷纷发表意见，赞成“合的方案”。他们主要是认为“广西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是低一些，但广西丰富的矿藏，公路、水运交通也是一个整体，如果分开来，东西两部的发展都要受到限制”。再有，“合的方案对民族团结、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建立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是各民族的共同目标，合的方案符合这个目标。”作为人数较多的汉族应该帮助人数较少的兄弟民族求得共同发展。广西代表团中的壮族代表甘怀义、侗族代表秦振武、瑶族代表凤裕山、壮族代表韦瑞霖等在发言中也特别强调，广西各民族间团结互助的不可分的兄弟关系，表示作为弟弟的少数民族，欢迎汉族老大哥参加到壮族自治区里边来。但是，还有部分人思想不通，他们发言指出：广西建省已有二百多年，汉族在广西是多数，如果把广西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恐怕汉人在感情上、习惯上难以接受，因而不同意采取“合的方案”。也有少数人同意“合的方案”，但是不同意采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而主张采用“广西各族自治区”、“广西自治区”等名称。

能听到这么多的意见和建议，周恩来十分高兴。3月25日，是会议结束的日子。他在会上做了总结性发言。

周恩来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了一下会场，说，“这次座谈会开得好，收获很大，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到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少数人的意见有些出入，这是难免的，因为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意见总会有出入的。可是在基本问题上，即在壮族必须建立省一级的自治区的问题上，在合的方案比分的方案为好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很大的成功，大的方面意见一致了，是不是可以认为建立壮族自治区的工作从此就完全顺利了呢？不是的，这个工作才开始，我们还要经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酝酿，把广大人民群众讨论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国家权力机关审核批准，才能付诸实施。只有把工作做得成熟了，才会收到好的效果。”

接着，周恩来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谈到当前的民族政策。

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原来居住在中原地区。后来汉族逐渐发展，把少数民族逐渐挤到边疆去了。汉族人口多，所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好，经济、文化比较先进，处在有利的地位，这样，汉族就逐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历史上，也有些少数民族进犯过汉族，史书上称做“异族入侵”。周恩来说：“各民族间互相侵扰，本来是件坏事情，但在客观上也产生过好的后果。它造成了民族杂居，进而互相通婚，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使民族的长处容易结合起来。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不断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点，不断和其他民族混合，它不但没有衰落，在客观上对汉族的影响还有它的好的一方面。”

周恩来以满族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满族不过几十万人口，但是它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达二百多年，今天中国的版图这样广大，就是认清朝继承过来的。清朝有些政策对人民也是有益的，可是到了后来，上层统治者腐化了，抵挡不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并加深了对人民的压迫，汉族再也不能

忍受它的统治，才起来推翻清政府，汉族占了统治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旧政府都没有能够解决民族问题。汉族愈发展，就愈把许多少数民族挤到边疆，在政治上压迫它们，经济上剥削它们。从中国的情况看，全国有 50 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的人口合计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尽管汉族挤他们，可是他们居住地区的面积还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由于人口众多的汉族早就占据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致使他们住的地方中有不少是高寒山区和沙漠地带，给他们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

周恩来说：“今天，汉族应该多多替少数民族设身处地想一想，不要让他们再受委屈，应该使他们也能得到较好地发展。”

他还强调：“我们主张把全国各民族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在各民族相处中，第一，汉族一定要自觉，遇事应多责备自己，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这样少数民族也就会跟着汉族的样子做，各个民族就会真正自愿地合起来。第二，要在民族大家庭中搞好团结，不能怕麻烦，一时怕麻烦，日后就会生出更多的麻烦来。民族问题本来就是复杂的问题，麻烦的问题。每个民族都有它长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对待民族问题，要作历史的分析，并且要有阶级观点。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民族问题离不开阶级问题，但是民族问题又不完全等于阶级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周恩来精辟论述和分析，使代表们点头称是。大家的疑虑消除了，思想统一起来。

1958 年 3 月 5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首府设在南宁。

**“汉族应该多多地替少数民族想一想，
不要让少数民族再受委屈”**

满族是 56 个少数民族之一。但是，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却没有满族代表的位置。周恩来发现问题后，提出“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

1911 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灭亡了大清帝国，满族也随之失去统治地位。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当政时，歧视满族，满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几乎完全和汉人同化了，分不清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认为：“民族将来是要互相同化的，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歧视，不能强制。”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有了满族代表的席位。

1957 年 3 月，周恩来在政协召开的讨论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满族的问题。

周恩来指出：满族不过几十万人口，但是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多年，正说明他是一个有本领的民族，是值得佩服的。但是到后来，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它抵挡不住外国的侵略，它腐化了，汉人再不能忍受它的压迫了，才起来打倒了清朝的统治。清末，鼓吹革命的文章，例如邹容写的《革命军》，现在读起来还会感到痛快淋漓。当时人们把满族说得坏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再那样看待满族就不完全合适了。过去统治中国的是满族中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满族整个民族，即使谈到满族统治阶级，他们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今天我国的版图这样广大，就是从清代继承过来的。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应当承认清朝对此是有贡献的，清朝有些政策对人民也是有益的，在清代全国人口增加了，就是一个证明。我们这样提不是要肯定清朝

统治阶级一切都对，首先侵入就不对。不过，除了不对的以外，其次也做过一些好事，这样就不至于理解错了。

周恩来还谈到，任何民族都有它的民族心理感情的，辛亥革命以后，我们号称“五族共和”，只承认汉、满、蒙、回、藏。由于推翻清，整个满族也抬不起头来，他们用汉文，改满服，有些

人改了姓氏。从形式上看，汉人和满人最没有区别，但实际上，满族还是有它自己的民族感情的，不能设想，满族和汉族杂居了二

百多年。今天满族就已经没有特点，完全和汉人一样了，没有区别了。在第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中没有邀请满族代表出席，这是一个错误。当时这样想满族已经没有什么特点了，可以不作为一个民族单位。到了召开第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的时候，才有了满族代表出席，可见我们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是体会不深的。

在承认满族的问题上，是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的。当承认了他们的民族地位以后，满人过去几十年来抑郁的感情才舒畅了。

许多著名满族人都是周恩来的朋友，如末代皇帝溥仪一家、作家老舍先生、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等。周恩来在他们身上倾注

了党对少数民族最大的关怀。程砚秋走进新中国后取得的进步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抗日战争时期，程砚秋拒绝给日本人演戏，遭到迫害。为躲避日军搜捕，他隐居北京西郊青龙桥，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外辱的高尚民族精神。

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程砚秋。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程砚秋，从此他走上新中国的京剧舞台为戏曲事业谱写出新的篇章。

1957年，反右运动急风暴雨似地展开后，中共中央决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一批先进分子入党，以便于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周恩来认为程砚秋在戏曲界有较大影响，思想基础好，如果能帮助他在政治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将会对一批知识分子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周恩来的启发下，程砚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产生了强烈的入党要求，而且在工作实践中自觉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年11月，程砚秋所在机构党组织决定接受他的入党申请。周恩来和贺龙亲自作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是周恩来三十年来第一次作入党介绍人。三十年前，他还曾介绍朱德、孙炳文、贺龙、郭沫若等入党。在程砚秋的入党志愿书上，至今还保留着周恩来那苍劲、有力的字迹，字里行间凝聚着一位老共产党人对这位少数民族的人民艺术家的关怀与期望。周恩来给程砚秋写了这样一封信：

砚秋同志：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周恩来的这封充满感情的信极大地温暖了程砚秋的心，他提笔给周恩来回了一封同样充满感情的信：

“你珍贵指示和对于我的愿望，（我）感到兴奋极了，想了多日，真不知用何种语言来回答。您再三说三十年没有介绍人入党了，请放心罢，我永久忠诚遵守党的一切，有信心为人民去工作，不会使您失望的。专此，敬复周恩来总理台鉴

程砚秋谨启

12月3日

程砚秋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成为少数民族艺术家中的榜样。可惜，他入党后不久，就被病魔夺去生命。周恩来在程砚秋的追悼会上对他的弟子李玉茹说：“砚秋同志走得太早了，正在能为党好好工作的时候，就走了。以后，担子就落到你们这一代肩上。”

“一定要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 作贫下中牧的好女儿”

在辽阔而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而七十年代，广为传颂的是“当代王昭君”，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到牧区落户的真实故事。

周秉建从小活泼可爱，是周恩来最钟爱的小侄女。

周恩来有两个同胞兄弟，秉建是他的小弟弟——周同宇的最小的女儿，大家称她为“小六”。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刚刚读初中的秉建决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内蒙古插队落户。

当时，全国的青年都在走上山下乡的道路，秉建的选择，使周恩来十分高兴，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亲属能同所有的青年一样。懂事的小六使周恩来感到欣慰，尽管他对尚未完全成人的秉建还不十分放心。

离开北京前夕，秉建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到西花厅来向伯伯告别。

望着满脸稚气的秉建，周恩来爱抚地把她揽到身边，用温暖的大手抚摸着她的头。周恩来虽然是一个大国的总理，但同样有着常人难以割舍的亲情。毕竟秉建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在正常的年代，她还处在读书的年龄啊。不过，周恩来十分理智，在侄女面前，他没有流露出这些，像所有的家长一样，他对秉建叮咛了又叮咛，嘱咐了又嘱咐。

周恩来说：“你到草原去当牧民，我坚决支持。不过，可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哟，想得太简单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动摇。你的决心坚定不坚定啊？”

秉建还不能完全感受出周恩来叮嘱的分量，但却懂事地点点头。

周恩来接着说：“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很好地注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周恩来知道秉建不吃牛羊肉，因此特别要求她要锻炼吃牛羊肉，他说：“只有过好生活关，才能同少数民族融为一体”。

周秉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暗下决心，要在广阔天地经风雨、见世面，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辜负伯伯对我的期望。”

秉建被分配到内蒙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这里是纯粹的牧业区，住蒙古包、烧牛粪和羊粪、喝奶茶、骑马、放羊，一切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隔膜。勇敢的秉建穿上了毡靴和蒙古袍，钻进了蒙古包，热情的蒙族乡亲热情地接纳了这位小姑娘。

秉建和伯伯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地向伯伯汇报思想，及时得到伯伯的帮助和指导，顺利地过了生活关。几个月后，她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蒙语，乍一看，人们还真不会想到她是一个来自北京的汉族姑娘，更想不到她是来自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的侄女。

然而，正像周恩来所提醒的，要真正下决心和少数民族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秉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思潮的干扰和冲击。

1970年底，部队到牧区招兵，对知识青年来说，这是离开农村的一个机会；对秉建来说也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她没有征得伯伯的同意，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这件事，传到周恩来的耳中，他立即派秘书到部队调查秉建入伍的情况。

不久，已经穿上军装的秉建兴冲冲地来到西花厅，向伯伯、伯母报告自己参军的消息，她满以为会受到伯伯的夸奖。没想到，伯伯开口说：“小六啊，咱们商量一件事好吗？”

秉建一愣，心里“格登”一下：“我又犯什么错了？”她不解地望着伯伯那收起了笑容的，但看上去仍然十分慈祥的面容。

“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草原去，回到蒙族群众中去？”周恩来平静地用商量然而却是坚定的语气问道。

秉建一时想不通，伯伯为什么对自己的要求这么“苛刻”，近乎“无情”。她想：“我是按正常手续参的军，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其他青年一样当兵呢？”秉建委屈得想哭。

周恩来说：“如果不是看着我的面子，能让你参军吗？应该把参军的名额让给贫下中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让他们到部队去，你留在边疆多好啊，少数民族地区多么需要你这样的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啊。”

一向听话的秉建收起委屈，不再说什么，谁让她是周恩来的侄女呢？

为了使秉建尽快回到内蒙古草原去，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有关军区的负责人，要求他们调查和处理这件事。听说部队同意秉建重返草原的决定后，周恩来如释重负。他两次找秉建谈话，鼓励她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为内蒙古的建设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秉建脱下军装，带着伯伯的希望回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这件事在广大知识青年和广大牧民中产生很好的影响，被广为流传。

1975年夏天，内蒙古大学到牧区招生，经广大贫下中牧推荐，秉建走进了大学，学习蒙古语专业。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秉建高兴极了，她又想起了伯伯的话：“下乡这么长时间了，还不精通蒙古语，这怎么能为少数民族服务呢？没有这个本领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想办法，学好这门知识”。

机会终于来了，秉建不会辜负伯伯的期望。

到呼和浩特上学时，秉建路过北京。这时，周恩来已患重病住进了三五医院。秉建向伯母（邓颖超）汇报了情况。邓颖超对她说：“伯伯很关心你，他对你只讲了三个字，就是‘还要看’。这就是说，虽然你过去在生产队里当牧民，下乡时间比较长，可是你现在上学了。过去只能说明过去，不

能说明将来，毕业以后能不能还回到草原去当牧民，和贫下中牧共同战斗，能不能继续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在基层，坚持在牧区干到底。”

这可以说，是周恩来留给最钟爱的小侄女的最后的遗言。

秉建果然是伯伯的好侄女，毕业后，她留在了内蒙。后来，她和蒙古族歌手拉苏荣结了婚，成为半个蒙族人，被草原人民称为“赛音呼”。她为蒙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理时常提起你们这些人，
他一直很想去西藏看看。”

邓颖超曾对藏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说：“总理时常提起你们这些人，他一直很想去西藏看看”。

“一直很想上两藏看看”，是周恩来的遗愿。

没有能够去西藏看一看，的确是周恩来生前的一件憾事。1975年9月，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拉萨的每一个角落。西藏人民迎来了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喜庆日子。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拉萨参加庆祝活动。

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夕，团长华国锋来到医院看望周恩来。

那天，已经是晚上12点钟了。身体虚弱的周恩来还没有休息。他在病榻上对西藏工作作了最后一次指示，表达了他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他请代表团的同志们把电影《海霞》、《养蜂促农》，带去给西藏的同志看，并嘱咐不要说是他送的。周恩来还关切地说，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很艰苦，这几年工作取得了成就，去了要多加鼓励。他还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要保证干部数量，也要保证干部质量，要把真正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提拔起来。领导班子要坚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建成一个团结战斗的班子，有这样的领导班子，工作就能搞好。他还强调：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西藏在这个问题上注意了，也是有成绩的，但不能满足。他说：“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策要执行好，干部要培养好，人民要团结好，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工作就能搞起来。”

周恩来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去西藏看一看，但是，他对西藏的关怀却深深印在藏族同胞的心中。对十世班禅的关怀与爱护，集中体现了周恩来对西藏的深情。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我国藏族宗教领袖和西藏地方政治领袖之一。1943年，他被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后被称为十世班禅。建国后，在周恩来关怀下，十世班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进步的作用。

1951年春，当班禅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的时候，就与周恩来结下了忘年交。

那一次，13岁的班禅大师率领其属下的办事机构堪布会议厅的40余名僧俗官员到达北京，和中央政府共商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

当天晚上，周恩来为小班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身着桔黄色绸缎藏袍的小“活佛”一脸聪慧与灵秀。在共和国总理的面

前，他显得有些腼腆和拘谨。周恩来并没有因为他年龄小而给以轻视，而是给予他最高的礼遇。班禅十分感动，他向周恩来献上一条质地优良的洁白哈达，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班禅坐在周恩来身边，逐渐消除了紧张的情绪。他们开始了愉快而亲切的交谈。周恩来仔细询问了西藏的情况、内部的团结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还代表党中央表示了对班禅的热情欢迎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共中央对西藏的政策。

会谈结束后，大家起身步入宴会厅。周恩来在入口处停步，他右手微微弯曲，同时伸出左手，示意请班禅先行。班禅见状，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的请周恩来先走。在相互谦让的情况下，周恩来改变了主意，他挽起班禅的右臂并肩走进大厅，这件事给年少的班禅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不久，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安排下，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范明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任命梁选贤为堪布会议厅副秘书长，共同负责护送班禅返藏。

由于历史的原因，班禅集团和达赖集团之间存在许多矛盾，中共中央一直采取了促进西藏内部团结的方针。

1954年，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班禅和达赖一起被邀请来北京参加会议，共商国是。周恩来还亲自到前门

车站去迎接他们。第二年初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专门讨论了西藏的工作，通过了《国务院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

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一协议的通过，密切了班禅和达赖之间的关系，恢复了班禅在

西藏固有的地位和职权，为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打下了基础。

然而，西藏问题毕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少数西藏分裂分子在1959年春天发动了武装叛乱，反对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他们还把达赖劫持到印度，一时间西藏的上空恶浪滚滚，乌云遮天。

值得高兴的是，在这场尖锐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面前，班禅表现得非常好。1959年4月14日，班禅又一次进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中南海为他接风洗尘。周恩来在欢迎词中，对班禅的爱国主义立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他指出：“西藏反动分子自甘暴弃，选择了背叛西藏人民、背叛祖国的道路。他们这样自取灭亡，实际上反而替西藏的民主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的黑暗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

班禅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周恩来发布命令，任命他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班禅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十分感激周恩来对他的培养，他曾多次对人讲，周恩来和他不仅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而且也是导师和弟子，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从50年代末开始，国内“左”的形势也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作。

1960年至1961年，班禅在视察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藏族地区的工作时，发现了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回到北京后，他立即向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作了汇报。班禅反映的问题引起毛泽东、周恩

来的重视。1961年1月24日，周恩来约见班禅，充分肯定了班禅勇于反映意见，对工作认真执著的精神。同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周恩来指出，西藏的改革，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他说：“运动中出了点‘左’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领导上说，掌握是不够的。”他希望班禅回藏后，要注意纠正“左”的错误。

班禅把看到的这些问题写成纪要，经过反复修改后，形成了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后来被称为“七万言书”。班禅经过深思熟虑后，拟写出这样一个题目：“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表达了对周恩来的尊重与信任。

周恩来看到“七万言书”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同班禅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对意见书的评价是：“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周恩来的直率和入情入理的分析，使班禅很服气，他十分感谢周恩来对自己的理解和爱护。

然而，形势很快向更坏的方面发展。1962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分析，李维汉被视为“右倾投降主义”受到批判。班禅的“七万言书”也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受到批评。

1964年秋，班禅在西藏受到公开批判，并被撤销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恩来采取断然措施，安排班禅举家迁入北京，进行保护。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很险恶，但是他听到班禅被隔离审查的情况后，非常揪心，立即指示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副部长刘述周要千方百计保护班禅。他说：“就是你们自己受到批斗，也要把班禅保护好。”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悉心关照，“文化大革命”中，班禅才免于死。当他熬过那段漫长的恶梦般的日子后，没有忘记周恩来，他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

周恩来在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住了班禅，保护住了许许多多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但他却没有能够保住自己。周恩来去世后最初的几年，人们可以发现，每逢他的忌日，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石阶上，总会看到班禅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看到他送来的一个小小的花圈和一条洁白的哈达。班禅送来的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思念，而且是全体藏族同胞的思念。

新疆维吾尔族干部铁木耳·达瓦买提在缅怀周恩来的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您对各族儿女温暖如春像慈爱的父亲。”这份感受应该说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属于56个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感受。

海南宝岛行

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元勋作出
战略决策：“一定要建立我们自
己的橡胶生产基地”

1960年2月9日，周恩来在视察了位于祖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海军榆林军港后，又乘坐小面包车，马不停蹄沿东海岸北行，途经万宁、嘉积、文昌，在海口稍事停留后直奔海南岛的儋县。这是个什么地方？儋县，原为汉朝元丰元年（公元110年）所设儋耳古郡所在地。800多年（公元1097年）前，已进垂暮之年的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被朝廷一贬再贬，从广东惠州启程，同幼子苏过踏上这块瘴疠遍地、荒无人烟的土地。面对这般荒凉情景，苏东坡禁不住仰天长叹：“（儋耳）饮食百物艰难！”1951年，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战略物资的禁运，作出了“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的战略决策。深受封锁禁运之苦，又没有种植橡胶地理条件的苏联，尤其感到缺少橡胶的艰难。斯大林曾经形象地比喻说：“橡胶是植物排泄出来的液体金子，它对发展各项现代工业，尤其是对军事工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决策的指导下，1951年8月31日，周恩来主持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文件确定由陈云主持这项工作，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具体组织大面积植胶工作。

1952年3月，政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命令，组建了为创建新中国橡胶事业而奋斗的林业工程第1师、第2师和1个独立团。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第1师1个排的武装战士，会同几百名农民和几十名马来亚归侨，作为先锋，来到这荒山野岭安营扎寨，以植胶为业的西联农场从此诞生了。

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他同斯大林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争取苏联提供资金，帮助中国种植和生产橡胶。从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斯大林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请求，说：“你们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上，也是援助苏联。”9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

为了尽快落实中苏两国所签订的协定，1952年12月17日，周恩来审改并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南植胶垦殖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大力增产种子，扩大植胶面积，力争早割胶、多产胶”。同时，《决定》强调：“应十分重视先种优良种苗，应选择植胶条件较好的地区尽先垦殖。”“1953年应将育苗重点放在海南，并应积极兴修水利，营造防风林，种植间作物，创造胶树适生环境，加强定植苗木的经营管理和干部培养训练工作。”

这时，在苏联贷款和机械设备的有力支持下，以林业工程第1师、第2师和独立团官兵为骨干组成的垦荒大军，向这个热带荒原挺进。他们住茅棚，睡竹床，战台风，抗暴雨，同毒蛇猛兽拼搏，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暑往寒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几十个植胶农场相继诞生了。他们艰苦奋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次打破世界植胶权威所谓橡胶只能在赤道以南10°到赤道以北15°之间的热带地区生长的断言，在北纬18°至20°的热带北

缘建起了一个又一个、一望无际的橡胶园。

这以后，周恩来又同有关部门负责人三番五次地研究在海南岛发展橡胶事业的问题。

周恩来一次又一次地紧握创业者们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深情地说：“你们辛苦了！……”

根据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1960年1月，时刻牵挂着橡胶事业壮大发展的周恩来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橡胶生产的指示。

2月9日，周恩来又来到全垦区最早建立的农场——西联农场。这时正是西联农场和全垦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这些创业者们每天只能分到二三两米，要靠上山挖木薯、摘野果、采野菜充饥；水肿病流行，饥饿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有的倒下了，剩下的人面对每时每刻都可能到来的死神的威胁，仍咬紧牙关，为新中国橡胶事业发展的美好前景默默无闻地奋战在莽莽胶林中。

在这艰难的时刻，周恩来带着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与问候，来到这些创业者身边。他深为新中国植胶人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在茅屋里、田畴间，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地紧握他们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深情地说：“你们辛苦了！……”

人们看到，周恩来在握手时，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总是友善而专注地看着对方。对他来说，这是信条：对人就是要尊重。而表达尊重的标志，就是在自己的眼睛中要有这个人。周恩来这种待人以诚的风姿，深深地打动了创业者的心。

“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做工作，首先，要懂得尊重人。”这是周恩来的口头禅。

周恩来来到“天任”、“蔡惠”橡胶园。这是檐县爱国华侨1919年从南洋引种，经过于辛万苦的培育，才获得成功的两个象胶园。它是新中国发展橡胶的主要采种基地，是新中国橡胶事业的发祥地。

在胶园里，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3年前在北京会见第三次全国妇代会代表时，曾经握过手的女胶工。他冲口而出，兴奋地叫着“叶娣！叶娣！”

叶娣哭了，在场的许多男女胶工也哭了，他们为一个泱泱大国总理竟能一眼认出在几年前只有一面之交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工感动了！

叶娣，是50年代初从南洋归国后到西联农场的8位女侨胞之一。她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割胶手，是先进割胶技术的传播者。叶娣回国时只有23岁。由于她管理的橡胶树长得又粗又壮，产量名列前茅，因而于1957年9月作为8位女侨胞的代表出席了全国妇代会，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随后，场党委书记把割胶辅导员郑红芬介绍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刻亲热地伸过手去，紧紧地握着，摇动着。心情激动的郑红芬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嘴里进出一句短话：“总理，您辛苦了！”“不，是你们辛苦了！”周恩来问郑师傅是哪里人，是什么时候来胶园工作的？郑师傅动情地诉说着：自己是个华侨，13岁就在国外跟父亲割胶。后来被殖民主义者抓进集中营。1951年祖国把她从苦海中拯救出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周恩来饶有兴味地听着越说越激动、越说话越多的郑师傅讲述自己的过

去。

“现在生活习惯了？”周恩来问。

郑红芬回答道：“习惯了，政府照顾得可周到了，连我们设想到的，政府都替我们办了。”

参观中，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橡胶品种、生产情况和产胶能力，以及一个工人每天能产多少胶等等。

郑红芬选了两棵胶树为周恩来作割胶表演。兴致勃勃的周恩来也操起胶刀，请郑师傅教他割胶。

在胶园，周恩来深情地抚摸着那一棵棵历经风霜、刀痕累累、已有 50 多年高龄的“老祖宗”树，仔细地观看着从割线上汩汩涌出、叮叮咚咚落入胶杯的洁白胶乳，语重心长地说：“橡胶树，我们自己有了，我们要多产胶！我们国家很需要橡胶呀！”“我们国家的建设，要立足于自给，像胶也是如此。”

接着，周恩来同郑红芬、叶娣，周香等合影留念。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至今一直挂在西联农场的会议室里。

周恩来来到胶乳加工厂，整个工厂顷刻之间沸腾起来。他向工人们握手致意并问好。工人们个个都感觉到周总理手上有一股暖流，流向了他们的整个身心。

周恩来向工厂领导逐一地询问了胶乳厂工人人数和他们的学习、生产、生活情况。

在于胶制片车间，周恩来看到工人在吃力地操作着笨重的压片机，便走近一位工人身旁，关切地问：“能不能改装一下呢？”“能不能搞个电动压片机啊？”“能！”工人回答说。周恩来高兴地说：“那就搞一个啊！”然后，周恩来叮嘱车间党支部书记陈说：“在各个生产环节，都要尽可能地用机械和电力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话语间，充满了周恩来对工人的体贴、鼓舞和支持。后来，电动压片机仅用 10 天时间就制造出来了。

离开车间时，周恩来又问老陈：“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老陈说：包装浓缩胶乳的铁桶不够用，影响正常生产。周恩来当即同随行的省、区领导人商最决定后，对老陈说：“一个月内就给你们解决。”就在一个多星期后，成批的铁桶陆续运进加工厂，积压了数十吨的浓缩胶乳的包装问题就解决了。

周恩来挥笔题词：“西联宝岛，南国珍珠”；“儋州立业，宝岛生根”

西联农场的创业者用期望的眼神望着就要离去的周恩来，说道：“总理，请您为农垦工人写几句话，不知行不行？”

情绪高涨的周恩来爽快地答应说：“行！”写什么呢？他略为沉思了一下，就挥笔写下了意境深远、雄浑有力的题词：“西联宝岛，南国珍珠”。

周恩来就要离开西联农场了，创业者们觉得时间太短，依依不舍，他们只好把对周恩来的敬爱之情，凝结在送给周总理的一份劳动成果——一瓶洁白的胶乳。一颗精选的胶树种子、一块优质的胶片——之中。

下午，在明媚春色的伴随下，周恩来来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华

南热带作物学院的所在地——儋县宝岛公社，看望为实现中国天然橡胶的大发展而离开城市的高楼大厦，来到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的穷乡僻壤，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知识分子们。

周恩来所到之处，都要询问：“什么大学毕业的？”“来了多久，习惯吗？”“学习怎么样？”在简陋的图书馆门前，他称赞自学 14 种语言，为热带作物科技情报工作做出贡献的翻译何国良“了不起，了不起！”勉励何国良和所有有志于献身中国橡胶事业的知识分子们“好好干下去”。

最后，周恩来又为他们题写了饱含赞美与殷切期望之情的 8 个大字：“儋州立业，宝岛生根”。

周恩来走了，离开了海南宝岛，但他的谆谆教诲，却一直在中国橡胶创业者脑海中回响，成为激励整个海南垦区广大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巨大精神力量！

同样，离开宝岛后的周恩来仍然经常惦记祖国橡胶事业的发展的创业者们。

1963 年 7 月，周恩来在百忙中接见了来北京出席橡胶和热带作物加工会议的代表，并且讲了话。他指示：第一，由国家计委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并确定橡胶和热带作物产品的产销问题；第二，由国家科委组织化工部、一机部、农垦部的科技工作者，到对植胶有丰富经验的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锡兰等国考察，学习它们的先进经验；第三，由农垦部负责总结新中国橡胶生产的经验教训，以推动橡胶事业的蓬勃发展。

海南广大植胶职工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殷切希望，他们克服了种种自然的和人为的困难，使得橡胶事业的发展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到 1988 年，我国对橡胶及其他热带作物的研究取得显著进展，重大科研成果中有 7 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有 10 多项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我国植胶面积和产量也跃居到世界第 4 位。

到 1990 年，40 年来海南垦区几十万职工用自己的艰辛劳动，共植胶 370 万亩，为国家累计生产干胶 176.6 万吨（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70% 以上），上缴利税 22 亿多元。

到 1995 年，海南垦区橡胶平均亩产突破 75 公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年橡胶总产量达 20 万吨，再创历史最好水平。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满载着海南垦区职工的辛劳与汗水，记载了他们对国家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战胜饥荒的总指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之后出现大饥荒，周恩来挑起 了解决粮食问题的重担

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从1960年开始到1961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告急，一般只能维持3至5天的供应，山东、山西、河南、安徽等重灾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原粮，导致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等异常严重的情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60年、1961年中国人口连续两年出现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全国总人口由1959年的6.72亿减少到6.59亿，减少了1300多万。

这样，及时而妥善地解决粮食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的最关键问题。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忧心忡忡的周恩来挑起了解决粮食问题、战胜饥荒的重担。他深入基层了解实情，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力求找到综合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办法。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5月31日，周恩来在会上就粮食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他解释说：由于1959年、1960年和今年夏荒（比受灾严重的去年又减少夏粮200亿斤左右）的影响，更增加了我们粮食供应的困难，“所以，我要作粮食问题的报告”。

接着，周恩来对有关情况一一作了介绍。他说：“从产、购、销、调、存这5个方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粮食形势是紧张的。”尤其是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为了弥补粮食赤字，一是从去年12月起，中央“下了决心进口一部分粮食，以后进口计划数又逐步有所增加”；再就是继续挖库存。因此，今后“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城市严重于乡村”。

在目前情况下，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供应紧张问题呢？

周恩来如数家珍地自问自答：“我们可以设想这样几种办法”：

第一，“不留20亿斤救灾粮”。但是这样做，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是“不负责任”。“救灾粮非留不可，去掉不得”。

第二，“是否可以多征购一些？按照今年的形势，我觉得不行。”因为“要多征购”，就要“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挖空”。

第三，“大家努力，多增产一点。这当然是好事，当然要增产。”“但是，这总有一定的限度，因为是灾荒年度”，“有灾害等气候方面的影响”。因此，“对增产不能寄予希望太多，不然又会变成高指标”。

第四，“能不能平均压低城市的口粮指标？现在城市按人头平均只有商品粮400斤，实际有的地方没有400斤”。这个人均数量还包括了酿酒等商品用粮。“这已是低指标了，不能再压了；再压城市里的浮肿病等等就会多起来，那就比农村更紧张、更严重”。

第五，“能不能多进口？肯定不行。”“不仅外汇挤不出来”，而且粮食出口国也“没法出口那么多，我们也没法进口那么多”，因为我国的“港口吞吐不了”。

第六，“可不可以向苏联多借一些粮食？”我看不行。

第七，“能不能再多挖库存？”“只能少挖一点，到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还要补上，不然没有办法周转”。

第八，“从城市压人口下乡，这是最后一个办法。前7种办法，只有一个挖库存作为厨转还可以。除此以外，根本的一条方针，只有压人下乡。”

怎么压呢？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从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

下午，根据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报告精神，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代表分组讨论了粮食问题。随后，根据各组讨论意见，周恩来召集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并提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6月5日晚10时，周恩来同李先念商议之后，他不顾一天辛勤工作后的疲劳，在6日零点到毛泽东处，上午8时又向刘少奇等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成员报告了《九条办法》的内容。上午10时，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九条办法》的形成、内容和实施问题作了说明，并征求与会代表的意见。

6月1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九条办法》的修改说明。

6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九条办法》规定：（1）城镇减人，必须造成声势。（2）全国城镇人口只许减少，不许增加，减人必须同压缩粮食销量结合进行。（3）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首先是大中城市）人口，做到人、粮相等，严禁虚报冒领和营私舞弊。

（4）为解决粮食问题并使国家和集体都有粮食储备，三五年内全

国口粮一般仍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5）1961年7

月到1962年6月粮食的产、购、销、调、存的数字，待8月中央工作会议再决定。（6）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调整，推迟到下半年后再决定。（7）中央各部门会同有关省、市、自治区提出各部在该地区的有关单位的精简计划。（8）城市征兵的重点，放在适龄的中等学校学生、青年工人上。（9）为在今后3年实现恢复到1957年粮食产量的水平上，应在整风、整社和贯彻《十二条》、《六十条》和中央指示信的同时，拟定工商业支农计划、粮食增产计划。

从此以后，《九条办法》成为指导城市精简工作和解决粮食困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周恩来猛然一怔，答道：“这可不是小事，

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党中央郑重决定周恩来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以恢复操劳过度的身体，但因工作任务重而脱不了身，周恩来仍一如既往地繁忙工作着。

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1981年12月在上海接受笔者和力平等同志的访问时回忆道：

当时全国人口6亿左右，城市人口1亿2千几百万，“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粮食供应数量大量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负担不起。许多地方纷纷告急，形势很紧张。

我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

在全国粮食供应最困难时，总理处理事情仍非常沉着冷静，着急也不溢于言表。他

了解情况，问得很细、很深入。他问我们全国哪些地方最困难？有多少生产队人均口粮 8 两？对河南、安徽、甘肃、四川等困难省，总理还要我们统计好的、比较好的、中等的和差的生产队各占多少。俗话说：“糠菜半年粮”。总理连糠菜都要过问。因此，我们搞生产队生活安排时，把糠菜都考虑进去了。

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也回忆道：

在 3 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不少人，各地要粮食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他只好要粮食部和铁道部准备好几列装着粮食的火车，哪里急需，火车就往哪里开。有一次，上海库存只够供应 3 天，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一旦缺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就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上海的燃眉之急。

1961 年的一天，连续工作了 17 个小时的周恩来，仍在一遍又一遍地敲打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或者给哪个省调入多少。保健护士郑淑芸前去送药，心疼地说：“总理，像这样具体的技术工作，不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猛然一怔，然后严肃地回答道：“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

郑淑芸打心眼觉得周恩来说的有道理，可她心不平的心里仍然嘀咕着：“总理，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呀！”她的鼻子一酸，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

1987 年 1 月，笔者和杨增和等访问当年任外贸部副部长的雷任民，他噙着泪花向我们讲述了周恩来为解决粮食危机而操碎心的情况：

由于 3 年“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从 1960 年暴露出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局面，京、津、沪、沈等大城市市民粮食库存只够供应几天了，甚至有的城市发出告急，市民只有一天的用粮了。在这种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

这年 12 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 150 万吨。我们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 250 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见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周总理吩咐我：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再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楚 3 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资金问题？

这是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我国船只进出这里它们是要劫持的。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我们一致认为：货源是有的，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着要找出路，我们向他们买大批粮食，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我们。至于运输船只问题：第一，尽量买 FNB（货到中国口岸付款）；第二，可以租到外国商船，外汇中国银行可以周转透支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神情，向我提出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情似乎才踏实了。

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那时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有恶化，周总理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

船只航行情况。为了粮食，总理真是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

据档案记载，一次，周恩来在同一位外宾谈话时说：“为了粮食，我的头发都白了许多”。

**周恩来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 1
亿斤！我们干 3 杯，增加 3 亿斤好不好？”**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0 年 6 月到 1962 年 9 月，在这两年零 4 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和讲话就多达 115 次，其中一次是在江西省南昌市。

1961 年 9 月 17 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省城南昌视察。

18 日晚，周恩来一行同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共进便餐，同议国是。

周恩来谈论着怎样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快江西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等重大问题，特别强调了搞好商品粮和经济作物基地建设的重要意义。他风趣地对江西省委一班子人说：“你们不是有个《江西是个好地方》的歌子吗？这个歌儿不错，江西确实是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鄱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不错！粮食也比较多嘛！”

“总理，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杨尚奎等谦虚地回答说。

长期负责农业生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站起来说：“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 34 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听了这篇祝酒词，周恩来站起身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乐呵呵地说：“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接着，他诙谐地加重语气说：“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刘俊秀惊奇地问。

周恩来深情地看着他，颇为欣赏地望着这位文化水平不高，但事业心重、责任感强、领导江西农业生产有方、成绩卓著的工农干部，叫服务员拿酒来，亲自斟上茅台酒，轻快地回答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 1 亿斤！我们干 3 杯，增加 3 亿斤好不好？”

在江西以豪爽出名的刘俊秀，此时此刻，在外调粮食这个大问题上也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他沉思片刻，面带为难表情，说：“总理啊！国务院给我们的外调粮食任务 12 亿斤，我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 3 亿斤就是 15 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

这时，谭震林、罗瑞卿给为难中的刘俊秀鼓劲说：“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 3 杯，3 亿斤就 3 亿斤嘛！”

事前周恩来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情况已经有了清楚的了解，因此，他十分肯定地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

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

周恩来一番恳切的言辞，打动了刘俊秀的心，他设身处地想了想：“周总理是我国6亿人民的当家人，如果现在国家没有面临这样大的困难，周总理是绝不会开口向江西多要粮食的。江西再有困难，也要想办法支援国家。”

于是，刘俊秀说：“可以，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3亿斤就3亿斤！”

听了刘俊秀令人满意的爽快回答，在和谐轻松的气氛中，周恩来满面春风，欣喜地举起酒杯，同江西同志连干了3杯。

19日上午，周恩来带着江西为国家增加3亿斤外调粮的喜讯动身飞回北京。

现存的32张粮食报表上，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总是要求粮食部门及时将粮食购销调存表等报表送去，他一张一张地审阅，一旦发现问题立即给予解决。

一次，周恩来同李先念、陈国栋、杨少桥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一定要马上搞出来，让你们计划司周伯萍司长来就行了。说完，周恩来又处理其他政务去了。次日凌晨，当周伯萍来到西花厅时，周恩来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宵劳累，又同周伯萍一起，仔细审查了这个计划表，连表中的每一个附注都讨论了一遍，然后才批示印发。

另一次，周恩来同杨少桥、赵发生研究分省的粮食计划调拨安排，当排出表格后将数字相加时，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周恩来戴上老花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计算后，沉思了一会儿，问道：“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增加了5000万斤，加了没有？”啊，问题正出在这里，是杨少桥等把这个数字漏记了。周恩来在表上加上这个数字后，再打算盘，果然收支平衡了。

当时从周恩来那里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在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上，他的笔迹计有994处。其中，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

这些报表现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被保存下来，它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听付出的心血！

四川踊跃外调粮食，周恩来好言相劝： “不要报31亿斤，报30亿斤就行了”

建国以来，一直是粮食外调大省、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省，从1953年到1960年的8年时间里，总共外调粮食283亿斤，平均每年外调35亿斤，其中1958年、1959年平均每年外调高达42亿斤。由于四川省1958年抽调数百万劳动力“大炼钢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又由于过多地调出粮食，因此到1961年初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

在这以前，对于四川照顾大局、大力支援兄弟省市的无私举动，深深感动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国务院领导人和受惠省市的领导人，他们常常称赞说：“这是共产主义风格。”

在全国粮食开始紧张的1960年夏，四川省委领导人在北戴河会议上踊跃地上报调出粮食31亿斤。这个数字，占了当时全国各地上报粮食调出总数的1/6。对此，周恩来好言相劝说：“不要报31亿斤，报30亿斤就行了。”

当四川省也发生粮荒的消息传出后，周恩来立即发出指令：四川省停止外调粮食。

随后，周恩来特地派童小鹏赶往四川南充市火花公社蹲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寻找解决困难、渡过难关的有效办法。

1962年初，四川省粮荒更加严重。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在同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陈国栋和杨少桥等计算研究后，他当即作出了立即向四川省调拨2.5亿斤粮食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四川省粮食供应极度紧张的状况。这年2月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说：“这几年把四川这样一个出商品粮最多的省调亏了，这是只顾眼前、影响长远的错误，我们是要负责的。”

由于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同舟共济，到1962年国家终于渡过了粮食困难关。

邯郸调查鱼水深情

周恩来初到伯延，便对一位女社员说：“去你家看看行吗？”

1961年初，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年4月下旬到5月中旬，时时牵挂着人民群众的温饱，为近期广大农民的困苦生活而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

在解放战争时期，邯郸地区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在这块土地上，曾掩埋了许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壮烈捐躯的革命先烈。建国后，为了世代纪念这些烈士，缅怀他们的业绩，邯郸市人民政府拨款修建了烈士陵园和纪念馆。1954年，应邯郸市人民政府之请，周恩来挥毫题字两幅，一为邯郸烈士陵园，一为烈士纪念馆。

5月3日，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习习吹来的春风的伴送下，周恩来身穿半旧藏青色中山服，脚踩一双半旧圆口布鞋，带着几位工作人员，精神抖擞地悄悄来到原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县伯延村。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这里胜利地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

来到伯延公社后，周恩来不辞辛劳，走村串户，奔波忙碌，就广大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找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谈话、

开座谈会，认真听取社员对党的农村政策的反映。

这时的伯延村是公社所在地，有10多个自然村落，共2.7万余人，办公共食堂比较早。伯延受灾面积大，正面临严重饥荒。

“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很快，周恩来到伯延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一次走访中，有不少社员群众涌到街道两旁，欢迎他的到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周恩来一面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一面同身边的群众亲切握手。

站在人群中的女社员郭仙娥，三步并作两步，大胆地走到周恩来面前，热切地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握着她的手，和蔼地问道：“你家住哪儿？去你家看看行吗？”郭仙娥激动地回答：“好，好。”说罢，便引着周恩来往她家走去。

周恩来走进她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人。她向周恩来介绍说：“那是俺小孩子他爹，有点病，耳朵还有点聋。”说话声惊醒了她的爱人王连生。他睁开眼睛一看，见屋里站满了人，直楞楞地好一会儿都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的大女儿贴近他耳朵说：“周总理来了！”王连生一听周总理来了，惊讶地连连说：“总理快坐！快坐！”随即，他噌地一下，从炕上坐了起来，伸手从地上拣起一只鞋就穿。没等他把那只鞋穿好，周恩来已弯腰从地上拣起另一只鞋，送到了他的手边。

顿时，王连生眼泪夺眶而出，一时不知说啥才好。一个国家总理亲自给他这个旧社会过来的穷孩子、普普通通的社员拾鞋，怎能叫他不流泪呢？他紧紧地握着周恩来那双温暖的手，半晌才说出：“总理您辛苦了，我们贫下中农欢迎您。”

周恩来怕他听不清自己的话，便加大声音，询问他的身体状况，问找医生看过没有，吃的什么药，一再叮嘱他安心养病。

在周恩来所访问的社员家里，他总要到社员存粮的房间走一走，到厨房

看一看。由此，他发现一个带普遍性问题：“社员家里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更是没有什么存粮。”每当这种情景出现在以人民生活幸福美满为已任的周恩来面前时，他的心情总是沉甸甸的，自责自己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工作没有做好。

周恩来说：“张二廷说的是真理。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自己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周恩来初到伯延公社时，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仍很严重，广大社员还不敢讲真话。

“周总理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说八道的。”社员群众私下嘀咕说。他们虽然不知道国务院总理是多少级干部，但却知道“宰相”在中国的地位和分量。

5月4日下午，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社员座谈会上，出现了冷场，没有人发言。周恩来挨个发问，他们也只是哈哈发笑，不敢答话，生怕说得不好，让干部怪罪。唯有一位年近50、性格开朗的名叫张二廷的社员的发言，十分坦率真诚，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走访社员家庭。他来到张二廷家。刚一进门，周恩来就亲切地高声叫着：“二廷，二廷，在哪屋住？”张二廷听见是周恩来的呼唤声，急忙跑到院子里，噙着泪说：“周总理，快到屋里坐。”

“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周恩来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拉着张二廷的手，一同走进屋里，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同他拉起了家常。他俩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一股暖流涌上张二廷心头。张二廷见到这位要自己称他做“老周”的国家总理是这样的平易近人、关心人，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以后的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再请张二廷发言，张二廷以坦诚的态度回答：“总理，你叫我说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啦。”于是，张二廷便根据伯延公社所遭受的严重灾情和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在公共食堂、评工记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毫无顾忌地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为什么吃不饱？”周恩来严肃地问。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再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里才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冬天还可以用余热取暖。”“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随后，张二廷像吃了豹子胆似的，指着周恩来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当然会没有吃的！”

张二廷这番刺耳但却是情真意切的话，在周恩来心中掀起一阵波澜，引起他的极大重视和沉思——“多好的一个社员啊！”

20多天后，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仍颇有感触地说，这个社员“劳动很好”。“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这是我在调查中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接着，他说：“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小平同志曾在那个地方住过”。言外之意，这里的人民群众觉悟是高的。

在场的地委干部没有料到会从张二廷口中冒出这么一句他认为是对领导人“极不恭敬”的话来，显得十分尴尬。转而，他满脸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周恩来不以为然，看了看这个干部，和颜悦色地说：“这样看不对。张二廷说的是真理。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自己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接着，周恩来鼓励张二廷继续大胆地讲真话，并说：“以后，我每年都要派人来看你。”周恩来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动了张二廷。他打心眼里感到：周总理真是个好人啊！周恩来就这样交了一个农民朋友张二廷。

这以后，周恩来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务院或总理办公室每年都有人来伯延看望周恩来的农民朋友张二廷。

经过几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周恩来终于弄清了社员们对食堂非常不满。于是，周恩来对跟随他来的调查组的同志说：是不是找一个食堂试一试，宣布采取自愿原则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口粮领回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查组在一个生产小队宣布了这个决定后，谁也没有料到，除了炊事员外，社员竟然全部退出了食堂。

**周恩来将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及时地向
毛泽东作了电报汇报，说：“绝大多数甚
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

周恩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同伯延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情谊。在伯延的6天中，他多次召开座谈会，并调查和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问寒问暖，问今问昔，了解社员的实际生活状况，把党的关怀直接送到社员心窝。

纯朴厚道的伯延公社社员也以心交心、以情换情，把主张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粮食应该包产到生产队等心里话，全都掏了出来，奉献给了周恩来。

在社员群众敢于说真话的情况下，周恩来在伯延先锋大队第四生产队就包产问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问社员群众：你们这个队每亩包产304斤粮食能够达到吗？话音一落，社员们就像炸了锅似的，争先恐后地说：“包得多了。”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旱得厉害，夏田每亩平均产量只能有70斤左右，有的只有40斤，还有的连种子都可能收不回来”。“夏荒这样严重，全年平均亩产304斤不可能。”

周恩来的目光转移到生产队长身上，问道：“为什么要包这样高的指标？”生产队长当即回答：“这是任务。公社党委、县里头要这个任务，实际上不可能。”

听到社员们的这番议论，周恩来心想：是不可能啊！这个地方是产棉区，县里规定还要调出粮食，这怎么能行呢？于是，他对大家说：你们的意见呢？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一致倾向于每亩包产200多斤。

一个社员心有余悸地要求周恩来把包产产量定死。他说：“你们现在不定死，谁晓得到秋天会不会又要多征。要是那个时候，把我们的口粮又挤掉了，自留地的收成也顶口粮，结果还是我们落

当着地委、县委和公社负责人的面，周恩来爽快地说：“我可以保证。”

“分下去的自留地不要再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

听到以上明确的答复，与会社员深情地望着贴心人周恩来，长时间地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之中。

为了保证大大偏离农村实际情况的党的农村政策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调动广大农民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一直工作到5月7日凌晨3时的周恩来，将自己在邯郸调查所了解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

现在有以下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电话记录上写下批语：“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随即，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

5月8日，周恩来就要离开伯延了，伯延人民听说他们打心眼爱戴的周总理就要走了，村里很多人都来到街头，挥泪相送。按理讲，管理着诺大一个国家的总理，在一个农村一呆就是6天，从时间上说并不算短了。可是伯延人民却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殷切地期望周恩来再多同他们呆上几天。

周恩来亲自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发给社员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

据当年跟随周恩来的摄影师杜修贤回忆：

在人群中的张二廷依依惜别，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你今后一定抽空回伯延看看呵。”周恩来久久地凝视着他，微笑着说：“有机会一定回来，如果我来不了，也一定派人来看你。”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年年都委托人去伯延公社看望这位使自己“很受感动”、“说的是真理”的农民朋友张二廷。

伯延人民噙着幸福的泪水送别周恩来后，仍久久地不肯离去

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负责人在调查研究后所提出的意见，对《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供给制的规定，并提出公共食堂办或不办完全由社员决定，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周恩来根据在邯郸调查时所获得的真实情况，还在这次大会上大力提倡并在会后积极推行了粮食包产的办法。

这以后，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推动了农村形势在3年内全面好转。

国难当头的正确方针

“大跃进”带来严重后果，周恩来和李富春共同提出“八字方针”

1958年发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运行两年多以后便带来了严重后果。从60年代的第一年开始，我国国

民经济就陷入了重工业畸形发展、农轻重比例失衡、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严重、商品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困境之中。

国难当头。在严重的经济形势面前，1960年6月14日至1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二五”计划后3年（1960年到1962年）的补充计划。接着，7月5日到8月10

日，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分析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势，研究如何扭转工业生产被动局面，如何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同时初步议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整顿的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根据这两次中央会议的精神，从8月中旬起，国家计委开始讨论重新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这时，即将出国访问的

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在谈对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时强调：“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应着重进行整顿、巩固、提高”。接着，国家计委在关于请各大区计委主任来京开会的电报中也指出：“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

8月29日至9月5日，国家计委顾卓新等几位副主任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在第一天汇报时，对国民经济全局有全盘深入了解、一向以严密精细著称的周恩来，明确他说：应该在“整顿”之后增加“充实”两个字，从而补充发展成为“整顿、充实、巩固、提高”8个字。

第一天汇报结束后，周恩来又开始考虑这么一个大问题：究竟用“整顿”还是用“调整”更符合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

半个月前，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作形势报告，传达北戴河会议的基本精神时，就明确提出了应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他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农业生产“基本上还依靠人力、畜力”。

“为了摆脱落后，必须使农业这个基础过关”。但是，“两年来城市人口增加3千万，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还未很好扭转过来”，“这不利于农业生产”。现在“劳动力不仅要停止向城市流，而且要向城市要。城市的劳动力有一部分要坚决回农村去。工业支援农业，首先要在劳动力上支援。”

周恩来还说：“由于大跃进，各方面都想搞些建设，使我们各方面都得到发展。这个愿望是好的，但不论计划内的或计划外的，却常常突破原来的指标，影响设备、器材等不够分配，工作上显得百废俱兴，人力物力分散了，搞得很紧张，使我们不能很好地集中力量。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计划上加以调整，所以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战线太长，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我们要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能分散力量，这会使我们的建设更快。”

这以后，经过认真考虑和比较，周恩来认为：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调整”虽然与“整顿”只是一字之差，但这两个字的含义却有很大的质的区别。还是用“调整”好，因为它更符合扭转宏观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的迫切需要。因此，在汇报即将结束时，他又提出将“整顿”二字改为“调整”。

9月6日，顾卓新在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传达周恩来听取汇报时的指示说：“在总理处谈了3个半天，总理意见，礼拜六政治局谈一次”，1961年计划的“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这个时候起，八字方针开始以更为完整、准确的形式出现。

9月30日，周恩来签发国家计委党组上报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审阅这个报告时指示：即送李富春交龚子荣办。“此件已经书记处原则通过，并商定先行批发，以使各地各部据此进行编制计划草案的工作。另将计委党组口头汇报要点送中央常委审阅”。《报告》以中共中央文件的方式首次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个字方针。

11月3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发出呼吁：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要积极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11月16日，在听取国务院有关副总理汇报1961年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主题为“摸清情况，总结经验”的讲话。

周恩来说：“从总的方面看，国内形势大好，但有暂时困难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了困难的严重性：虽然是暂时困难，但“暂时困难是全面的，不仅农业有困难，工业也有困难”，“两年农业歉收，底子亏了。今年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300亿斤，其他经济作物，如棉花、烤烟、糖、油、麻等，底子也亏了。”进而，“农业影响工业，影响城市”；“工业反过来又影响农业”。据此，他作出结论：这些情况证明，“做计划，搞建设，必须有大跃进的速度，又要按比例地发展”。“只有大跃进的速度与按比例地发展相结合”，“才能波浪式的有节奏的持续跃进”。“否则，就会违反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周恩来勇挑重担，部署和坚持不懈地领导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全部工作

1961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把它写入全会公报中。这样，标志着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

从此以后，周恩来和陈云等国务院领导人勇敢地挑起了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重担。他既抓方针政策的制定，大力宣传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重要意义，同时又抓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消灭财政赤字，调整农村政策，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减少粮食供应与增加粮食生产、煤炭产运销等各项工作。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协助周恩来、陈云等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10人小组。成员是：副总理兼经委主任薄一波、建委副主任谷牧、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化工部部长彭涛、农机部部长陈正人、经委副主任孙志远、铁道部代部长吕正操和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

1961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全国粮食库存不到100亿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目前的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农村到底能供应城市多少商品粮、劳动力和工业原料，解决多大的市场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城市能搞多大的工业”。

从这一认识出发，周恩来提出了要坚决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的主张。他指出：“城市人口太多，对供应工作压力很大，对发展工农业生产不利。”“我们现在的工业水平，根本不需要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因此，“在不妨碍生产，而且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前提下，要压缩一批城市人口回乡”。“我们希望从今年麦收开始，到明年，争取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压缩1千万以上的人口回乡。”

4月初，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对八字方针的含义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他说：调整，就是调整我们各部门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就是要把现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充实，就是现在我们的各种生产事业中有很多缺口、薄弱环节，要把它配套成龙，填平补齐，充实起来；提高，包括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这个政策性极强的解释，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吃透八字方针的精神实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到今年夏天，党的领导层内对形势的认识仍不统一，有人继续坚持“左”的设想，致使北戴河会议后对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还没有退够，工业生产无法完成较高的计划指标，调整收效不大。对此，党内有人认为，工业生产任务完不成，是松劲造成的，要反对人们的松劲情绪。

周恩来明确地表示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他说：“我了解到不是干部、职工松劲的问题，而是许多问题没有能够解决”。因此，应该大抓调整。他以强有力的事实说明：“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因此“好转先于城市”。看来经济建设还要全面调整，“工农业的关系和城乡关系都要调整”，而且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调整计划。

9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进一步强调：“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八字方针是有机联系的”，但“调整是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问题”。

周恩来进一步说明：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坚决退够，留有余地。农业、工业、教育、财贸等等，都是如此。凡不合理的指标，一定退够，退够再不退了，然后留有余地，好调整。”

“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调整要有次序、要排队。首先抓农业，因为农业是基础。经过3年灾荒，要把它恢复起来，增加供应城市的粮食、劳动力、运输、原料。其次是市场。再次是采伐业。”

“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一定要在新的比例关系上进行新的平衡。”

本月，周恩来还在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提出，“要将重点调整煤炭生产和重点支援农业两项工作抓紧进行。”

由于周恩来等的大力提倡，这以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进行全面调整、综合平衡的问题。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主动
承担责任。每当有人感到不可理解时，
他总是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

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1961年八九月间，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反映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正确意见，并得到毛泽东赞同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在今后3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具体安排，这就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

据谷牧在1989年所写的文章中回忆说：

在这一次庐山会议上，周总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除了大会上已经安排的日程外，他还经常在午间召开有关会议，研究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据我的笔记记载，仅从8月30日到9月14日这半个月里，他就找我和10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及有关综合部门的同志，开会研究煤炭生产、矿山机械问题达6次之多。写到这里，我不禁回忆起在那段岁月里，10人小组在总理的具体领导下辛勤工作的幕幕情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难题，大家忘我地工作，多方了解情况，充分估计各种实际困难，深入研究各种办法和措施，简直绞尽了脑汁。在讨论问题时，大家有时也会因认识角度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最后总能够从大局出发，把意见集中统一起来，拿出办法，报总理裁定。

1962年一二月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7千人大会）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这两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对严重形势和艰巨任务的认识，加强团结，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并进入到全面调整的决定性阶段。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问题作了诚恳的检讨，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心情沉重地说：

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

第一个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见，是50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

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

严重后果。

讲到这里，周恩来加大音量，向与会者进一步检讨道：

“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财，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周恩来曾经大力反对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倾向，是被动卷入“大跃进”这股洪流的。为此，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上。”每当有人这样提问时，周恩来总是真诚而坦然地回答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周恩来这样做，既是他真实想法的流露，同时也有他深层的考虑。因为，国难当头，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允许出现推诿过错、互相指责的情况，必须同舟共济，共挽危局。其次，上级领导理所当然地应当主动为下级干部承担责任，使他们轻装上阵，做好调整工作。试想，中央领导人把责任推给地方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又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这样谁会有心思去带领群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呢？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这以后，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等不同场合仍然多次进行检讨。他说：“要说责任，还在我身上，你们是负次要的责任。”“工作中缺点错误的责任在中央、国务院，还有国务院的各部。你们回去，可以向下面传达这一点，减轻大家的负担。”

这两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

周恩来在陈云发言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1962年3月上旬，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说：“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来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

会上，周恩来进一步强调：“讲到经济形势，就应该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多说一点困难，也没有多大坏处，要鼓励各种不同意见都说出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争论以后，由中央做决定。个人还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必须一致。”“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国家计委要搞综合平衡，各部门、各个地方都要搞综合平衡。”

当陈云在会上发言提出经济调整“不要拒绝‘伤筋动骨’”时，周恩来颇有感触，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和缺点，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强调：“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从缺点和错误中取得经验教训。”“这些反面的经验就能够同正面的经验一样，成为对我们极为有用的财富。从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的比较中，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事情应该怎样做，就应该怎样做，这样，我们就有可能

更快地学好建设的本领。”

周恩来有着高超的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才干，具有开拓进取和实事求是精神，尤其善于在危难险恶的局势面前，审时度势，提出转危为安的正确措施和办法。因此，他在《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中，以“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为标题，娓娓道出了自己的全盘意见和主张：

“我们在今后几年中，把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然而，“在1962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具体任务是：“第一，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增产。”“第二，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尽一切可能多增产日用品。”“第三，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第四，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第五，彻底清理仓库，重新核拨资金。”“第六，改善市场供应状况。”“第七，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第八，提高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工作的质量。”“第九，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加强现金管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第十，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

周恩来的上述意见，得到与会者的首肯和赞同。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周恩来同志在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下发《政府工作报告》，可以“使广大干部都能清楚了解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克服困难，更好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任务，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斗争”。

可以说，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为动员全国人民实行“伤筋动骨”的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4月2日，为了引起有关财经部门领导人对于城市调整工作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召集的财经各部党组负责人会议上说：“各个部都要按行业提出企业排队的计划”，下决心“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他提醒大家：做好调整工作的关键，是把情况“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力量”。

4月19日，在反冒进中曾检讨过多次所谓反冒进错误的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任副组长。

5月1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高级干部发出呼吁：“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他解释说：“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周恩来告诫与会者：“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并且说明“现在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精简职工超过1000万，城市人口争取超过2000万。“这个决心，就比今年2月中央发布的那个精简城市人口的指示进一大步了。”

为了使与会者感受更为深刻一些，周恩来十分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没有的”。接着，他说：“下

这个决心，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刘少奇等的意见，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鉴于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对于调整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会议上还决定，将讲话要点发给与会者带回各地，作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依据。

会后，周恩来将《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报送在上海的毛泽东审阅。5 月 24 日，毛泽东指示：“退周总理，照办。”26 日，中共中央将《指示》和《报告》下发全国。

从此，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有声有色、大刀阔斧地展开。到 1962 年底，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出现了从两年连续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主要农产品产量开始增长，粮食总产量达到 3200 亿斤，比上年增长 8.5%，生猪存栏数达近 1 亿头。比上年增长 32.3%；基本建设规模受到有效抑制和压缩，重工业比生产的发展速度比上年降低 16.6%，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 42.5% 提高别 47.2%；财政收支实现平衡，并略有结余。

这段时间，是周恩来在建国后领导经济工作最繁重、最活跃，发挥其经济思想和卓越才干的又一个比较充分的时期。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1962年3月，春回大地，冰雪消融。
周恩来飞临广州，为美丽的羊城带来春的信息。
这个春天，属于广大的科学家：
这个春天，属于广大的艺术家；
这个春天，属于广大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政策一向受到周恩来的重视与关怀

1956年1月，为迎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全面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周恩来的讲话，感召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建设伟大祖国的事业中来。

然而，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就在党内受到怀疑进而被彻底否定，1957年，由于党内一些人过于严重地估计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形势，直接影响到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分析。经过“反右派运动”，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被划入剥削阶级的范围中。从此，“资产阶级”这顶帽子，沉重地压到广大知识分子头上。

随即，“左”的思想滋长蔓延，许多人对周恩来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的一些提法开始抱有怀疑，存的人甚至借这件事对周恩来进行攻击。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周恩来却始终顶着压力坚持自己在1956年讲话的基本原则，即对知识分子两面性两点论的分析。两面性就是说，知识分子有革命、进步、积极的一面；也有落后、消极的一面。两点论就是说，知识分子有长处，有优点，也有缺点。

党着手纠正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偏差，是从50年代末开始的。但从全党范围来说，纠正1957年以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摘掉他们头上的“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却是到了1962年召开的广州会议上。

那时，周恩来清楚地看到，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妥善解决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必须从指导思想彻底扭转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但是，由于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直没有取得共识，在国务院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始终存在争论，因此，究竟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为好，周恩来一直是慎重又慎重，考虑又考虑。

1962年初，经过大跃进的猛烈冲击和自然灾害的严重侵袭，党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国内政治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检讨与纠正1958年以来各项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统一全党思想创造了一种团结、民主的气氛。另外，经过1961年以来解放思想的工作，广大知识分子要求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这种气氛为周恩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带来了极好的机会。

你们到广州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振奋一下人心

1962年广州会议，从严格意义上说包括两个会议。一个会由聂荣臻主持，从2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有各专业、各学科有代表性的科学家310人。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制定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科学家们集中到广州后，聂荣臻找了一些科学家座谈，发现他们顾虑很大。有人问聂荣臻：“现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究竟怎样理解？”有人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听到这些反响后，感到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于是，他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回答：“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另一个会议是由文化部、剧协筹组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个会议是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作家和文艺部门领导之间的关系，对一些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而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重新作出评价，以便总结经验，团结队伍。会议筹备过程中，在剧协工作的张颖找周恩来汇报工作。那天，周恩来和陈毅正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文娱晚会。看见张颖，周恩来特别高兴，忙问她：“有什么事嘛？”张颖把文化部和剧协同志的考虑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两手习惯性地交叉在胸前，对站在一旁的陈毅说：“陈老总，你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呀。”张颖疑惑地看看周恩来，又看看陈毅，不知他们笑什么。周恩来对张颖说：“陈老总老早就想到文艺界的情况不应该继续了，开个会是好意见嘛。你好好向陈老总汇报一下，到开会时，陈老总还要去做报告呢！”张颖告诉周恩来：“陶铸同志欢迎大家到广州去开会”。听到这个承诺，周恩来很高兴，因为当时国家财政经济还很困难，办个会不容易。他对张颖说：“既然陶铸同志欢迎你们去广州，你们可以去，但准备工作要充分，你们应该把全国剧作家的情况，及各级领导的情况作个比较详细的调查，问题搞清楚后再来向我汇报一次。”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文化部和剧协立即组织几个调查组分赴几个大区、省、市了解有关情况。调查组发现，在文艺界，戏剧界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有的作者在运动中受到过人的批判与斗争；有的艺术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有的领导人不按艺术规律办事，瞎指挥，有的批评粗暴简单，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创作人员的政治待遇、学习与创作条件等。各调查组的报告最后汇集到周恩来那里，使他进一步感觉到摘去知识分子头上的这顶“资产阶级帽子”是多么紧迫。当张颖再一次走进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会议筹备情况时，周恩来态度坚定他说：“你们去广州，请陈老总打头炮。会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造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振奋一下人心。”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紫光阁内，总理交心

虽然，文化部和剧协的同志为召开广州会议做了充分、认真的准备，但是，周恩来仍旧放心不下，他深知，这些年积累的问题太多了，要想统一思想，端正认识，谈何容易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周恩来决定，先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开个会，谈一谈，通通气，为广州会议能够成功地召开做个准备。

1962年2月1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一百多位在亨的艺术家应邀走进中南海紫光阁。这使一些人想起二年多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周恩来曾经向他们讲了一次话，谈的是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虽然，那次讲话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是，周恩来当年的声音至今留在广大艺术家的心中，激励他们在困境中前进。

周恩来走进紫光阁大厅，望着眼前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的心情非常激动，二年多前那次相会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他有多少话要向朋友们一吐为快啊。

首先，周恩来对二年多前的那次讲话做了结论，他说，“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是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充分肯定了这几年艺术家们的创作成绩。他说，五八、五九、六年，话剧、歌剧、儿童剧、电影方面产品很多，创作繁荣，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时候的特点是敢于厚今薄古，敢于面向前途，增加了民族自信心，敢于批判外国的、旧的、不好的东西。问题是“打破了旧的迷信，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比如，今天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中国的一切都好，外国的一切都坏；骂倒一切，他说，这又犯了另一方面的片面性，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怎么能以今天的尺度去量过去那个时代的作品呢？”周恩来的话，解除了在座一些朋友的思想负担。

对新的迷信束缚作家思想的现象，周恩来做了具体分析。他以自己的老朋友，剧作家曹禹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周恩来说：曹禹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反而有了束缚。为什么要以曹禹为例呢？周恩来深有感情他说：“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周恩来的话虽重，但犹如细雨润心田，在座的人们无不为他朋友式的谈话而感动。

周恩来认为，这次会议，我们就是要破除新的迷信，解放思想，敢说敢想敢做，纠正文艺工作中一些“左”的偏向，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讲话中，周恩来通过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矛盾冲突、艺术真实等问题，阐述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批判了这些方面存在的片面性。他认为，纠正这些偏向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只有正确的领导才能真正的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周恩来强调，政策上的偏差，中央是第一位的责任。运动中有偏差，我们代表党向大家道歉。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真心诚意的自我批评，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最后，周恩来满怀信心他说：新的局面来了，现在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但是还会有一个时期的困难，可能对作家在物质上的照顾还会有些不便的地方，但从政治条件上看，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政治上出现了新局面，文艺上也一定会出现新局面。希望大家到广州去，把座谈会开好。这次紫光阁“预备会”，确定了广州会议的指导思想和讨论内容。

广州会议，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广州会议召开时，周恩来正在北京主持起草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忙，他本来不准备去广州，而是请陈毅作代表去讲话。是聂荣臻反馈回来的关于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知识分子要求“摘帽”的呼声，使他下决心亲赴广州解决问题。

2月25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人大报告起草情况，并告知准备和陈毅一起去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周恩来和陈毅到达广州。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陶铸就到艺术家下榻处探望。会见的房间里挤得满满的，不少队各地方来的同志，周恩来不熟悉，他就一一地询问，从姓名、籍贯到创作，态度亲切，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大家都很兴奋，详细地回答着周恩来的提问。

那天，聂荣臻、郭沫若等向周恩来汇报了与会代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种种顾虑，强调这个问题严重阻碍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贯彻和知识分子积极性的调动，希望能够在这次会议上予以解决。经过小范围充分酝酿讨论，决定在这次会上增加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由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为统一思想，3月1日，周恩来约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进一步就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开展讨论，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做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的话为他在广州会议讲话的主题最后定调。

3月2日，两个会议的代表齐聚羊城宾馆，当周恩来、陈毅、陶铸等步入会场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报告的题目是：《论知识分子问题》。同1956年的报告相比，周恩来着重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不同。他指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卖国贼，成为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从理论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我国知识界的根本转变和极大进步。为论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周恩来引用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殊形式的联盟”。周恩来认为，列宁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包括了知识分子，因此“付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并提出要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讲话中，周恩来批评了1957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要对那些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

对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反映强烈，大家普遍认为“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

因为工作忙，周恩来未等会议结束就提前返京了。他还要说的话留给了陈毅。

3月5日、6日，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陈毅的话句句掷地有声，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

话音未落，整个大厅响彻起雷鸣般的掌声。一张张含泪的笑脸被机敏的摄影师摄入镜头中。

陈毅动情了，他接着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这感人肺腑的话语，使与会者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向外涌流，是委屈，是激动，还是幸福，谁也说不清。

这样的结果，是许多代表们没有想到的，因此，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消息传出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也产生很大反响，周谷城先生曾讲过一段肺腑之言，他说：“知识分子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终是作客的思想，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如今，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周谷城的话，代表着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它表明，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换来的是几百万颗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事业的炽热之心。

知识分子问题又起波折，邓小平最终完成周恩来的心愿

对广州会议的强烈反映，深深地触动了周恩来。尽管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但是，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进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他在报告中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作了更明确的阐述：

“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则强调：“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自觉地、逐步地进行，而不应该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更是错误的。”

周恩来的报告，坚持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根本上继承了他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出的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它对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重要影响。

但是，周恩来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对这个问题持不

同意见甚至明确反对，特别是由于中共中央对 1957 年以来工作中产生的“左”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清理和纠正，因此事情很快发生波折。

1962 年 9 月，也就是广州会议半年之后，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 1957 年反右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这种背景下，党内围绕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重新展开讨论。

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就知识分子“摘帽”问题进行了讨论。从广州会议以来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表态的毛泽东讲话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在这个时期中，有些人开始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没有阶级观点。11 月 26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教育问题时，周恩来对这些指责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观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中都是这样提的。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这一争论作出了公正结论。他说：对知识分子“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人大报告所说，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那是中央批准的。”

尽管周恩来为坚持正确的意见做了巨大努力，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差愈来愈严重，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估计再次被否定。如果说，周恩来留下许多遗憾的活，那么没有能够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这顶帽子于应该是其中之一。周恩来的这个心愿是邓小平实现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勇敢地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说话，提出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些观点是对周恩来 1962 年广州会议讲话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知识分子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三到大庆激励创业者

首次视察大庆的周恩来，
大声说道：“时间不多，要抓
紧在大庆多看几眼”

1962年6月21日，坐落在沃野千里的黑龙江松嫩平原上的大庆油田，红日高挂，碧空如洗，空旷的原野芳草萋萋，呈现一派勃勃生机。这天上午10时30分，周恩来偕同邓颖超，在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负责人余秋里、康世恩陪同下，由齐齐哈尔乘火车首次到大庆视察。这时的大庆，正是全体大庆人住干打垒，以5两干粮加野菜，保一日三餐，为摘掉中国贫油国帽子而进行大会战的艰苦创业的时候。在火车站，周恩来的脸上充满敬意，无数次紧握前来欢迎的创业者们的手，不断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周恩来谢绝了大家要他先休息一会儿的劝说，大声说道：“时间不多，要抓紧在大庆多看几眼。”出了火车站，他就直奔1202、1203钻井队现场。当周恩来登上钻台和钻工们握手时，一位也想握手的钻工，不好意思地一个劲将自己满是油污和泥浆的双手往衣服上擦。见此情景，周恩来马上走过去握住他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

周恩来的这一举动，拉近了钻工们和一个国家总理的距离，钻工们畏缩拘谨的心情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周恩来靠拢，并把他团团围注。

趁此机会，周恩来同他们拉起了家常：“多大年岁啦？”“当了几年钻井工人啦？”“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作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地询问，了解情况，一面专心致志地听取大家的回答，时而投以赞许的目光，时而开怀大笑。

当钻工们介绍国产钻机性能还不错时，周恩来鼓励说：“要再接再厉，多打井，打好井。”

钻工们提出要与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爽快地伸出双手，分别搭在身边的两位老钻工肩上。瞬间，留下了人民总理和钻井工人水乳交融的珍贵镜头。

周恩来来到北二注水站。这是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首先建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他看到岗位上的工人，人人自觉按岗位责任制的要求操作，搞化验一丝不苟地化验着水质，看泵的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压力表上显示的注水压力变化，感慨地说：“你们的岗位挺重要啊！”在泵房里，他浏览了贴在墙上的各项岗位责任制，边看边评论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当他发觉泵站流程图没填写绘图时间，就建议“要把时间写上”。邓颖超补充说：“记上日期，别人看着明显。”从泵房出来，陪同人员示意时间不早了，应该结束参观了。周恩来毫不介意地说：“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高兴啊！”这样，他又马不停蹄地视察了好几个地方。视察中，周恩来惊叹大庆人以苦为荣，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为大庆人创造性地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种种难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在职工食堂，周恩来一面同大师傅握手问好，一面掀开锅盖，用勺搅正煮着的红高粱米粥，还亲口尝了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他深切地对大师傅说：“你们很辛苦啊！”

大师傅急忙客气地回答：“不辛苦”。周恩来环视了一下四周，坦诚地对在场的大庆人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当天晚上，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自发聚集到火车站的大庆创业者的欢送下，急匆匆地离开了大庆——这个令他感慨万千和深切怀念的地方。

二到大庆的周恩来赞许道：“这是你们大庆人自己创造的严细作风，四个一样好，我要向全国宣传”

一年后的6月19日上午11时，周恩来第二次来到大庆视察。愈来愈多的抽油机挺立在空旷的原野上，使他真切地感受到：真是一年一个样啊！

周恩来再次来到1203钻井队现场。在人群中，他一眼就认出一年前见过面的小李，大步走过去，紧紧握住小李的手，高兴地说：“李清明同志你好！”他像久别重逢的老相识、老朋友一样，同钻工们畅谈，详细询问他们一年来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尤其是与钻工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生活情况，他问得最多最细。

周恩来得知身边的一位工人是湖南人后，关切地问：“湖南人部吃大米，在东北要吃粗粮，你能习惯吗？”这位工人冲口而出：“总理，粗粮细粮我都能吃，只要为国家多产油，吃什么都行！”

“多好的工人啊！有这样的工人，何愁建不成世界第一流的大油田呢？”周恩来暗中思忖道，并带头为他鼓掌。

在轰隆隆的钻机声中，当周恩来得知钻工们立下雄心壮志，决心用3年时间钻井10万米时，他大声鼓励说：“好！要有雄心壮志，要敢于创新指标！”

在大庆最大油库——西油库，周恩来环顾四周油罐群，遥望远处装油栈桥和长长的输油管道，他叮嘱工人要增强主人翁的使命感和安全生产的责任心，语重心长地说：“这地方很重要，一定要搞好安全生产。”

随后，周恩来参观装油栈桥。在4米多高的栈桥上，他观看了工人的油罐车装油表演，并对栈桥上没有一点油污感到很满意。他问：“你们在冬天和雨天工作，怎么办？”“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要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工人畅快地回答说。

周恩来点了点头，赞许道：“这是你们大庆人自己创造的严细作风，四个一样好，我要向全国宣传。”大庆人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再次深深地感动了周恩来。

从50年代开始，对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最勤、宣传最多的周恩来，在中三转油站得知站在他身旁的采油指挥部会计李英只要两个小孩，她的爱人已做绝育手术后，兴致勃勃地对她说：“你俩是模范夫妇。”随即，嘱人把李英的爱人找来一起合影留念。他从不放弃在群众中宣传计划生育的机会。

在西油库，周恩来了解到女医生杨洪文24岁尚未结婚，亲切地向她介绍说：“咱们的陈外长40岁才结婚，是晚婚的模范。”笑容可掬的陈毅，把话接过去，诙谐地说：“你要向我学习。”当杨洪文爽快地表示一定向陈毅学习时，周恩来饶有风趣地引导说：“不，不，降低条件，30岁就行了。”一场宣传晚婚的思想工作，就这样诞生于易于使人接受的妙趣横生的谈笑之

中。

在这天参观中，周恩来多次叮嘱黑龙江省委和油田领导人：要提倡与宣传晚婚和晚育。

这一年，大庆原油产量达到 430 多万吨，为实现我国石油基本自给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介绍了大庆经验。他指出：

这个油田的建设，是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就是通过大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这个油田的建设，自始至终地坚持了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相结合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三到大庆的周恩来回到北京 8 个月
后，仍赞不绝口地说：“1962
年我去大庆，那真称得起是‘艰苦
奋斗，自力更生’的典范”

1966 年 5 月 13 日中午 12 时 30 分，周恩来在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陪同下，第三次到大庆视察，受到油田负责人徐今强、宋振明等和 16000 名油田职工的热情欢迎。

午饭后，周恩来乘坐大客车首先观看了油井出油的情况。当采油指挥孙燕文汇报油田全部油井都生产旺盛、保持自喷时，周恩来严肃地问道：“你们没有自己夸自己吧？”孙燕文回答说：“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好。”周恩来接过话茬说，面庞上泛起了久久的笑容。

在钻井现场，宋振明介绍 1202、1205 钻井队都决心在当年分别打井 5 万米，超过苏联功勋钻井队。听完宋振明介绍，周恩来给予坚决支持，说：“他们两个队，如果每个队打井 5 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他们，给政治鼓励，你要给职工讲！”

周恩来登上钻台，详尽了解钻井情况，观看了钻井大队长、铁人王进喜起钻、下钻和接钻杆的操作表演。泥浆溅在身上，他也毫不介意。当他看到一次就从近 1000 米的井下取出 64 米长、比茶杯还粗的岩心时，连声说：“好！好！”

离别时，周恩来深情地握着 1202 队老队长张云清和 1205 老队长王进喜两人的手说：“你们两个队，今年每队如果打上 5 万米，要告诉我，给我发电报，我一定替你们向毛主席报喜！”

在周恩来的鼓励和关怀下，到年底这两个队打井都超过 5 万米，创造了全国新纪录。以后，由铁人工进喜带队到北京，向周恩来报了喜。周恩来则满腔热情地邀请王铁人一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

周恩来来到炼油厂，仔细地观看了墙上的岗位责任制度和巡回检查路线图。他在认真询问了执行岗位责任制度的情况后，表扬道：“你们厂管理得不错，你们先进！”

接着，他对陪同的康世恩说：“我们的炼油技术也有进步，这个炼油厂

的人员在国内也不算多，但比国外就多了，我在非洲看过一个炼油厂，他们人很少……”弦外之音，他是在激励大庆油田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不要自满，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白天，周恩来从油井到钻井场，再到工厂，路程约70公里，却毫无倦意，总是谈笑风生。这大概是大庆油田3年来所发生的

新的重大变化，使他忘却了疲劳吧？！

8个月后，周恩来仍赞口不绝地说：“1962年我去大庆，那真称得上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范。”“大庆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5年功夫石油产量由97万吨跳到去年的1060万吨，这是伟大的成绩。”

夜幕降临，周恩来和大庆人共度了一个不眠之夜。

23时30分，周恩来召集座谈会，听取石油部副部长兼大庆党委书记、指挥徐今强汇报大庆工作。

在听取汇报中，周恩来十分关心对家属来油田的安置、农副业生产和计划生育问题。他说：“这里有工人58000人，来队家属24000户，还有34000户没有来，职工每年放假回家，也会造成很大矛盾，你们组织家属参加劳动，自力更生好。粮食少，少来，粮食多了，家属可以多来。”“同时要抓节制生育，有时女同志思想通了，男同志思想不通，反正都有矛盾。”

午夜24时，周恩来约康世恩、徐今强谈话，就把大庆建设成

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问题，试验改革教育制度、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创业的好传统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在康世恩等的催促下，一直孜孜不倦工作的周恩来，到5月4日凌晨3时才熄灯睡觉，可是到5时，他又起床办公，阅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

上午9时，周恩来视察油田北区输油管道施工现场。他驻足于一块黑板前，细细品味了一首工人写的小诗。不一会儿，他对身边的新闻记者说：“你们这些记者，这些工人写的诗歌不快记，记什么？”

接着，周恩来转身对康世恩、宋振明说：“你们记住这首诗了吗？我背给你们听：

没有经验靠实践，
遇到困难学‘毛选’。
专家大家是一家，
排山倒海力量大。”

“对不对？”周恩来问大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一字不差。”他的好记性，引来了一片赞叹声和一阵热烈的掌声。在现场的工人无不感佩他对工人阶级的深情厚意。

周恩来来到一处高地，右手指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大油田说：“既要搞好油田建设，又要多种树，搞好绿化，尽量保持植被，建设新型矿区！”

周恩来的工作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节目”一个紧挨一个，每一分钟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了。

10时，周恩来参观新建的工农“丰收村”。在这里，他指挥大家一起唱《大庆家属闹革命》等歌曲。顿时，恢宏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

歌声停住后，周恩来瞧了瞧跟随参观的各方人士说：“来大庆，不学会几首大庆歌曲能行吗？”

11时30分，周恩来参观家属缝补厂……

下午14时，照像……

14时20分，出席欢迎外宾大会，15时40分结束。

视察中，每当有自动聚集的欢迎人群时，周恩来总要叫司机把车开慢点，总要打开车窗向群众挥手致意。

16时，周恩来在临时直升飞机场同送行的油田负责人一一握手道别，并一往深情地留下了希望与寄托，说：“谢谢你们！大庆又有进步了，大庆是成功的。”但是，“你们可不要忘记一分为二呀！”他这次来大庆，共度过了28小时。

“欢迎总理再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油田负责人依依不舍地回答说。

三次来大庆视察厂29个单位，接见过数万大庆人的周恩来，点了点头，也恋恋不舍地说：“有机会一定来。”

直升飞机徐徐升空，在发动机的轰隆隆声中，周恩来慢慢悠悠地飞离大庆。

周恩来始终惦记着油田的生产和建设，对大庆人的情未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周恩来一直惦记着大庆油田的生产和建设，对大庆人的情未了。

为了保护大庆油田，周恩来决定继鞍山钢铁公司之后，对大庆油田也实行军管。1967年1月，他亲自修改了关于在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针对有人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阴谋，他在决定的一开头就加上了“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典型。”随即，他亲自送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常委审定批准。

这年3月，周恩来在向石油部副部长谈起这个决定时，神情严肃地说道：开头第一句话关系列大庆的政治生命问题，这是总体。我是不会掉以轻心的，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

1967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全国石油系统职工代表和铁人王进喜。他亲切他说：大庆，是毛主席亲手树起来的一面红旗，我们要爱护这面红旗。

接着，周恩来面带温色，气愤地说：为什么有的人硬要反对这面红旗？为什么他们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为什么？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

说到这里，周恩来扳起指头，一一论列了大庆石油大会战取得辉煌胜利的原因。他说：

大庆会战，我们靠什么打了这个胜仗？首先，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其次，靠广大会战职工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再其次，就是全国各方，可以说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单单有这3个条件，如果没有组织这次会战的领导人，没有组织这个会战的领导班子，等于说打了一个胜仗没有指挥员，行不行啊？不可能嘛！

接着，周恩来怀着激动的心情回顾了自己视察大庆的情景，说，我曾3次到大庆，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厂矿像大庆这样取得那么伟大的成就。所以，毛主席提出除了学习解放军，还要学大庆，学大寨。他们是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了。

多么中肯的分析，多么有力和多么及时的支持啊！

全体大庆人和铁人工进喜把周恩来对大庆的爱，深深地埋在心里，并把它当成搞好生产、争取更优异成果的强大推动力。

由于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极左思潮的干扰，合理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致使1970年大庆油田出现了压力下降，油层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的严重情况，原油生产月月欠产，完不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

3月11日，忧心如焚的周恩来听取了由他亲自请到北京的铁人工进喜的汇报。3月18日，他在石油部军管会报送国务院的《关于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大庆不要忘记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由于周恩来的亲自干预，大庆油田很快扭转了“两降一升”的严重局面，使原油生产恢复了正常。

1974年，大庆油田原油产量达到4100多万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大抓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大庆油田原油产量在这一年里增加到4626万吨。1990年，康世恩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大庆油田从发现、开发建设到如今，已经30个年头了。从1966年至1988年，大庆为国家生产原油9亿多吨，财政上缴800多亿元，出口原油1.05亿吨，换取外汇242亿美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大庆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浸透着周恩来总理的心血。

真诚召唤落叶归根

1965年7月18日，一架波音707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徐徐降落。机舱的门打开，一位神情激动，眼含泪花的老人步下舷梯。

他，就是旧中国最后一位总统李宗仁。

早已在此等候的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迎上去，热情而真诚地伸出他那双温暖而有力的大手，亲切地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当两双曾经合作过，也曾经交战过的大手紧紧握到一起时，摄影师按下快门，留下这历史的瞬间。

整个中国轰动了，整个世界轰动了。人们不仅为前者的明智选择，也为后者的宽宏接纳而慨叹不已。这时候，只有李宗仁心里最清楚，没有周恩来的真诚召唤，何以有自己今天的落叶归根啊。

一篇令世界瞩目的声明震动 了一位老人的心

1955年4月，阳光明媚，鸟语花香。

在印度尼西亚美丽的城市万隆正在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篇令世界瞩目的声明。

声明写道：

“ 中国人民政府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

这时，没有人能够想到，这则声明发表后，竟如此强烈地震撼了一位栖身异乡的老人的心。他，就是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后，李宗仁任代总统。但是，他上台后，没有能够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他带着失败的耻辱离开大陆远赴美国。

在美国，李宗仁曾经企图依靠美元寻求第三条道路。但是，没有多久，他就意识到这是一项错误的选择。因为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它犹如一条巨龙，在东方腾空而起。李宗仁不能不承认眼前的事实。他曾指着报纸上的大陆新闻对朋友赞扬说：“共产党真了不起！”当然，最令他折服的还是周恩来这篇导致他改变人生道路，萌生“落叶归根”的声明。

万隆会议后，李宗仁异常兴奋地致信在香港的；日部程思远，要他代为起草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程思远收到信后，立即找到在台湾中央大学任教的罗梦册先生商议此事，由罗起草了一份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大纲。李宗仁根据这份大纲，亲自写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分别提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艾登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并于6月11日在纽约公开发表。

这份建议指出：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个完整部分”，“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可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所谓联合国托管，中立化或两个中国的理论，作用在使台湾与中国分离。这正与一般

的统一倾向，如德韩及越南的情况背道而驰。”

这个建议可以说包含着李宗仁复杂的个人考虑，但是，也反映出，他在政治立场上的重要转变。

李宗仁的政治动向立即引起中国有关部门的重视。8月14日，李克农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分析：李宗仁提出这一建议主要有两层原因：第一，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发表了关于中国愿与美国直接谈判的声明后，国际舆论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日高；第二，我闰政府对蒋介石集团分子的宽大政策和这年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返国的实际影响。李克农认为，鉴于此种状况，加上我方的争取工作，“李宗仁靠拢新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周恩来看到李宗仁的建议后，也给予中肯的评价，他说：“这个建议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这番话是对李宗仁发出的真诚召唤，也是对一切身居海外的爱国人士的真诚召唤。从此，争取李宗仁回国的的工作，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秘密而稳步地开展起来。

响应周恩来的召唤， 程思远决心赴北京

长时间中，周恩来反复思考着，李宗仁身边究竟哪一位能对他起作用？工作究竟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一天，周恩来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研究这件事，谈话中，有人提到李宗仁请程思远起草建议大纲的情况。“程思远？”好熟悉的名字，周恩来思索着，追寻着……

那是1938年，广西军队出师抗日途经武汉。当时，周恩来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副部长，经常被各方面部队请去做政治报告或出师动员。桂系将领白崇禧听到周恩来在武汉，立即派程思远去请他，为广西学生军训话。那时候，程思远年轻有为，受到李宗仁的重用。想到这里，周恩来眼睛一亮。对，就从程思远工作做起。

经过反复慎重商议，工作计划定下来。周恩来的心也定下来。他令有关人员一定要把程思远请到北京来。

不久，居住香港的程思远获得一个口信，原国民党桂系元老，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李济深来了电报，请他到北京一叙。口信中允诺，这件事第一绝对保密；第二来去自由。后来，程思远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策动我回国这件事只是以李济深的名义，而实际是周总理亲自过问的。”事关重大，程思远不能不反复权衡利弊，周密思考。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周恩来在大陆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呼吁：海外知识分子要为统一祖国大业做贡献。这篇讲话犹如细细春雨，滋润着程思远的心田，他深深地感动了，在事先没有征得李宗仁意见的情况下，独自做出了赴北京与共产党接触的决定。

程思远后来回忆说：“我认为，共产党讲话算数，特别是这些话，由周恩来公开讲出来，那么我感觉回国时机是适宜的，心底是踏实的，因为我信

任周总理。如果不是周总理讲这个话，我也许不会回来。”程思远的选择，得到许多老朋友的赞许。1965年，屈武先生陪同李宗仁、程思远到国内各地参观时对程思远说：“1956年周总理的号召只是一个普遍的号召，而你这件事却办成了，居然做到了，真了不起啊！”程思远不无激动他说：“如果没有周总理对我的关怀，结果还不一定是什么样子。”

真情打动程思远 往返奔波不辞劳

正像程思远所感受的那样，在争取李宗仁回国长达近十年的艰苦努力中，他五次北上京城，每次都是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周恩来的工作之细致，设想之周密，是程思远始料不及的，他亲身体会到，是周恩来为李宗仁平安回到祖国铺设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1956年4月28日，古老的北京迎来了一位身负重任的客人。这是程思远第一次进北京。

虽然，周恩来和程思远还是十八年前见过面，但他还是一眼认出了这位高个子使者。十八年的岁月风尘在每一个人脸上都留下了不可磨去的印迹，但是，在程思远眼里，周恩来像十八年前一样目光炯炯，笑容可掬。不同的是，在周恩来身上又看到了一个大国总理所应具有的特殊风度。

5月12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大厅中，周恩来同程思远进行了亲切、愉快的交谈。周恩来深知，这些身居海外的朋友对我党的政策并不十分了解，而这又是他们选择道路，决定人生命运的重要依据。因此，第一次交谈，他就坦诚地向程恩远阐明了中共的内外政策，说明当前中共的基本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周恩来指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减相见。他情谊恳切地对程思远说：“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这是他第一次把新中国争取李宗仁的工作提到国共再度合作的高度。接着，周恩来话锋一转，落到争取李宗仁的工作上，请程恩远将这一信息转达海外人士和李宗仁。程恩远为周恩来的深情所打动。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内心十分兴奋，尤其是周总理让我把他谈话的精神转达给海外人士，并且邀请李宗仁先生在适当的时候回来看看，这是周总理给我的光荣任务，我当即表示愿为此而努力。”

1958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程恩远的女儿林黛回香港探亲。她向程恩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落叶归根的心愿。这是李宗仁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信息，周恩来非常重视。1959年，国庆前夕，周恩来召见程思远，充分肯定了他这个阶段的工作成绩，并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10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恩来又一次见到程恩远，他在谈话中对程思远说：“李先生出于爱国热诚，要向国家贡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意愿，估计他当前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提出，要李宗仁先到欧洲与程见面，然后再做决定。

“时机尚未成熟”，周恩来的估计是正确的。当时，国内形势比较复杂，

大跃进带来的后果已见端倪，国民经济已出现困难。但更重要的是，李宗仁虽然有了归国的意向，但思想准备不充足，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仍对美国抱有幻想。另外，李宗仁的处境也很险恶，一直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特务的监视，稍有不慎，出现闪失，造成的影响是难以挽回的。

这些情况说明，工作的难度还是相当大。周恩来嘱咐程思远，一定要从思想上帮助李宗仁摆脱对美国的幻想，靠拢新中国。

1960年底，美国大选揭晓，年轻的海军军官肯尼迪当选为总统。这使李宗仁产生一种错觉，他认为麦卡锡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国会中援蒋集团的头目诺兰也失去政治影响了，应该鼓动肯尼迪改变对华政策。因此，他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一方面祝贺他当选总统，一方面促进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肯尼迪的回信中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邀请程思远到北京商谈。1961年6月，程思远应邀到达北京。周恩来同他谈话中，请他传话给李宗仁：“目前肯尼迪政府困难重重，不能期待其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李先生的立场应当超然一点，不要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总的说来，肯尼迪不可能对中国采取新的立场。”

事实的教育和周恩来的提醒，使李宗仁的思想日渐靠拢新中国。1962年11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李宗仁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中对尼赫鲁的思想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文章指出，尼赫鲁第一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矛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文中同时指出：美国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作法对美毫无裨益，只能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1963年夏，李宗仁会见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谈话中，他声称：“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他承认：“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周恩来精心策划， 程思远不辱使命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李宗仁回国的准备工作也在悄悄地进行。

1960年秋天，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赶到香港与程思远商定在欧洲会面的地点、日期以及联络办法。为躲避美蒋特务盯梢，最后选定会面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因为那里是中立国，又是著名的风景游览区。另外，还有郭德洁女士的弟弟所开中国餐馆做掩护。李宗仁以旅游名义前往，不致引起外人的怀疑。为了这次会见，从周恩来提出建议算起，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这一次李宗仁欧洲之行的意义，直到1965年才真正为人们所理解。

1963年11月，程思远赴欧洲之前，又一次赶赴北京，同周恩来在紫光阁彻夜长谈。他向周恩来倾吐了李宗仁“回国心情甚为急迫”的近况。说“去年4月，李宗仁函告张发奎，他死后希望把骨灰扬于祖国东海；今年9月又致信黄旭初，说已感到气喘，想到港居住；最近又公开表示要去法国。说：

‘只要对祖国有所裨益，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程思远又说：“这些都表明，李宗仁有老年人的一种自然变化，怀念祖国，不愿老死异域；叶落归根，向历史最后交代，希望中共给予考虑。”

周恩来仔细听完程思远的话后，首先肯定李宗仁是有爱国心的，接着，详细分析了李宗仁的基本情况，指出他目前还受到美国、台湾、第三势力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周恩来说：“我们看他是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但要劝他摆脱以上四个方面的关系。”周恩来认为，李宗仁对第一第二两个方面的关系可能已经断了，这次经香港去欧洲要注意防止第三势力的纠缠。至于第四个方面可能还未完全摆脱，周恩来坦率地说：“李先生总想在中美之间做点事情，这下符合我们的国策。美国武装力量不从台湾地区撤退，就谈不到中美恢复邦交问题。”总起来说，“我们对李先生向往祖国表示欢迎，但不强求，‘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

对李宗仁到欧洲的选择，周恩来设想了四种可能：第一，重回美国，料理些事情。如他有这个意思，不必勉强；第二，回来看看，注一个时期，然后再出去，我们保证他来去自由，保守秘密；第三，留在欧洲。他考虑留在外边为祖国做一点事情，我们欢迎，如生活上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第四，如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

周恩来的考虑十分周到，他继续说：如果李宗仁决心回来，我们一定要从各方面替他设想周到。祖国已经解放十四年了，各方面变化很大，需要过“五关”。什么是“五关”呢？这就是思想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他对程思远强调，一定要把国内的实情告诉李宗仁，告诉他国家还存在许多困难和不足，这不是使他失望，也不是条件，而是言之在先，让他做好思想准备。

在一旁聆听的程思远望着周恩来真诚的目光，胸中涌动起一股暖流，眼睛不禁湿润了……

谈话从深夜到黎明，程思远告辞出来，心里既踏实又充实，一夜的疲倦仿佛消失殆尽。

圣诞节前一天，程思远带着周恩来的嘱托满怀信心飞往苏黎世。

程思远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李宗仁了。但是见面后，他顾不上畅叙怀念之情，而积极转达了与周恩来彻夜长谈的内容。话未尽，李宗仁已经感动不已，仿佛置身于新中国温暖的怀抱中。他坚定地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我只要选择一条路，回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经过充分的准备，李宗仁回国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周恩来用心良苦， 李宗仁回国在望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当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美国新泽西州时，再一次震撼了李宗仁的心。回想起国民党统治中国多年连一部像样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他对新中国由衷地折服了。如果说，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发表的那则声明，使他萌发了回归祖国的初衷，那么这则消息就坚定了他回国的决心。

但是，就在这一年，李宗仁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当时，中法建立外交关系，李宗仁为此写了一封公开信，在美国报纸发表，要求美国政府追随法

国同中国建交。但在信中，他错误地断言朝鲜战争是中国发动的。不过，很快，他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言论。

1965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李宗仁的动态上批道：“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毛泽东的宽怀加速了李宗仁回国计划的实施。

这年3月，李宗仁致信程思远，表示急于回国参加建设。程思远接到信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果断决定“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美飞欧。这是他回国的第一程。由于有1963年欧洲之行的“预演”，李宗仁这次离美几乎没有受到美国情报系统的怀疑而很快获准了。直到这时，许多人才深深体会到周恩来1963年要李宗仁先到欧洲商谈的良苦用心和深远意义。

程思远前往欧洲迎接李宗仁。临行前，周恩来请他立即赴京一商。程思远因办手续耽搁了到达北京的时间。

6月18日，程思远赶到北京的当天，周恩来刚好离京出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等接待了程思远。周荣鑫对他说：“周总理对非洲国家进行的友好访问是早就安排好的，他等不及

了，已经在上午起飞。但是，对李先生回归祖国的有关经费、技术、路线等各方面的问題，都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周恩来确实想得很周到，他留下的意见是：第一，送程思远一笔去欧洲的旅费，同时也带给李宗仁一笔旅费；第二，有什么问题可以找统战部这几个同志商量，他们可代总理作答复；第三，要程思远立即返港赴欧迎接李宗仁回国。周恩来特别提到，在苏黎世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中国大使馆帮助，那里已做了安排。

周恩来出访回国后，不顾旅途劳顿，立即着手迎接李宗仁回国。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在民主人士中，有一些人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花这么大气力来争取李宗仁，因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就在李宗仁飞离苏黎世的当天，周恩来召集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及桂系有关人士进行了座谈，借此机会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介绍了准备迎接李宗仁回国的情况。章士钊先生插话问道：“现在是否最后定了，李先生是否会转去台湾？”周恩来立即肯定地回答：“李宗仁不会去台湾。”他说：“李宗仁这次回来是自觉的，过去他就提出要回来，我怕他回来生活过不惯，劝他以后回来。毛主席高瞻远瞩，欢迎他回来，来去自由嘛。”

周恩来提出：李宗仁到京时，希望大家都去迎接。谈到这里，他转向张治中说：“这次我是否去迎接还未报中央，你回来时，我没有去接，因为你先去奉化才来北平。这次我如果去接李宗仁，你可能会有意见吧？”张治中连忙解释：“总理愿意就去接，我没有意见。”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对大家说：“这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对李宗仁的安排要商量，你们同他如何相处，如何影响他，也请议论议论。我工作虽多，也要抽时间见他。你们工作不多，可同他多谈谈。”

由于周恩来的耐心工作，统一了民主人士的不同认识。一些人十分感慨地说：无论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还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推翻的

统治者不是送上断头台，就是送上绞刑架，只有在新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奇迹。

树高千尺 落时归根

1965年7月13日，李宗仁经雅典、贝鲁特飞抵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

为确保李宗仁归国途中的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一定要取得巴方的支持。

当李宗仁的座机抵达卡拉奇机场时，巴方出动警车急速驶入机场停机坪，军警登机进入机舱直接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接入警车安全送到中国驻巴使馆。

7月17日深夜，在丁国钰陪同下，李宗仁、程思远一行登上巴航公司的一架飞机飞往广州，开始了回归祖国的最后一程。

就在这天深夜，已到上海迎候的周恩来接到情报：台湾方面已获悉李宗仁回国的消息，在缅甸边境某地区布置了截击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李宗仁的座机。

周恩来彻夜未眠，静候在电话机旁。当接到报告：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已平安进入我国境内后，他才上床去休息。

7月18日，在上海虹桥机场出现了本文开始令世界震惊的一幕。

7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内部俱乐部会见了李宗仁、程思远一行。周恩来重申了“来去自由”的原则，特别强调了李宗仁与“四种关系”。谈到美国时，周恩来说：“经过抗美援朝，美国已经知道中国的力量。”他详细回顾了中美十年谈判的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不拿原则作交易，这一点，连陈诚也不能不为之动容。据台湾方面资料记载，陈诚去世前的遗嘱中没有再提“反攻（大陆）”和“反共”，这一现象或许与中共在对美问题上表现出的民族原则与立场是分不开的。关于蒋介石，周恩来说：“根据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接触，‘没有一句真话，不以信义待人’，‘然而蒋虽不可信，但台湾保存在蒋手里还是比让美国霸占去好’。劝李宗仁‘对台湾问题不要干预’。至于第三势力，周恩来认为是没有前途的，中美关系还不是解决的时机，他希望李宗仁认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不要再抱幻想。”

这是周恩来同李宗仁第一次长谈。谈话中没有更多的客套，却句句充满了真诚。程思远感慨地说，“周恩来关心的不是李宗仁个人，而是祖国的统一大业。李先生的归来也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对他个人的争取，而是为发展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

李宗仁回国的消息随着电波传向海外，传向世界各地。深深震撼了许多人的心。台湾《天文台》报社长陈孝威评价说：“李宗仁这个抉择，聪明而正确，李的勇气是应该佩服的。”他还说：“数天下人物，毛泽东确是第一人。毛在中国，其成就实非过去许多人所能预料得到。难能可贵者，他的许多做法都是新的创造。新创造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毛能发扬好的，消除不好的，这就是他的成功处。我一向骂共产党，但现在内心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

遗憾的是，李宗仁回国的第二年，中国大地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对他竭尽全力进行了保护，得到他的理解。1969年，李宗仁去世前，在病榻上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短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称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这封信包含着周恩来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全部意义。

首访非洲 十万八千里探路

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起，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开始觉醒。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新中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纷纷电贺和承认非洲独立国家。新中国也由此进入了第二个建交高潮期。

1963 年 12 月 14 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踏上正在觉醒的非洲大陆，拉开了首次出访非洲 10 国的序幕。

在文明古国阿联，纳赛尔总统 称周恩来为“亚洲的杰出战士”

12 月 13 日，北方的气候寒气袭人，但周恩来一行从昆明机场登机时，心里的感觉与美丽的春城一样温暖如春。在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上，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澎……与周恩来总理一道，告别了熟悉的国土和欢送的人群，开始远航。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这之前应邀访问肯尼亚，他将由肯尼亚直飞开罗与周恩来等人会合。

经过 10 几个小时的飞行，14 日中午，专机终于进入非洲第一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这里的气候，与中国首都北中的寒冷正好相反，烈日当头，酷似盛夏。汗罗机场叠叠重重、热烈欢呼的人群，进一步为环境加了温。

当天下午，在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的陪同下，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周恩来、陈毅等人，他把一枚精制的“共和国颈章”，亲自挂在中国总理胸前。在随后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24 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 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12 月 16 日，周恩来出席了阿联第九届科学节大会。纳赛尔总统在大会讲话中称周恩来为“亚洲的杰出战士（英文报纸译为：‘杰出领导人’），人类最初思想世纪古老的先锋文明创造者和目前站在现代历史潮流有影响力量和其动力的中国革命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这些称赞，是少见的。也许是翻译上的问题，或者是电码的疏漏，这些称谓有些绕口和晦涩，但是，这确是当时孔原、黄镇，童小鹏联合发回北京的综合报告中的记载。

在纳赛尔称赞周恩来为创造人类古老文明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时，周恩来对古埃及的灿烂文化也同样有着极深的感受。12 月 19 日上午，

周恩来、陈毅一行在总统会议委员会委员里法特等陪同下，来到开罗郊外，参观了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 178 米高的开罗塔。

在阿联期间，双方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其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其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其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

其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其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12 月 20 日，就在中国政府代表团将要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前夕，周恩来在开罗库巴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的有阿联、美国、印尼、印度、法国等多家报社、杂志社、通讯社、电视台，电台的各路记者。周恩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应答机智、妙语如珠。

他谈到对阿联的“最主要的印象”是：英雄的城市，灿烂的文明，现代的建筑，英勇、热情、勤劳、智慧的人民，有能力的领导人，团结的力量以及新兴的气象。

有记者问：“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致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两个月之久？”

周恩来恳切地回答：

“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 14 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

带着这种友好愿望，周恩来、陈毅等人飞离开罗，12 月 21 日至 26 日，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在这里，不仅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称周恩来为“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而且该国首都阿尔及尔市政府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称号。非洲人民把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当成自家人。代表团的这种感觉，在摩洛哥更加强烈。

在摩洛哥，周恩来戏称热情的哈桑二世为“皇帝委员会委员长”

12 月 27 日上午，当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时，王宫里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出人意料的国宴。国王哈桑二世打破了接待外国元首用两菜一汤的惯例，改用极为丰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来盛情招待中国贵宾，这一席菜，就连 1961 年起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的杨琪良也未曾领受过，也使出席宴会作陪的一些外国使节感到异

常的破例，惊喜万状！

摩洛哥的传统饭菜，是用手抓着吃的。哈桑国王依照本国的风俗，陪主宾周恩来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一只烤好的整羊已经放在了直径八九十公分的瓷盘中。哈桑国王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恩来的食盘里，以后每上一道菜都如此进行，以示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周恩来历来是入乡随俗的，他有流鼻血的毛病，“火大”的东西很少吃，在国内时也极少吃羊肉，但是，面对主人的盛情，他乐意客随主便。每次上菜后，周恩来也依样回敬主人哈桑国王。另一边，哈桑国王的弟弟、年仅19岁的亲王与陈毅同桌，他抓起一块烤肉，自己先用嘴尝一尝，然后再送给陈毅。陈毅见亲王如此“破例、热情”，也洒脱地接过肉大口地吃起来，一点也没见外。双方人员都极为感动。满场气氛亲切融洽，为这次访问创造了极好的氛围。

席间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吃得都很尽兴。周、陈一再盛赞东道国的饭菜堪称“世界佳肴”。哈桑国王很满意，他也回过来称赞中国的烹调乃“举世之冠”。

宴毕，哈桑国王把周恩来、陈毅和杨琪良大使请进他的会客室品茶。摩方所饮的茶，是中国供应的绿茶“喜珍眉”，加上一把鲜薄荷和一些“面包糖”（面包状，近似于冰糖，由白糖加工而成），放入特制的大铜茶壶里用木炭火煮。室内有茶官专司此职，经他品尝认为合乎标准后，再斟入特制的精美的银托玻璃杯内，送到客人面前。随同周恩来访问的细心的卫士长成元功发现：哈桑国王手下的这位“茶博士”，在烧茶时，一会儿用小杯子尝一口，尝剩下的茶水，又倒回大茶壶里去。他就这样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地做着这件事。成元功感叹，茶在摩洛哥是多么宝贵啊！此茶烧好以后，茶色呈淡绿色，清凉香甜，别具风味。

周恩来喜欢饮茶，他的家乡也盛产茶叶，但摩洛哥特有的饮茶方法，他也是头一回见。周恩来对此表示欣赏。这一效果，正合哈桑二世意，他连忙说：这是8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面包、茶叶、糖，是摩洛哥1200万人生活的三大必需品，须臾不可少。光绿茶就年需12000吨，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因此，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

周恩来客气地回答：贵国喜欢的那种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不大的特定地区，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统统供应了贵国。我回国后一定请有关人员再研究一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好解决了。

按哈桑国王的说法，这一问题的解决，等于解决了他的人民的生活问题，解决了“造反”问题。后来到索马里，索方也向周恩来提出在茶叶方面给予援助的请求。周恩来特意交待有关人员：对摩、索这样的国家，我们要派专家来作些调研，看能否种植他们所需的茶，若能，让我们的专机送些茶叶树苗来，这才是从根本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人家。

摩洛哥从历史上就延续了王国制，这一体制进入20世纪60年代将如何发展？哈桑国王不无考虑。趁周恩来这位对世界局势有所影响的东方大国总理在此，哈桑国王突然巧妙地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周恩来和陈毅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风趣地回答：

“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

陈毅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

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说罢，3个人哈哈大笑。这一巧妙的回答，既安慰了哈桑二世，又表明了中国尊重这些国家人民的选择的态度。机智诙谐而又含有深意。

周恩来、陈毅在与摩洛哥领导人会谈时，涉及到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锁、剥削的问题，也没有回避中美关系和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的谈判。周恩来告诉哈桑二世：

“尽管美国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遭到美国的敌视、包围、封锁、禁运等等），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起武装冲突，根本没有这种设想，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中美谈判，我们主张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解决具体问题。但美国都不同意。我们只有等待，同时继续谈下去，要多长就多长，除非美国宣告谈判破裂。已谈了8年多，可再谈8年多，甚至80年。历史上有百年战争，现代可以有百年谈判。我们相信中美最终是总要达成协议的。”

这一认识和态度，周恩来后来也向其他非洲国家表明了。中国人对改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决心、耐心和诚意，逐渐被非洲第三世界的兄弟们所认识、了解。

当中国代表团在1963年的最后一天离开摩洛哥时，新年即将来临。代表团前往欧洲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访问。这是首访非洲期间唯一访问的欧洲国家。

恩克鲁玛遇刺，周恩来打破礼宾 常规深入戒备森严的奥苏城堡

正当代表团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欢度新年，并为决定将原定在突尼斯停机加油升级为访问、完成中突建交这件喜事而高兴之时，加纳共和国发生了刺杀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的政变。虽然恩克鲁玛幸免于难，但情况不明。是否在访问突尼斯之后按原定计划前往加纳访问？这是摆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周恩来找来陈毅、乔冠华、黄镇、孔原、童小鹏和外交部的几位随防的司长商议。周恩来果断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前往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作为亲密战友和身经百战的元帅，陈毅是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和胆略的。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不同意，他们对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劝说：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总理不能去；问题还不仅是我们不应去，还有加纳的愿望和困难也需要我们认真考虑；按照惯例，这一访问也应取消。

周恩来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和陈毅说服了大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为摸清情况并把我方的意见通知加纳方面，周恩来派黄镇作为特使，先行去加纳，并对他说：“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

1月9日，在代表团前往突尼斯访问的同时，黄镇飞抵加纳，立即与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取得了联系。“二黄”前往恩克鲁玛的秘密住处奥苏城堡，代表周恩来总理表示关切和慰问，并商量周恩来访问加纳的具体安排。他们

向加纳总统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一个独特建议：为了照顾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我们打破礼宾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住地进行，总统不必到机场迎送，也不要到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一建议，充分照顾到恩克鲁玛的困难处境，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总理谦谦君子的风度和屈尊交友的胸怀。恩克鲁玛听了，非常高兴和感激，表示完全同意。他原来估计，在加纳局势如此动乱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是不会再来访问的；因为在他前一次遇刺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尼日利亚访问，尼赫鲁得悉恩克鲁玛遇刺后，就取消了原定对加纳的访问。恩克鲁玛感到，危难之中方见中国总理的真诚。

1964年1月11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

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访问。在阿克拉机场，遵照周恩来的建议，恩克鲁玛没有露面，他特派三人委员会成员代表他率阿克拉各界人士来迎接中国客人。机场和街道两旁热情欢呼的群众，略为冲淡了刚刚发生过谋杀所产生的恐怖气氛。由于各国记者得知有预谋政变发生，早已云集加纳。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的到来，也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报道兴趣。恩克鲁玛遇刺的情况，他们早已作了报道。中国客人还看到了这样一张照片：在凶手行刺恩克鲁玛的那一刻，恩克鲁玛勇敢地把凶手压在身子底下。

当日下午，尽管刺杀事件带给人们的余悸未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还是在代表总统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外交部长博齐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和加纳驻华大使麦那的陪同下，乘车从容地视察了阿克拉市容。随后，代表团全体成员又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乘车直奔阿克拉城的另一端。恩克鲁玛总统居住的奥苏城堡就建在海边。

当周恩来等人进入奥苏城堡时，看见那里戒备森严，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但似乎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这也难怪，行刺恩克鲁玛的人就是被美国等国收买的加纳警察。他不得不在这一时期利用军队来高度戒备。周恩来等人在门外等待加纳官员进门通报。过了一会儿，恩克鲁玛飞快地迎出来把中国客人们接进屋里。恩克鲁玛穿的是一套中山服，这是他访问中国时周恩来特意送给他的。

恩克鲁玛歉意地向周恩来解释门外的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周恩来面交了毛泽东给恩克鲁玛的慰问信，并告诉他：“首先，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来了慰问电，今天已广播……年轻的总统异常感激，他握着周恩来的手许久没有松开。为感谢周恩来冒着危险前来，恩克鲁玛在城堡里举行使宴招待周恩来一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企图暗害恩克鲁玛总统的卑鄙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恩克鲁玛亲自带着周恩来等人参观了他所住的这座奇特的奥苏城堡。这是当年殖民者为掠夺加纳黄金、贩运奴隶、镇压加纳人民而修建的。城堡地下室直通大海，室内存放着当年殖民者整治黑奴用的刑具，从头到脚的刑具有尽有。中国客人看了以后，被这些殖民主义的酷刑和监牢深深震撼。周恩来后来在缅甸还与奈温主席谈起这座城堡。

为冲淡地下室的殖民主义恐怖气氛，恩克鲁玛又引导周恩来、陈毅等人上楼，破例到夫人和孩子们住的房间参观。上得楼来，气氛就大不一样了。恩克鲁玛的家庭，是一个“种族团结”的家庭，夫人是一位漂亮的埃及白人，孩子的皮肤呈棕色。他介绍夫人认识周恩来等人，并亲切交谈。这样的礼仪，是极少见的。在非洲，只有自家人才能看见家中妻子的容貌。可见恩

克鲁玛没有把中国贵宾当外人。

从楼上下来，周恩来意外地发现城堡里还放着一台乒乓球案，知道恩克鲁玛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爱好，立即提议与恩克鲁玛“赛”一场球。他俩愉快地拿起拍子上阵，由陈毅元帅当裁判，你“一来，我一往，乒乓球桌上发出了轻快的、有节奏的响声，伴随着周围的笑声，传遍了奥苏城堡。在恩克鲁玛处境维艰、十分危险的时刻，周恩来提出如此轻松愉快的建议，它的深远的政治涵义，世人是不言而喻的；对恩克鲁玛的紧张心理，也是一个极好的调节。

以后的会谈，都是周恩来亲赴奥苏城堡进行。他劝恩克鲁玛：不必到宾馆去回拜。对中国总理在最危难的时候送来巨大的力量和慰藉，且处处体谅和照顾对方，恩克鲁玛甚为感激。他也知道，这件事在世界政治、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为此，恩克鲁玛在会谈中对周恩来说：“我代表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过去我们也有客人，你这次访问对我们的情况作了仔细的分析，所以你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

在加纳总统遇刺之际中国总理冒险前往访问，这件有对非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访问结束后，立即就有几个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向周恩来发出了访问邀请。

周恩来拟定的中国外援八原则 在加纳和马里正式出台

首访非洲，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对这些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真诚的援助。这些援助除了道义上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援助。

在周恩来访非之前，这样的援助早已在进行中。譬如在周恩来访问马里之前，就曾派出中国水稻、茶叶等方面的专家援助马里。中国专家到达马里后，遵照周恩来嘱咐，以“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的态度和“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援助马里人民。没有桌椅，他们就坐在床上办公，没有汽车，他们就步行，从不提什么特殊要求，从而赢得了马里人民极大的信任。

周恩来每到一个非洲国家，几乎都要谈定一笔援助数额。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财力有限，与超级大国的某些援助相比，这些数额的援助并不算多。但却是雪中送炭，真正用来扶助他们的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即“用在刀刃上”。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一些国家的米厂、皮革厂、卷烟厂建立起来，一些国家的编织业、茶叶种植业……等等发展起来。中国的援助，最大的特点是真诚、无私、相互、平等、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这点得到受援国家的高度赞赏和感谢。

但是，在加纳和马里，周恩来却彻夜未眠。他在考虑：中国的真诚援助，必须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当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原则。一个重要的举措，便在进入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酝酿、出台了。

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进行了两次单独会谈后，晚上从奥苏城堡回到住处仍在思考，不能入睡。明天将是访加的最后一天，是该适时地宣布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原则了，当晚，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提纲：

“援外原则八项：

1. 平等互利；
2. 尊重主权、不附条件；
3. 无息或低息贷款；
4. 有利自力更生；
5. 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
6. 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
7. 技术出口；
8. 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这份提纲，笔迹苍劲有力，内容简明扼要。虽然是用来做全面阐发的提纲，但是完整的内容，经过一夜的酝酿、思考，已经存入周恩来的脑海中。

第二天，即 1 月 15 日，周恩来与恩克鲁玛举行最后一次会谈，他首次在非洲大陆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与恩克鲁玛谈完，已是晚上 7 点钟。当晚，周恩来会见加纳通讯社记者，在答记者问时，正式地向外界宣布了中国的外援八原则。一个完整的、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的举措，在这里正式出台了。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八项原则所包含的真诚、无私、平等、互利、公证、合理等等中国精神，一目了然。

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这八项原则的提出至少有三方面的国际意义：为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不平等、附带条件、要求特权、以富压贫、干涉别国内政、攫取别国资源等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提出了挑战；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外援为辅，以公正、合理为基础等等）提供了基本准则；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范例。

1 月 16 日，中国代表团离开加纳，前往独立后“选择了发展民族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语）的马里共和国访问。在这里，周恩来再一次详述了中国外援八原则。1 月 21 日，中国同马里共和国发表的

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正式写入了上述八项原则。从此，国际舞台上诞生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

1月21日上午，周恩来在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机场发表了“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和富强起来”的一番讲话后，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

踏上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 周恩来被她的歌舞深深地打动

首访非洲，许多国家都在赤道线附近。北京的寒冷，代表团成员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相反，他们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什么是“炎热”。再加上非洲人民的热情和友好，又给天气的热度加了温。

几内亚共和国，西濒大西洋，与马里等国相邻，是一个具有典型的热带风光的国家。当中国代表团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火炉”。

在访非所受到的倾城欢迎中，几内亚尤为突出。机场上，前来迎接的塞古·杜尔总统让礼兵鸣放了21响礼炮，这显然是按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周恩来的。科纳克里全城的群众欢迎场面更是热烈。按几内亚方面的安排，在机场休息室稍事休息后，立即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美景别墅”。敞篷汽车共有4辆：杜尔总统陪周恩来乘一辆；其余3辆分别由几内亚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国民议会议长陪同陈毅、孔原、黄镇乘坐。当时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回了这样一份报道：

“从机场到宾馆的15公里的公路两旁，密密层层的人群夹道向周总理欢呼：‘中国——几内亚友谊万岁！’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有许多人爬在沿街的房屋上向中国客人欢呼。

“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歌舞，尽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日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塔姆塔姆’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

“鼓声，巴利风（木琴）声以及其他各种非洲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欢乐。

“今天，科纳克里的市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当车队缓缓驶过的时候，几内亚姑娘唱起了歌颂中国——几内亚友好的歌曲……”

在这热烈欢呼的场景中，周恩来和陈毅也以生动的笑容，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当车队行至卢蒙巴印刷厂时，热烈的欢迎达到了最高潮。敞篷汽车不得不在人山人海停下来。这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两名几内亚女王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代表大家向周恩来献花，然后又以几内亚民族特有的传统赠送几内亚出产的柯拉果……

好不容易，汽车才缓缓开到位于海滩旁边漂亮的“美景别墅”。这是一座按几内亚民族风格建造的宾馆，客厅里，早已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杜尔总统的巨幅画像。尽管工作人员已作好了安排，但杜尔总统似乎还不放心，他亲自陪同周恩来到了卧室里，直到观看各处都准备妥当后，才慢慢离去。杜尔总统是个活泼、开朗的人，胆大而且心细。这些倒有点像周恩来的性格，他俩后来成为“老朋友”，也能说一些交心的话。

当晚，杜尔总统和夫人特意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接

风。周恩来在文艺演出开始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大加称赞几内亚美丽富饶的国土和勤劳勇敢的人民。他说：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几内亚人民的真挚友谊，前来访问你们共和国，我们有机会同总统阁下，同几内亚各界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感到亲切和愉快。几内亚政府对我们的殷勤接待和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以陈毅副总理和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慷慨、好客的主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几内亚共和国是富饶和美丽的，几内亚人民是勤劳和富有才干的。正如塞古·杜尔总统所说，几内亚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百宝箱’。我们深信。几内亚人民一定能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这个‘百宝箱’打开，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周恩来还表示：“几内亚人民可以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6亿5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几内亚人民可靠的、忠实的朋友。”

自从抵达科纳克里当天接受几内亚群众按民族传统赠送的柯拉果后，周恩来对几内亚以及非洲的水果印象极深。1月23日这天，塞古·杜尔总统陪同他乘汽车前往金迪亚市访问。在这个市，他还特意参观了水果研究所，了解热带水果的情况。最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几内亚的热带粮食作物——木薯。这种东西中国国内也有，但它是有毒的，不能生吃。几内亚的木薯却是无毒的。杜尔总统用手掰下来两块，当场吃了一块，又拿了一块给周恩来品尝，的确无毒。几内亚方面向周恩来介绍了木薯的特点和栽种情况。热带植物，令中国客人们大饱眼福。

几内亚民族，的确是一个勇敢和热情的民族，他们对中国客人的热情，有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周恩来总理每次外出回到住地，都要表示热烈的欢迎。有几次，总理没回来，只有随员们先回来了，几内亚士兵看见中国客人的汽车驶回，同样朝天鸣枪欢呼。等中国总理回来时，他们再次鸣枪。这种奇特的欢迎方式，有时真叫随员们受宠若惊。

1月26日晚上，在即将结束对几内亚的访问时，周恩来特意设宴招待杜尔总统；宴会之后，代表团又在大西洋畔的“美景别墅”宽敞的阳台上，举行告别招待会，与杜尔总统等人面海告别。随后，前往科纳克里机场。

午夜，周恩来在机场向几内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告别词。不同的是，这份告别词在发表的当天又经周恩来等人紧急做了修改。修改源起于几内亚独特的歌舞。

这天白天，将要离开几内亚的周恩来，脑海中又回荡起他称赞“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那天晚上所看过的几内亚歌舞，他在几内亚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歌舞所蕴藏的生命力。他觉得在告别词中应该表达这种感受。

随即，他给乔冠华写了一个意见稿：

“冠华：

请将告别词中加上下达一段意思（文句请你们改写）。

即：

几内亚人民在民主党和总统领导下，大力推动和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在几内亚的歌舞中，不仅强烈反映出几内亚人民的历次反帝斗争，而且广泛歌颂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卢蒙巴的名字在几内亚人民中同几内亚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一样受人尊敬，受人怀念。这一些充满着政治内容的革命歌曲的传播，大大鼓舞着非洲人民的民族觉悟，促进着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周恩来

1月26日”

午夜零时30分，在周恩来发表完告别词后，代表团踏上专机，前往苏丹共和国访问。在苏丹，周恩来安排了两天半的访问时间，接着又前往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埃塞俄比亚……

1964年2月4日，当周恩来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市发表了“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这一著名论断后，带着该市赠送的“自由钥匙”，圆满结束了对非洲10国（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友好访问，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国。

按原计划，代表团回国后在昆明、成都稍事休整，过完春节将再访亚洲3国——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这就是后来所指的“亚非欧14国之行”（包括阿尔巴尼亚）。

3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浓浓的春意中终于回到了离别3个月的北京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这次出访，“前后共经历了72天，行程10万8千里”（周恩来语），终于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尽管周恩来谦逊地说：“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但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中国对非洲大陆全方位的外交工作，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蘑菇云升起的前后

毛泽东、周恩来邀请李四光，钱三强 共商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大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斗争尖锐激烈，霸权主义乞灵于核讹诈政策，在东方和整个世界的上空不时掀起阵阵乌云，人类和平受到核战争的威胁。

面对霸权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作为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坚定地说：中国必须掌握原子弹。

1955年1月14日下午2时，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他俩是应周恩来的邀请来谈发展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

当他俩的身影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时，周恩来快步迎上去，脸上泛起亲切温和的笑容，欢迎他俩的到来。

周恩来同他俩是相交甚久、知之甚深的老熟人了。在互致问候、稍事寒暄后，周恩来便开门见山，转入谈话的正题。李四光、钱三强向他介绍了中国铀矿资源勘探情况和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现状。周恩来略带几分庄重的神情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作点现场演示。”

时光，在专注而热烈的谈话中悄然流逝，不知不觉地，谈话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送走客人后，周恩来马上致信毛泽东：

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后，可能在明日下午（15日）3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的同志）外，彭（真）、邓（小平）、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一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第二天下午3时，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建设中国原子能工业问题。

毛主席面带笑容，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吩咐，李四光手拿一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讲解了铀矿资源同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介绍1954年上半年中国铀矿资源第一次在广西发现的情况。钱三强以学者特有的风度，汇报了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中国科学界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

“你们给主席表演一下盖革计数器接近铀矿的试验吧。”周恩来提醒说。

李四光、钱三强熟练地做起试验来。当盖革计数器接近铀矿石立即就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全场的人都为那神奇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发出啧啧的感叹声。

在兴奋与惊喜中，有的领导人还亲自动手作试验，有的领导人则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请李四光、钱三强解答。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摆下3桌每桌只有6个普通菜的便宴招待大家，毛泽东举起酒杯，用洪亮的声音动情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中国原子能工业开始起步。周恩来用心良苦，不失时机地尽可能争取苏联帮助，使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1月31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激动地对到会的副总理和各部负责人说：“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们应该对人民很好地进行教育”。一方面，“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另一方面，“我们心须掌握原子能”，“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地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精神，作出了中国要“迅速掌握、使用原子能技术”的决定。从此，中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开始起步。

周恩来用心良苦。他认为，在坚持自力更生，特别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应该不失时机地尽可能争取已经掌握原子弹的友好邻邦苏联“老大哥”的各种援助，以增强在薄弱环境中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基础条件，使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1955年初，周恩来多次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判，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勘察铀矿资源的协议和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协定。

1956年3月，周恩来指派刘杰和钱三强等组成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

这年下半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国15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又把利用原子能列为第一项重点科学研究任务，摆在科技发展的突出地位。同时，他领导筹建了具体负责实施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的领导机构——第三机械工业部（不久改为

第二机械工业部），相继建立了比较完整、相互衔接与配套的科学研究机构。

1957年9月，周恩来抓住国际形势有利于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的大好时机，以更高的规格，派遣负责实施中国科学远景规划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和国防部副部长陈赓、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赴苏联谈判，并在10月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究原子弹的协定。

与此同时，一向考虑问题周全、深邃的周恩来，在有“老大哥”大力相助的顺境中，敏锐地意识到，尽可能争取苏联援助，绝不是依赖苏联和苏联专家。因此，他明确指出要努力消化、吸收人家的先进技术，力求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周恩来说：“不理他那一套，我们自己动手……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1959年6月，苏联走出了撕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合同的第一步——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又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所有协定和合同。8月，苏联下令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带走了重要图纸，中止了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这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形势也极为严峻。“大跃进”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苏联人为制造的人祸和国内严重的天灾交织在一起，的确给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疾风识劲草，岁寒知松柏。此时此刻，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周恩来，以沉着坚定的语气说：“不理他那一套，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豪迈自信、不信邪、说话风趣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此时随口道出一句语惊四座的话来：“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他还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为了记住那个令人心寒的被人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就定为“596”。

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等为中坚力量的一批搞理论与实验物理的科技精英，也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汇集到原子能研制机构，直接承担起各个重要环节上的攻坚任务，向原子能科学堡垒发起了可歌可泣的持久的猛烈攻击。

经过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的努力，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均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一些重大技术难关尚待突破。

为了抢时间，赶进度，1962年10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二机部提出的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做好爆炸原子弹的设想，并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便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

11月3日，最高决策人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表现出特有的稳重，慢悠悠地点燃一只香烟，深深地吸了两口后，以充分信赖的口气，笑着对大家说：“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

刘少奇的这一提议，顿时赢来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与会者向周恩来投去了钦佩与信赖的目光。他们一致赞成共和国的“好管家”、对国际国内的一切重大事情都能操办得十分妥帖的周恩来，出往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最高权力机构的主帅。

11月7日，以周恩来为主任，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等国务院7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7位部长级负责人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央专委会的成立，有利于广泛深入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加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攻关工作，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到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的实施。

从此，呕心沥血、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又肩负起了直接领导原子能事业发展的重担。他一上任，就以高屋建瓴之势，排除重重困难，着手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协作体系，统一指挥调度共有20多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的研制原子弹的科技攻关工作。

周恩来告诫说：“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从1962年11月7日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周恩来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及时解决了建设、科研和生产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这期间，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进入突飞猛进时期。

早抓，及时抓，抓住不放，是周恩来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半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3次会议。

在第一、二次会议上，周恩来详细听取了二机部部长刘杰的汇报，并针对原子能工业存在的薄弱环节，干脆利索地拍板决定大力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加强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力量，限令有关部门、部队。科研单位在12月底以前，为二机部选调各类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500多名，并决定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一部分重要的技术设备。同时，他明确地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奋斗目标。

当年作为中央专委会专职副秘书长的刘柏罗，在他1987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中：“周总理明确了先抓原子弹，使大家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

在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态度十分明确地表示同意刘杰提出的《1963、1964年原子能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根据《两年规划》所提出的顺排计划、倒排措施的方法，周恩来用他那一双浓眉之下的炯炯有神的眼光，环顾了出席会议的每一个成员后，大声告诫说：“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就像一股清新的强劲春风，吹遍了二机部和其他国防尖端部门的所有单位，迅速地得到贯彻执行，并成为中国国防尖端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

不仅是宏观决策的杰出战略家，而且是微观指挥好领导的周恩来，从战略规划的具体组织实施，到试验基地广大科技人员、工人、部队官兵的衣食住行，他都一一过问。

60年代初期，全国人民都在困难中奋斗，生活在戈壁大漠中的试验基地的这群“国之骄子”的生活自然更艰苦一些。周恩来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示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从全国各地调拨生活用品支持试验基地，给他们送去了大米、面粉和治疗浮肿病的药品；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让他们能够吃上云南宣威火腿，喝上贵州茅台醇酒。他还曾在电话中对主管基地工作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爱萍千叮万嘱：“要让科学家、技术工人、军队的干部战士们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

在周恩来领导和关怀下，在最困难的1960年，粮食部一次就调拨给试验基地数百万斤黄豆，青海省人民政府调拨4万只羊，商业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甘肃兰州成立二级批发站，以加强对西北地区特种部队和核工业部门的生活资料的供应。

在戈壁荒漠中的这群“国之骄子”，对他们的这位主帅充满了由衷的钦

佩和敬意，更加坚定了他们在自己神圣的岗位上忠于职守，默默地无私奉献的信念。

由于周恩来出色的协调指挥和中央专委会其他成员尽心尽力地工作，由于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协作，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捷报频传，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原子弹研制的每个环节的进展都比预期的要好。

——1963年3月，中国科学工作者正式拿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12月，在大西北大漠深处的试验基地进行一比二的聚合爆轰产生中子试验获得成功。

——1964年1月，兰州浓缩铀厂攻克种种技术难关，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合格产品。

4月11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八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以前做好试验的一切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至于是否进行试验和何时试验，待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决定后再定。于是，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完成阶段。

1964年6月，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一比一的核装置聚合爆轰试验，达到预期目的。

以上科学研究的进展，清楚地表明：设计和制造原子弹的整套技术对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不再神秘。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设计原理和制造技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提到议事日程。

周恩来告诉刘杰，党中央决定将原子弹的爆炸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

1964年9月16日、17日、23日，周恩来主持了第九次中央专委会会议，正式商讨了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问题。接着，周恩来向参加核试验的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

10月11日凌晨1时30分，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报告核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送上张爱萍、刘西尧两同志从现场经飞机送来的10月10日3时报告，请予审阅。

现一切已经准备好了，拟经保密有线电话以暗语告他，同意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到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并告我们。

另外，送上刘杰同日报告请阅。防空方面请罗总告总参负责检查、联系和指挥，转移资料；设备、仪器和保密工作，由刘杰负责督促进行。

关于起爆有效后的宣传和政治斗争，正在进行准备，当另报。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特地邀请在京的王涂昌、彭桓武、邓稼先、郭永怀等核物理学家乘专机飞往试验现场，直接观看原子弹的爆炸实况。报告得到毛泽东批准后，10月14日，周恩来庄严地下达了原子弹装置就位的命令。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了极为紧张的工作。他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开会，商讨和起草有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中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和中共中央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14日晚，周恩来习惯性地拿起毛笔飞快而流畅地给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了信，通报有关情况。信中写道：

主席、少奇、林彪、小平、彭真、贺龙各同志：

有关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作，昨天已在书记处后来又向主席做了报告，并得到同意。现在先将已拟好的三个文件，即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的草稿，送请审阅。其他还有致各友好国家的政府首脑信、外交部通知、对外宾外国记者谈话要点，将陆续送审。我国这次试验决定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主动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

爆炸时间，前方还在做最后研讨，今晚当能定夺，当另告。

在得到试验现场总指挥部的研讨情况后，周恩来当即与中央专委会成员商定了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为了使准备工作万无一失，周恩来立即打电话给留守北京、负责现场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刘杰，严肃地问道：“试验会有什么结果？”

“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刘杰回答。

顿时，周恩来心中有了几分喜悦，但他还是再三叮嘱道：“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同时告诉刘杰，党中央正式决定将原子弹的爆炸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专委会的全体成员，参与原子弹研制的全体科研人员、试验基地的全体官兵盼望已久的日子，就要来临了！他们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中国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万一试验不成功，将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为了绝对保证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对几位老师说：“今天会后，除了参加会议的，对谁都不能讲，邓颖超是老党员，还是中央委员，但我保证不对她讲。”他还特地对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

陈毅心领神会，他知道周恩来的这番苦心。是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的谈话中不能说漏了嘴。“于是，他操着四川口音说：“我不讲哇！”

在受命担任核试验正副总指挥的张爱萍和刘西尧启程前往试验基地时，周恩来又叮嘱他们说：对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与试验有关的人员外，一律不让其他人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接着，他又重述了他不会让自己妻子邓颖超知道的一席话。

周恩来严守纪律的行为，也长期地深深地感动了同甘共苦几十年的妻子邓颖超。周恩来逝世10多年的时间里，在邓颖超为数不多的回忆文章中，她专门以《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为题，娓娓道出了周恩来模范遵守纪律的许许多多的动人事迹。她指出：

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例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也向我保密。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主管的同志到试验现场传达了恩来同志的讲话，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因此事先没有任何透露。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大型音乐舞蹈 史诗《东方红》的3000多名演职人员宣

布：“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5日午夜前，整个原子弹装配完毕。

16日清晨，西北戈壁荒漠晴空万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政治责任感，使核试验基地笼罩在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之中。

102米高的铁塔在金色的阳光的伴随下傲然挺立。在它的顶端金属结构的小屋里，几十万人心血凝聚而成的第一个原子弹就静卧在里面。

16日15时以前的10秒钟，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总控制室里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人们都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排排彩色灯钮依次顺序地迅速闪烁着，发出庄严的充满历史感的声音。一名年轻端庄的女军人明亮的眸子随着红灯移动，口齿清楚地读着人们非常熟悉的倒计时数字：10、9、8、7、6、5……当读到0时，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声令下：“起爆！”

顷刻间，辽阔的戈壁大沙漠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的闪光；随即，腾空而起出现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

巨大的火球在剧烈的翻浓着，徐徐升上高空，最后形成拔地而起的参天的蘑菇云。

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总指挥部里的人的眼中都涌出了喜悦的泪花。他们曾付出了多少代价，戈壁大沙漠曾给了他们多少希望和辛酸……他们完全沉浸在无比幸福的欢乐之中。

欣喜中不乏冷静的张爱萍，望着科学家王淦昌说：“这是核爆炸吗？”王淦昌激动地说：“是。”

张爱萍此时兴奋不已地抓起电话，直拨北京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

“我是张爱萍，请找刘杰同志。”

在二机部，刘杰和其他几位负责人正守候在电话机旁。听到电话铃声，刘杰赶紧拿起电话机，立刻听见：

“请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蘑菇云已经升起，原子弹爆炸成功！”电话里还传来了参试人员的欢呼声。

“我立即报告！”

刘杰随即拿起专用电话机，说：“我是刘杰，请找周总理。”

“我是周恩来。”

“张爱萍同志报告我们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蘑菇云已经见到了！”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以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刘杰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再一次证实是不是核爆炸，以便使外国人相信。”

忠于职守的刘杰立即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

中子测试结果出来了，力学、光学试验结果也出来了……面对这些事实，张爱萍以完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确实确实是核爆炸，爆炸后的火球已经变成蘑菇云。”

这时，刘杰已经激动万分，再次同周恩来通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确实确实爆炸了！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吧。”

不久，又收到了美国关于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广播。

这天傍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多名演职人员。周恩来满面

春风，兴奋地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会场顿时沸腾起来，人们在兴高采烈地欢呼跳跃。周恩来向大家摆了摆手，风趣地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

当晚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发表的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新闻公报；同时播发了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的严正立场的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天晚上，素有儒将之称的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在西北核试验基地即兴填写清平乐词一首：《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词曰：

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世界上真有凑巧事。就在中国原子弹爆炸的这一天，莫斯科也传来一个震惊肚界的消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心想卡死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在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核试验一举成功之日，赫鲁晓夫下台，这岂止是历史的巧合，难道不也是历史的绝妙讽刺吗？怪不得世界舆论议论纷纷：“中国原子弹爆炸！赫鲁晓夫下台！”

几天后，周恩来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前往八一电影制片厂，调看原子弹爆炸的原始资料样片。当他看到蘑菇云冉冉升起的时候，动情地鼓起掌来，说：“我们胜利了。毛主席讲要奖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大勋章，感谢他促使我们搞出了原子弹。”

10几年后的1969年3月，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大使凯瑟时说，赫鲁晓夫是个蠢才，但他也教育人。1959年他主动取消了同中国的原子能合作协定，但我们要感谢他，他一逼就把我们逼出来了。1964年，他下台时，正巧我们放了“送瘟神”炮，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和苏联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

陈毅满脸笑容，向缅甸客人介绍：“革命歌舞剧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上演后，连演14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赢得了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各国宾客的赞誉。

这年10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缅甸政府代表团客人时说：“你们看过的《东方红》革命歌舞，‘便是叙述中国革命的历史故事’。”

在座的外交部长陈毅抢过话来，带着敬意和钦佩的心情，满脸笑容，向缅甸客人介绍：“革命歌舞剧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导演革命的歌舞。”

顿时，曾被这台节目所倾倒的缅甸客人向周恩来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

从这以后，参加创作和演出这部史诗的文艺工作者们都纷纷述说：“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显然，这个“总导演”含义，绝非是一般艺术上的职衔所能涵括得了的。

周恩来公开透露自己的总体构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我们要大庆祝一下子，搞一台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大歌舞

那是在1964年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被自己的得力助手、亲如兄弟的陈毅拽着，拉到上海文化广场欣赏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台大型歌舞，是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和音乐、舞蹈，戏剧院校以及部分业余台唱团、童声合唱团共同参加演出的。它以不同形式的歌舞为主，用幻灯投影为背景，表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目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引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的场面，在他心中酝酿着一个别人不曾想过，但却一直是他的心愿的创作构想：在举国欢度国庆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通过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战斗历程。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召集主管文学艺术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和文化部、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开会，详谈了他的想法，得到一致的赞同。7月18日，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公开透露了自己的总体构想。他说：

我们这回就要大庆祝一下子……这回我到上海去，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3000人的歌舞大会，很动人，我看还不错，是写我们大革命的。请周扬、徐冰同志，还有有关方面的同志，你们都是作家，你们大革命都参加过的，你们帮助搞一下子。总之，要有人写，不然就没有法子表演出来的。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这个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

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因此就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搞一下子。

7月20日，周恩来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再次提出要搞一台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大歌舞。他认为，这是反映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说于就干，抓到底，抓出成果来，这是周恩来一贯的工作作风。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很快，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治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负责人进行研究，认为搞这样一台节目是可行的。7月24日，周扬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提出了《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的报告。报告对大歌舞内容编排的原则和整个演出的要求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一）政治内容方面应以我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为基础，比较概括地加以表现。如各次重大革命事件都来表现，就不免挂一漏万，很难平衡。

（二）这一大歌舞既要在政治上正确地表现出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特点，充分体现出在毛主席领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同时也要在艺术表现上尽可能做到统一和谐，有起伏，有发展；做到结构紧凑，风格鲜明，气氛强烈，能给观众以根深的感染力。

（三）在编排新的章节时，音乐方面尽可能选用当时富有代表性的诗词和歌曲（从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材料较少，但也还有些革命歌曲可用）。舞蹈方面也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成品加以改编。不足的地方，以及用歌唱或舞蹈难以表现的部分，拟用朗诵诗来弥补。

（四）这一节目的演出，在台上排的人数多，中间无法休息，因此时间不宜过长……

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最后商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他就大歌舞的组织领导工作亲自点将，最终确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由6人组成的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春桥为副组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国务院外办副主任李一氓、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许平、总政文工团团长丁里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赵鼎新、丁里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考虑到毛泽东当时发出了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号召，于是决定以部队各文工团为主力，政府所属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文艺单位也参加排练和演出。

8月1日，周恩来仔细地审阅并批准了周扬提出的报告，还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出具体批示。

周恩来策划一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这时，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经受到“左”的错误估计的影响。江青、康生等人利用这种“左”的错误估计，对文艺界大张挞伐，在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作家、艺术家由此受屈甚至遭到批判和打击的时候，他策划并推出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是想通过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知名人士参与，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东方红》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而他们是主要参与者。

在《遵义会议》这场戏定稿时，周恩来欣慰地点了点头，说：历史就是这样嘛！机

会主义者把革命引入歧途……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练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他三天两头深入现场，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都提出了很多精辟的修改意见，并且集合起一支全国最优秀的创作演出队伍。

主题是一部作品优劣最为重要的一环，具有核心和统帅的作用。《东方红》要表现什么样的主题呢？

这是周恩来尤为重视的一个问题。他明确指出：是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整个作品要贯穿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

主题确定后，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如何实现寓教于乐，仍然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他看到，用艺术形式，特别是歌舞这种形式来简要地表现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并有相当的难度。

为了紧扣主题，使《东方红》的创作真正做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有机地高度统一，周恩来亲自或邀请熟悉党史的党政军负责人给编创和演出人员作报告。同时，他时刻以一个总导演的敏锐洞察力和鉴赏力，审视着、指导着《东方红》的整个排练过程。

在排练队伍集合之初，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编创和演出人员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革命史诗，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写出来的，是一个伟大的创作。参加大歌舞工作，是一次革命化的实践，是一次党史学习。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何况大家这么年轻，更要好好学习，努力做到甲艺术形式将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

在《星火燎原》一场戏中，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明确指出：对于我党来说，蒋介石的叛变只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外因，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才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不相同。这是血的教训。写清楚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确地表现历史，而且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秋收起义》舞蹈排好后，周恩来从既要有革命内容，又要有抒情的艺术形象的原则出发，谆谆开导说：这场戏，要着重反映毛主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但必须用优美的画面来反映。因此，开头可以用火把形象地象征毛主席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火炬；结束时，换成多面红旗，引导群众前进，浩浩荡荡，形成燎原之势，然后从四面下场，象征毛主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

当周恩来发现剧本中没有最能反映主题思想的遵义会议这场戏，只是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时，当天深夜，他赶到导演组召集会议，给导演们讲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严肃地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主席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就没有今天的胜利。因此，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这场戏无论如何不能少，一定要加上，要用专场来表现，而且要努力表现好。在以后的排练过程中，周恩来亲切地对演员说：“要

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

《遵义会议》这场戏初排时，只有舞蹈，有些像哑剧。对此，周恩来又提出要增加歌曲来渲染气氛。于是，编导人员增加了《抬头望见北斗星》、《遵义会议霞光闪闪》等优美的抒情歌曲。他高兴地给予肯定，说这样设计好。当他发现舞台上红军战士太少，气氛仍显不够时，又提出要增添人民群众，而且必须有少数民族群众。

经过不断的加工修改，《遵义会议》这场戏的容量和氛围大大地增进和扩充了，成为整台气势磅礴节目中的第二个高潮。

定稿时，周恩来颇为欣慰地点了点头，说：历史就是这样嘛！机会主义者把革命引入歧途，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又拨正了船头，把革命引向胜利。

一天，已经接近午夜了，可是《东方红》排练场上仍然是灯火通明。在最后一场展示民族大团结的欢乐歌舞中，各少数民族的舞蹈都几近完美无瑕；相比之下，汉族舞蹈相形见绌，总是千篇一律地打腰鼓、跑旱船，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于是，产生了争论，大家都在耐心等待周恩来的裁决。

在时针指向零点时，周恩来果然出现在排练现场。当他得知争论的情况后，他并没有就事论事，以一两句话裁决了事，而是循循善诱，从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来启发大家的创作思路与灵感。这样，果然使在场的创作人员茅塞顿开。

最后，大家一致赞同用传统京剧中“闹天宫”的表现形式代替这段汉族舞。形式确定后，一贯雷厉风行的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找来中国京剧院负责人，连夜落实了“闹开宫”的排练方案。当周恩来离开时，晨曦已经射进了排练场的舞台。

对旧体诗词有颇高鉴赏力的周恩来，
亲自选定毛泽东的 3 首诗词放进
《东方红》中，并叮嘱要写出最好的曲子，
用最好的演员来演唱

在一次审查歌剧的过程中，人们惊奇地看到周恩来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径直地向二楼走去，不断地变幻着角度和位置，大家感觉到他是在看什么，仿佛又在听什么。他返回一楼后，又像先前那样尝试了一遍。当排练结束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周恩来是在感觉剧场的音响效果，琢磨如何才能让庞大的管弦乐队不致于压倒演员的歌声……

熟悉、热爱旧体诗词并有颇高鉴赏力的周恩来，亲自选定了脍炙人口、气魄雄伟的毛泽东的 3 首诗词——《井冈山》、《长征》、《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放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

周恩来多次叮嘱创作人员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子，用最好的演员来演唱。因为这 3 首歌象征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 3 个伟大转折点。但在最初审排时，3 首歌曲的气势和效果都不理想。对此，周恩来立即动员北京所有著名作曲家都来参加创作，并择优挑选。

不几天，沈亚威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晨耕的《井冈山》，昌远和唐诃分别创作的《长征》脱颖而出。在两首高质量的《长征》曲谱难分伯仲之时，周恩来又委托音乐组负责人、著名作曲家时乐濛各取其精华，合二为一，有机地糅合为一首。

就这样，在既是政治家又熟谙艺术规律的周恩来的指导下，这3首诗词的政治内容与歌曲的艺术性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其震天撼地的磅礴气势，极富感染力地本质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并画龙点睛地深化了《东方红》的创作主题。

越是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周恩来非常珍爱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主张尽可能地将相关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优秀的民歌放到这部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中去。他亲自审查了《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浏阳河》、《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等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歌。

但是，不能不看到，周恩来也为《东方红》这部传世之作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遗憾，这就是他把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他亲自领导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的八一南昌起义删掉了！

当时，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八一起义的方向不明确，大军到潮汕后就失败了。只有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才是正确的。因此，“有秋收起义就行了”。

人们兴许还曾记得1961年7月，周恩来招待参加电影创作会议的代表到香山休息时的情景。据当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播回忆：

他（指周恩来）也和大家一起去逛香山，和大家边走边谈。我当时也趁机和他同走一段路，询问他，八一厂打算将江西话剧团演出的《八一风暴》改成电影，是否可以？他却回答说，戏已经演过了，何必再拍电影呢？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已有历史记载了，可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起义后还是想找海口，争取外援，由于敌人强大，难以实现，起义失败了。要写电影，就要写这支部队在朱老总领导下，上了井冈山，才走上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到1965年1月，周恩来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问题征求创作人员的意见时，有人提出：影片如果不表现八一南昌起义“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一处不足”。他坚持说：“不必要增加这一场。”这时，参加会议的彭真感动地说：总理呀，八一南昌起义是革命的历史，应当增加，不要因为是您领导的，您就谦虚。周恩来笑了笑，也不再多作解释，只是重复说：“还是不要加这一场。”

在排练《东方红》的60多个日日夜夜里，这其中的每一场戏、每一段舞，甚至每一个细节，都浸透着周恩来的智慧与心血。每一次分场排练，他都亲临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了8场，他完整地观看了5场。每场结束后，他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并发表意见，争取每一个节目的日臻完善。

著名作曲家时乐濛先生感慨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理能像周总理这样……

辛勤的耕耘，终于赢来了丰硕的劳动果实。大型音乐歌舞史诗正式于1964年10月2日上演了。这是新中国文坛空前的盛举，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扬和国外宾客的普遍好评。

10月15日，周恩来陪伴日本芭蕾舞代表团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夫妇观看《东方红》。在客人的恳求下，他陪同他俩到演出后台参观。尽管演出刚刚结束15分钟，但他俩来到后台时，3000多名演员已经全部撤离，所有的

道具服装都像解放军营房里的枪支和被褥一样，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固定的位置。他俩感到十分惊讶和佩服，说：“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真幸福，有国家总理亲自关心文艺工作。我们多么盼望有这么一天啊！”他俩还提出了许多完全是属于文艺的专业性问题，其中包括灯光设置上的具体问题。

周恩来犹如行云流水，侃侃而谈，——作了使他俩满意的答复。清水正夫睁大双眼，惊奇地问：“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没等周恩来回答，在场的一位演员自豪地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顿时，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泪光闪闪，再次说：“你们是幸福的”。

在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引起轰动的时候，周恩来已经有了更为深远的新的设想：应该将《东方红》拍成一部可以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的电影，让它广为流传，传之后世。

基于以上考虑，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东方红》演出的16个专业团体、3000多名创作演出人员之后，他同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和创作人员，就把《东方红》拍成电影问题进行了彻夜长谈，并且强调：这部影片拍摄成功，对于全国人民都很有教育意义。

这以后，在周恩来精心设计关注下，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1965年9月一部震撼亿万中国人心灵，也感动过不少外国朋友的电影艺术片《东方红》终于拍摄完成。

抚今追昔，周恩来对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的辛勤指导，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民主的领导作风等等，至今仍然令当年参加创作和演出的作家和表演艺术家难以忘怀、记忆犹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至今都能说出许多感人肺腑的事情来。

90年代初，著名作曲家时乐濛先生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仍感慨万于地说：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中国音乐舞蹈史上的

一座丰碑，其规模之宏大，技术之精湛，影响之深远，中国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一部音乐舞蹈作品能与之相媲美！自她诞生以来的28年间，尽管有人诋毁过她，贬低过她，但是她的舞，她的歌，却从来没有一天在中国老百姓中消失过，绝响过……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理能像周总理这样，对文艺事业关心得如此之多，如此之细了！

艰难的保护

1966年初夏，旱情严重地威胁着北方大地。风尘仆仆的周恩来刚刚从邢台地震区赶回来，又投入指挥北方八省抗旱的斗争中。这时，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比自然灾害更令人揪心的政治灾难，正在悄悄地酝酿，并且很快铺天盖地，席卷全国。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周恩来被动卷入这场灾难之中

章士钊受冲击，请求毛泽东“转圜一下”，
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应当予以保护”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就毛泽东的初衷来讲，这场革命的重点是整那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斗争的范围很快超出了这个界限，冲击到党外朋友，也冲击到许许多多普通的家庭。这年的夏季格外炎热，到了8月，已是酷暑难耐了。这时，红卫兵运动也进入了高潮。那些日子，在校园里、机关中、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身着绿军装，腰系武装带，臂挂红袖章的年轻人。他们举着毛主席语录，狂热地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的冲动和激愤，喊出的活句句充满火药味，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

8月29日深夜，北京东城史家胡同内一阵喧嚣，在一座标准的四合院的大门外，云集着一群红卫兵。他们“咚！咚！咚！”地敲打着红色的院门，随后蜂拥而入。

这所住宅的主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章士钊先生。强行入院的则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三十多名红卫兵。

刹那间，整个院落气氛紧张起来。一个模样像负责人的红卫兵高声宣布要对院子的主人采取“革命行动”。随即，他们疯了似地乱抄、乱翻，四处搜寻着。转瞬间，整洁、典雅的屋内被抄得一塌糊涂。直到他们发现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后，情势才稍稍缓和下来。

章士钊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毛泽东的好朋友。对红卫兵突如其来的行动，他感到十分震惊。事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红卫兵抄家的粗暴情景。信中，他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30日，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这封信，阅后即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毛泽东 八月三十日”

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一起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对章士钊采取了三条保护措施：

- 一、把抄走的东西送还章士钊。
- 二、派警卫部队的两位同志立即赶到史家胡同，劝阻再来抄家的红卫兵。
- 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往解放军三一医院，加以保护。

由于周恩来采取了有力措施，章士钊平安度过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在保护章士钊的同时，周恩来

想到了更多的朋友……

章士钊的问题出来后，周恩来心急如焚，他想到了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战朋友。这些人也需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啊。

就在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同一天，周恩来亲笔开列一张“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这张名单上，首先提到了十三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保护范围也包括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

围绕着对这批高级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斗争。

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民主人士的安危，他凭借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正值酷暑，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在北戴河疗养，周恩来马上想到他们若回到北京，可能会碰上红卫兵抄家这种事，因此，及时派中央统战部一位负责人到北戴河去，向几位老人打招呼，让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这实际是对民主人士保护性工作的开端。

毛泽东关于保护章士钊的指示下达后，周恩来多次找有关人员商量具体办法，根据被保护人的不同情况，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问题细致而周到。

他想到张治中等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出现差错，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影响。因此，他委托一些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他们暂时离家避一避。

周恩来在开列保护名单的当天，还请秘书告诉军委后勤部的一位负责人，通知三一医院准备接收他们住院，理由是：一则这些人年老多病；二则免得被红卫兵斗争。周恩来指出：这些人都是高级民主人士，又是政府人员，不是当权派，不是现行反革命，政府有责任保护其生命。在医院里，他派部队的同志作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

为防止红卫兵跟踪骚扰，周恩来特别嘱咐有关人员要秘密护送。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程潜先生的夫人郭翼清后来回忆：“那天，一个陌生人来到我家，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请程老的司机去看看，因为他常陪程老活动，认识人多。司机回来说，那个人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们全家才放心下来。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老将名字改一改，后就用了程老的小名。当时，我们不知道他将程老护送到了三一医院保护起来。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和程老见面，衣服、用品有人来取。”

除程潜外，周恩来对张治中、章士钊、李宗仁都采取了这样的保护办法。对郭沫若亦采取相同措施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稍稍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以保护。他派一些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带红袖章，装成红卫兵的样子，住在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他们还同当地派出所和所

在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鼎、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

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

列在保护名单的第一位是宋庆龄。时这位伟大的女性，周恩来太了解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一直追随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她和共产党人结下深厚的友情；南昌起义枪响后，她领衔发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愤怒谴责蒋介石的背叛行径；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力民族解放奔走呼号，促进国共两党开诚合作；像这样的人，怎么不应该保护呢？1966年9月1日，周恩来对那些缺乏历史知识的红卫兵们进行了说服工作。他谈到宋庆龄时是这样讲的：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地。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那时，国内形势非常乱，宋庆龄在北京、上海的住宅都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这使周恩来焦急万分，他恳切地劝慰宋庆龄住到北京来。为确保宋的安全，周恩来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保护工作，并决定由公安部、公安局、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这一系列措施逐渐平息了上海、北京两地冲击宋宅的风波。

然而，事情不仅仅如此，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口号下，上海农民砸毁了宋家的祖坟。这件事使宋庆龄感到非常伤心。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责成上海有关部门妥善解决。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宋氏墓地很快得到修复。当周恩来令人把修复后的墓地照片送到宋庆龄手中时，她非常感激，落下泪来。

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在即将辞世的老人心中，有什么比得到公正的评价更为宝贵的呢？

在那动乱的岁月中，这些民主人士有谁能在家或医院中真正“静心养病”呢？社会上、家庭中、朋友里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

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和变幻莫测的形势，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终日缄口不语，积郁成疾。

蔡廷锴先生的夫人罗西欧女士后来回忆道：“十年浩劫兴起的时候，蔡先生身体不大好，患有脑动脉硬化症和白内障。但在那动乱的年月里，他很

难静心养病。一贯爽直乐观的他，终日里缄

口不语，苦苦沉思，有一天，他的患难知交蒋光鼐先生家被抄了，蒋先生知道他脾气急躁，惟恐他和红卫兵冲突起来吃亏，就让蒋夫人给我家挂电话，嘱咐蔡先生不要轻易动火。听到这消息，蔡先生气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后来，周总理亲自派公安人员对我们家进行了保护，红卫兵才没能进我们家的大门。然而，蔡先生的心情却更加郁闷了。我手里还存有他晚年的一张照片，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双目无神，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

周恩来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挂在心上。他的工作没有停留在安全保护上，而是从各方面关怀他们。周恩来不仅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治上给以信任；在他们病时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在他们之中有人去世后妥善处理善后事，并且对他们的遗属关怀备至，使党的温暖浸透到他们每一个家庭。

提起周恩来的保护工作，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总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傅作义在年轻时患上胃病，一直没有很好的治疗。1973年8月的一天，他在进餐时突然感到咽不下东西。家里送他到医院检查，发现胃里有一肿块，病情已相当严重。

周恩来得到报告后非常着急，立即劝他住院治疗。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选有经验的大夫组成医疗小组为傅作义诊治，尽可能地延长他的生命。为使傅作义心情愉快地配合大夫工作，周恩来请傅作义以个人名义邀请商震回国；安排他会见美籍专栏作家赵浩生等。周恩来通过这些活动，使傅作义精神振奋，在去世前度过了一段美好而有意义的时光。

1974年初，傅作义病情恶化，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抢救。他常常在深夜找大夫去，询问傅的病情，商量医疗方案。在医生决定为傅作义作腹部开刀插管术时，他叮嘱医生一定要仔细，不要引起感染。这一时期，正是周恩来处境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江青、王洪文等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世人皆知；另一方面，周恩来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体十分衰弱。但是，为了党的工作，他全然不顾自己。

后来，傅作义病情转危。周恩来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刘芸生看到面容憔悴，重病缠身的周恩来，非常感动。她俯下身去在傅作义耳边呼唤：“宜生，宜生，你醒醒，周总理看你来了。”

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一功。”

这时，傅作义已经不能说话。只见他的嘴角微微颤抖了几下，眼眶里滚动着泪花。

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在这位即将辞世的老人心中，有什么比得到这样公正的评价更为宝贵的呢？

傅作义去世后，周恩来抱病主持了追悼会。

会后，邓颖超代表周恩来看望了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刘芸生，鼓励她战胜悲痛，勇敢地面对未来的生活。在以后的日子中，周恩来不仅帮助她善解决了生活费和住房问题，并且在政治上关心她。1974年9月，周恩来在病卧于床的情况下，亲自给中央写信，提议邀请傅作义等四位起义将领的夫人参加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的关怀，使刘芸生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为和平统一祖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报答周恩来的恩情。

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为张治中及“新疆叛徒集团案”正名

在保护民主人士的过程中，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仅疯狂地迫害大批老干部，而且疯狂地迫害民主人士，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整倒一批民主人士来获取打倒一批老干部的口实。张治中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的牵连就是典型的一例。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红卫兵多次到张治家中查抄，逼他交待“反动历史”。在周恩来干预下，张治中受到了保护。因为有毛泽东的批示，他们不好再公开找“岔子”，但其阴谋活动始终没有停止。

1967年初，全国开始了“揪叛徒”的运动。其中一例骇人听闻的冤案，是“新疆叛徒集团案”。江青、康生硬说这批同志勾结张治中，隐瞒历史回到延安潜伏下来为国民党做事。为了找到证据，他们继续在张治中身上做文章，抓不到本人，他们就追查张治中的秘书。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在新疆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陆续派出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

1942年，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影响下，盛世才投靠蒋介石，逮捕了一大批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其中有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1946年春，张治中被蒋介石派往新疆任西北行营主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在张治中离渝前夕，亲自到上清寺公馆，请他依照协定精神，释放在新疆的被捕同志。当时，张治中欣然答应。到新疆后，在屈武协助下，张治中派专人护送这批同志回到延安。为此，朱德还写信给张治中表示感谢。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种无视历史事实的作法，周恩来非常气愤。他挺身而出，指出新疆这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的，由他出面向张治中要求，由张的部下送回延安的。

为说服受蒙骗的红卫兵，周恩来耐心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列举张治中在重庆谈判时，迎送毛泽东到延安，说明张治中与中共团结合作的关系，对张竭尽全力予以保护，使张的处境稍有好转。

在那极左思潮疯狂泛滥的年代，周恩来开列的这份保护名单，以及围绕这张名单开展的种种活动蕴藏了周恩来的智慧与艰辛。周恩来保护的不仅仅是一批高级民主人士，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或许，这正是许多朋友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依然还能理解和原谅我们党失误的重要原因。

呕心沥血抓经济

“文比大革命”中，为了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坚持不懈地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作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愤然反击：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

《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双城县人委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 21 个公社已有 11 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页《要事汇报》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担心会冲击生产的预感，如今已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针对这种势态，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8 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串连运动开始危及到工农业生产和各级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红卫兵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不料，通知稿传到江青手里时，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9 月 2 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红卫兵讲清楚政策，红卫兵串连要保证党和国家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

9 月 3 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十

个问题（注：《意见》一共讲了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也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双眉紧蹙，思绪未断。

如今，不光是红卫兵串连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来了，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连。黑龙江双城县反映的情况不仅仅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来电告急，如果听任这种势头在工厂、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看来，必须调整斗争的策略。对中央文革，有些问题要先斩后奏。

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与此同时，李富春把起草的关于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送周恩来审定。

周恩来对文件稍作了修改。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农村之外。

文件指出：工厂、农村及工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工人、农民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外出串连，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以保证生产建设工作的正常进行。生产任务重的地方和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公社、生产队、企事业单位，应迅速建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9月8日，周恩来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央文革一伙对此又进行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周恩来不予理睬。会后，他直接将两个文件连同黑龙江双城县的情况反映以及江苏、江西等地来电反映生产问题的材料一起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的这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

次日，即文件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百万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连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

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不能丰产不丰收。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行？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连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又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还能搞什么革命？”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

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请来“尊神”

林彪。大批周恩来指示召开的工交座谈会。周恩来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迂回抗争

“文化大革命”像一头癫狂的怪兽，咆哮着在神州大地恣意肆虐。

正当周恩来竭尽全力勒住这头怪兽的缰绳不让它踏向农村、工矿时，林彪、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这头怪兽的“敏感处”狠狠地抽了“两鞭”，使它更

为癫狂、肆虐。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看了《紧急指示》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台的讲话中，别有用心他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

——11月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在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紧急指示》的下达和中央文革对安亭事件的肯定，等于在向社会宣布：工厂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大大地削弱厂中中共中央9月份下发的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力。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的纵深蔓延。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被揪斗，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是那样的艰难，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严同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

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分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部“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工人、农民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无疑是向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调到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周恩来的斗争方法很高明。他表面上没有急于否定陈伯达的

十二条，但他知道这十二条在座谈会上肯定会遭到强烈反对。

11月17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紧张。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卫生的负责人参加的卫生交通座谈会正在进行。

来自地方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对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串连表示担心。

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则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对陈伯达十二条中提出的“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

周恩来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人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陈伯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找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打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要余、谷二人读其中的段文字：“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也。”

而后，陈伯达又用他那难听的福建腔普通话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

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次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12月4日至6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议的汇报。

此时的林彪，实际上是中央文革请来的“尊神”，来替中央文革助威压阵。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

还未等谷牧说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的发难，大叫：“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恶狠狠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责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

这时，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6日的会上，王力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注：指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抗争，周恩来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会上，他作了“掩护”式的发言。他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倘若是“反对”，那就是敌我矛盾了。

周恩来还对那些受到错误指责和批评的干部们鼓励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字字句句他说：“这次工交会议

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 180 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由陈伯达等人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工矿、农村与学校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否定了党委的领导。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周恩来对国民经济这一大关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他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种种行径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不止一次地对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大串连、大夺权、大武斗，铁路
交通劫难四起，经济命脉危如
累卵。周恩来软硬兼施，双管
齐下。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国大地，疯狂、妒嫉、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大陆的每一撮泥土，撩拨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神志不清、上窜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1967年3月18日，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份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手中。报告反映：局内派别众多，一个局就有200多个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有人强调打破框框，砸烂规章制度，该拧闸的不拧闸，几次险些造成国际列车的碰撞……

周恩来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阵阵说不出滋味的难受。

狂热，使人迷失了理性，祸灭了良知。为了那种毫无任何真正价值的“革命”、“造反”，他们可以自己切断自己的生命线——铁路交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非常清楚铁路交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别的姑且不说，单就当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两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业发展要靠南方省区的粮食来支撑，南方的工业建设要靠北方的煤炭来保证。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主要是通过铁路，仅南粮北调一项每年就达100亿斤，1965年达120亿斤。如果南北铁路交通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瘫痪。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这样每天要靠从外地调运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的大城市，中断一天的铁路交通会是个什么样子？！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一年来，周恩来在维系铁路交通方面没少费心血。1966年8月份全国红卫兵开始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连，给我国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8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学生就达212.4万人次。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设施遭到破坏。对此，周恩来指示起草了时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的两个文件，强调要把铁路交通部门和重要站段当作“要害部门”，坚决保护。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对。

在欲以正式文件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来又找到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他还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10月下旬至11月初，周恩来又接连指示起草了《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和《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部门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全国各地的学生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以保证必要的生产物资的运输。

如果说，红卫兵的串连还仅仅是给铁路运输带来影响，那么，随着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而波及全国的夺权恶浪迭起，全国的铁路交通状况就更加混乱不堪。

1月22日，铁道部被“造反派”夺权。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铁道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铁路交通部问职工也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连；各铁路站段武斗、派仗迭起，全国一些铁路干线时有停断，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连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运行也很困难。

在这全面内乱的汪洋中，周恩来竭尽全力，自己当起了铁道部长。他除了处理其他党政大事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晚上找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哪个地方铁路交通中断，他就亲自打电话到哪里去追问，并频频找群众组织谈话，苦口婆心地进行批评、劝说和教育，不分昼夜……

——1月10日凌晨，周恩来把来自长春、齐齐哈尔、大连、武汉、广州等地的铁路部门职工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就恢复铁路运输秩序指出：“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生产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自己当起了铁道部长。希望铁路系统各单位联合起来，写个呼吁书，维护铁路畅通”。

——1月27日晚11点至次日晨7点，中南海会议厅。周恩来找铁路系统“造反派”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在夺权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责令说：“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运输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2月1日，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找铁道部部分“造反派”谈话，对他们无休止的派性武斗提出严正批评：“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7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一想，是一个人重要还是7亿人

民重要？夺权，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然而，在铁路交通全面内乱的局面下，周恩来对“造反派”及群众组织的呼吁、教育、批评、警告犹如杯水车薪。“看来，要制止铁路交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并从根本上扭转混乱的局面，必须对铁路交通实行全面军管。”周恩来决心已定，便当即将齐齐哈尔铁路局的报告及自己的意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3月19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此事请你们研究。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研究拟出了一个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3月22日，中南海会议室。周恩来向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到会代表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指出：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第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军管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负责。”然而，周恩来组织拟定的军管文件遭到中央文革一伙的刁难。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他们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也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由于中央文革的干扰，对铁路交通军管的实施一拖再拖。铁路交通的混乱势态继续恶化。5月31日中午，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的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手上。报告反映：因各地两派纠纷和武斗，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4条铁路干线均处于半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

沉重、焦虑、愤怒一起交织在周恩来心头。

“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顾不上惊扰毛泽东的午休，带上铁道部的报告，急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看着报告，毛泽东若有所思的脸上也显得非常严峻。

“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严峻的现实不容周恩来有片刻的喘息。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又紧急约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谷牧、余秋里等到国务院开会。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他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和大家商定了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细则：（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交通的命令；（二）将全国18个铁路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四）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

会后，周恩来给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写信通报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具体细则。江青一伙虽然对周恩来的先斩后报恨得咬牙切齿，无奈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只好暂时作罢。

军管之后，全国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得到一定的扼制。

然而，由于整个局势的进一步恶化，1967年7、8、9三个月间，“全面内战”空前激烈，全国局势乱到了连毛泽东也难以驾驭的地步。铁路交通中断事故仍频频发生。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继续进行各种努力。

1967年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发生，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诬

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反革命兵变”，并借机挑动“造反派”揪斗军队干部，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军管的威信也受到影响。对此，周恩来采取了更强有力的措施——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了下来，8月10日，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没日没夜地找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谈话，终于在1967年底促成了全国铁路系统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全国18个铁路局和52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就实现大联合、保证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

1968年初，林彪、江青策划在全国开展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此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起，若干地区的铁路交通局势再度恶化。

1968年2月2日，津浦线上两列客车遭“造反派”武装抢劫，乘警枪枝被抢。此外，津浦线几处路段被毁，数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通讯调度中断，致使徐州地区铁路交通瘫痪。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出了派性斗争，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不及时制止，而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立即将《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送给毛泽东，并附一封短信：“像另纸（注：指《情况反映》）所报铁路破坏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之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重笔批道：完全同意，退总理照办。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几天后，周恩来又指示有关负责人起草了一个更为严厉的内部命令，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补充命令》。《补充命令》指出：阻拦列车，挑动铁路、港口内外群众进行武斗，破坏铁路运输和装卸，一概是反革命的上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2月6日命令办理。

在那无政府主义猖獗的喧嚣中，一些“造反派”视中央命令如儿戏，越来越猖狂。3、6、7三个月，在广西、陕西都相继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恶性事件。在广西，开往越南的援越军用物资专列被抢，大批枪枝弹药被哄抢一空；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恢复通车……

对此，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商定，经毛泽东批准，对大搞打砸抢、破坏铁路交通的“造反派”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7月3日、7月24日，中央连续发布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铁路交通，对不听劝告拒不放下武器的“造反派”进行坚决打击。

“七·三”、“七·二四”布告的颁发，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此后，全国铁路交通运输日渐恢复正常。到1969年，铁路运输量全面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前三年中，为了维护铁路交通，周恩来历

经千辛万苦，费尽了心血。如果当时没有他的艰苦努力和百般抗争，全国铁路交通瘫痪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惊心的魄“九一三”

1971年9月13日，在中共九大上以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的荒原上。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许多人惊呆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深夜，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在北京的家中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促的铃声惊醒了他。对方说：“周总理请你2点赶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什么事这么急切呢？”不容细想，王幼平披上衣服，赶往大会堂。守门的战士对他说：“周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现在正在外边散步，马上就回来。”王幼平进入东大厅等候。不一会儿，周恩来回来。他的表情十分严肃。大家落座后，周恩来环视一周，看到王幼平，微微点点头。他宣布说：“现在出了件大事，出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林彪叛逃屋内一片沉寂，这是令许多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出在意料之中”——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已经发难，毛泽东称其“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庐山，挺拔秀丽，高耸入云。

山顶上总是云雾缭绕，给人一种神秘之感。

千百年来，这座美丽的山峰以其独具的风采，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吸引了无数政治家。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1970年夏季，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选在庐山召开。

8月20日，周恩来又一次飞抵庐山。

庐山美景依旧，而周恩来却没有心情去欣赏它，因为，会议开幕后不久，就出现了令他始料不及的局面。

8月22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所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林彪、陈伯达、康生，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是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另一件事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在今天的讨论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一项新的内容，就是谈一谈形势。他认为，大家更关心的是形势，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毛泽东建议，由周恩来谈形势问题。他要求，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大会，失败的大会。

毛泽东这样提出要求似乎是有感而发。

自从刘少奇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以至被迫害致死后，国家主席的位置一直空在那里。毛泽东有他的想法，他的打算。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然而，这个建议从一开始就遭到他的“接班人”林彪的反对。林彪有他的想法。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与江青一伙“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矛盾日趋尖锐。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机抢班夺权，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4月11日，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并竭力要说服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作了请示报告。毛泽东看后在报告上

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但是林彪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林彪对叶群说：“国家还得设主席，一个国家没有主席不成。”叶群没有林彪那样含蓄，她曾更直截了当地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一句话，道破了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一再说明不要设国家主席。4月下旬，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以中国历史上三国的故事又一次提醒他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为了达到设国家主席的目的，上庐山前，林彪、叶群等背着毛泽东、周恩来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陈伯达和“文化大革命”以来追随林彪，结成死党的总参谋长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积极配合。他们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并布置人为林彪起草了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

8月20日，林彪一行是带着他们的纲领、意见上庐山的。

或许，毛泽东有所预感，在2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向常委们发出了警告。

然而，陈伯达不知是听不出毛泽东的警告，还是有些忘乎所以，在22日的会上再次触及令毛泽东反感的设国家主席问题。他说：“主席做主席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家搞得很好，后来‘叛徒’刘少奇做主席，这个国家弄得有修正主义。”

毛泽东十分震怒，他说：“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他决定亲自主持九届二中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正式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向大会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周恩来没有想到，一向不大主动表示意见的林彪在事先没有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突然抢先发言，打乱了政治局常委会事先拟定好的会议议程。

大会的秩序完全打乱了。

林彪的讲话最初较为含蓄。他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大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大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随即，他直接切入主题：“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参加这次会议的汪东兴回忆：

“林彪翻来覆去他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来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的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已经四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出不悦的声调。

周总理见此状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

毛主席宣布散会。”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本来应该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但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转移话题，提出要中央全会明天听林彪的讲话录音。

那时，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毛主席的接班人。大家对吴法宪的提议不好提反对意见。这样，原来的计划难以进行下去。周恩来让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后十分不悦，他问政治局的意见怎样，并表示：“大家同意我就同意。”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以及军队中追随林彪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和李作鹏、邱会作，按照事前商量好的口径，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同时宣讲经林彪审定的“天才论”的材料。叶群在会上气焰十分嚣张，大讲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她说：关于“天才”的观点，“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整个庐山被闹得乌烟瘴气。

陈伯达参加的华北组会议闹得最凶。

当年华北组的组长是李雪峰，副组长是北京的吴德、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水贵、内蒙古的吴涛、军队的郑维山。编在华北组的还有汪东兴。

二十五年后，吴德在他写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一文中是这样回忆的：

“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

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

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

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

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

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我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

我更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人了。

晚上11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晚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

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

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

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全会的第6号简报。”

8月25日，这份简报送到林彪处。林彪看后称赞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

这份简报和陈伯达等在庐山的种种不正常活动，进一步警觉了毛泽东，使他更深刻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是应该让林彪一伙清醒的时候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决定，全会分组会议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并收回6号简报。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要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边，“要一心一德，不能再离心离德。”

与此同时，周恩来看到吴德的一封信，信中反映，北京组的聂元梓也在到处搞串联活动，要揪反对毛主席的人，因此，当晚，他找到吴德，指示他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

那几天，周恩来紧张极了，常常忙得不能睡觉。他连续找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谈话，批评他们的作法，并要他们作出检讨。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驳了陈伯达。意几书中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这是毛泽东下决心反击林彪集团的重要信号。

此后，全会主题转到讨论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上来。

9月初，周恩来分别参加了全会华北组、华东组和西南组的会议，对陈伯达及其干将进一步提出了严厉批评，责令他们向党中央做出检查。这时，在会议前一直留守北京的黄永胜刚上山不久，见势不好，赶忙销毁了他按林彪旨意准备好上庐山“开炮”的讲话稿。

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可以说是最忙的一个人，他的秘书顾明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同志连夜找林彪的几个主要党羽谈话做工作，挽救党的严重危机。我们住在恩来同志的楼上，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下楼时，见到心脏病专家胡旭东大夫和护士带着氧气瓶守在恩来同志办公室门外，恩来同志还在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已连续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又有心脏病，怕出意外，随时准备抢救。”

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在闭幕会上，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的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继续强调全党团结的意义。

他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

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于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毛泽东的讲话深得全党的拥护。周恩来在发言中号召全党，要“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更加团结，共同对敌。

中央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周恩来在全会上周密布置了批陈整风的三项战斗任务，一、首先加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到全党的学习；二、继续进行斗、批、改；三、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在庐山会议闭幕会上，还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全会公报。

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识破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平息了他们在庐山掀起的这场巨大风波。

华北会议，斗争还在继续，周恩来领导全党全军，系统批判陈伯达，同时要求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

9月9日，周恩来告别庐山，返回北京。

庐山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

还在庐山时，陈伯达已觉察到事情败露和后果的严重性。8月29日，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的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 “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

但是，经过庐山的一场较量，林彪也看清了形势：阴谋掩盖不注，陈伯达也保不住了。

自从陈伯达被点名后，林彪寝食不安，竭力同陈伯达划清界限。他说：“我和陈伯达过去没有接触”，“军队的几个同志过去同陈伯达也没有共过事”。

林彪难道真的同陈伯达没有关系吗？毛泽东在反驳叶群所说的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言论时指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领导了批判陈伯达的斗争。他和康生、李德生组成三人小组负责陈伯达专案组。

为了争取大多数，牢牢掌握军队的大权，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会批陈报告的批示中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这个举动，毛泽东称为是“甩石头”；随后，他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称为是“掺沙子”；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称为“挖墙角”。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开好北京军区党委会（历史上称为华北会议）的问题。12月18日，周恩来在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向列席会议的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毛泽东对 38 军报告的指示。会议决定先用三天时间开好军区党委扩大会，初步统一认识。19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写的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指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 月 22 日，华北会议召开，批判揭发陈伯达的斗争拉开帷幕。

会前，周恩来找吴德、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等谈话，谈了毛泽东对 38 军报告的指示，并要他们几个在会上做检查，批揭陈伯达。对华北会议的情况，吴德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几个人在会议上检讨了，华北组在庐山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6 号简报，一个是跟着陈伯达起哄。吴忠等人也在华北会议上检讨了在庐山上的错误表态等问题。

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在唐山发表了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制造了一起大冤案。

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

周总理让我们去帮助李雪峰，我到京西宾馆去看了他，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次见李雪峰。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他在北京市工作不到七十天，他的思想状态我知道一些，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有些问题上有对立情绪。

在华北会议前期，我主要是检查了我被陈伯达的讲话所迷惑和在 6 号简报上签字等问题。因为我没有参加 8 月 24 日的小组会，我也没有在 8 月 25 日的小组会上表态，所以也检讨不到更多的问题。后来在抄李雪峰家的材料中发现了李雪峰写的一本庐山会议日志，他在日志上记叙了 8 月 25 日他与我在河北的几位同志发言一事上有不同意见。

纪登奎告诉我发现李雪峰的日志后，中央认为我和陈伯达、李雪峰这些人没有关系，也没有参加 8 月 24 日的小组会。这样，周总理找我谈话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参加会议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字，他要我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揭批陈伯达，要我不必再作检讨。”

华北会议上，一些同志出于激愤，不够冷静，使周恩来很焦虑。他认为，不正确引导，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破坏了团结。1971 年 1 月 4 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连夜致信毛泽东，主张应该对北京军区的问题一分为二，不要全部否定。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开好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和宣传落实的办法。

1 月 20 日，周恩来又致信毛泽东和林彪，再一次汇报华北会议的情况，他在信中说，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方、各单位的群众关系，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周恩来密切关注着华北会议的局势，悉心指导批陈斗争。周恩来认为，陈伯达是一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支持武斗的祸首。陈伯达问题涉及到北京军区的一些干部，周恩来认为应该区别对待，不要混同起来。1 月 24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总结性讲

话，系统地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并严肃指出了北京军区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他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的决定。华北会议期间，中央军委也召开了座谈会。毛泽东多次指示，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做检讨。但是，他们却按兵不动，既不批陈、也不检讨。这使毛泽东非常气愤。2月20日，军委办事组为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指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然而，军委办事组在讨论毛泽东批评他们的指示时，仍不悬崖勒马，黄永胜在会上念了唐朝诗人章碣的一首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以此来攻击毛泽东。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对他们仍旧采取了挽救态度。周恩来多次分别约他们谈话，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敦促他们认识错误。但是，他们不思悔改。为打破林彪的山头，4月，中共中央从各军区派负责同志参加了军委办事组。

4月15日开始，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2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做总结性发言，周恩来指出，黄永胜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

几乎与此同时，林彪借口养病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随即他又派林立果从苏州赴上海，接着去杭州策划反革命政变。林立果一伙制定出代号为《“571工程”纪要》的行动纲领。

斗争的形势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尖锐，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出在意料之外——林彪集团抢班夺权迫 不及待。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之夜周恩 来协助毛泽东粉碎林彪叛国阴谋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

他在武汉、长沙和南昌等地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江西等省的负责人谈话，着重谈了庐山会议的斗争，并且点名批评了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下一步斗争做好准备。

毛泽东离开北京后的第三天，8月16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行前的指示到北戴河，向正在那里避暑的林彪汇报工作。他说毛泽东提议在“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他还告诉林彪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

林彪担心九届三中全会要解决他的问题，因此加紧了反革命叛乱的步伐。一场谋害毛泽东的阴谋在悄悄地进行部署。

然而，毛泽东似乎察觉了什么。9月12日下午，他在没有通知中央有关部门的情况下，突然返回北京。他的行踪甚至周恩来都不知道。

只有林彪清楚他们企图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了。他决心破釜沉舟，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北京对峙。

林彪在北戴河的别墅位于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林丛中。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9月12日晚，叶群耍了一个花招，她宣布当天晚上要为女儿林立衡举行订婚仪式。为了稳住客人，叶群与林立衡等一起在小放映厅看电影。

8 点多钟，林立果也赶到这里，向林立衡祝贺。随后，他与叶群一起退出，到林彪室里密谈。

林立衡与叶群一向有矛盾，叶群有事经常背着她。林立衡从弟弟焦的神态中似乎预感到什么。所以他们一离开，她也从电影厅溜出，躲在林彪的外间屋偷听。她隐隐听到他们要离开北戴河到什么地方去。林立衡立即向北戴河保卫处——8341 警卫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这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的福建厅灯火通明，玻璃窗都紧紧地闭着，并拉上深色的窗帘。靠天安门广场方向朝东的窗户旁放着长形会议桌，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周恩来背朝广场方向，正在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十点半左右，警卫秘书进来向周恩来耳语几句，他起身去接电话。电话是汪东兴订来的。

原来，姜作寿从北戴河打电话向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词汇报了林立衡提供的情况。张耀祠向汪东兴作了汇报。由于事关重大，汪东兴立即报告了周恩来。

汪东兴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

汪东兴回答：“可靠”。

周恩来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放下电话后，周恩来回到会议桌旁，继续讨论政府报告。

这时，汪东兴又接到张宏来的电话，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汪东兴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情况。

这样，周恩来不得不停止讨论会，处理北戴河发生的情况。

周恩来转到东大厅的一间小房里。他拿起电话向吴法宪查问：“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随飞机同去的有哪些人？”他命令吴法宪：“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为了掩盖南逃的阴谋，晚上 11 点来钟，心虚的叶群同周恩来通了电话。

叶群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

周恩来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叶群答：“空中动。”

周恩来问叶群是否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一开始骗周恩来说她不知道。稍停片刻她又说：“有，有一架专机，是送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大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脑子反应很快，回答周恩来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赶忙说：“我们晚上下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他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听到周恩来说要到北戴河来，叶群有些慌，她赶忙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从这次通话中，周恩来证实北戴河发生的情况确实不简单。

他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可是，李作鹏没有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去做，他给山海关机场下达的命令是：“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就放飞。”

9月13日零点32分，汪东兴办公室的电话急促地响起，这是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对方报告，林彪一行已强行起飞了。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发出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雷达立即行动起来，追踪林彪的飞机，并随时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问调度人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人员说：“能听到”。

“那好，请给我接上，我要和驾驶员潘景寅讲话。”周恩来说。

调度人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恩来说：“那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飞机没有做出任何反响。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必须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处。

他正在向毛泽东报告时，吴法宪打来电话，说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他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

毛泽东摆摆手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凌晨一点五十分，256号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立即送他到人民大会堂暂住。

这时，又出现新的情况。林立果的死党周宇驰接到林立果要他出逃的命令后，立即同江腾蛟、王飞、鲁珉等赶紧撕毁原来准备南逃的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他自己伙同于新野、李伟信以执行任务为借口，窜到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了一架直升飞机“直—5”，携带林彪一伙盗窃的大量机密文件和美元向北飞去。由于驾驶员陈修文发现了周宇驰等人的阴谋，机智地骗过他们，将飞机开回北京郊区上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降落。不畏强暴的陈修文同周宇驰等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不幸中弹身亡。周宇驰和于新野畏罪自毙，李伟信被当地军民捕获。

这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深夜三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紧急布置了应付各种可能出现情况的措施。他要求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律集中到大会堂办公。

从9月13日早晨开始，周恩来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情况，部署“紧急战备”。直到9月14日中午，周恩来才躺下休息。算起来，他紧张忙碌了五十多个小时。

2点时，电话铃又急促地响起，外交部报告：刚刚接到驻蒙使馆的一份电报，要立刻送给周总理。

秘书无奈地轻轻推醒周恩来。

听说是驻蒙使馆来的电报，周恩来立即清醒过来，他迅速坐起，让秘书

念给他听。

报告中说，林彪所乘的 256 号三叉戟飞机 13 日零晨 2 点 30 分在蒙古温都尔罕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这时，周恩来才轻轻地吁了口气，紧张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他大踏步向屋外走去，向毛泽东报告。

“副统帅沉沙折戟”这条爆炸性新闻，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许多干部由此觉醒，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认真思索一些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参加中央专案组，继续进行审查林彪反党集团的工作。他不失时机地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大旗，迅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放了大批受到林彪反党集团迫害的老干部，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国内形势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小球转动了大球

新年的第一天是展望未来的日子。

1979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这给相隔一万二千英里的北京和华盛顿带来了新的喜悦。用美国总统卡特的话来说：这一历史性事件“能有利于当今的世界和今后的世界。”

这一天，在北京，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为中美建交举行招待会。邓小平副总理在祝酒词中说：“在庆祝中美建交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生前为打开中美关系开辟了道路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人们也自然会忆及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多年来为促进中美关系做出的努力。对于这次中美两国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卡特总统、布热津斯基博士和万斯国务卿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此，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

二十五天后，1月25日，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卡特就中美建交等问题对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卡特说：“这是我首次有机会来向人数最多的观众讲话。我很高兴地代表我国2亿2千万人民，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能够建立起新的友好关系致以我个人的谢意。我要指出，这一机会并非仅仅是过去几个星期中，我作为我国总统同中国的华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谈判的结果，它是多年来中国的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同我的前任——我国的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进行谈判的结果，它得到许多伟大的领导人和我们人民的广泛支持。”

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这两段讲话共同谈到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在推进中美两国建交的历史进程中，周恩来是值得提到的重要人物之一。

“小球转动了大球”，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1971年，樱花盛开的时节。

日本著名城市——名古屋正在翘首迎接前来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各国健儿们。

在人群中，人们又看到了很久没有在国际乒坛上露面的中国运动员矫健的身影，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林惠卿、郑敏之

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运动员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参加这次比赛是十分不容易的。每当提起这场赛事，熟悉内情的人们都会想起周恩来，想起他为设计那座中美友谊的桥梁而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

乒乓球队出发前，周恩来向他们交待了一项任务：为加强与各国乒乓球队的交流，赛后可以邀请几个国家来中国访问。他特别提到匈牙利说：“不是说他们打得好吗？你们到了日本，务必向匈牙利发出邀请，请他们到中国来访问，相互交流。”

3月30日，美国乒乓球队听到中国队邀请南斯拉夫访华的消息。在名古屋比赛休息大厅内，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国际乒联理事、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罗福德·哈里森碰见中国乒乓球队负责人宋中时，忙问他还准备邀请哪些队访问中国，并说：“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斯

廷霍文还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选手到美同去。”

美好的信息随着电波传向中国。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向中央写的报告的结论是：“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

这时，名古屋又爆出比世乒赛更加爆炸的新闻。4月4日这天，世乒赛五个单项比赛全面展开。经过充分的准备活动，中国运动员提前乘车赶往爱知体育馆。当汽车就要发动时，一位长头发的两方运动员也跳上了车。车上的人一下就认出，他就是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格伦·科恩。原来，他因为练球耽误了时间，找不到自己队的车子了。当年参加比赛的中国著名选手庄则栋回忆说：“他很自觉地站在车门口，也不动。汽车一直向前开，路上大约走了10几分钟，他就站了10几分钟，也不跟中国人说话。中国运动员也没有一个人主动同他说话。”

当时，庄则栋坐在车的最后一排，这时，车快到站了。看到科恩很窘迫，庄则栋站了起来从挎包里拿出一块折叠好的东西递了过去，并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这辆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

科恩打开一看，是一幅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上面是黄山风景图。

庄则栋曾经连续三届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能够得到他的礼品，科恩十分高兴。

他们相拥着走下车，迎面碰上了一群记者，他们一眼看到这新奇的现象，看到科恩手中拿的中国织锦，十分兴奋，也感到非常惊奇。顿时，闪光灯中快门频频按下，拍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

第二天，日本新闻媒介争先恐后报道了这条令世界瞩目的新闻。当天，科恩在地铁站买了一件运动衣回送庄则栋，并又拉着他一起拍照。中美关系的新动向，引起了各国更大的关注。

名古屋传来的信息，也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注意。虽然，他们都在那份认为美国运动员访华的时机尚不成熟的报告上划了圈，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形势的新判断，一个新的决定正在他们头脑中悄悄地酝酿。

新闻工作者钱江在他的书中写道：

“星光闪烁，灯光如水，映照出毛泽东的高大身影。在他的办公桌上，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已经放了几天了。

对于这份报告，周恩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在报告中加进了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在文件末端，周恩来写了三个字：‘拟同意’。他本人不作最后决定，没有把报告批下去，而是于4月4日将它呈送毛泽东

主席。

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没有当即批示，但也没有让秘书把它拿走。这个情况说明，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因为等不到毛泽东的批示，名古屋的赛事就要结束，外交部就把周恩来批过的文件内容告诉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结束比赛的日子即将临近，周恩来提醒毛泽东，4月8日，各国代表团将纷纷离开名古屋回国。毛泽东面对新的抉择。

吴旭君，这位当年毛泽东的护士长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下决心时的情景：

“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楞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呵，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他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毛主席做了最新的决定。”

消息传过去，名古屋震动了。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31届世界乒乓球比赛结果的关注。

小球终于转动了大球。

有人称赞庄则栋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的关头所作出的贡献，而庄则栋却说了这样一句寓意深刻的后：“我只是把乒乓球从球台的这一边打到那一边，而周总理是把友谊之球从地球的这一边打到了那一边。”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经香港飞抵北京。

4月14日，周恩来在神圣的人民大会堂接待了来自美国、加宁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他亲自为这次会见设计了椭圆形会场。

在热烈而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同美国朋友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周恩来问斯廷霍文：团长先生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吧？

斯答：是的。我们代表团每个成员都是第一次到中国来。

周问：对中国有点生疏吧？

斯答：是的，对中国完全不熟悉，但对你们的好客很熟悉。

周说：中国有句古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斯说：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说法，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很好的朋友。我们欢迎中国朋友去美国访问。

接着，周恩来仔细询问了几天来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会见中，调皮的科恩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问题：“总理对目前在美青

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亲切而耐心地回答他：“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的粗浅的、表面的观察。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别的国家的青年来访问时，我们发现他们不一定和你们同一派，但是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形式，比如留长头发，等等。我碰到过英国青年也有留长发的，碰到过日本青年也有这样情况的。”

科恩很有兴致地插话说：“对，总理先生。这些表现形式是许多日子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有少数人熟悉。”

周恩来继续说：“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我只能回答这些了。”

周恩来的坦诚使科恩深受感动，回国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为此，科恩的母亲非常感谢周恩来对他儿子的影响。

最后，周恩来请美国朋友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周恩来与基辛格秘密会谈，周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世界观也不同，但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

其实，远在“乒乓外交”发生之前，中美两国已经相互开始试探。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入主白宫，这位明智的总统决定以从越南撤军和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12月3日，在波兰华沙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大使向中国驻波代办表示，愿意恢复已经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华沙会谈。

1970年初，中国代办和美国大使在华沙进行了两次会谈，美国大使进一步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意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但是，这项提议由于美国出兵柬埔寨而搁置下来。

然而，聪明的周恩来没有放弃努力，这年10月1日，他独具匠心地安排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欢度中国的国庆节。然而，与中国的思维方式差异甚大的美国首脑一直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和毛泽东作出决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该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

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至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队伍，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讯联络的目的。”

与此同时，尼克松获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准备访问北京的消息。尼克松利用叶海亚·汗出席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的机会约见了她。10月25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叶会晤。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充当中美之间的“信使”，请叶海亚·汗告诉中国，他们认为中美和解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决不会与苏联一起共谋反对中国，并表示愿意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

第二天，尼克松会见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谈了同样的内容。

后来，周恩来传信尼克松：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他还说：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随后，令人眩目的“乒乓攻势”引起世界局势的巨大震动和连锁反应。

1971年4月21日，中国方面向尼克松提出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在于：“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重申，中国政府愿意接待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代表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

5月17日，尼克松向北京正式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问题，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他提议，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举行一次秘密预备会议。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即将举行的中美会谈，分析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预拟了各种相应的对策。会议决定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尼克松一个口信，表示欢迎基辛格来华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这个口信经毛泽东批准后，于29日通过巴基斯坦信使发往白宫。

会后，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起草了致毛泽东和林彪的书面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主要内容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预；美国如果愿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

6月2日，基辛格首先看到信息的内容。其中提到，最好由基辛格博士在6月15日至20日之间选定一个到达中国的日期，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一个下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至于飞行方面，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

着最近的将来在中国会晤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后来回忆，看到这个信息，“我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周恩来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即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最关心的问题，这就保证可以讨论我们最感兴趣的全球性问题。”7月9日中午，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安全降落。叶剑英元帅、黄华大使满脸笑意地站在那里迎候。在钓鱼台宾馆，基辛格见到了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就深深地吸引了这位美国朋友。我们不妨翻开基辛格的回忆录，上面记载了他在那次见面时的全部感受。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

“他面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在我们决定今后以巴黎作为联系地点之后，他还是提议，有时我们仍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因为据他说：‘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会谈是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

由于基辛格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没有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所以把这次会谈当成了一次正式的外交会谈。他为此还做了一番准备，写了一篇正式的外交讲话发言稿。

周恩来请基辛格先谈。

基辛格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基辛格说：“已经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这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周恩来用手示意说：“你会发觉，他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很快到了午餐的时候，周恩来诙谐地说：“中国的茅台酒可厉害，喝醉了回去交不了差。”他们边吃边谈，周恩来说：“谈判就是自由的交换意见，何必用稿子呢？”聪明的基辛格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说他不要照本宣科。他也很幽默地回了一句：“我用稿子已经赶不上总理先生了，我不用稿子就更赶不上总理先生了。”

周恩来告诉基辛格，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所列举的观点。这使基辛格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他对这件事毫无所闻。

原来，美国中西部新闻宣传机构的高级人员们集会，请内阁阁员和白宫助理人员报告国内政策。尼克松在会上做了一篇事先未草拟讲稿的即席演说，他赞扬中国人是“富有创造性的、勤劳的，是世界上最具有才能的民族之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本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

社会隔绝的状态”。

周恩来十分善解人意，第二天早上，他以自己特有的作风，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那篇尼克松讲话的英文讲稿，连同基辛格的早餐一起送过去。

基辛格第一次到北京同周恩来的会谈，比他担任公职以来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

在北京期间，基辛格还同黄华一起商讨了由中国方面起草的联合公告草稿，这件事没有经过多大的争论就通过了。为什么会这样顺利呢？20多年后，基辛格对前来采访他的大型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的导演戴维宇说：“跟周恩来打交道获益匪浅，他使我注意事情的本质。起草第一份声明时，当时说先不写，谈一谈什么是心须写进去的，然后再动笔。后来在谈上海公报时，他又提出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起草文件的做法，双方各自阐明立场，在同一份文件中既列出了双方的共同点，也列出了双方的分歧。”

7月11日，基辛格是满载着收获飞离北京的。

7月15日，尼克松在洛杉矶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中发表了一篇七分钟的简短演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3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7亿5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接着说：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背景。

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较好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同一天，中国方面以更为冷静的方式由播音员向全国播发了这个公告。当时，周恩来静静地收听着这条消息。他称，这是一个“震动全世界”的公告。3个月后，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飞往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具体安排。周恩来的一篇祝酒词深深地感染了基辛格，他说：“它比正式的发言能更好他说明周恩来的风格。”祝酒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们，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来中国临时访问的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和

其他美国朋友们。基辛格博士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政治讨论和技术性安排做准备工作。

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 22 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幕。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 16 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说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我提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朋友的健康干杯。”

由于有了第一次会谈的基础，这一次会谈双方所谈问题又深入了一步。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明了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法，给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基辛格说：“除戴高乐以外，我不曾遇到一个领导人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他不把领导工作同宣布个人的特殊爱好混为一谈。他懂得政治家不能造时势，很喜欢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须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政治家的风格要求懂得何者不能改变，同时也要懂得在何种范围内可发挥创造性。正是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从未讨论共同行动——美国 and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和平与均势问题在继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做法。”

基辛格这趟北京之行最重要的任务是同周恩来商谈尼克松访华公报。

这类谈话最初由于双方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僵局。后来，中国方面在周恩来主持下，提出了一个双方可以各抒己见的公报初稿。即将双方的共同点概括在一起而将双方各自的立场、主张以及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分别说明。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提出的这份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毫不妥协的词句阐述了你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而留下一些空白页由我们来阐述料定是相反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寸步不让的。乍一看这个初稿，我大吃一惊。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我想，这在国际上和国内也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我进一步思考，就开始看出，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我们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我们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可靠的信息。我们就可以避免那老一套的解释，而这往往是那种典型的公报的祸根。”

基辛格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方案，他为尼克松北京之行的铺路工作圆满结束。

10月26日，当基辛格登上飞机启程回国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他始料不及的事，就在这一刻，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新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

世界翻开了新的一页。

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手相握，20多年来隔绝中美之间的坚冰终于融化

尼克松访华是世界关注的大事，随行来的大批记者需要通过卫星播放整个行动的实况。可是，当时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

一天，周恩来约熊向晖来商谈这件事。他请熊向晖跟美国方面谈一谈，由他们代为租用一个卫星。中国方面照价付款。

熊向晖对美国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谈了这件事。齐格勒说：“租用卫星需要一百多万美元，我们美国方面已经准备了一个卫星，不用中国政府付款，只要建立地面卫星站就可以。”

周恩来听到汇报后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主权问题，我们一定要租。”他对熊向晖说：“你就对齐格勒讲，请他为我们租一个卫星，租用期间，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有使用权，但使用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的批准，而且我们要收费。齐格勒租用卫星的价格合理，我们收费也会合理。”

熊向晖把这个意见转告齐格勒时，他楞了，想了一会儿，不无钦佩地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谈判对手。我保证租用卫星的价格一定合理，因为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相当的。我非常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维护中国的尊严。”他还说：“我刚刚理解基辛格博士给我讲过的话，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飞抵北京。

尼克松走出机舱时发现，周恩来已经站在舷梯脚前。

2月的北京依然很冷，在寒风中，周恩来显得那么坚毅，他没有带帽子，厚厚的呢大衣掩盖不住他瘦弱的身体。

尼克松走下舷梯的一半时，周恩来带头鼓起草来。他略停一下，也按中国习惯鼓掌相报。尼克松后来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激动地写道：“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此时，周恩来的心情也很激动，25年了，两个国家相互隔绝，今天，坚冰终于融化，新的外交格局终于形成。

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在这一周中，周恩来陪同他会见了毛泽东，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记下令他永远难忘的中国之行。

回忆录写道：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而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很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朝气。

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刻板的意识形态的框框所歪曲，然而他的知识渊博是惊人的。”

中美联合公报几乎没有费什么周折就在杭州刘庄签字，定于2月27日在上海发表。因此，这份公报又称为上海公报。

双方关心的焦点和最难统一的问题是台湾问题。

公报中是这样写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能够达成这样的协议是不容易的，它包含着周恩来的智慧和心血。

2月28日，尼克松结束在中国的访问。

这一周，正如他所说的：“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敢斗“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中，始终贯穿着“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无论是“新文革”，还是“旧政府”，都有它特定的历史含义。“新文革”的代表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旧政府”的代表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在“旧政府”同“新文革”的斗争中，周恩来从未退缩过，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尘封了 30 多年的一则启事引发 了一场捍卫历史真实的斗争

1967 年夏，搞了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毫无“收”的趋势。

一些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被冠上“叛徒”的帽子，遭到更严重的摧残。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场阴谋，然而，他没有想到这股逆流正悄悄地向他袭来。

当揪斗“叛徒”的狂潮席卷全国时，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启事——《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当他们得知“伍豪”的真实姓名时，不禁大吃一惊。这张报纸很快送到了江青的案头。

当年，这些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决没有想到，这则被尘封了 30 多年的启事，竟成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武器；也决不会想到，这场捍卫历史真实的斗争会延续了十几年。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用过的别名。

伍豪事件，发生在 1932 年 2 月的上海。

当时，周恩来已在两个月前从上海秘密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而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报刊，却刊登了一则启事——《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一场阴谋，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黄凯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制造的。

为什么他们要搞这样一场阴谋呢？

1931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投敌。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中央的安全形成巨大的威胁。由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了敌人的情报，并立即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采取种种保护措施才使党中央免遭破坏。可是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违反组织纪律又遭被捕，对党中央形成新的威胁，因此，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采取果断而必要的措施，切断了顾顺章可以利用的一切线索，制止了敌人更大的破坏活动。

11 月底，上海各报登出顾顺章悬赏缉拿周恩来等的紧急启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周恩来等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江西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特务机关一计未成，又施新计，以制造所谓周恩来等叛变自首的方式来达到破坏中共党组织的目的。这件事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与国民党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2 年 2 月 22 日上海的党中央首先以曲折的笔法，在《申报》上登出一则启事，否认所谓伍豪启事。随后，2 月 27 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代党刊《斗争》第四期）上，以伍

豪的名义登出了《伍豪启事》，驳斥国民党的造谣诽谤。

“伍豪启事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
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
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民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把中
俄合办的中东路双手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
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中，在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背后，
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
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
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
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为进一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伎俩，党组织又通
过一定的关系，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业的法国律师巴和，请他在《申报》
上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运用巧妙的措词进行驳斥。周少
山是周恩来另一个为党内所熟知的别名。

1932年3月4日，《申报》以鲜明的大字标题刊出这则启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
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
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
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说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
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与此同时，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于二月下旬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宣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
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
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
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历史，却为江青所利用。接到红卫兵送来的报纸的抄
件后，江青不作任何调查，于1967年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
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到他们面前。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一个
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显而易见，这是逼
着周恩来表态。如果说，在以往的一些小事上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恩来还能
忍让的话，那么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周恩来是决不会置之不理的。5
月19日，周恩来在这封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
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
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
报。”当天夜间，周恩来就这个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
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
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
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

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1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5月19日夜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信和材料后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967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又向毛泽东重提此事，毛泽东批道：“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以后，毛泽东还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

然而，毛泽东的证明和保护，仍挡不住江青等的陷害。1967年10月，江青在北京钓鱼台接见吴法宪时指着载有“伍豪启事”的材料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又将诬蔑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吴法宪。

为此，周恩来就此事做了多次严正声明，驳斥江青的谎言。

在1972年夏天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谈谈这个问题，所以，关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列入了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议程。6月13日，陈云在会上发言指出：“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四 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同一天，陈云还写了书面发言，说：“我现在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这个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他向大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把这个报告的录音和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经中央批准后存入中央档案处，同时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存一份，便于党内都能了解这件事的真相。

但是，会后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问题被搁置下来。

1975年9月20日，重病的周恩来又要被推进手术室了。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他看上去心情似乎不太平静。只见他在那份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关于《伍豪启事》的录音报告记录上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注明是“1975年9月20日”“于进入手术室（前）”。

虽然，周恩来生前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是，人民最终使真相大白。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陈老总
站在崖边，我没有拉住他……”

一缕轻柔的光穿过窗帘的缝隙钻进病房中，昏睡中的周恩来突然惊醒。站在一旁的方医生赶忙俯下身问他：“总理，您怎么了？”

周恩来吃力地睁开眼，朦胧中看见了方医生，他才悟到自己躺在病床上，不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总理，您不舒服嘛？”方医生一边问，一边为他擦去额头的汗。

“不！”他对方医生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陈老总站在悬崖边，他脚下一滑，我没有拉住……”

原来，周恩来又在思念他的战友了。

或许，因为陈毅走得太匆忙，太不应该；或许，周恩来因为没有保护住陈毅而深感内疚；或许，周恩来认为他再见陈毅的日子不远了……

“文化大革命”中，陈毅是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残酷迫害的对象之一，也是周恩来需要竭尽全力保护的对象之一。

在保护老干部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江青一伙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江青一伙就暴露出夺取政治

权利的野心。他们四处点火，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老干部，在军队中制造混乱。这种局面令经历了几十年斗争苦难的许多老同志、老军人忧心如焚。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由部分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讨论党政业务的会议，又被称为中央碰头会。那天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仿佛一场风暴来临之前。交战的双方，一方是身经百战、功劳赫赫，身怀正气的老师；一方是心怀叵测的江青一伙。

谭震林斥责张春桥等说：“你们这样搞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于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罢，他夹起皮包，准备拂袖而去。站在一旁的陈毅扬起手说：“慢，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这个行动后来被称为“二月逆流”。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内心十分震撼，也十分忧虑。为了保护陈毅、谭震林等人，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他在考虑究竟用什么方式，去报告才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然而，江青一伙却等不及，他们终于有了向毛泽东告状的口实。2月16日当晚，在江青的安排下，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向毛泽东报告了会上的情况，这使毛泽东十分生气，本来，周恩来宣布不准将碰头会的内容泄露出去，而江青一伙却无视他宣布的纪律，歪曲事实地将会上情况散布出去。从此，对这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1967年8月初，一些造反派追随江青一伙公开对抗周恩来的指示，在批判陈毅的会场上公开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那时，为了避免意外，几乎每次批斗陈毅的会，周恩来都要参加，想办法保护。那天，周恩来站在灼热的阳光下，执意不肯进去，直到造反派把标语摘下来为止。

在陈毅处境最危难的时候，周恩来曾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让你们

从我身上踏过去。”

这种情景不止一次的发生。一位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陈毅是周恩来力保的对象之一，周恩来多次在外交部与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或出席‘批判陈毅’的大会。为了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批判陈毅的大会，事先跟外事口的造反派达成协议，即下许在会场上张挂、书写或呼喊‘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标语及口号。”那天，当周恩来陪同陈毅走上主席台，陈毅开始做检查时，造反派违反了自己的承诺。‘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等大幅标语，从礼堂二、三楼挂下来，许多人手里还举着事先准备好的各种各样打倒陈老总的标语和毛主席语录，会场内有人领头呼喊着同样的口号。周恩来十分生气，多次站起来制止呼口号，他斥责造反派不守信用，宣布散会。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周恩来和陈毅离开会场。成元功后来回忆：“这时，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同冲上台的造反派扭打起来。造反派喊到：‘你们为什么保护陈毅？’一位服务员回答说：‘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我们这样做的。’”

虽然有周恩来的全力保护，但是，对形势的忧虑和心情的郁闷，使一向乐观豁达的陈毅终于病倒了。

1971年，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陈毅住院手术时发现患了直肠癌。这年9月发生的林彪沉沙折赖温都尔汗事件使陈毅脸上有了胜利的笑容，然而他的病情却急剧恶化。1972年1月6日，陈毅不幸病逝。1月8日，周恩来赶到305医院向陈毅遗体告别。或许他后来梦中惊醒的正是这一刻，他没有能够拉住陈毅，任他撒手而去。望着安详的陈毅，周恩来不禁泪水盈眶……

保护陈毅，只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江青一伙斗争的一个典型，而事实上，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他所进行的抗争是无法计算的。

一位“文革”中幸免于难的老同志说：“在十年动乱中，敬爱的周总理想方设法保护许许多多老同志，使他们免遭迫害和残酷折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总理已身患重病，还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作为受到保护的幸存者之一，每当我回忆及此，感激之情，难以描述，唯有不断鞭策自己，以周总理为榜样，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林彪事件后，为周恩来解放“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创造了条件，而陈毅逝世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又为周恩来解放干部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机。

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在同张茜等人的谈话中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信息给了周恩来巨大的鼓舞。他抓住机会，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这些对进一步解放老干部有着特殊意义的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重新复出广作舆论。

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达后，邓小平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陶铸、王震、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在3天内被分别遣送出北京。邓小平一家被转移到江西。

周恩来深知这些人被遣送出北京将意味着什么，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了最大的关怀，同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老干部的作法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1969年10月18日上午，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打电话，对接电话的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说：

“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接触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

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这次谈话中，他也提到邓小平。周恩来说：“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动力，也是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这些指示，对于当时江西省的一些领导还是有一定的威慑作用。邓小平被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厂子附近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少将的房子，这座房子被称为“将军楼”。

1970年，周恩来飞江西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他曾对保健医生张佐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一个是你的同行，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

周恩来为什么讲这段话，他在想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但至少可以断言，周恩来心中还在惦记这个在旅欧时就如同自己小弟弟般的邓小平；至少可以看出，邓小平在他心中并不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利用“林彪自我爆炸事件”的转机，把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引向深入，解放干部的工作也有了进一步发展，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在这封来信上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指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然而，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邓小平复出的工作并不顺利。毛泽东指示下达后，周恩来作了进一步努力。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内说：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1972.12.18”

1973年初，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江西劳动三年之久的邓小平终于踏上回北京的路程。

这时，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发展，3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了自己便血的情况，决定向政治局请假两个星期，去玉泉山检查身体。他建议这个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同时，他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由纪登

奎、李德生、汪东兴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第二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会议的情况。毛泽东批示：同意。

随后，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回到北京的邓小平也十分挂念对他亲如兄长的周恩来。他和夫人卓琳多次到玉泉山探望生病的周恩来，同他进行亲切的交谈。

3月29日，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到毛泽东处开会。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

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邓小平的复出，使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总算透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同“四人帮”的斗争又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力量。

为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利不落人 “四人帮”手中，周恩来以重病之 躯进行拼死斗争

1974年国庆节刚刚过，毛泽东就提出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他的秘书从外地打电话告诉王洪文：“毛泽东说，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要王告诉周总理。”

这个意见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加快了抢班夺权的步伐。

10月中旬，江青利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风庆轮问题”的报道，污蔑“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他们有预谋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说“风庆轮”是“卖国主义”，“邓小平是后台”，要邓小平表态。

“风庆轮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74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奉命派遣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李国堂任政委，顾广文为政治干事。“风庆”轮开船后，“四人帮”的爪牙却大做文章，给李、顾扣上“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帽子。实质上，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指向国务院。李国堂、顾广文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说明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还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李、顾的态度激怒了“四人帮”，他们在上海的亲信为此写了一封1万多字的信，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江青和王洪文等在信上批示，要求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严肃处理，并将情况报中央。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后，李、顾受到批判。“四人帮”还在报纸上大做文章，竭尽诬蔑之能事。

与此同时，江青还大闹政治局会议，要邓小平对此表态。邓小平不畏强暴坚决顶住，使江青恼羞成怒。

10月18日，江青等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状告周恩来、邓小平。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周恩来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在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毛泽东并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诬告，他批评了王洪文，要他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回京后同周恩来、叶剑英等谈一谈。

周恩来在北京加紧了解了“风庆轮事件”的原委，了解了这件事并不像江青他们讲的那样。周恩来敏锐地察觉，这是他们计划好了要整邓小平，阻挠他出任第一副总理，因此，周恩来约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请她们把真实

情况报告毛泽东。

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人啊安排由周恩来、王洪文负责。毛泽东还提议由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与“四人帮”第一个回合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的支持使周恩来十分振奋，他下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的虚弱病体，紧张地开始工作，有时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病房常常是通夜明亮。

在病榻上，周恩来仔细审阅了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和名单。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他指出，人多名单“关键在于中青干部”，并提议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希望毛泽东健康日好，“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这时，“四人帮”也加快了夺权的步伐。江青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闻讯后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等人竭力想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文化、教育、体育三个部委中，周恩来慎重地征询李先念等同志的意见后，提出，教育部关系重大，以周荣蔭掌管为宜；文化、体委可做让步。

为慎重行事，周恩来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经过反复酝酿，周恩来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单方案。

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年底，周恩来决定抱病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这时，医生发现，周恩来大便潜血，他的癌症已转移到肠部，需要立即手术。这使叶剑英非常着急，因为这是同“四人帮”集团的一次重要较量，去长沙汇报只有周恩来最合适。经过与医生反复研究，决定推迟手术，叶剑英要求医护人员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

这是在用生命与“四人帮”斗争啊！

12月23日，周恩来飞抵长沙。

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促膝交谈。毛泽东关切地嘱咐周恩来要注意身体，多出来走走。他还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的有力支持，使周恩来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拥护周恩来起草并由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1975年1月13日，经过同“四人帮”艰苦斗争而取得胜利的四届人大，终于在北京隆重召开。

当周恩来瘦弱而又坚毅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甚至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操着夹杂着苏北味道的口音，一字一句地念着那份政治报告，听起来，依然那样亲切，那样有力。这是他最后一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做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向全中国人民留下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向世界的前列”的政治遗言。

重病的日子

从1974年6月住进医院，到1976年1月去世这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中，周恩来一直受到病痛的严重折磨。然而，在这段时间中，他想到的、关心的仍然不是自己，他留给后人的是一件件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

病痛没有压倒周恩来，他以 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身体常规检查中发现患了癌症。超负荷的工作，复杂的斗争和郁闷的心情使他的病情很快恶化。1974年6月，周恩来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治疗。病痛的折磨没有压倒周恩来，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精神支撑着病体。四届人大召开后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1975年3月间，他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3月20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他的病情和对疾病的态度：

“主席：

最近4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3次电烧，已经稍稍控制。去年11月12日经镜照电烧后，一个半月年仅尿血9个C.C.多；今年2月4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亦仅尿血10个C.C.多，如待满3个月再行镜照检查，当在5月初或4月底。

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4同志（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唐两同志转报主席，我决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问主席好！

周恩来

1975.3.20

虽然，周恩来是一个病人，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病人。生命下息、战斗不止，是他遵循的重要原则。在周恩来重病期间，他所承受的工作甚至超过一个健康人所难于承受的工作。用他的警卫秘书高振普所说：“他没有因为生病而减少工作，他没有因为有病而增加休息。”

力平和成也竟在他们写的《周恩来为人民抱病操劳记略》中对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到1976年1月8日去世这段时间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这段日子里，周恩来共作过大手术 10 次，小手术 8 次。平均计算，大体上每 40 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周恩来就继续工作。1975 年，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毛泽东支持下由邓小平主持了。但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仍旧处理工作问题，此外还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161 次，同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 55 次，接见外宾 63 人，在接见外宾之间或之后与陪见人谈话 17 次，在医院中召开会议 20 次，离医院外出开会 20 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 7 次。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并且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无论在开会时，还是在会见外宾时，人们很难看出，也很难想象，他是正在受着多种癌症折磨的人。

人们常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周恩来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的典范。

**他对妻子的最后一个请求是死
后不保留骨灰，妻子说：“在
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

往年的 6 月 1 日，西花厅宽敞的院内常常会传出孩子们欢快的笑声。而 1974 年的 6 月 1 日，西花厅却格外沉寂。

周恩来就要离开这居住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厅，就要去住院治疗了。他的病情能不能好转，他还能不能再回到这个充满温馨、充满幸福的家，谁也说不清楚。送行的亲人压抑着内心的痛苦，默默地祝福，祝福他能恢复健康，祝福他能早日回来。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红色的高墙外面就是嘈杂的马路，南来北往的车辆，络绎不绝的行人常常会打破墙内的安宁。据说，有人曾建议，让路经墙外的公共汽车改道，恢复墙内的安宁，但是遭到周恩来的反对。

这里原是 1910 年清廷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醇亲王当摄政王时盖的办公厅。有人说，周恩来选择西花厅是因为爱上了院内的几株海棠花，每当春天来临，海棠花开清香四溢时，周恩来总会忙里偷闲和妻子一起在树下散步；或者同他请来的各界朋友一起赏花，充满生活的情趣。

提起海棠花，周恩来和妻子之间还有一段美好的恋情。

1954 年春天，海棠花开时节，周恩来正在瑞士出席争取世界和平的日内瓦会议。望着满院争奇斗妍的花朵，邓颖超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一天，她从树上采摘了一朵茂盛的海棠花，细心地压在书里，而后连同一片原来压好的香山红叶一起寄给了周恩来。邓颖超在信中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

周恩来会心地托人带回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和玫瑰花。后来，邓颖超将这寄托相思的花和叶贴在纸上，嵌入镜框挂在卧室里。它象征着他们夫妻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

就要离开家的周恩来望着那花已谢而枝叶仍旧茂盛的海棠树，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感情。明年的花开时节，还能和心爱的小超漫步在那熟悉的绿荫小道上吗？周恩来无法回答。

以往，周恩来和妻子很难相守在一起，而住进医院后，邓颖超和他相伴的机会多起来，邓颖超的秘书赵伟后来回忆：“他入院之初，还坚持办公，

由秘书挑选文件，交邓大姐每天带到医院。这段时间，邓大姐就成了总理的通信员和秘书。”

接触的时间多了，他们谈话的机会也就多了。他们之间交谈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对身后事的处理。

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对这个问题已有所考虑。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倡议，对人死后的葬仪从土葬改为火葬。周恩来与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在倡议书上签了字。在中央做出决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商议，“不宣传、不张扬，自愿把我们已经死去的先人的坟墓改成深埋，把土地交给公社使用。”

生病住院后，如何处理好身后事，更迫切地提到周恩来面前。邓颖超后来回忆：“周恩来同志说过：我死了以后，我的骨灰不要保留，拿去作肥料。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而且也许还可以起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当时，我们俩人这样约好，而且相互保证。恩来同志说：我可以保证你，你未必能保证我。当时我也觉得他的看法有道理，他是中央负责同志，对我这个普通共产党员来说，我死后，他向中央报告一下，就可以保证不保留我的骨灰。而如果他先我而故去，对于他的骨灰如何处理，我只能提出意见，要由中央作出决定，我难以保证对他的诺言能够实现。”

周恩来十分理解邓颖超的心情。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也对赵炜讲了。

赵炜后来回忆：

“记得9月间的一个晚上，周总理叫我去。在谈工作之前，先对我讲起他死后骨灰怎么处理的事。我一听他谈这个，就怕对他精神上有压力，忙用颤抖的声音说：‘总理，您不要谈这事，您还不会那么快。现在讲，对您治病没有好处。’话音未落，总理就批评我说：‘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我只好忍着悲痛听他说下去。他说：‘我和大姐在十年前就约好的，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撒掉的问题，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的前面，我可以保证她的。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我强忍泪水听完了总理的这番话。对撒掉骨灰的事，周总理住院期间同我讲过两次。后一次他补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作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活着要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周恩来遵循自己的诺言，为他的民族，他的人民，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周恩来病重时，赵伟陪邓颖超去看他，他说：我们两个约好的，骨灰不要保留。我的丧事不要超过任何人，不要特殊。当时，他的病情很重，情况很危险，邓颖超没有答复他。

死后不保留骨灰，这是周恩来对妻子提出的最后请求。

邓颖超认真地办了这件事。

周恩来去世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到医院向他告别。中央同志在场时，邓颖超郑重地向他们提出：第一，恩来同志要求不保留他的骨灰，要求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第二，我个人的建议是，最好不要搞遗体告别，不要搞吊唁，至于开个追悼会，那是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中提倡过的。毛主席说：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开个简单的追悼会就行了。

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批准了邓颖超代表周恩来提出的请求，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十分感慨地说：“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他的革命行动，使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我对恩来同志的保证也终于实现了。在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

他最关心的是祖国统一，在一份对台工作的文件上，他用颤抖的手写下“托托托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台工作遭到很大破坏，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后，中共中央对台工作才又开始出现新的转机，并且艰难地向前推进。1974年，周恩来飞长沙会见毛泽东时，谈到被关押的战犯问题。1975年，经毛泽东提议，在周恩来亲自部署下，释放了在狱中关押的全部战犯。

这时，周恩来已重病缠身，但是，对台工作一直由他直接领导，一些重要的文电，特别是关系台湾问题的重要文电都要送到他那里签发。1974年9月4日，他在一份对台工作文件上认真地作了批示，批示最后的四个字是“托托托托”。这是周恩来批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他留给负责对台工作的同志的最后嘱托。

躺在病床上，周恩来还一直惦记着远在台湾的朋友，他听说张学良患了眼疾，有失明的危险，十分着急，立即请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查明情况。张学良是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民族英雄”和“千古功臣”，当年，他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后，周恩来利用种种机会为张重获自由而奔走呼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依然怀念着海峡对岸的张学良，他在许多次讲话中都给予张学良高度的评价。1990年5月30日，邓颖超在张学良九十寿辰时致他的贺信中这样写道：“忆昔54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忧，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势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等思，赢得人们景仰。恩来在世，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当然，周恩来关心的不仅仅是一个张学良，在他心中，装着所有台湾朋友，他盼望着祖国的统一，直至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

1975年9月的那次手术中，医生们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细胞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当时，正在领导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的邓小平指示医疗小组，要为周恩来“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这以后的几个月，周恩来的身体愈来愈虚弱，但是，他的头脑却十分清楚，还在思考着有哪些重要问题需要交待。

12月18日这天清晨，周恩来从昏迷中醒过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即俯下身去问：“总理，您想喝点水吗？”

周恩来摇摇头。

他又问：“您哪里不舒服吗？”

周恩来摇摇头，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要见罗部长。”

“是罗青长同志吗？”

周恩来点点头，眼中流露出急切的目光。

西花厅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秘书向邓颖超报告：“总理要见罗部长”。

邓颖超马上意识到，周恩来一定有重要的话要对罗青长说。

北京的冬夜寒冷而漫长，七点钟时，天还没有完全亮，罗青长接到四花厅来的电话，对方说：“罗部长，总理想见你，请你做好准备。中央有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才能见总理，我们正在请示，可是天还早，中央首长还未起床，你做好准备，随时等候我们的通知。”

罗青长十分激动，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总理了，周总理究竟病成什么样子了？这是多少同志关心的问题啊。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罗青长也受到江青一伙的严重迫害，他负责的国家核心机密所在地也受到严重冲击。像许多老同志一样，罗青长想不通形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去找周恩来请示，从夜里七点一直等到第二天清晨七点。望着周恩来熬红的双眼，他有些不忍心了，但还是提出了问题。周恩来没有多说，只是送给他三句后：“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罗青长说：“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邓小平是最早得到报告的，他果断地说：“总理病成这个样子，他想见谁就见谁”。得到中央的批准后，罗青长立即趋车奔往医院，耳畔响着邓颖超的叮嘱：“恩来病得很重，你要有思想准备，见了他不要太过难过，一定要克制。他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你多听他讲。”

尽管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见到周恩来后，罗青长还是忍不住哭了。他后来回忆说：“进入病房了，一眼看到周总理那消瘦的病体，憔悴的面容，我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赶紧走向前去向他问候。总理正在发高烧，体温是三十八度七，体质十分虚弱，但为了安慰我，他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久久不放，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就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听到这里，我泪眼模糊，声音哽咽，但想起邓大姐事前要我坚强的叮咛，我强忍悲痛，抑制着感情，连声对总理说：党政军的同志们都问候您，全国人民都关心您，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随后就抓紧时间，跟我谈起他在病中仍然关心着的台湾情况，关心着的台湾同胞和朋友。说着说着，他的声音低落下去了，眼睛逐渐合上了。我急忙劝他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却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和我谈下去。直到可恶的病痛再次把他折磨得说不出话来，他才疲倦地闭上了双眼。然而，只是稍歇了片刻，他老人家又强打精神对我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谈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罗青长守在周恩来的病房旁，许多往事涌上心头。然而，他记忆中最清楚的是：周恩来多次教导的“千万要记住，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他们曾经帮助过我们，如果祖国将来统一了，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

周恩来没有等到祖国统一，但是他的希望一定能够实现。深深了解他的心意的邓颖超，在周恩来去世后，让他的骨灰在人大会堂台湾厅停放了一夜，了却他的心愿。

**病危的时候，他想到的
还是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这天，周恩来的精神好一些，邓颖超轻轻地把他扶起来斜靠在枕上。

看上去，周恩来的心情似乎不错，他用手摸摸脸上的胡茬说：“小超啊，我这脸不知成什么样子了，真想请朱师傅来帮我清洁一下。”

周恩来称为朱师傅的叫朱殿华，是北京饭店的理发师。他给周恩来理了二十几年发，一般情况下，周恩来总是自己到饭店去理发，有时因为工作太忙，或急需接待外宾，他才派人把朱师傅接到家里来。周恩来对朱师傅十分尊重，从不埋怨或指责，每次朱师傅走进屋来，周恩来总是说：“老朱，又让你跑一趟，该耽误你的工作了。”每次朱师傅理完发，周恩来总会说：“谢谢！”

有一件事，给朱师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有一次，他去西花厅给周恩来理发，刚刮了一半脸，周恩来突然一咳嗽，朱师傅没提防，在他脸上刮了个小口子。朱师傅心里一阵紧张，不知如何是好。周恩来见状忙安慰他说：“这不怪你，怪我咳嗽没有向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为减轻朱师傅的思想负担，周恩来那天特意留他吃了晚饭再走。

周恩来住院后，朱师傅定期去医院为他修胡刮脸。可是到1975年底，周病情加重后，朱师傅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去了，所以周恩来的胡须长长了，他多么想见见朱师傅，多么想请朱师傅来为他修修面，理理发啊。

秘书似乎看透了周恩来的心思，忙问：“是不是请朱师傅来一下？”

周恩来想了想，叹口气，又摇摇头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让他来吧。”

听到这里，身边的同志一阵酸楚，别过脸去。

周恩来就是这样，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想到的还是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周恩来病情严重后，完全卧床，大小便需要别人帮忙，但是他从来不让女护士为他帮忙。邓颖超劝他说：这是她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再说，你可以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啊。但周恩来坚决不肯，表现了对女同志特别的尊重。

周恩来患的是癌病，深深体会到这种病给人带来的痛苦。从自己的病，他想到了更多受到癌病折磨的人。

云南锡矿是肺癌高发区，旧社会许多工人患了癌病，没法治，只好回家等死。病重的周恩来却把锡矿工人的生命挂在心上。1975年3月，刚刚手术后的周恩来，在手术台上叫住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大夫李冰。

周恩来说：“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李冰回答：“知道”。

“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周恩来说话十分吃力，但语气却十分坚决。

李冰哭了，在场的人都感动地哭了。

吴阶平大夫后来回忆说，在周恩来弥留之际，看见他站在床前，还说，“吴大夫，我这里没有事了，你去照顾别人吧。”

这就是人民的总理，这就是人民的总理表现出的高尚情操。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去世。

这是一个人们永远难忘的日子，也是一个人们永远记住的日子。

周恩来走了，但是，他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人民心中的丰碑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卓越领导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周恩来离开我们已经 20 周年了。他是一个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然而，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他的缅怀敬仰之情，历久弥深，在心中为他树起了丰碑。

为什么周恩来具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一个主要原因，是周恩来具有伟大的人格、高尚的情操。他一生率先垂范，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凡是要求党员和公民做到的，他首先做到；凡是禁止党员和公民去做的，他坚决不做。宁愿自己一无所有，但愿人民安居富足，真正做到了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周恩来对待自己，廉洁奉公，率先垂范。他经常说：“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陈毅感言：
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在工作上，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内审中国国情，外度世界大势，共同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作出决策。同时，他长期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无私奉献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但是在生活上，周恩来总是低标准，严要求，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特殊，就是对国家制度规定的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常常尽可能降低标准，弘扬我国人民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他经常说：要“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

建国后，周恩来一直居住和工作在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一座建于清朝宣统年间的老式平房。光线昏暗，地面潮湿，梁柱蛀蚀。油漆剥落，门窗缝隙也很大，大风一刮，桌面就积一层灰土。成年累月在这个环境中办公，周恩来经常膝盖疼痛。尽管如此，他仍然多次拒绝为他维修房子。

1959 年冬，秘书趁周恩来、邓颖超不在北京，对房屋进行了保护性维修，并更换了部分陈设，结果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随即，他暂住外面，直到秘书把淘汰的陈设搬回来后，才回到西花厅。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行政秘书何谦说：

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些你们为什么不想到？

为了修缮西花厅一事，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他说：“借此机会我得做自我批评，修了房子，你们可以到西花厅去看看，修得标准太高了，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

周恩来的饮食简单清淡。他的主食一般要吃 1/3 的粗粮。每餐大部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一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每当有人感到不解时，周恩来总是爽朗地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比过

去好多了，我们不能忘本啊！”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和毛泽东带头不吃肉、鱼、蛋，并主动地把自己和邓颖超每月的粮食定量降到 15 斤和 13 斤，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说：“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从此，他俩始终以这个粮食定量为标准。

周恩来不仅自己吃得简单，招待国内宾客也是如此，而且总是自费，从不让公家报销。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 60 年代初期的情况时说：

这期间，他们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及做工作，还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和副食，请文艺界、戏剧界、新闻界、体育界及医务界的同志吃饭，多时三四十人，少则 20 多人。当时，我负责管理他们的家务，知道他们在经济上也不宽裕……

每次宴请前都是周总理、邓大姐亲自安排的。他们先向我们问清家里有多少节余下的粮食和副食，然后和我们共同商定邀请人数和吃什么饭菜。他们定的原则是，要让大家吃饱，花样可少，但量要大，最后大杂烩菜包底。总理、大姐提出自己腌泡菜，做小菜，多吃豆腐粉条，肉少就买些排骨、猪蹄，有时也买一些高价食品。每次宾客来后，周总理总是谦和地说，请大家来见见面，聚一聚，现在是困难时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大家，我和小超大姐个人请大家吃顿便饭。这样的聚会真是无拘无束，亲如家人。

1962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北戴河寓所，周恩来宴请了正好在北戴河搞创作的部分电影界、戏剧界知名人士。据当时在那里搞创作的著名剧作家、电影艺术家岳野 1992 年在《寻梦觅踪，重沐甘霖》一文中娓娓叙述：

那天在总理住处临时吃饭时，先闻其声，后见其人，陈老总携夫人张茜同志来了。周总理立即宣告，今日我和小超（总理平时对邓大姐的称呼）请大家吃便饭，特邀陈毅同志张茜同志做陪。陈老总连连拱手，荣幸之至。饭是中餐西吃，每人一碟菜，主食有馒头、蒸饼和米饭可以自取。菜盘内有柔香而不腻，晶莹如琥珀般的红烧肉五六块，有油菜、菠菜，还有榨菜丝等几样，人手一份，或坐或立，不围桌，不成席，随意自在，孙维世以主家大小姐姿态，忙出忙进帮着炊事员端菜、端汤，照顾大家。总理说，饭菜不好一定管饱，大肚汉们可食双份。话音既落，瞧有几个馋客便立即加快速度，再食第二盘。

陈老总边吃边大声道破了一个惊人的内情。他说今天总理夫妇请客，未动用国家一文钱、一两米、一两肉、一根菜，完全是他老两口平时供应的节余。同志们吃着、听着，心里极为不平静，1962 年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每人的主副食皆定量供应，我们这群素不拘礼仪的“老九”们，想到多吃多占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口粮及副食供应，也感愧交加了。

陈老总边吃边向邻近的同志低声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此时我们每个人对每粒饭、每块肉更细加品味起来，鸡吃萤火虫，心知肚明，不能只图个齿馥嘴香，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哺育啊！

每次外出视察，周恩来总是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盛气凌人，摆架子，抖威风，还要过问伙食，督促身边工作人员据实交纳粮钱。

一次，周恩来在杭州楼外楼请工作人员吃饭。饭亏，省里陪同人员提出由地方报销。几经交涉，终于付了 20 元钱。临上飞机时，周恩来怕饭钱不够，又托人带去 10 元。其实，按价计算，这顿饭只花了 19 元多。楼外楼服务员只好给周恩来写信说明情况，并退还了多付的饭钱。

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有时因为时间长需要准备工作餐。他明确规定，工作餐就是家常便饭。他常说，这样的饭菜，“既经济又实惠”。据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回忆：1963 年，周恩来请出席中央专委会会议的同志吃晚饭。后到的贺龙元帅望了望饭桌，风趣地对周总理说：“呀，国家的经济好

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呀？”周恩来笑答：“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周恩来在穿着和使用生活用品上，也一向注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服（看上去虽然干净、挺括），修了又修的皮鞋，织补了又织补的袜子；戴的是使用了多年的“上海牌”国产表；用的是打了补钉的毛巾、掉了许多瓷的澡缸、木板床、旧沙发……一套睡衣是1950年初出访苏联时做的，缝缝补补，一直穿到面目全非，伴随他度过26个春秋。每当工作人员向他提出需要添置新衣时，他总是说：“旧的还可以穿嘛！”“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从周恩来的家庭经济条件来看，生活本来是可以过得好一些甚至是很好的。但是，每当他想到国家还落后、人民生活还清贫时，内心就忐忑不安，食不甘味。因此，他常挂嘴边与人共勉的一句话是：

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有人或许会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收入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他俩一贯省吃俭用，一定积攒了不少钱吧？

其实不然，据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周恩来每月工资是404.8元，邓颖超是342.7元。从1955年7月国家实行工资制以来到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他俩的工资除支付生活费外，其他开销是很大的，主要用在五个方面：资助亲属；补助生活困难的包括警卫战士在内的身边工作人员；抚养烈士后代；开会人员和客人的就餐费；额外上交的党费。据初步统计，周恩来、邓颖超用于补助工作人员的钱有10218.6元，资助亲属的钱有36645.5元。周恩来拿出节余的钱交党费，先后3次；共14000元。仅此3项支出就高达60864.1元，相当于花掉了12年零5个月的工资。

周恩来从不收受礼物。对于所送礼物，凡是能够退回的一律退回，凡是不能退回的就加倍付款，然后将礼物交有关部门处理，做到秉公办事，不留情面。

1961年初，周恩来就家乡淮安县委托人带来一些土特产等礼物一事，委托秘书代写了一封信。

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薪金中拿出100元钱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

在秘书随信寄去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上，还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他恳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人认真阅读，坚决按中共中央通知精神执行。

周恩来的这一做法，有效地阻止了请客送礼不正之风的滋生与蔓延。

外宾赠送的礼物，虽然是友谊的象征，但周恩来从不据为己有，总是如数上交。一次，一位烈士子女看见西花厅客厅、办公室和卧室都没有像样的陈设时，纳闷地问周恩来：“你经常出国，又有那么多外国首脑来访，送了那么多礼品，怎么一件陈设也没有呢？”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我是总理，他们才送给我，如果不是总理他还会送吗？”可见，“人家是送给我们国家

的，并不是送给我周恩来的。如果我把国外送来的东西收下来了，那是什么行为呢？”

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使这位烈士子女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廉洁奉公的道理。

周恩来对待妻子，高标准，严要求。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这个做法，得到心心相印的邓颖超的充分理解和支持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婚后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情深意笃，患难与共，是夫妻关系的楷模。他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体贴邓颖超，而且在政治上坚持高标准，严格要求邓颖超，不以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代替严肃的政治关系。

新中国诞生时，不少妇女界知名人士，如宋庆龄、蔡畅、何香凝、李德全、史良都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了部长以上的重要职务，而且他们大都是由周恩来同各界人士协商后当选和被任命的。本来，以邓颖超的才能、威望和资历，完全适合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但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没有同意。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卫戍司令彭干臣烈士的妻子江鲜云对此很不理解，直言相问。周恩来也快语相答：

这个问题不是你第一次提出，过去已有人提过，建国初期党内外人士都这么提过，甚至还有人劝过我，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

紧接着，周恩来加重语气，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周恩来这个做法，得到心心相印、同舟共济几十年的邓颖超的充分理解和坚决支持。早在他俩新婚燕尔之时，就有一个“君子协定”：“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和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80年代初，邓颖超仍颇感欣慰地说：“几十年来，我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现在看来，夫妻不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是比较合适的。”

周恩来不但不同意邓颖超同他在一个具体部门工作，就是对她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也历来从严掌握。1955年确定工资级别时，中共中央批准蔡畅定为3级、邓颖超定为5级，周恩来却把邓颖超压到6级。1974年，毛泽东批准邓颖超担任副委员长，但周恩来却把批示压了下来。

1982年4月，邓颖超对几个晚辈说：“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但是，如果你们的伯伯在世，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

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多么高尚的情操啊！

周恩来对待亲属，不顺从迁就，不允许有丝毫特殊。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是一个极重感情、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并竭力提供帮助的人。但是，他对亲属的关照和帮助是有原则的，不顺从迁就，绝不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也绝不允许亲属有丝毫的特殊，更不用说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他极其憎恨“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丑恶现象。

同时，周恩来十分注意不受亲属的错误思想影响和左右，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

周恩来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 20 年代曾参加革命，建国后是工业部门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被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为此，他多次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意见。后来，他又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这件事，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周恩来再次郑重其事地要内务部为他弟弟办了因病退休手续，自己则按月补贴胞弟家用。

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但对亲属子女十分疼爱，视作亲生子女一样教育，目的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周恩来总是教育他们：“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规定，不能利用亲属的职权搞特殊化。”为此，他和邓颖超给他们规定了不成文的严格“家规”：不准专程到北京看望；来者一律住机关招待所，在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己掏钱买饭菜票，没有的则由他俩代付伙食费；不许动用公家汽车；不准说出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来炫耀自己；生活要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在亲属子女选择志愿时，总是教育他们以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为自己的第一志愿，1961 年，他动员侄子、侄媳带头响应党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双双由北京调回家乡淮安工作。

1970 年底，中学毕业后分别到延安和内蒙插队落户的周恩来侄儿周秉和、侄女周秉建都在当地参加了解放军。

当侄女高高兴兴地回北京报喜时，没想到周恩来却要她“脱下军装，重新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他轻言细语地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

在周恩来看来，参军是件好事。但当时全国共有数百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由于农村条件艰苦，有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途径离开农村，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很不好。因此，他要侄儿、侄女带个好头。兄妹二人觉得伯伯的话在理，毅然脱下军装，回到了各自所在的农村。

针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周恩来曾经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大声疾呼：

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 407 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像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这番话，是周恩来对高级干部在应该如何教育子女问题上所敲的警钟，是“盛世危言”，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年轻一代的殷切关怀之情和寄予的厚望，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周恩来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曾经说：“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而死”

为什么周恩来在一生中能够时时处处、始终如一地做到率先垂范，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呢？根本原因，是周恩来牢固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而正确的行为必然受正确的思想支配。早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他就确定了共产主义理想，明确表示：“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深知：“力量的源泉是人民”，“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有人把谋求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作为人生奋斗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周恩来对此却嗤之以鼻。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把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自己崇高的唯一的人生追求。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曾经说：“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进一步指出：“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光明的前途服务。”他告诫说：我们要“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一分钟工作”。“我老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

周恩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人民的幸福为乐，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人民群众的疾苦常常使他彻夜难眠。

1956年，当他得知因救灾措施不力，广西部分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后，沉痛地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和关心不够，那是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经常出现在人民群众遇到旱涝、风雪、地震等重大灾害或事故的地方。

1958年7月，在黄河出现特大洪峰的危急关头，他亲临黄河大桥工地，冒雨和工人们一起抗洪抢险。

1961年5月，在灾情较严重的河北武安县，他同社员同吃一锅饭，就人民反感的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研究，并及时地向党中央提出了纠正“大跃进”偏差的办法。

1966年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在余震不断的紧急关头，他赶赴灾区，同灾区人民共商抗震救灾大计，鼓励他们重建家园。在人民群众表示感激之情时，他响亮地说：“为人民服务应该！”

凡是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民群众，无不从他那里直接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政府的温暖。

周恩来晚年胸前一直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这就是他一生只讲

奉献，从不索取，把个人有限生命完全溶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操的真实体现。

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总有一些确曾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能善始善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拜倒在金钱的脚下腐化堕落了，这是为什么？从周恩来认真坚持党性修养，不断进行思想改造的感人事迹中，我们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重视党员的思想改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提高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周恩来非常强调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郑重地指出：无产阶级肩负着“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任务，但是，“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各种旧的政治影响和习惯势力，对我们仍有影响”，“至于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就更多了”，因此，“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强调：“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周恩来清楚地看到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他告诫道：“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他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周恩来不仅重视全党的思想改造，更注重自己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自觉、严格地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他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我曾经同包括蒋介石、马歇尔在内的国民党和美国等国的各界人士打过交道。“我的关系可复杂了”。从周围环境看，我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很多，出访时还要同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打交道。“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我今年65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他还说：“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

在周恩来看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自我改造，加强党性修养，这是由其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担负的重大责任决定的。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党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和执行得好坏。

基于以上认识，周恩来针对有的领导干部忽视自我思想改造的危险倾向，在60年代初曾以尖锐的语言，予以当头棒喝：“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

针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1995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也发出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严以律己，防微杜渐。江泽民的号召同周恩来在30多年前的警告，一脉相承。周恩来的警告，在新时期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周恩来以自己认真坚持党性修养，长期进行思想改造的行动，有效地保证了牢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忠实地履行了

“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誓言。

周恩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他的丰功伟绩和伟大形象将光照万世，永垂青史！

后记

10几年来，我们一直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曾参加撰写《周恩来传（1898—194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的工作，目前正参加撰写《周恩来传（1949—1976）》、《周恩来年谱（1949—1976）》的工作。

几年前，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同志提议，希望我们能写一本生动而真实地再现周恩来总理生涯的普及性读物，奉献给衷心爱戴并热切期望更多地了解周恩来的人们。这是一项使我们兴奋不已的很有意义的光荣任务，理应尽心竭力把它做好。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准备，我们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断断续续却是严肃认真的写作，终于写成本书。

为了区别于近两年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体书籍，我们选择了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片断，以独立成篇，而又不失内在逻辑联系的形式，以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和简洁明快的文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光彩照人的思想、生平和业绩。其中第1—10、15、20—23、25、28、29、36篇由熊华源撰写；第11—14、16—19、24、26、30、32—35篇由廖心文撰写。另外，第27篇由杨明伟撰写；第31篇由陈扬勇撰写。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现任室顾问李琦同志，原室务委员、研究员力平同志的热心指导与大力帮助，请他们审阅了全书，并承蒙力平同志为本书作序；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副研究员安建设同志审阅了部分书稿。我们还得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马连儒同志、国际编辑室副主任王德树同志和原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吴学金、肖辉、朱强、李兰亭、吴志敏、吴侮平、高丽华等同志也分别参加了本书的审稿、封面设计、校对等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限于写作水平，书中若有错漏不当之处，祈盼读者指教。

作者

1996年6月于北京毛家湾

